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未解之谜 / 乔赫水主编。—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2

ISBN 7 - 80702 - 286 - 8

I . 世... II . 乔... III . 科学—世界—解密 IV . G1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1245 号

世界未解之谜

乔赫水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 350 × 1168mm 1/32 印张 32

字数 200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ISBN 7 - 80702 - 286 - 8/G·190

定价 228.00 元 (全 10 册)

编 委 会

主 编：乔赫水

编 委：乔赫水	朱立春	李 萌	杨 波
李维杰	李喜彪	丁 文	丁荣英
倪 文	吕致文	曲洪琪	唐景安
任 珂	莫关亮	翟国斌	刘天桦
江小帆	郭 超	江 一	程 武
谭 波	常志冈	钟力辉	罗 琳
刘 琪	尹 农	陆 冰	王 新
姚继志	董嘉坚	王 军	牛 立
许向华	陈迎冰		

目 录

目 录

娥皇女英二妃之谜	(1)
斑竹一枝千滴泪	(1)
姐妹二人·同时落水	(2)
夏帝王姒孔甲之死	(4)
商纣王死亡探谜	(8)
掘墓人定律	(8)
象牙筷子	(9)
最长之夜	(9)
夺床斗争	(11)
一连串暴行	(12)
煮成肉羹与兔子	(12)
比干与空心菜	(13)
火烧摘星楼	(15)
周昭王淹死汉水之谜	(16)
第一次征楚内幕	(16)
第二次征楚内幕	(17)
周昭王死亡之谜	(18)
秦始皇坑儒之谜	(20)
赵高乱秦政之谜	(22)
吕后大封吕氏家族之谜	(24)
刘彻被立为太子之谜	(26)
初为胶东王留下的谜团	(26)
栗姬失宠毁儿子内幕	(27)
刘彘被立皇太子秘情	(29)

世界未解之谜之中国历史之谜

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之谜	(30)
汉武帝夜闯民宅之谜	(33)
王昭君出塞之谜	(35)
王莽篡汉探秘	(37)
刘备“三顾茅庐”之谜	(41)
曹操不当皇帝之谜	(42)
南征北战为了谁	(42)
临死立下什么遗嘱	(45)
司马衷委曲求全之谜	(46)
太子如何游戏人生	(46)
太子被害揭秘	(47)
贾南风成为皇后探秘	(48)
东晋孝武帝出生之谜	(53)
东晋孝武帝暴崩之谜	(55)
南齐东昏侯胡作非为揭秘	(57)
梁武帝崇佛之谜	(59)
陈后主淫曲之王揭秘	(63)
北魏立嗣杀母之谜	(65)
拓跋弘之死揭秘	(67)
胡太后被溺死之谜	(69)
皇帝为何称为丐帮帮主	(71)
苻坚功败垂成之谜	(74)
英雄一世死得悲凉	(76)
隋文帝暴崩之谜	(77)
梅妃之谜	(79)
杨贵妃归宿之谜	(81)
唐宣宗当和尚之谜	(83)
赵匡胤“暴死”之谜	(84)

目 录

花蕊夫人之谜	(86)
赵氏家族病之谜	(88)
辽穆宗嗜睡	(91)
成吉思汗陵墓之谜	(94)
“上帝之鞭”蒙哥死因之谜	(96)
朱元璋大兴文字狱之谜	(97)
建文帝失踪之谜	(99)
明成祖生母之谜	(101)
权妃死因之谜	(102)
明英宗“南宫复辟”之谜	(104)
嘉靖崇仙之谜	(106)
懿安皇后下落之谜	(108)
努尔哈赤死因之谜	(109)
大妃阿巴亥葬地之谜	(111)
太后下嫁之谜	(112)
顺治继位之谜	(114)
顺治出家之谜	(116)
雍正继位之谜	(118)
雍正尸体无头之谜	(120)
年羹尧被杀之谜	(122)
乾隆身世之谜	(124)
乾隆九进孔府之谜	(126)
乾隆自称“十全老人”之谜	(127)
“香妃”之谜	(129)
孝全皇后死亡之谜	(132)
咸丰死因之谜	(134)
慈安暴卒之谜	(135)
慈禧身世之谜	(137)

世界未解之谜之中国历史之谜

慈禧病亡之谜	(139)
慈禧随葬珍宝之谜	(140)
光绪“衣带诏”之谜	(142)
光绪死因之谜	(144)
珍妃堕井之谜	(146)
溥仪葬地之谜	(148)
袁世凯猝死之谜	(150)
西施的归宿如何	(155)
屈原自沉汨罗江之谜	(157)
貂蝉之谜	(159)
骆宾王的归宿之谜	(161)
李白死亡之谜	(165)
杜甫死因之谜	(167)
“苏门四学士”之谜	(170)
李师师归宿之谜	(171)
李清照晚年有没有改嫁	(173)
陆游与唐婉爱情悲剧之谜	(176)
真有潘金莲其人吗	(178)
董小宛之谜	(181)
陈圆圆香魂归何处	(183)
“扬州八怪”之谜	(186)
“八大山人”之谜	(188)
赛金花之谜	(190)
“两昆仑”之谜	(193)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谜	(196)
小凤仙之谜	(198)
《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作的吗	(200)
《历代帝王图》作者之谜	(204)

目 录

《五牛图》之谜	(206)
《清明上河图》之谜	(207)
《满江红》作者之谜	(209)
杂剧《西厢记》的作者是谁	(212)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214)
《三国演义》成书之谜	(217)
《西游记》作者之谜	(219)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	(220)
《红楼梦》的原作者是谁	(224)
《聊斋志异》成书之谜	(226)
《镜花缘》的作者是谁	(229)
《人间词序》之谜	(231)
《二泉映月》之谜	(233)
陶渊明故里之谜	(234)
“三星堆”之谜	(236)
大观园之谜	(238)
紫禁城之谜	(241)
杏花村之谜	(243)
岳阳楼之谜	(244)
乐山大佛之谜	(246)
桃花源之谜	(248)
黄鹤楼之谜	(250)
碣石之谜	(252)
抚仙湖水下建筑之谜	(253)
岱顶无字碑之谜	(256)
夜郎古国之谜	(258)
长城之谜	(259)
泰山封禅之谜	(262)

世界未解之谜之中国历史之谜

姑苏台之谜·····	(264)
长江之谜·····	(266)
九鼎之谜·····	(267)
传国玺之谜·····	(270)
大禹葬于会稽山吗·····	(272)
曹操的陵墓之谜·····	(275)
刘备的陵墓在何处·····	(278)
寒山寺古钟今何在·····	(280)
岳飞墓之谜·····	(283)

娥皇女英二妃之谜

斑竹一枝千滴泪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不得善终的皇后，是黄帝王朝第七任帝虞舜的妻子伊娥皇，和她同死的，还有她的妹妹伊女英。

伊娥皇是公元前二十三世纪的美女，她爹是唐尧帝伊放勋。后来跟她的妹妹伊女英，一齐嫁给虞舜。

姚重华在中国历史上属于传奇人物，他和伊放勋，被儒家学派形容为天上少有、地下只有一双的至善至美。不但是空前绝后的标准君王，而且是空前绝后的典型完人。人类所有的美德，全部集中在他们身上，没有人性弱点，更没有人性缺点。以致看起来不像是人，而像是神。

当伊放勋在平阳（山西省临汾县）称孤道寡时，姚重华还是二百公里外蒲阪（山西省永济县）一个小部落酋长的儿子，默默无闻。可是他胸怀大志——也可以说他不知道安分——于是就发生了一连串怪事。这些怪事可能真有，也可能只不过是为了美化他而捏造出来的。反正，无论如何，怪事终是怪事。怪事是，姚重华的一家人，全是蛇蝎心肠，只有他一个人大仁大孝。这是一种画家常用的烘托笔法，必须在周围全涂上黑墨，才能使月亮雪白如昼。后世史学家为了突出姚重华，不惜工本，把他爹他娘，以及他弟弟，甚至他的妻子伊娥皇和伊女英，都泼上污水。

史书上说，重华父亲瞎老头（瞽叟）、继母，跟继母生的弟弟姚象，三个集人类至恶至丑的家伙，组成联合阵线，跟集人类至善至美的重华作对。父亲日夜计算怎么才能杀他的儿子，弟弟则日夜计算怎么才能杀他的哥哥。父子都是丧尽天良、谋财害命的高手。这是一个恐怖的家庭，阴风惨惨，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凶案。事实上

也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不过每一次,重华都靠着他的机智和运气,死里逃生。于是,他奇异的“大孝”行为,传到伊放勋耳朵里,放勋就把伊娥皇、伊女英两位公主,嫁给他。

不可理解的是,儿子虽然娶了公主,父亲仍饶不了他,非干掉他不可。史书上说,父亲教姚重华上房洗瓦,等他刚爬上去,父亲就在下面放火,要把儿子烧死,谁知道姚重华早有准备,手拿斗笠,就像降落伞一样,冉冉而下。一计不成,再来一计。有一天,父亲教姚重华掏井,姚重华知道父亲又要露一手,早就秘密地在井底凿了一条地道,通往地面。果然,等到姚重华一下了井,父亲和弟弟立刻七手八脚地把井填平。父亲拍巴掌曰:“好啦,这下子他死定啦。”姚象曰:“这计谋是俺想出来的,家产俺要平分。”平分就平分,父母高高兴兴把儿子的牛羊赶走,弟弟则高高兴兴地把两位年轻漂亮的嫂嫂接收,把哥哥的琴放到桌上,又弹又唱,好不得意。正唱得起劲,想不到哥哥从地道爬出来,墓地在门口出现,两个人当时那副面孔,一定大为可观,结果弟弟狼狈而逃,父亲赶走的牛羊,也只好再赶回来。

姐妹二人·同时落水

当伊放勋听了亲家翁的种种奇怪恶行和女婿的种种奇怪孝行之后,大为感动,认为有孝行的人,必然忠心耿耿。公元前二二五八年,伊放勋逝世,他的儿子伊丹朱继承帝位,屁股还没有把龙墩暖热,重华就发动政变,把他放逐到丹水。

——丹水在哪里?谁也说不准,丹水可多啦。山东省昌乐县有丹水焉,河南省济源县有丹水焉,湖北省宜都县有丹水焉,陕西省商县有丹水焉,陕西省洛川县有丹水焉,河南省开封县也有丹水焉。可是依以后所发生的事推测,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伊丹朱可能被放逐到最远的湖北宜都,那里距平阳距离六百公里。

——姚重华的孝行,不但奇怪,而且诡譎,除非故事是假的,否

娥皇女英二妃之谜

则的话,他的种种孝行,使人毛骨悚然。苏老泉有言:“凡事之不近人情者,咸不为大奸慝。”连孔孟二位圣人,都主张“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何况必置之于死地乎?

姚重华把伊丹朱赶走之后,自己坐上宝座,那是公元前二二五五年的事,距岳父大人伊放勋之死,已三年矣,说明这个宝座得来是如何的不易。

姚重华既成了元首,后世的史学家称他为“虞舜帝”,即孝顺友爱的君主也,如果传说不是乱盖,却也颇为名实相符。伊娥皇、伊女英,自然一律升格为“妃”。

公元前二二〇五年,姚重华死在湖南省苍梧山。伊娥皇和伊女英,走到湘江。——或许是在南下时走到湘江,筋疲力尽(她们也都老啦);也或许是丈夫死后,哭哭啼啼北返时走到湘江,感觉到已无生意。不管怎么吧,姐妹二人走到湘江,双双投到或跌到湘江淹死。

伊娥皇伊女英二位之死,我们不敢肯定它不是一场政治谋杀,夏部落首长姁文命既有胆量造反,他就有理由预防死灰复燃,来一个斩草除根。但我们也不排除她们姐妹殉夫自尽。不过,如果真是殉夫,后世史学家一定会大大喊叫,使姚重华更为膨胀。只有死得不明不白,尤其是,姁文命也被后世纳入了圣人系统,就更难下笔。记载遂不得不含含糊糊,吞吞吐吐。

事实上姐妹二人未死之前,曾每天哭泣,眼泪洒到竹子上,尽都成斑——奇怪的是,她们不在房子里哭,却跑到竹林里哭,是不是被逼投河时,抱着竹子,大放悲声?从此凡是有斑点的竹子,都被称为“湘妃竹”。姐妹死后,后人尊奉她们为湘江女神,姐姐伊娥皇为“湘君”,妹妹伊女英为“湘夫人”。屈原在所著的《离骚》中,就有下列诗句——

天帝的女儿降临了啊
向北眺望,有无限的悲愁

微弱的秋风吹着洞庭湖啊

树叶片片，落下水流

(原文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四千年来，出现无数吟咏她们姐妹的诗，都充满了哀愁，却没有悲愤。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于非命的皇后，第一位被权力争斗牺牲的女人，一幕一直被掩盖着的惨剧。

夏帝王姁孔甲之死

姁孔甲是姁少康的第七代皇孙。公元前一九二二年，姁不降死后，君王的宝座，没有传给他，却传给弟弟姁廑。公元前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前一九〇一年，姁扁死后，君王的宝座，传给儿子姁扁。公元前一八八〇年姁廑去世。君王的宝座，不知道什么缘故，才恢复原来系统，传给孔甲。

夏王朝在第三任君王姁太康时，进入危机，幸亏少康崛起，恢复姁姓皇族的政权，史学家称为“少康中兴”，即中兴衰微没落了的姁姓皇族。不过事实上，一个政权一旦覆亡，就是覆亡，要想中兴，就跟把一个死人从棺材里挖出来，要他复活一样，任何人都不可能。

姁孔甲是一个脑满肠肥的庸才，他任性、好奇、喜怒无常，不把人当人，智商不高，典型的富家子弟。虽受过跟他身份相当的教育，却无法摆脱大少脾气。除了打猎外，他只知道一味侍奉鬼神。打猎使他疯狂，而祭祖使他在为非作歹后心里平安，而且每逢祭祖，都要杀猪宰羊，可以名正言顺地大吃特吃。他什么都不管，只管努力娱乐。

有一年，他的猎狩部队，南渡黄河，猎狩在东阳邙山。传说那里是吉神泰逢住的地方，吉神泰逢显然不喜欢这个昏君，作起法

夏帝王姒孔甲之死

术，忽然间大风骤起，飞砂走石，天昏地暗，猎狩部队被刮得东藏西躲，四下逃命。孔甲带着随身的几个卫士，也狼狈地豕突狼奔。最后，在山坳里发现一个农家茅屋，便闯了进去。想不到，那家正设喜宴，原来主人新得了一个儿子，亲戚朋友正在那里热闹烘烘，举杯庆祝哩。姒孔甲的出现，使他们大为震惊。等到弄清楚他的高贵身份之后，就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曰：“这娃儿可是好命，生下来就碰到天子临门，一定福如东海，大吉大祥。”有的曰：“恐怕不见得，天子的气焰太盛，恐怕会使娃儿受到伤害。”姒孔甲大怒曰：“我怎么会使娃儿受到伤害？跟我走，我收养他当儿子，看谁敢碰他？”

娃儿一天天长，姒孔甲指派一队卫士，给他严密保护，他不是爱这个少年，而是要向他的人民展示他的权威，连天意都可以改变。

然而，一件意外事情发生。有一天，少年正在皇宫玩耍，忽然间，帐篷被风吹动，早已腐朽的椽柱，从中断裂，崩塌下来，像利斧一样，把少年的双足砍断。少年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他从此成为残废。姒孔甲听到报告，大失所望，显然他这个君王的权威到底有限。只好教少年去看守城门，恢复他的卑微日子。并且自己作了一首歌，曰《破斧之歌》，纪念他所受到的挫折。

《吕氏春秋》原文：

“夏后氏（姒）孔甲，田于东阳蒗山（河南省巩县北），天大风晦盲，（姒）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姒孔甲）来见，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姒）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乎。’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就在这时候，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种动物——龙，以堂堂正正的阵容，在朝堂出现。夏王朝第一任君王姒文命，就跟龙有密切

关系，南浔部落（不知道在啥地方）曾在地脉深处，挖出来两条一雌一雄的龙，进贡给文命，姒文命把它们饲养在一个大院里，命名那个大院为“豢龙宫”，请一些会养龙的人，负责饲养。那些养龙的人代代相传，久而久之，自成为一个特殊技能的家族。

姒孔甲有祖传的血液，他也喜欢养龙。《史记》、《左传》，异口同声地说，当他登极时，“天降二龙”。有人对此颇为疑心，认为龙象征祥瑞和富贵，怎么会跑到走下坡路王朝里献宝乎哉。不过，凡事之反乎常情常理的，一定有它的毛病。毛病一旦发作，人们才醒悟到，祥瑞有时恰恰是一个凶兆，二龙降临，原是为了夺命。

开山老祖姒文命早已归西，南行部落进贡的龙，也早死掉，豢龙宫也早废除。拥有养龙特技的豢龙家族，手艺也都生疏。姒孔甲急于物色一位专家来饲养他的宠物，豢龙家族中已没有人才，或许虽有人才，却想到侍候昏君的后果，而不敢推荐。于是姒孔甲找到了刘累，刘累曾经在豢龙家族那里学过几天手艺，并不精通，在养龙这个行业中，他只是三四流角色。但姒孔甲已经大喜过望，命他所属的部落为“御龙族”，用以褒扬他的特殊本领。

养龙跟养猪不同，养猪简单，只要喂它吃饱就行啦，养龙必须具备特殊知识，而刘累的特殊知识，似乎不多，于是不久，两条龙中的那条雌龙，就一命归天。养死了君王的宠物，可是滔天大祸。想不到刘累的反应使人叹为观止，他不但不赶忙报告，也不急着想办法补救，反而镇定如恒。他把死龙的肉割下来，做成一盘奇味，献给孔甲下肚，他说这是他的一番敬意，请君王尝尝新肴。孔甲吃了，大为赞赏。可是到了后来，姒孔甲问起龙的情形，要御驾亲瞧时，刘累才慌了手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带着家小，连夜开溜。溜到鲁邑（河南省鲁山县），销声匿迹不敢露面。

姒孔甲大发了一阵雷霆之后，终于找到一位高手师门。师门是嘯父的学生，而嘯父是一代异人，《列仙传》说，他还有一位学生名叫梁母。当嘯父决定离开人间时，他爬上三亮山（一个缥缈的仙

夏帝王姒孔甲之死

山)和梁母握手道别,然后在山上燃烧了几十堆营火,乘着火光,冉冉升天。在这种名师指导之下,可肯定师门的才能。所以用不了多少日子,他就把那条雄龙养得精神焕发、活蹦乱跳。

然而,师门从心眼里瞧不起那位蠢才君王,他不像刘累那样,像奴才般地奉命唯谨,而总是坚持他的意见。奉命唯谨的结果是把龙养死,据理力争的人则把龙养得又肥又壮。姒孔甲对龙毫无所知,却偏偏不断地对养龙“指示机宜”或“面授机宜”,如果真照他的“机宜”行事,龙只有死亡。师门对那个蠢才忍无可忍,他要求姒孔甲闭嘴。但他忽略了一点,姒孔甲虽然蠢才,却是君王。最后,在一场争辩中,姒孔甲被驳斥得体无完肤,他恼羞成怒,下令把师门处斩。师门笑曰:“老家伙,不必发脾气,杀人是没用的,你已经输定啦。”姒孔甲曰:“我不会输定啦,你却是死定啦。”师门的尸体埋葬在首都安邑(山西省夏县)荒郊野外。

师门身躯虽死,灵魂不灭,就在棺木入土的刹那,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山野林木忽然起火燃烧,首都居民蜂拥赴救,却无法扑灭。姒孔甲这时才知道他犯了错误,急忙御驾亲征,前往火场祈祷,乞求师门宽恕他的罪恶。经过一番祷告,火势才被熄灭。姒孔甲这才舒了一口气,坐车回宫。可能师门鬼魂就是要引他出笼,以便乘他回宫之时,附着他复仇。

当御辇在宫门口停住,卫士打开车门,请君王下车时,发现姒孔甲瞪目端坐,鼻息全无,已经死了。这时,大风又起,大风中似乎传出一种声音:“你输定啦,你输定啦。”一代君王,再不能复生。孔甲就这样死了,他那传奇般的死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

商纣王死亡探秘

掘墓人定律

商部落酋长子天乙把暴君桀履癸推翻后,他不再称夏王朝,而另外建立一个新政权——商王朝,把首都从安邑(山西省夏县)迁到他的根据地亳邑(河南省商丘县)。

商王朝立国六百六十二年,共三十一个君王,迁都六次。为啥左迁右迁,南迁北迁,现在为止,还没有弄清楚真正原因。有人说跟黄河不停地闹水灾有关,也有人说可能跟旱灾有关。商朝还没有完全脱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结构,所以也只好搬来搬去。到了公元前——一九八八年第二十八任君王子武丁时,他把首都迁到朝歌(河南省淇县)。朝歌原名“殷邑”,因之,对商王朝,人们也称殷王朝或殷商王朝。

商王朝三十位君王中,虽然有好有坏,有贤明的,有昏暴的,但他们总算保住性命,正常死亡。然而,六百余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它终于到了老境。公元前一一五五年,第三十一任君王子受辛即位,就在他手中,把他所赖以活命的商王朝,活活埋葬。

子受辛是第三十任君王子乙的嫡子,而他的同胞哥哥子启,却是庶子。原来老娘生子启的时候,她还是父亲子乙的小老婆,小老婆生的儿子,当然是庶子。后来,她荣升为子乙的大老婆,又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子受辛。子以母贱,子以母贵,老娘虽然同是一个老娘,却因为生子时的身份也不同。这就是儒家系统誓死拥护的经典。至少在这件事上,该经典不但害死了子受辛,也颠覆了立国六百六十二年之久的商王朝。盖子启是一位万众归心的贤明王子,假如他继承王位,商王朝的寿命可能延长下去。可惜,他是“庶子”,没有当君王的资格。

象牙筷子

在子启和子受辛之间,充分说明宗法精神,这种制度规定,只有嫡子才可以继承帝位,所以子受辛虽是弟弟,当子乙死掉之后,还是轮到他登基。

子受辛登极的那年是几岁,史书上没有载明,我们也无法猜测。《帝王世纪》赞美他的体力,说他能抓住九条牛的尾巴,倒拖着走。《史记》赞美他的聪明灵巧——聪明足使他拒绝规劝,灵巧足使他掩饰错误(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总括一句,曰:“死不认错”。

公元前一一四七年,苏部落(河南省温县)叛变,商朝大军讨伐,苏部落跟六百年前施部落同一命运,抵挡不住的时候,酋长只好把女儿苏妲己,献给君王。子受辛一瞧苏妲己天仙般的容貌,连自己姓啥都忘啦,立即下令停止攻击。

然而,子受辛的荒唐,不始于苏妲己,而始于使用象牙筷子。在猎象不易的公元前十二世纪,象牙筷子跟现代镶满钻石的筷子一样。象牙筷子不是孤立的,它有连锁反应。一则故事上说,一个人因为拣了一条锦绣裤带而终于家破人亡。

最长之夜

一条裤带都能惹起家破人亡,可看出象牙筷子的威力,更无坚不摧。子受辛的老叔子胥余,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叹曰:

“用象牙筷子吃饭,就不会看上泥土做的碗,而且还要更进一步用犀玉做的酒杯。既用象牙筷,又用犀玉杯,决不会再甘心喝稀饭、穿短袄、住在茅草篷底下矣。跟着而来的将是一件件绫罗绸缎,和一栋栋高楼大厦。顺着这种趋势,倾全国之力,都供应不起。远方的稀世珍宝,豪华的起居饮食,都从此开始。我担心的是,何以善后乎哉。”

世界未解之谜之中国历史之谜

子胥余，箕部落酋长、子爵，史书称“箕子”。箕部落位于箕山（阳城——河南省登封县），是古史上闻名的地方。伊放勋曾坚持“禅让”王位给巢父和许由，他们当然不敢接受，就逃到那里隐居。而稍后妣文命死后，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伯益，同样不敢接受“禅让”，也逃到那里躲起来。

箕子的话果然料中，盖奢侈荒唐，是没有刹车的；一旦起步，除非栽到万丈深渊，便会越奔越快。子受辛接着大兴土木，建筑“鹿台”——跟妣履癸的“瑶台”比美。鹿台可大啦，用玉石作门，每个房间都极尽豪华。面积四平方公里，高三百三十公尺，整整盖了七年才落成。把天下的金银财宝，都搜刮到那里，又在钜桥（河北省平乡县）建立一个仓库，储备粮食。子受辛深信：既有权、又有钱、又有粮，这政权可是钢铁打成的，任凭谁都动不了他一根汗毛。

子受辛步妣履癸的后尘，也“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不过有些地方，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下令男女都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互相打闹追逐。他兴趣勃发时，还用绳套住人的脖子，按到酒池里，叫他喝个够，直到被酒淹死。规定以三个月作为一夜——可真是最长之夜。他就跟土拨鼠一样，把昏暗的日子当成正常的日子。于是乎，忽然有一天，他问左右曰：“哎呀，今天是哪年哪月哪日呀？”左右张口结舌，没有一个人回答得出。再问箕子，箕子心里想曰：“当一个君王，使全国人连日子都不知道，政权危矣。全国人都不知道，偏偏我知道，我也危矣。”只好跟着沉醉，同样也不知道。

这是子受辛昏的一面，而暴的一面，表现在他清醒的时候，各地部落酋长们（诸侯）不堪苛扰，纷纷抗拒朝廷的勒索，有些甚至武装驱逐前来催缴税款的贪官污吏，这行为立刻被肯定为叛逆。子受辛认为胆敢叛逆，不是因为他的暴政，而是因为刑罚不够严厉。他认为，逮捕和杀戮是治疗叛逆的惟一特效药。

夺床斗争

子受辛博古通今，他知道他最敬佩的老前辈妲己发明过“炮烙”酷刑，该酷刑被废已六百年之久，为了大力镇压反动势力，决定恢复使用。最初，该刑以简陋的小姿态出现。只不过是一个铁熨斗，用火烧红后，叫囚犯举起。可惜的是，囚犯还没有举到头顶，双手已焦。子受辛因看不到举起的盛况，大发雷霆，他不允许破坏他的乐趣。于是改用巨大的铜柱，在铜柱上涂抹油脂，叫囚犯从这一端走向那一端，囚犯滑下来，恰恰滑到熊熊炭火里，发出哀号，子受辛乃龙心大悦。

子受辛的聪明灵巧，一旦向凶暴方向发作，就势不可挡。

《皇后之死》曰：

“厨夫烤熊掌没有烤熟，他立刻把厨夫杀掉。杀掉厨夫不足为奇，后世帝王的表演还超过他。奇的是子受辛可怕的研究精神。有一年冬天，他坐在鹿台之上，看见一个倒楣的穷朋友，脱掉鞋袜，赤足涉过溪流，不禁大惊曰：‘天这么冷，竟然不怕，他的脚构造一定不同凡品，敲碎让我瞧瞧。’结果穷朋友的双腿和双脚被敲碎，取出骨髓，以供御览。又有一次，子受辛对怀孕的女人，发生了兴趣，下令剖开肚子，把胎儿拿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呜呼，穷朋友还有活着的可能，孕妇只有惨死。而凡是被干掉的异己，尸首统统都拖去喂老虎。”

不久，苏妲己发动的夺床斗争爆发，引起一连串屠杀。古中国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这对男人而言，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制度之一。但对女人，却是一种噩运，使她们不得不投身于激烈的夺床斗争之中。在民间，夺床斗争失败，不过失掉丈夫；在宫廷，夺床斗争可是一片血腥，一旦失败，不仅失掉丈夫，还要失掉芳魂，甚至，还可能断送全家人的性命。

子受辛有三位重要大臣，曰：九侯、鄂侯、西伯。除了西伯我们

知道姓姬名昌之外,其他二位的姓名,史书上没有记载。九侯的女儿是子受辛的姬妾之一,她当然貌美如花,再加上高贵的出身,理应得到宠爱。可是,她的敌人苏妲己却棋高一着。

一连串暴行

九侯女儿的灾难,可能由于她过度矜持。司马迁用简单的几个字描述:“九侯女不喜淫,纣(子受辛)杀之。”问题是,谁都想不到该娇娃被砍下玉头之后,引起的反应,不可遏止。

《皇后之死》曰:

“可能是迁怒,也可能是预防报复,(子受辛)又把九侯也处斩,而且剁成肉酱。鄂侯一瞧,这简直不像话,极力规劝。咦,暴君一旦发了脾气,任何理性的话都听不进去。劝得太恳切,反而被认为:‘怎么,你胆敢同情别人,吃里爬外呀。’有此一念,索性连鄂侯,也一并剁成肉酱。

“子受辛一连串暴行,使惟一残余下来的三公之一的姬昌,如雷轰顶,他不敢再去规劝,他知道规劝的结果是啥——一团肉酱,他只有叹气。然而,叹气也不行,崇侯虎立刻一个小报告打到子受辛那里。“崇侯虎曰:‘姬昌有他的所谓影响力,很多部落酋长都服他,他心里已经有鬼,恐怕将有不利于国家的行动。’子受辛毛骨悚然,下令逮捕姬昌,囚禁在美里(河南省汤阴县)。”

煮成肉羹与兔子

姬昌被囚禁之后,他的大儿子姬考,正以人质的身份,在朝廷任职,负责君王的车辆马匹,有时候也替子受辛驾车。暴君们都是翻脸无情的,子受辛既跟姬昌翻了脸,一不做、二不休,立刻下令把姬考“烹之”。是杀了之后煮他的尸体呢?或是把活人按到滚水锅里活活煮死呢?史书上没有记载,只记载煮了之后,熬成肉羹,送给姬昌当饭。子受辛曰:“如果姬昌是圣人,他一定拒绝吃自己亲

商纣王死亡探秘

生儿子的肉。”但姬昌却坦然下肚，子受辛笑曰：“谁说姬昌是圣人，吃了自己亲生儿子的肉却不知道。”

民间传说，姬昌是知道的，但他不得不吃，吃了还有活命的可能，不吃则徒触怒暴君，结果自己也会被煮成肉羹。但他无法消化，在一阵呕吐后，吐到地上的残肉，忽然变成了一只小白兔，向他拜了拜，一蹦一跳而去。神话学家说，自从嫦娥把惟一的小白兔抱到月球上之后，小白兔就绝了迹。直到姬考惨死，地上才再有这种可爱的动物。

煮掉了姬考，使位于岐山（陕西省岐山县）的周部落，陷于恐慌，因为子受辛下一步可能把父亲姬昌也煮掉。周部落用尽方法营救，都没有结果。周部落的智囊人物闳夭，回想起六百年前子受辛的老祖宗子天乙如何逃脱妣履癸魔掌的故事，就一方面收购骏马，一方面发动突袭，把莘部落（陕西省郃阳县）包围。莘部落以出产美女闻名于世，美女遂被掳一空（也可能在威逼下，出售一空）。这些礼物使子受辛先生心花怒放，尤其对于美女。他曰：“有一个就足够啦，何况这么一群乎哉。”于是下令释放姬昌，为了回报美女们，还发给周部落一批武器，而且泄底曰：“不是我要抓他，是崇侯虎那小子打他的小报告呀。”

释放姬昌，等于纵虎归山。六年后的公元前一一三六年，姬昌为报这一箭之仇，攻击崇部落（陕西省户县），把酋长崇侯虎吊死，整个部落小民，掳作奴隶。子受辛对这位忠心的酋长这么轻易地出卖，使所有仍效忠他的其他部落改变了态度。次年（前一一三五），姬昌逝世。他有一百个儿子，就由他儿子之一的姬发，继承酋长位置。

比干与空心菜

姬发是激进派，他不久就集结了八百多个小部落的部队，向首都朝歌（河南省淇县）进攻，然而，攻到孟津（河南省孟津县），却被

商军击败。

这一次的军事行动，造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子受辛，认为叛乱已被镇压，一小撮不安分的莠民，已接受惩罚，证明人心倾向，邪不胜正，就更肆无忌惮。另一些人，包括子启、大臣祖尹在内，却认为小民的忍耐力已达到饱和，抗暴怒火已在燃烧，孟津之役，并没有消灭了火种，只不过用被子把火种盖起来而已。祖尹把这种判断告诉给子受辛，子受辛笑曰：“我的命天注定，小民蠢动，不过送死。”祖尹叹曰：“这个家伙完蛋啦。”于是，子启、祖尹和一大批头脑清醒的官员，开溜逃命。只有贵族成员之一的比干曰：“主上有过，不去规劝，不能谓之忠心。怕死不敢说话，不能谓之勇士。”可怜的这位忠心的勇士，他为他的愚昧付出代价，他不断地提出批评和建议，终于超过了暴君容忍的上限，子受辛变色曰：“你是何居心？显然是别有居心！”

比干回答：“我只是为仁为义！”子受辛对比干的“桀骜不驯”大起反感，他曰：“想不到你真是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把你的心掏出来，教我瞧瞧。”

比干被剖心之后，一缕忠魂不散，尸首仍悠悠忽忽，走到田野，遇见一位农妇挖菜，比干曰：“菜有心乎？”农妇曰：“菜当然有心，无心怎么能活？”比干曰：“不然，人无心照样能活。”农妇曰：“你这个傻瓜，人无心非死不可！”一语道破，比干大叫一声，倒地气绝。同时，刹那之间，那一带菜的菜心都化为乌有。据说，这就是空心菜的来源，用以使后人永远不忘暴君兴起的这场凄惨冤狱。

比干一死，箕子知道难逃厄运，急忙装疯，害起来精神之病。可是子受辛不管这些，仍把他逮捕，投入监狱。

根据地从岐山（陕西省岐山县）迁到镐京（西安市）的周部落酋长姬发，和他的姜子牙，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朝廷的变化。不久，首都朝歌传来消息：“奸佞之辈都居高位，可以动手啦。”姬发曰：“还不到时候。”不久，又传来消息：“贤能的人纷纷逃亡，可以动手啦。”

姬发曰：“还不到时候。”不久又传来消息：“不断的逮捕和处决，人民不敢批评政府矣，可以动手啦。”姬发告诉姜子牙，姜子牙大喜曰：“这是没有民心支持的赤裸权力，时候已到，可以动手矣。”

火烧摘星楼

公元一一二二年周部落跟其他部落的联合兵团，战士四万五千人，战车四千辆，从孟津（河南省孟津县）渡黄河北上，直抵首都朝歌西南郊牧野，与商政府军十七万人（战车数目不详）决战。周军在数量上显然居于劣势，但商军心已经瓦解，决战一开始，商军即行叛变，倒转枪头，攻击子受辛的御林军。子受辛这时候才发现他的老命不握在上天之手，而握在小民之手，于是他像兔子一样飞快地逃到鹿台上的摘星楼。

《封神榜》形容他的下场：

“话说纣王（子受辛）行至摘星楼……谓朱升曰：‘朕不听群臣之言，误被谗臣所惑，今兵连祸结，莫可解救，噬脐何及？朕思以天子之尊，万一城破，为群小所获，辱莫甚焉。欲寻自尽，此躯尚遗人间，犹为他人指点。不若自焚，反为干净，毋得令儿女存留也。你可取薪堆积，朕当与此楼同焚，你当如朕命。’……朱升下楼，去寻柴薪，堆积楼下不表。且说纣王（子受辛）……自服袞冕，手执碧玉，满身佩珠，端坐楼中。朱升将柴堆满，挥泪下拜毕，方敢举火，放声大哭。后人诗为证：‘摘星楼下火初红，烟卷乌云四面风。今日成汤（子天乙）倾社稷，朱升原自尽孤忠。’……只见火逞风威，风乘火势，须臾间四方通红，烟雾张天。怎见得？有诗为证：‘烟迷雾卷，金光灼灼漫天飞。焰吐云从，烈风呼呼如雨骤。排坑烈焰，似煽如焰。须臾万物尽成灰，说什么画栋连霄汉。顷刻千里化红尘，那管他雨聚云屯。五行之内最无情，二气之中为独盛。雕梁画栋，不知费几许工夫，遭着他尽成齑粉。珠栏玉砌，不知用多少金钱，逢着你皆为瓦解。摘星楼下势如焚，六宫三殿，只烧得柱倒墙

崩。天子命丧须臾，八妃九嫔，牵连得头焦额烂。无辜宫女尽受殃，作恶内臣皆在劫。这纣天子（子受辛），这纣昏君（子受辛）啊，抛却尘寰，讲不起贡山航海，锦衣玉食，金瓯社稷，锦绣乾坤，都化滔滔洪水向东流。脱难欲海，休夸那粉黛蛾眉。正是：你从前焰成雄威，作过灾殃还自受。成汤（子天乙）事业化飞灰，周室江山方赤炽。’

“……只见那火越盛，看看烧上楼顶，楼下柱脚烧倒。只听一声响亮，摘星楼塌，如天崩地裂，将纣王（子受辛）埋在火中。顷刻火化灰烬……后人诗叹曰：‘放桀（姒履癸）南巢忆昔时，深仁厚泽立根基。谁知殷受（子受辛）多残害，烈焰焚身悔已迟。’又有诗单道纣王（子受辛）才兼文武云：‘打虎雄威气凛凛，千钧臂力冠群僚。托梁换柱越今古，赤手擒过鸢飞雕。拒谏空称才绝代，饰非枉道巧多饶。只因三怪（苏妲己等）迷真性，赢得楼前血肉焦。’……话说武王（姬发）来至摘星楼，见余火尚存，烟焰未尽，烧得七狼八豕，也有无辜宫人，遭此大劫。尚有遗骸未尽，臭秽难闻。……吩咐军士……寻纣王（子受辛）骸骨，具衣裳，以天子之礼葬之。”

至于苏妲己，早被捉住砍掉了漂亮的玉头。

周昭王淹死汉水之谜

第一次征楚内幕

昭王时，南方楚国逐渐强盛起来，有时不听命，不来朝贡，原来周初所封的诸侯国大都在北方中原一带，南方的“群蛮”以楚为中心，成为臣服于周的方国。周向以姬姓诸侯为贵，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方国抱有歧视态度。周成王在同诸侯会盟时，派楚君熊绎看管祭神的火堆，不让他参加大会，因此楚人不满，怀恨在心。楚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吞并周围小国，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了，自称王，与

周昭王淹死汉水之谜

周抗衡。周作为天朝大国不会容忍楚势力的发展,所以对楚及其属国不断征讨。

楚臣服于周时,朝贡的产品主要是菁茅,这是一种草类,在制造祭礼用的酒时用来滤酒。楚向周停止了朝贡,昭王就想举兵讨伐。周公和召公(周初周公旦、召公奭的后代)劝谏说“楚国路途遥远,大军攻伐必涉汉水,道路艰险。我王不如先派使者晓谕楚君,楚国若能认罪朝贡,岂不免除劳军之苦?再说楚所贡菁茅之物也算不得什么贵重东西。”昭王说:“出兵伐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菁茅的贡品,自我祖开创基业,国威日振,远近诸侯无不臣服,听命于我朝,人民受我大周礼俗教化,安居乐业。历代用兵主要是讨伐不听王命的国家。南方初定,楚不来朝贡,不讨伐怎可使各国畏服,维护周的尊严呢?”

昭王说服了周公、召公,让他们留守管理国家。他选派祭公、辛伯等文臣武将跟随自己亲征。昭王率宗周六军(周制:镐京6军,洛邑8军)向前进发,途经许多方国,他们无不表示臣服,向周军贡献食品,殷勤接待昭王,主动介绍南方的情况。但大军进入汉水一带后,路途艰难了,那里山多水多,草繁树茂,人烟稀少,是没开发的地区,没有道路可走。他们只好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士卒轮番打草砍木,每日走不了几里路。他们还常常遭到毒蛇猛兽的袭击,有时遇到成群的凶兽,士卒要冒死厮杀,死伤现象不时发生。路途困境使昭王十分不快,这时有人来报,说楚君派使者进贡菁茅,只是因病不能前来接驾。祭公等人乘机劝昭王班师,得到允准,仅仅在几个小国示威一番就回到了京城,实际昭王这次出兵无功而还。

第二次征楚内幕

楚国知周师回京,认为周楚相距较远,进军不易,昭王难再出师,所以照旧不朝不贡。昭王不能容忍,但又不便马上举兵,过了

一两年同主要朝臣议定，这次不走近路，按先前的道路进军。大军到了汉水边，征用渔民的船只，调用船夫撑船过渡。军队渡完后，昭王下令将船只全部凿沉于汉水之中，坚决地说：“此次南征，不获全胜，决不回还。”以沉船来表达他的决心。渔民船主苦苦哀求，泣述造船不易，渔家向依船为生，请求还船只。士卒只是服从王命，对渔民请求，无动于衷。渔民的船只就这样全部毁掉。周围的民众也受到了大军路过征敛粮物之苦，所以附近民众、渔夫无不痛恨周军。周军很快进入楚国的境地，进攻丹阳（当时楚都邑。在今湖北秭归东），楚料知抵挡不过，其国君赶忙派人带着厚礼请求赦罪。昭王命令楚君前来朝见。楚君无奈，只好来见昭王，叩头认罪。昭王看楚君已认罪，只是责备一番，便同一些诸侯一起沿长江北岸东下，到云梦泽游猎。这云梦泽在当时是长江中游一个很大的湖泊，地跨当今湖北、湖南地区，后来逐渐淤积缩小，仅剩下今洞庭湖的部分。那时云梦泽方圆千里，湖岸弯弯曲曲，有的深入湖中，岸边草木丛生，各种野兽成群。周军在这里摆开猎场，昭王在各诸侯的陪同下亲率军队，弯弓搭箭，追禽逐兽。楚国群臣和南方一些方国首领看到周军兵威马壮，周王格外威风，无不敬服。接着周围许多小国闻讯赶来，向周王献贡朝贺。昭王心情舒畅，不胜欢喜，把堆积如山的猎物颁赐各军，进行犒赏，并同各国诸侯宴会于泽边。大军休整三日，然后向云梦泽南端巡游，来到湘水流域。在湘水边有一座高山，风景秀丽，峻岩屹立，树木争荣，瀑布倾泻，这座山由于昭王莅临，后来得名为昭山，这就是现今的湖南省湘潭县的昭山。昭王到了这里，游兴已足，便起驾北归。诸侯们各自送了一程后，返回自己的国家。昭王率大军仍抄原路北上。

周昭王死亡之谜

当昭王来到汉水南岸准备渡水时，但船只已经一只也没有，这

周昭王死亡之谜

才想到来时已全部凿沉,不免有些后悔。他只好命令士卒到民间各处搜集,结果只得几只破船。又把当地人民召集来,命令他们迅速赶造。当地人民已怀恨在心,在造船的时候,他们串通起来,收集破旧的木板,造了许多船只,外表涂上颜色掩盖痕迹,然后交给昭王。昭王和将士们等了许多天,船只终于造出了许多,士卒将车、马、财、物装上船,然后登船启航。当船只航行到江心,粘合船板的胶经水的浸泡溶解,船板逐渐裂开。正当昭王在妃姬陪坐着江面,得意地观看一船船胜利归来的将士时,突然听到一阵狂呼乱叫,紧接着喧闹嘈杂声鼎沸整个江面。在他看到许多将士落水,想问缘由之际,自己的坐船也漏进了水。宫女喊叫起来,昭王仓皇失色,刚刚站立起来,只听“呼”的一声,船底裂开,江水涌进,船迅速下沉。辛余靡在后船上见势不好,前来救驾,刚登上昭王坐的船,船只已散架,众宫女连同昭王在叫喊声中落水。他们及所有将士在水中挣扎,整个江面,船板、财物漂浮,人马浮沉荡漾,有的已沉水身亡,有的抓住船求生,有的挣扎喊救。昭王这船人,妃姬美人都不懂一点水性,很快就被大水吞没。辛余靡身强力壮,识水性,他只顾寻救昭王,眼看昭王离他不远,忽沉忽现,急忙向昭王游去,怎奈水面人、物间隔,拨走了这个,又有另个挡道。他游到昭王跟前,一把拉住昭王,拼命地向一块船板游去。他费了好大的力才把昭王放到船板之上。这时他细察昭王,已气绝身亡。他竭力用手扶着船板,推着昭王尸体向岸边游去,游至岸边浅滩,这才喘了口气。他略休息一会,逐渐把昭王尸体移上岸。这时,已有少数的将士死里逃生爬上岸,祭公已不知去向。辛余靡向江面望去,军械、旌旗、财物连同船板顺江而下,有一些尸体被水浪推到岸边搁浅。汉水滔滔,波浪涌涌,生龙活虎的王师,顿时覆没。这时已经日落西山,草不动,树不摇,凄凉寂静。

辛余靡派人急速向京都通报,周公、召公得到昭王等将士沉江的消息,非常震惊。两人商议,这件事事关重大,切不可走漏风声,

若是各国诸侯知道，会丢了天子尊严，损伤国威。他们封锁消息，把昭王灵柩迎接回京，不向诸侯告丧，草草把昭王安葬了。然后辅佐太子满即王位，只是向外说昭王得病而崩逝，这在历史上，就留下“王南巡不返”的记载，把事实真相隐讳起来。但是当时毕竟有活下来的知情者，岂能隐瞒得了事实的真相？

秦始皇坑儒之谜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开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先河。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建立郡县制等，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为统一思想，制止书生们对朝政的非议，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颁布了系列法令：“焚《诗》、《书》、百家语”；“偶语《诗》、《书》者弃市（杀头）”；“以古非今者族（灭）”。焚书令一经颁布，熊熊火焰，将许多宝贵的文化典籍付之一炬，造成千古遗恨的文化浩劫。书可以毁灭，而人心难平，士子们议论朝政的言论还是不绝于耳。于是，秦始皇在大规模地焚书之后，残忍地将数百人一起活埋。这就是腥风血雨的“坑儒”事件。

造成这场劫难的导火索是宫中方士卢生和侯生的逃亡。秦始皇自以为威德无人能比，自称“始皇帝”，妄想长生不老，可以把皇帝一直做下去，所以千方百计寻仙访药。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听信了齐国方士徐福的话，命令徐福带领童男童女寻找海上仙山。结果徐福等一去无踪，据说在一个小岛上安居乐业，自成一统了。秦始皇却不肯死心，仍然耗费巨资，请方士为他寻找可以不死的不死灵丹妙药。卢生与方生就是秦始皇养在宫中为其炼药的方士。

焚书令的下达明显针对士子，令卢生等十分不安。卢生等心知肚明，这长生不老药是炼不出来的，如果没有丹药，那么始皇的严刑峻法很快便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于是批评秦始皇刚强暴戾，贪于权势，这种人不值得为他寻药，这样大骂一通后逃之夭夭。秦

秦始皇坑儒之谜

始皇对书生们是古非今本已十分恼火,现在看到巨资豢养的卢生等人愚弄他,怒火万丈,遂下令坑儒。坑儒实质是焚书的继续,是秦始皇实现思想统一的行动。

而被坑的是方士还是儒生呢?有的论者认为,秦始皇杀的是欺骗他的方士,所以被坑的应为方士,所谓“坑儒”确切地说应叫做“坑方士”。更多论著则认为被坑者为儒生。有人认为,秦始皇所坑的,既有儒生,又有方士,而以儒生居多。因为秦始皇本来轻视儒生,因方士逃走,遂迁怒于儒生,所以儒生成为这场灾难的主角。因坑儒一事,秦始皇长子扶苏向父皇进谏,进谏词中有“诸生皆诵法孔子”之句,也证实了被坑者是孔子之徒的儒生(《秦始皇本纪》)。

那么,坑儒的数目到底是多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坑儒数目为四百六十余人。《论衡·语增》中作四百六十七人。而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说七百人被坑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考证说,秦始皇共两次坑儒。第一次是卢生等逃走后,秦始皇令御史在咸阳地区捉来儒生,亲笔圈定四百六十余人,以“妖言”、“诽谤”罪名下令活埋。而随着审问地区范围的扩大,犯禁者超过四百人,于是第二次坑杀儒生,活埋七百余入。

关于秦始皇第二次坑儒,有史料详细记载:秦始皇先命人在骊山温谷秘密挖坑种瓜,等瓜熟以后,命令儒生们下谷观看。儒生们在谷中一边观看,一边争执不休,秦始皇趁机下令往坑里填土,将七百多人全部活埋(《诏定古文尚书序》)。骊山温谷从此又叫“坑儒谷”,汉代又把这里叫“燔儒乡”,在现今临潼县西十公里的洪庆堡。洪庆堡也叫“灭文堡”,据民间传说,由于焚书坑儒的烈火灼烧,到现在这个地方的土都是红的(《秦始皇本纪》)。

从坑儒到秦亡,充分暴露了秦始皇专制君主狭隘和残忍的本性。他有“威严”,但只是表象,其实他的内心,充满恐惧和不安。他至死也没有寻求到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公元前 210 年,他在一

片怨声怒涛中走向了坟墓。

赵高乱秦政之谜

赵高是秦始皇和二世皇帝宠信的权臣，他居高位后，声势显赫，一时权倾朝野，著名的“指鹿为马”的故事就是指他玩弄权术，蒙骗君臣。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秦朝的灭亡，多少与这个人物篡权误国有关。

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述说赵高的身世云：“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

赵高能进入秦王朝中央政权机关，是因为他“通于狱法”，这一点符合了“喜刑名之学”的秦始皇的胃口，遂得秦始皇宠信。以后赵高私下勾结公子胡亥，蓄谋利用胡亥作为篡权工具。秦始皇出巡途中病死于沙丘。临死前，令赵高作书通知远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至咸阳会丧并嗣位，诏书未发出，秦始皇已死，赵高对李斯进行威胁利诱，一起伪造了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赐公子扶苏死。接着，他又设法处死了掌握兵权的大将蒙恬和蒙毅。二世上台后，赵高又劝他“尽除去先帝之故臣”，不少秦朝的宗室大臣，因赵高的陷害而被杀，连李斯也未能幸免。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完全落入赵高手中。

对于赵高的身世，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四十一《赵高志在复仇》条云：“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及者也。”这种说法，据他自己说出自《史记索隐》，影响颇大，连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中“秦末社会矛盾的激化”章节中也引用了这个观点，认为“赵高原是赵国远支宗室的后代，因其父犯罪被处宫刑，当了宦官……骗

取了秦始皇的信任。”

另一种说法,认为赵翼这个观点,显系臆说,本意无非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论,查今本《史记》三家注中“索隐”部分,并无这种内容。即使赵翼真见于什么“孤本秘籍”,此说也难以置信,因为这说法和《史记》原文有很大出入,而“索隐”出于唐人司马贞之手,其史料价值难与《史记》并论。《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为“诸赵疏远属也”,并不能理解为“赵诸公子”。因为“诸赵”一语,犹《史记》、《汉书》中常用“诸吕”、“诸窦”,“赵”乃姓氏,并非国名。而“诸赵”系指秦国王室,因为秦王室虽姓嬴,却又以赵为氏。《史记》中有明文记载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说:“秦始皇”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可见,所谓“诸赵疏远属也”乃指赵高是秦王室的本家,因而所谓“赵高乃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大多数学者都认定赵高是个“宫人”,但他是怎么变成“宫人”的,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清代赵翼认为,他是“自宫以进”,施行苦肉计,目的是为了报仇。但是这与《史记》中说的“生隐宫”有距离,今本《史记》三家注中有一段“索隐”的文字说:“盖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宫奴婢,妻后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并宫之,故云‘兄弟生隐宫。谓‘隐宫’者,宦之谓也。’”这就是说赵高并非“自宫”,而是因其父犯刑而殃及于他,成为“宫人”。还有一种说法比较新鲜,以为赵高并非“宫人”,理由是京剧传统剧目《宇宙锋》中有赵高逼女嫁给二世皇帝为妃的情节,如赵高有女,则非“宫人”无疑,但仅仅根据一出京剧传统戏为凭,根据不足。而京剧《宇宙锋》是根据什么来编写赵高逼女嫁给二世的情节,这恐怕也是鲜为人知的。

据上述可知,赵高并非赵国公子,并非“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而乱秦政。关于赵高乱秦政,历史上还流传不少故事,但只能供参考。如前秦王嘉(一说梁萧绮)撰《拾遗记》中记载一则故事说:“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令赵高谋杀之”,子婴梦见秦始皇的

鬼魂对他说：“余是天使也，以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欲相诛暴。”子婴因此“囚高于咸阳狱”。这故事具有天道轮回的意味，荒诞不经，当然不足为信。

其实，无论赵高是否赵国公子，也无论他曾否为“宫人”。他与秦二世胡亥加紧盘剥百姓，又任意诛灭异己，滥用刑戮，这就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刚建立不久的秦王朝被推向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星星之火，就会燃成燎原之势，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第一次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终于推翻了曾经显赫一时的秦王朝。

吕后大封吕氏家族之谜

野心勃勃的吕后控制朝政之后，随即实施她筹措已久的大计划：大封吕氏家族，将诸吕安插到各重要部门。汉高祖刘邦生前，曾与大臣们订立过一条盟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意思是只有刘家皇族中的人才能封王，此外无论何人皆不得封王；如有，则天下人都有责任讨伐他。这条盟约的矛头所向有两者：一是那些开国功臣。因为开国功臣中本有几位异姓王，后来逐渐被刘邦吕雉消灭，立此盟约，警戒其他人不要生此念头；二是针对吕雉及其吕氏家族而来。刘邦担心他死后吕氏强盛，危及刘氏皇权。这个盟约的参与订立者，在吕氏临朝称制时还有许多人在世，吕雉本人更是言犹在耳。不过，现在是她当政，什么盟约不盟约，她说了算！所以，她把立吕氏家族为王的打算向几个元老大臣表示出来，想看看这些人的反应。几个元老中，素以强硬刚直闻名的右丞相王陵坚决反对，他当面指责吕雉此举违背高帝盟约。一些人不表态，而绛侯周勃和左丞相陈平同吕后关系亲密，居然赞成，道：“当年高皇帝平定天下，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现在太后临朝称制，封吕氏族人为王，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吕雉见有人支持，大喜。散

吕后大封吕氏家族之谜

朝之后，王陵将陈平和周勃臭骂了一通，说你二人违背盟约拍吕氏马屁，将来有何面目去地下见高帝？陈、周二人不和他辩，只是说：“当面反对吕氏，我们比不上你，但将来保全国家和刘氏，你可能比不上我们！”原来，他们早已看出吕雉用心，故意顺着棍儿爬，保全自己并取得吕雉信任，以便在将来凭借有利地位诛吕安刘。过了几天，王陵被撤去右丞相之职，周勃、陈平被委任要职。

接着，吕雉追封已死的父亲吕公为吕宣王，长兄吕泽为悼武王，以试探其他公卿大臣的态度。可她这是多余的担心，根本没人出头反对。于是她放心地大封起来了：封吕台为吕王，吕台死后，其子吕嘉和弟吕产先后继任吕王，随后又封吕产为梁王，封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封候的就更多了：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滕侯，吕忿为吕城侯，吕胜为赘其侯，吕荣为祝滋侯，吕庄为东平侯，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等等。吕氏的亲戚自然也少不了沾光，如吕雉的外孙张偃居然封为鲁王！最奇的是，吕雉竟封她的妹妹、舞阳侯樊噲之妻为临光侯，开千古妇人之先河。同时，吕雉又以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指挥禁军劲旅北军，禁军中的南军则由梁王吕产指挥。又进吕禄为相国，以吕禄之女为皇后。一时之间，吕氏家族遍封王侯，尽掌机要，刘氏天下则成了吕氏天下。

吕雉大封同族的原因，是否仅仅为了让吕氏家族尽享荣华富贵、并使自己有强大的后盾？这当然是一个目的，但决不仅如此，她还有更大的阴谋：培植吕氏力量，在适当的时候，取刘氏天下而代之！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她的大杀刘氏宗室与大封诸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作的长线努力。若问：既然如此，为何吕雉终其世未敢实施这一计划？这看来主要原因是她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条件还不具备。刘邦的旧将老臣有不少健在而且握有重权，如灌婴就手掌十万甲兵驻扎在外，刘氏诸王各有封国，其力量也未可小视，等等。而吕雉的年龄又未能让她等到条件具备。她死后，吕氏子弟全是些庸碌之辈，更难办到了。

吕雉的野心举措，给以后的内乱埋下了导火线和炸药，同时也给吕氏宗族种下了灭族的祸根。这恐怕是吕后不能想到的。

刘彻被立为太子之谜

初为胶东王留下的谜团

却说太子刘启御幸过的美人王姁发觉自己怀孕了，这王姁是个极有心机、富怀远见的女人。她自抛夫入太子宫之后，很快就征服了太子刘启，得到了宠爱。她知道老皇帝刘恒近年来百病在身，冥台已为程不远，太子刘启登上皇位的日子指日可待，到那个时候，自己怎么也能闹个夫人，如果此番怀的是儿子，说不定还有皇后的福份。想到这里，她觉得要达到日后的目的，必须从现在开始就作努力。王姁知道太子很相信梦，于是就在梦上作起文章。一日，太子刘启又专房御幸她，二人一番颠鸾倒凤之后，昏昏睡去，一觉醒来，已日照东窗，王姁依偎在太子怀中说：“妾夜来做了一梦。”太子刘启见王姁如此说，急忙追问所做何梦，王姁闪动了一下眼睛说：“我梦见日入怀中。”太子刘启一听，大喜，说：“这是好征兆，你将要得贵人，我从今日起暂不与你同房，以验此梦。”王姁一听，知道自己编造的话太子信了，心中暗暗高兴。此后太子刘启果真便没再到王姁房中。一个多月后，刘启来问王姁是否有了身孕，王姁便悄悄告诉刘启，说她果真有了身孕。刘启连忙向上天叩头不已，从此便把这事放在心上，时时思及。不久，刘启也做了一梦，梦见汉高祖从天上飘然而至，到了刘启面前，对刘启说：“王美人将得子，可把他的名字叫作彘。”从此，刘启更对王姁另眼相看了。汉文帝驾崩，太子刘启承登大宝，是为汉景帝。三个月后，便封王姁为夫人。公元前156年七月七日，王姁在猗兰殿临盆，果然生下一个男婴。景帝思及高祖托梦，立即给这个男婴起名叫彘。从此十分

刘彻被立为太子之谜

喜欢这个婴儿，令人精心护养，刘彘就这样在景帝身边一天天成长起来，出落得机灵乖巧。三岁时，景帝把他抱在膝上，抚摸着他的头说：“吾儿愿意当天子吗？”刘彘用稚嫩的声音回答说：“当天子由天不由儿。儿愿每日在宫中父皇前玩耍，但不能失做子之道。”景帝听此，大为惊讶！三岁顽童，竟能出此之言，此儿确非凡人可比。想到这里，景帝更注重对他的训导了。公元前153年，刘彘四岁，由于刘彘生时有许多瑞兆相应，又聪颖过人，议立太子时，景帝很想立他为太子。碍于他不是长子，只好把太子之位给了栗姬所生的刘荣，而封他做了胶东王。

栗姬失宠毁儿子内幕

工于心计的王姁希望儿子当上太子，只封了个王，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是，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一样，谁也看不出她的不满。她心中暗想：皇上路程尚长，情况千变万化，儿子现今虽封为王，说不定日后就有当太子的希望，关键是机遇和努力。王姁想得很对，这种机遇不久就逐渐来临了。

汉景帝有位胞姐馆陶长公主嫖，嫁给堂邑侯陈午为妻，生有一女，名叫阿娇。在那个年月里，谁有女儿不想让她成凤？长公主嫖就更想了。她见胞弟景帝立了栗姬所生的儿子刘荣做太子，便去巴结栗姬，想把女儿嫁给太子。当长公主嫖向栗姬提出此事时，不料栗姬却一口拒绝，这把长公主嫖气得要死。但是当时又不能把栗姬怎么样，她虽然还不是皇后，但母以子贵，未来的皇太后很可能就是她，得罪了她那还了得，因此，长公主嫖暗暗地把满腔怨愤压在心底。王夫人知道这件事后，便去讨好长公主嫖，表现出极为同情的样子，长公主嫖于是对王夫人大有好感，她想起当年刘彘说过“若得阿娇为妻，当以金屋贮之”的话来，觉得女儿既然嫁不成太子，嫁个王也不错，而且，她本喜欢刘彘，王夫人又很贤惠，于是就向王夫人提出此事。王夫人听后，满口答应。长公主嫖便去请求

景帝，景帝无法，便答应了这门亲事。从此，王夫人便攀上了长公主嫖，二人过从甚密，就同亲姐妹一般。有一次，王姁领着刘彘去拜会长公主嫖，长公主嫖设宴款待这位亲家母，王姁趁长公主嫖酒熟耳热之机，别有用心地说道：“我见阿娇近日出落得更加漂亮了，她那个样子，本该是作太子妃的，可惜嫁了个亲王。”长公主嫖一听，立即想起向栗姬求亲碰了一鼻子灰的情景，恨恨地说道：“我的女儿理该嫁太子，你那儿子今是亲王，难道不可以成太子吗？”王姁见长公主嫖说出此话，很高兴，便又拿话激她说：“太子今已确立，栗姬今又得宠，长公主有何能可使吾儿做太子，你我也就是想罢了。”长公主嫖立即说道：“你不如此说，倒还罢了，今听你如此说，我倒要试试想象的事能不能成为现实，且看我的。”从此以后，长公主嫖便开始了一场夺取东宫的阴谋活动。她仗着姐姐的身份，经常去景帝那里，夸奖刘彘的聪颖慧悟，说：“那孩子可真聪明呢，读书能过目成诵。”景帝本喜刘彘，听如此说，倒要亲自试试，便召来刘彘，问他说：“吾儿近日所习何书？能为朕诵读一遍吗？”刘彘闻听，立即给景帝诵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及龙图龟策数万言，无一字遗落。景帝大喜，知长公主所言不是虚话，对刘彘更加喜欢。自此以后，长公主嫖经常出入宫闱。向景帝扇风说：“栗姬为人太忌妒，听说她常使用巫术，诅咒其他妃嫔，这样的人恐怕不能母仪天下吧！”景帝因很宠爱栗姬，长公主这番话并没大听进去。一日，景帝要与栗姬云雨交欢，栗姬不从，景帝搂过她来说：“朕已立你儿子当了太子，可知朕多么喜欢你，今你与朕不合，是什么道理！”栗姬撒娇地说：“吾儿虽成太子，其母尚在为姬，我问你，这是什么道理？”景帝说：“莫忙，你儿子既已当了太子，你当皇后的日子还远吗？”说完，景帝又对栗姬指天发誓，说肯定要立她做皇后，这样栗姬才高兴起来。不觉又许多天过去了，栗姬见立皇后事仍无消息，便在枕边催景帝快发诏令。偏巧景帝躺在栗姬身边想起了长公主嫖说栗姬太妒的话来，很想试探一下，便说：“我近年来身体

刘彻被立为太子之谜

不好，怕难久于人世，立你为后，没有问题，但我有一事相托，就是我死后，你要好好地照看我的众妃嫔和诸皇子们。”栗姬见景帝这个放不下，那个挂在心，于是妒意大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事。我听人讲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专爱必弃其他，今皇上专爱于我，却又对他们牵肠挂肚，是何道理？”景帝见她不应，心中已是老大不高兴，又见她出言不逊地反问，于是产生了一种憎恶之心。那栗姬毫不知趣，以为景帝没她不得活，便又催逼景帝赶快立她为后。景帝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答应，便生气地说道：“你等着吧。”栗姬见景帝拿这话搪塞她，便大骂景帝是老狗。景帝一气之下，披衣出房，到其他妃嫔宫中去了。从此栗姬便失了宠。

王夫人对此洞若观火，她知道栗姬失宠主要是因为多次催逼景帝立后弄得景帝发了烦，决定趁此机会火上浇油，便暗中指使人挑唆大行去向景帝建议册立栗姬为后。大行也觉得薄皇后被废之后，天下无后，此位不宜长久空缺，自己掌宾客之礼，应责无旁贷地奏请景帝赶快立栗姬为后，于是便去奏请景帝，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宜号为皇后。”景帝此时正在气头上，对栗姬毫无好感，忽听大行又来扯这个问题，便认为是栗姬指使的，顿时大怒，吼道：“什么母以子贵，我让你子不贵。”说完下令杀了大行，并在初元七年春正月宣布废掉刘荣的太子之位，贬为临江王。刘嫖王姁二人听到诏令，乐得手舞足蹈。可怜那栗姬非但没捞上皇后，还因自己砸了儿子的太子之位，赔了夫人又折兵，又羞又愧，最后终于怨恨而死。

刘彘被立皇太子秘情

皇太子暂缺。长公主嫖和王姁为刘彘夺储的途程重新升起了希望之光。刘嫖与王姁二人很快发现，景帝的同母小弟梁孝王刘武正依靠其母窦太后的宠爱，对太子之位蠢蠢欲动。这个竞争对手必须干掉。于是长公主嫖便四下活动，大造兄终弟及有违祖制

的舆论,并在大臣中串联,反对梁王承继大统。不久,窦太后正式向景帝提出立刘武为储君。景帝召集诸大臣会议此事。众大臣引经据典据理反对,退养大臣袁盎还专程从安陵赶到长安进言不可。结果此议作罢。到了这时,刘晟面前才真正出现了一条光明大道。长公主嫖立即趁热打铁,加紧为刘晟活动,频繁出入宫闱,与景帝重提王夫人梦日之事,夸奖王夫人如何贤惠。景帝本有过立刘晟为太子的打算,今经长公主嫖几年后一提醒,立刘晟之意遂决。于是便发布诏令,宣布立王夫人为皇后,十二天之后,立刘晟为皇太子,景帝因他“圣彻过人”,将他改名为刘彻。中元二年,废太子违法自杀,中元六年,梁王失宠郁郁而死。到了公元前¹⁴¹年正月,汉景帝崩于未央宫,当天,太子刘彻即位,从此开始了他辉煌壮阔的一生。

长公主嫖,当她看到十六岁的刘彻在御座上诏封自己的女儿陈阿娇为皇后,更加得意忘形了。

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之谜

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妃子。汉武帝与其他帝王一样,有好色之癖,到老不改。汉武帝先是宠爱陈皇后,然后又宠幸卫皇后,卫皇后人老珠黄,色衰爱弛后,又宠爱王李二夫人,王李二夫人病死后,又有尹婕妤、邢姪娥争宠于后宫。但汉武帝并不满足,仍在到处查访奇美女子,于是便发现了这位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原是河间一赵姓家的女子。汉武帝一次到北方巡视时,听身边的道士说此地有青紫气,说明这里必有奇女子。道士们实际是揣摩汉武帝好色的心理,投其所好,献媚邀宠。可汉武帝这个人十分迷信,对道士们言听计从,虽屡次受骗,仍至死不悟。汉武帝就马上派人下去查访。派下去的人怎敢说没有,于是找到了这位赵家少女。只见她生得美丽超群,气质不凡,但却有一种怪

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之谜

病，右手拳曲伸不开。这岂不正应在“奇”字上？汉武帝听到回报，亲自前往验看，果然貌美惊人。汉武帝欣喜异常。据说，汉武帝命随从解开赵氏女拳曲的右手，谁也解不开。等到汉武帝亲自动手，只见赵氏女的右手随着汉武帝的手一下子伸开了。

令人惊诧不已的是，手掌中还握着玉钩。这也许是武帝的随从与赵氏女合谋作戏给汉武帝看，以讨取武帝的欢心。可汉武帝的心理却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又惊又喜，当即把赵氏女载入后车，带入皇宫。一入宫中，汉武帝迫不及待地召赵氏女陪睡。汉武帝这个老头子得到一个绝色的少女，怎能不宠爱备至。高兴之余，汉武帝马上下令特地开辟一处华丽的宫殿，让赵氏女居住，号为钩弋宫。称赵氏女为钩戈夫人。过了一年多时间，钩弋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弗陵。母因子贵，钩弋夫人也被汉武帝封为婕妤，愈加宠爱。

这时汉武帝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年老又好色，怎能不导致体弱多病，精神恍惚。武帝手下的奸臣江充与太子刘据有矛盾，江充怕太子即位后自己被杀，就想趁武帝有病之机除掉太子。他向汉武帝禀奏说，皇帝的病是有人用巫蛊之术陷害的结果。汉武帝听信谗言，命江充查办。江充事先派人在宫中埋藏木偶，然后带人到宫中挖掘，结果太子刘据与其母卫皇后的宫中掘出的木偶人最多。江充把这木偶人作为刘据诅咒汉武帝的证据，扬言要禀奏皇帝。太子知道这是江充陷害自己。一怒之下，逮捕了江充，喝令斩首。江充的同伙向武帝奏说太子造反，武帝年老昏聩，不辨真伪，命令丞相发兵拘捕太子。太子无奈起兵相迎。于是长安城内爆发了一场皇帝与太子的大战，激战了五天五夜，结果儿子没有打过老子，太子兵败自杀身死。汉武帝杀死了儿子，还不解恨，又命人收取卫皇后的印玺缓带。卫皇后一见儿子已死，自己又被废掉，痛不欲生，大哭了一场，上吊而死。可见，卫皇后虽有过得宠之日，但也是悲剧性的结局，并且她的结局比陈皇后还要悲惨。卫氏家族都受

株连被治罪。太子的妃嫔也无一幸免，都自尽而死。

太子刘据死后，谁来接任太子的位置，这就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汉武帝共生有六个儿子，除太子刘据外，齐王刘闳也已夭折。燕王刘旦是武帝的第三个儿子，他见两位兄长都已不在人世，按次序应该他做太子。于是他就给武帝上书，说愿意归国入宿卫，保卫皇帝，实际上是窥探父亲的意思。汉武帝明白刘旦的心意是要争太子位，大怒，立刻将刘旦的使者斩首。这说明武帝绝没有立刘旦为太子的意图。朝内宫里都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汉武帝住进甘泉宫，召来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辅佐周成王的图画。于是左右群臣才知道武帝的心意是想要立小儿子为太子。这个小儿子是谁呢？就是钩弋夫人所生的弗陵。汉武帝对弗陵十分喜爱，认为他身体健壮，天资聪明，与自己很相像，所以想立他为太子。但这时弗陵才五岁，还不懂事，他的生母又正值年轻，将来儿子做皇帝，钩弋夫人必定想干预政治，恐怕要成为第二个吕后，想到这里，汉武帝为了皇家的利益，为了刘家的江山，便筹划了一条惨绝人寰的毒计。过了几天，汉武帝就故意找岔子谴责钩弋夫人，言辞特别严厉。钩弋夫人十分害怕，急忙去掉头簪耳环，跪地叩头不止，请求武帝息怒。不想武帝竟然翻脸不认人，命令左右侍女把钩弋夫人拉出去，送到监狱当中。钩弋夫人入宫之后，一直备受宠爱，从未见过武帝这般龙颜震怒的情景，从未受过这样无过被责的委屈。听到武帝这出乎意外的命令，好像头上响了一声晴天霹雳，不禁又惊又怕又伤心，眼中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子滚落下来。侍女们架着她向外走，她一步三回头，频频回顾这个宠爱过她的皇帝。汉武帝看见她满面泪痕的凄惨面容，也觉得十分可怜。可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政治斗争是不能讲感情的，“无毒不丈夫”嘛！没有点残酷手段怎么能驾驭政治形势？何况是言出法随，权力无边的皇帝呢？因此，汉武帝还是高声催促着：“快走！快走！你不用想再活了！”钩弋夫人还想再说点什么，可无奈已被侍女拉扯出宫门，送

汉武帝夜闯民宅之谜

到了狱中。当天晚上，汉武帝就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将钩弋夫人赐死，然后将她埋葬在云阳县西北五十八里的云阳陵。事后汉武帝问左右的人说：“人们对处死钩弋夫人有什么议论吗？”左右的人回答说：“人们说既然立她的儿子做太子，为什么非要杀死他的母亲呢？”汉武帝感叹地说：“这不是一般愚人所能理解的。往古国家所以混乱，多是由于皇帝年幼，皇太后年轻。皇太后独居骄横，淫乱放肆，没有人能禁止。你们没有听说吕后的故事吗？我绝不能让吕后的故事在我身后重演！”出于这种政治考虑，汉武帝不仅赐死了钩弋夫人，而且凡是给他生育过子女的后妃，无论是生男还是生女，都被赐死。从历史评价的角度说，汉武帝可以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杰出皇帝；但是从道德评价的角度说，这位皇帝的深谋远虑的政治措施，岂不是太残忍狠毒了吗？他的狰狞面目，岂不让人目不忍睹，不寒而栗吗？而且，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流毒甚广，北魏屡有立其子而杀其母的做法，追根溯源，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武帝才是发起人呢。

汉武帝夜闯民宅之谜

汉武帝以好色而闻名于世，他食色不厌，纵情恣欲，后宫充斥八千粉黛，还填不平他的欲壑。他经常外出猎艳，大尝野味。有一年，他听人说长安禁城旁的一位张姓富商家有一美妾，天姿国色，便动了邪念，就授意一位近臣把张姓家美妾住的位置及去的路线搞清。之后，便找了一个晚上，令这位近臣带路，穿上普通百姓衣裳，装成商人模样，前往张姓家。到了张姓家后，近臣上前叩开张家宅门，守门人询问他们要干什么，武帝近臣问道：“我家老爷是本城富贾，现有一桩买卖要与你家老爷做，他今儿亲自来，要当面与你家老爷谈。”那守门人借着灯光看了看后边的武帝，果是富商模样，便立即进去报告。一会儿，守门人出来说：“我家老爷令你二人

进去。”武帝甚喜，在近臣带领下，到了张姓家的正厅。此时，张姓富商正坐在那里，高烧红烛，以待武帝到来。见了武帝，张姓富商作揖说道：“欢迎光临寒舍，请！请！”武帝二人急忙还礼，进屋坐定。武帝自言姓贾，现做皮货生意，手里有一批货等着出手，不知张姓富商是否有意。说来也巧，这张姓富商也是个贩卖皮货发了大财的人，因此与武帝一拍即合。张姓富商非常高兴，立即设宴款待。武帝本能豪饮，今日为色而来，只喝到微醺便止杯。这时已近夜深，张姓富商便诚意挽留武帝二人住到府上，这正中武帝下怀。武帝立即满口答应。于是张姓富商唤人来领武帝二人去下榻，自己便回房安息去了。武帝在寓舍听听没有动静了，便与近臣出了房门。由近臣引他来到那美妾窗下。近臣用舌舔破窗纸，往里一瞧，虽看得不很清楚，但知张姓富商未在此房，原来近日张姓富商又娶小妾，此刻正在小妾房欢爱呢。近臣探明情况后，报告了武帝。武帝想一睹芳容，沿着舔破的窗洞望去，无奈美妾房中没有点烛，黑洞洞，看不清楚，近臣便想了一个办法，他拣起一枚石子从窗洞中投入，打在屋地上，咕嘟一声，把那美妾惊醒了。那美妾听到有响声，急忙坐起察看，为了弄个究竟，便点亮了红烛。武帝借了烛光望去，见那美妾身上只穿一件短裤，丰臀玉肌，双乳耸动，面如桃花，果然是天姿国色。武帝看得呆了。这时那美妾察看一番之后，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增况，便脱下短裤，去便桶处小解。武帝在外看得真切，淫心再也按捺不住，便令近臣将窗户撬开，飞身进去，抱住美妾便亲。那美妾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半死，刚要叫喊，武帝说道：“莫嚷，我是当今皇帝，久慕娘子，今得亲尝，也是我艳福不浅，朕明日即将你接进宫去。”那美妾哪里肯信，武帝此时便把随身所带的皇帝玺绶给那美妾看，美妾方信。由于她梦想攀龙成凤，那美妾便不再拒绝，与武帝欢爱起来。武帝本来练就一副御女本领，又兼此时淫心炽烈，便大加发挥，痛快得飘飘欲仙。看看天色将明，近臣便唤武帝赶快遁走，武帝哪里肯舍，想要再上一次

王昭君出塞之谜

巫山。可巧张姓富商出外小解，见美妾房中有话语之声，心中诧异，便去看个究竟。美妾正与武帝交颈搂抱，忽听有人敲门，知是夫主，大惊失色，忙让武帝快逃，武帝仍然不舍。这时张姓富商知内有奸情，便一脚踢开房门，抄起一根棒子进去。武帝这时才发现不好，赶忙夺窗逃走。张姓富商见奸夫逃走，满腔怒火发泄在美妾身上，也许是他得新忘旧，一阵乱棒，竟把这美妾打死了。天明，家人来报，说昨晚来的贾姓商人不辞而别，张姓富商急去贾姓商人下榻处察看，见并无睡觉痕迹，方才恍然大悟。

美妾被打死后，张姓富商因怕吃人命官司，草草掩埋。刚埋完回府，见外面来了几个太监，心中大惊，这时只听太监叩门，传令张姓商人入宫见驾。张姓商人不敢怠慢，立即跟了太监进宫。到了未央宫，见武帝端坐御座上，张姓商人战战兢兢，忙跪下朝拜，说道：“小民拜见皇帝。”武帝说道：“小民请起，朕闻你有一绝代美妾，今朝廷欲用之和蕃，不知你意下如何？”那张姓商人忙回奏道：“小民有妾虽美，但不至绝代，今晨忽得急病死去，现葬于北岗林中。”武帝哪里肯信，便说道：“你可知欺君之罪？”张姓商人忙说道：“小民知道，怎敢欺君，贱妾委实死了，皇上不信可派人查看。”于是武帝便令人带他去张府，那美妾果然不在了。问其家人，也说今晨死了，现葬北岗林中。武帝方才省悟，知自己逃走之后，张姓商人迁怒于美妾，将她打死。武帝心中不悦，欲治商人死罪，便令人去北岗开棺验看。张姓商人知事要败露，忙在武帝面前叩头说：“小民今早去美妾房中，发现了奸情，一时发怒，将她打死了。望皇上饶罪。”武帝闻听大怒，立即命令将张姓商人推出斩首。可怜那张姓商人，为利而引狼入室，赔了夫人又折命。

王昭君出塞之谜

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的美在华夏几千年文明

的演变中,已经不仅仅指她空谷幽兰般超群的姿色和才慧,一个几经演绎又代代相传的“昭君出塞”的故事,让昭君成为人们心目中为了国家的安定,毅然舍弃自身幸福的民族友好使者的化身。她的远嫁塞外,使当时国力羸弱的汉朝与匈奴之间保持互为友好的关系长达五十多年。

依据《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字嫱,南郡人。元帝执政时,王嫱正值花季,因姿容秀丽、聪慧可人,琴棋技艺俱佳而被选入宫中。然而在宫中,如她一般未被册封为妃的宫女何止成百上千,大家都在企盼着能够早日见到皇上,获得被宠幸、被册封的机会。皇上对这些宫女根本应接不暇。他让画工为每个宫女画像,自己再凭画像选人。一时之间,众多宫女竭尽自己所能竞相行贿画工,恳求能将自己画得美一些。性格耿直、倔强的王嫱鄙夷地面对身边发生的一切,她不相信自己的美会因为一个画工而被永远地埋没在高高的宫墙之内。但艳若桃花的王嫱真的就被贪婪的画工绘成了丑陋的平庸之辈,这一幅画像像一道残酷的令牌让王嫱冷落在后宫十年之久。此时恰逢匈奴单于来朝,请求与汉通婚,皇上欲征召宫女五人赐之。昭君认为与其岁岁年年在后宫苦苦等待,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果断地站出来,一来一定要让皇上亲眼见识自己的美色,尝尝思而不得的滋味;二来,倔强的昭君宁愿跋涉关山万里,做荒蛮匈奴的宠妃,也不愿再在后宫中虚度自己无多的青春。她主动请令求行。

在匈奴呼韩邪单于的辞行大会上,汉元帝召五女以示,但见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元帝不相信后宫原来还藏有如此绝伦的美色,意欲留住,无奈天子无戏言,只有忍痛割爱,事后却难免朝思暮想,并愤怒地把重利轻义的画工斩了。

出塞后的昭君,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汉族文化,促进汉族和匈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作用,使两国人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得以免受战争之苦,过上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幸福生活。但昭君

王莽篡汉探秘

的生活决非事事顺意，她嫁给单于后，生有一子，单于死后，按照匈奴的风俗，子继父业，同时继承父亲的妻妾。昭君无法接受这种方式，请求归汉，得到的答复是“从胡俗”。她只得又嫁与单于之子，并生有二女。可见，远嫁匈奴的昭君，一生不知克服了多少来自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与折磨。

郭沫若先生曾如此评价昭君：“昭君不消说不会喜欢嫁给匈奴，她之从嫁匈奴只能作为自暴自弃的反抗精神解释……”的确，这是很多性格倔强的女人容易选择的一种宁折不弯的行为方式。而昭君之所以深受蒙、汉人民的爱戴，是因为出塞确实增进了汉族与匈奴两国人民的感情。

但历史必须尊重事实，不能从客观结果凭空推测其主观原因，所以，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昭君出塞时的真实想法决非是为了民族兴亡，她在思想上还未形成以个人幸福换取民族安定的远见卓识。昭君主动请缨出塞，更多的是出于对贪婪的画工、对不求真相的皇上、对自己寂寞生存状态的一种不满和反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后来，是由于特定时期的民族政治倾向和需要，才使昭君的身上被赋予了越来越亮丽的色彩，成为了民族团结的象征。

时至今日，关于王昭君远嫁究竟是身不由己与匈奴和亲产生的客观结果，还是献身国家的伟大壮举，还一直存在争议。

王莽篡汉探秘

王莽字巨君，是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此人早年是王氏家族中比较贫寒而最为奸猾、最具野心的一员，也堪称中国历史上名列前茅的大野心家。他的父亲早死，因而当他的伯叔父们个个封侯时，他暂时还没有份儿。于是他竭尽全力去讨好姑母王政君和伯父王凤。王凤临死，特地交代王政君和汉成帝关照这个侄儿。王莽先被任为黄门郎、射声校尉。他极善伪装，在士大夫阶层中颇

有声誉,那些叔伯兄弟们也没有谁不喜欢他,王政君更是十分器重他,所以他爬得很快。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他被封为新都侯。绥和八年(公元前8年),他代替重病的王根出任大司马。

这王莽是伪君子的祖师爷,他假装清正谦恭的本领确是非凡的。他深知赢得舆论的拥护和士民的好感,是实现他个人野心的重要条件或者说敲门砖。他爬到了大司马的首辅地位,但他决不以此为满足。他的最终目标是坐上那高不可攀的龙椅。自然,在条件成熟之前,他从来不让人起半点疑心,包括他的靠山王政君在内。为了沽名钓誉,王莽干了许多矫揉造作不近人情的事情,有些做得让人看着都觉得过火了。比如,他身为朝廷第一重臣,家财巨万,却经常让他的老婆穿得破破烂烂,老让客人们认为是个老仆妇。有一次,他的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家奴。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应偿命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小事一桩,因为人们并不把家奴当人看,这种罪最多打几鞭罚点款完事。可王莽却勒令王获自杀,并将此事广传于社会间,以显示他的重视人命大义灭亲。他的另一个儿子王宇,对王莽禁止汉平帝的生母及舅父入京与平帝相见等做法不以为然,接受平帝舅父卫宝的请求,想帮助他们解决亲人相见的难题。在正面努力失败后,王宇听从其师吴章及妻兄吕宽的建议,派吕宽在夜里将一些兽血洒在王莽家门上,想用这种方法吓唬王莽,使之改变态度。结果被发觉,吴章、吕宽被杀,王宇也被逼令自杀。王莽还借此事兴起大狱,株连许多无辜者,“死者以百数,海内震焉。”王莽这一残暴行径,居然被王政君认为又是大义灭亲之举。王莽还为此写了八篇文章,训诫其子孙。而拍马屁者上书王政君,要求将王莽这八篇文章颁发各地,让各地民吏、学生们诵读。王政君一概允准,下诏颁行,将王莽捧得如同孔圣人一般。

元始元年,南方蛮夷献上一只白雉(白色野鸡)。一些阿谀之徒又借此做文章拍王莽的马屁,他们上书说,这是王莽的功德所

王莽篡汉探秘

致。当年周公辅成王时，越裳氏就献过白雉；今天王莽辅政，又出现此种祥兆，说明王莽有安定汉家之大功，可与周公媲美，应加封王莽为‘安汉公’。王政君立即批准这一建议，下诏封王莽为安汉公，位在一切朝臣之上，加封二万八千户的封地。王莽故意推辞了一番。王政君又下诏说：王莽功劳盖世，不能因为是皇亲国戚就避嫌不受封。王莽这才接受封号，但让出了加封的土地，并向王政君建议给各诸侯王及开国功臣的后代一次封赏。于是王莽在自己大捞一把的同时，顺便又赚了不绝于耳的赞誉。

紧接着，王政君又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己年纪大了，不想管具体政事，皇帝又小，所以一切政事由安汉公王莽全权处理，包括所有官吏的任免权在内。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王政君的主持下，王莽的女儿又被立为皇后。王政君已经把整个江山交到王莽手中了。王政君自己料不到，她对王莽的全力扶持，已经逐渐将她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王莽已经不满足于手握大权做没有皇帝名义的皇帝了，他要做真皇帝！

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四岁的汉平帝被王莽毒死。接着，王莽在王政君支持下，选立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广戚侯刘婴继位。然而王莽并不想让这婴孩真地当皇帝，不过想使之成为过渡期的点缀物而已。此时的王莽，已经完全控制了一切朝政，甚至包括舆论。他在择立刘婴的同时，指使一群公卿大臣联名上表给王政君，说刘婴年龄太小，不宜直践君位，应先立为“孺子”，而让安汉公王莽像当年周公辅成王那样“践祚居摄”，即当“摄皇帝”（代理皇帝）。此表一上，王政君如梦初醒，这才明白她的老侄原来是这个打算！她坚决反对。然而，王莽大权在握，计划已定，由不得她了。紧接着，武功县一个马厩精献上一块白石，说是在淘井时得到的，上面刻着丹书文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一下，连“天命”也有了。“人心所向，天命所归”，王政君还能怎样？固然，她严辞斥责那块是假的，但这斥责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威慑力。她自己明白这

点,所以当王莽派心腹王舜来劝她不要固执己见时,她也只好长叹一声点头同意,下诏让王莽当了“摄皇帝”,一切礼仪“皆如天子之制”,见太皇太后也不用行臣礼了,连年号也改成了能显示代理皇帝特色的“居摄”。那原来选定的新皇帝刘婴,这下反而倒成了皇太子,号称“孺子”。不久,王莽又改称自己为“假皇帝”。

王莽离真皇帝的位子只有一步了——事实上他就是真皇帝,只是名号上还差一点点。而重要的是还顶着“汉朝”这块牌子,他不是汉室子孙,他要建立自己的王朝。

在中国历史上,每临改朝换代之时,总有趋炎附势的无聊之徒造作出种种“符命”一类玩艺,当然更多的“符命”是那盯着皇位的人自己干的,以推波助澜,制造声势。那时人们很相信这一套,所以往往能起到不小作用。王莽要当代理皇帝时就利用过这一手,如今要当真皇帝,当然更少不了借助于此道。居摄二、三年,这类东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广饶侯刘京、千人扈云、太保属戚鸿都奏上“符命”。这刘京实在是无耻之徒,他作为汉家宗室,居然首先捏造“符命”来帮助王莽篡汉。他煞有介事地说齐郡临淄县有一个亭长叫辛当,一连几夜梦见一个神人告诉他:“摄皇帝即将成真皇帝。”还说若不信,他亭中将有一口新井出现,以此为证,后来果然出了一口深百尺的新井,云云。扈云和戚鸿之流则是老办法 造出所谓刻有符命的石头献上。更有一个梓潼人哀黄,本是个无赖子,他见王莽这个阵势,知道这是拍马屁捞富贵的好时机,就做了两个铜匱,一个上刻“天帝行单金匱图”,一个刻“赤帝行玺邦传手黄帝金策书”。还有一篇文字,说汉高帝刘邦已奏明天帝,将天下让给王莽。还刻有王莽的十一个辅佐大臣的姓名,他本人的大名也在其中。然后在一个天色阴暗的黄昏,穿上一身黄衣,装神弄鬼地把这铜匱送到汉高祖刘邦的庙中。守庙的官员马上报告王莽,王莽当下装模作样,带着一群人到高帝庙中接受金匱,并宣布正式接受汉家的禅让。随即举行即位大典,即真皇帝位,改国号为“新”,年

刘备“三顾茅庐”之谜

号为“始建国”。

西汉灭亡！这一年，为公元9年。

经过数十年的奋斗，王莽终于踏上了皇帝的宝座。而他这数十年历程，是她的老姑母王政君扶着他走过来的。

刘备“三顾茅庐”之谜

建安末年，群雄割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天时，孙权继父兄之业，盘踞江东，占有地利，独以正统自居的刘备寄人篱下，虽胸怀大志而一事无成，内心自是十分痛苦。

当时刘备依附于荆州刘表。刘表虽然待他很厚，但刘备却总是很苦恼。一日宴会间，刘备如厕，回来时眼眶含泪。刘表很奇怪，刘备说，因为见到自己“髀肉复生”，感叹时光老去，却无所作为，所以很伤心。这番话引起了刘表疑忌，便让刘备带人住在荆州附近的小县城。刘备拜访当地名士司马德操，司马德操向他推荐了“卧龙”（诸葛亮）与“凤雏”（庞统），说只要得到其中一人就能得天下。颍川徐庶投奔刘备，也说诸葛亮是当世英才。刘备想让徐庶去请诸葛亮，徐庶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于是，刘备带领关羽、张飞，亲赴襄阳（今湖北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卧龙岗寻访诸葛亮。前两次都未见着诸葛亮，第三次才见到。就在卧龙岗的草庐中，诸葛亮畅谈天下形势，提出“鼎足三分”的计策，令刘备大为倾倒。而诸葛亮也为刘备的诚意打动，同意出山辅佐刘备。这即是通常所说的“三顾茅庐”（《续资治通鉴》）。陈寿《三国志》持此说。诸葛亮《出师表》中“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证明了这一史实。

而鱼豢《魏略》中另持一种说法，刘备并未屈驾去请诸葛亮，而是诸葛亮自愿归附刘备。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也有相同记载。当时刘备屯兵樊城，诸葛亮预见曹操要攻打荆州，于是北行，求见

刘备。刘备当时正与众宾客叙话，因为从未听过诸葛亮的名字，所以对他毫不在意。过了一会儿，别的客人都走了，只有诸葛亮还留在那里。刘备一向有喜欢编牦的嗜好，刚好有客人送来一牦牛尾，他就编织起来。诸葛亮问道：“将军应有远大志向，难道平时就以编牦度日吗？”刘备解释说：“不过借此解忧而已。”诸葛亮便开始向他陈述荆州的形势，以及刘备应该采取的对策，刘备大为动容，觉得人才难得，从此待以上宾之礼。

有人认为“晋见说”符合历史。《魏略》早于《三国志》，且以史料丰富、态度严谨见长，鱼豢此说应为可信。以当时情势分析，诸葛亮既有心辅佐刘备，为何两次避而不见？况且诸葛亮年方 27 岁，“皇叔”刘备肯屈节下顾么？的确令人怀疑。

清洪颐煊《诸史考异》中则兼顾了以上两种说法，诸葛亮开始见刘备的时候，刘备虽以礼相待，但并不是很器重他。后来经徐庶的推荐，刘备才三顾见亮，委以大计。诸葛亮对刘备感激无比，并记入《出师表》，以表达自己感恩之情，而忽略了“三顾”之前的“晋见”。

不论“亮诣备”，抑或备“三顾”请亮，总之，君臣相遇，风云际会，遂成就了鼎足三分之事业，留下千古美谈。

曹操不当皇帝之谜

南征北战为了谁

公元 220 年十月，汉献帝在群臣的要求下，不得不将帝位“禅让”给曹操的儿子魏王曹丕。曹丕称帝（史称魏文帝），正式建立了魏政权。曹丕封汉献帝为山阳公，封他四个儿子为列侯，追尊曹操为武皇帝。

曹丕能够顺利登上皇帝宝座，全靠曹操创造的条件，打下的基

曹操不当皇帝之谜

础。

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至许,任司空,开始控制朝政之后,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公元208年,曹操任丞相,公元213年被封为魏公,公元216年又晋爵为魏王,并立儿子曹芳为王太子,女儿皆称公主。魏公、魏王有王都,在邺城。魏国也有相国、御史大夫、尚书令、侍中等官,在形式上已经和皇帝没什么两样了,只是魏王在名义上比汉献帝要低一等,而实际上汉献帝已成曹操手中的傀儡,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实权都掌握在曹操手里。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直继续二十四年(公元196年——公元220年)之久。在这期间,他除了和其他地主武装集团进行长期斗争,逐步兼并群雄,统一北方外,还和刘氏王室势力进行了反复较量,镇压了内部的反叛势力,消除了异己。

公元200年,曹操镇压了车骑将军董承等人的谋反。公元214年,献帝伏皇后(伏寿)串通她父亲伏完等密图曹操,也被发觉,伏后和她两个儿子以及伏氏宗族一百多人被杀。公元218年,少府耿纪、太医令吉本等又一次策动政变,想挟持献帝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结果也兵败被杀。公元219年,任西曹掾的魏讽,乘曹操出征汉中的机会,聚众谋袭邺城,被人告发,牵连而死的有数千人。到这时,取代刘氏的障碍基本清除了,但曹操自己仍然没有当皇帝。

早在公元210年,曹操曾颁布《让县自明本志令》,表明他维护国家统一的志向和无“篡汉自立”的野心。令文中有这样的话:

“董卓作乱,我举义兵,占领兖州,破降黄巾,讨伐袁术,灭掉袁绍,占据河北,直下荆州,克平天下。如今我身为丞相,作为臣子,地位的尊贵达到顶点,已经超过我的愿望。假使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或许有人见我势力强盛,又生性不信天命这类事,在私下议论,说我有不逊之志,想称皇帝,妄加猜测,使我不安。胡亥杀蒙恬,蒙恬说:‘自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受

秦国信用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三十万，势力足以背叛，然而我自知必死，还是坚守大义，是因为不敢玷辱先人之教而忘记先王啊！’每当我读到此处，没有一次不感动得流泪的。然而，想让我放弃所统率的军队，回到武平侯国（时曹操为武平侯）去，这实在是不行的。为什么呢？我确实怕放弃了兵权，被别人所谋害。这既是替子孙打算，也是为国家着想，不能为慕虚名，而遭受实祸。我的封地有四县，享受三万户的赋税。江湖没有安静，我不能让位。至于封邑，可以退让。现在我把二万户交还国家，只享受武平县一万户的赋税，以减少别人对我的诽谤，也稍微减轻我的负担。”

在令文中，曹操反复表明自己忠于汉室，并无“不逊之志”。这是在赤壁之战失败后，形势出现对他不利的情况下，反击政敌，安抚拥汉派的一种政治手段。同时也公开表明了他要牢牢掌握军权，同政敌坚决斗争的决心。其实，曹操并不是真的不想夺取刘家天下，当条件具备时，他是会这样做的。

公元 219 年十二月，孙权袭杀关羽之后，给曹操上书，歌颂功德，称为“天命”，劝他当皇帝，自己情愿称臣。曹操读罢这封信，出示给群僚们看，并说：“孙权这小子，竟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他说这句话一方面是指出孙权并非真意，一方面也是想看看群臣的态度。这时，文官以侍中陈群为首，武官以将军夏侯惇为首，懂得曹操的意思，便趁机向曹操劝进。陈群说：“汉朝到现在仅剩一个名号而已，一尺土地，一个老百姓都不归汉朝所有，期运早已尽，历数早已终。所以早在桓帝、灵帝时期一些宣传谶纬的人都说‘汉行气尽，曹家当兴’，殿下（指曹操）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群生注望，远近臣服。应该畏天知命。”夏侯惇也说：“天下皆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以来，能为民除害，为百姓所归的，就可以作天下之主。现在殿下征战三十多年，功德著于黎民百姓，为天下人心所归。当皇帝既应天，又顺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曹操考虑到自己老了，身体又有病，不能久存于人间，称帝不一定有利，还是留给

曹操不当皇帝之谜

自己后辈更合适。于是他回答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思是说即使当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自己也不当，要像周文王给周武王创造条件那样，让自己的儿子去当皇帝。没有一个月，即公元200年正月，曹操就病死了，终年六十六岁。

临死立下什么遗嘱

曹操临死前留下遗嘱说：

“我在军中依法办事是对的，至于小的忿怒，大的过失，不应当效法。天下还没有安定，不能遵守古代制度。我有头痛病，很早就戴上了头巾。我死后，穿的礼服要像活着时一样。安葬之后，文武百官便脱掉丧服。驻防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官吏们都要各守职位。入殓时穿一般的时服，埋葬地邺城西面的山冈上，跟西门豹的祠堂靠近，不要用金玉珍宝陪葬。”

曹操一生提倡俭约，反对厚葬，临死时还念念不忘。由于曹操的提倡，一时造成了一种风气，有的官吏穿了新衣，坐了好车，舆论就说他不廉洁，反之，就说他廉洁。这固然是一种表面的看法，但经曹操的提倡，使过去那种奢侈淫佚的恶习，有一定改变，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虽然曹操没当皇帝，但由于他已经控制汉献帝，并为他的儿子正式“篡汉”创造了条件，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在旧小说、旧戏剧的歪曲宣传下，过去人们往往把他当成篡汉奸臣，而加以否定，不能正确地评价他，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司马衷委曲求全之谜

太子如何游戏人生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每一个娶妻生子的成年男子都负有保护妻与子的双重责任。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则。不能承担起这种双重责任的人，对妻子来说不是一个好丈夫，对儿子来说，不是一个好爸爸。由此观之，晋惠帝司马衷是一个典型的“三不”式人物——对臣民来说他自然不是个好皇帝了，再加上不是好丈夫、不是好爸爸，倘若不是个白痴，就差不多够自杀的份儿了。

司马衷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司马遹。年事稍长以后，司马遹犯了一个同时代公子哥儿的通病：不肯一心向学，而只喜爱与左右侍卫人员嬉戏。这对于皇家子弟来说，并不算什么大毛病。倘若当父亲的能够适时加以训导，应该说这是无甚妨碍的。可司马遹不幸，偏偏遇上了司马衷这样的父亲和贾南风这样的后母。

由于不能生产，贾南风憎恨一切由司马衷召幸过有了身孕的宫中妇女。据说她会亲手杀死过一个即将分娩的宫女。对那些躲过她的迫害生下一男半女的妃嫔和她们所生的孩子，贾南风也都是有机会就想把他们置于死地。

以聪明伶俐见称于世的司马遹既不容于皇后，万般无奈，不得不在宫中以与人做小买卖而自污。据史书上说，司马遹做生意很精，尤其擅长切肉卖酒。卖肉时往往只需用手掂量一下，便知道是几斤几两，分毫不差。

做生意做得兴起，司马遹又把东宫花园里的葵菜、蓝菜、鸡鸭、面粉等向民间出卖以换取钱财。

当时的太子洗马江统上书规劝，提出五点建议，告戒司马遹：

一、虽然有小的病痛，仍应勉强入朝侍奉。二、应常常召见太傅，增进德行。三、停留在画室的时间，应尽量减少。四、御花园出售葵菜、蓝菜之类，伤害国家体面，有损美好的声誉。五、修墙、盖瓦不必听信巫术。司马遹看了苦笑，不听。

太子被害揭秘

不久，司马遹的长子（司马衷的孙子）司马彪患上了不治之症，眼看将死。司马彪怀着悲痛的心情请司马衷给司马遹封一个王号，司马衷答应了，可贾南风不允。司马遹忍不住口吐怨言。

数天以后，贾南风把司马遹骗入宫中灌醉，乘机命他抄写谋逆表章，然后拿给司马衷看，命令这位傀儡丈夫废掉太子。虽然有些“傻冒”，但虎毒尚且不食子，司马衷一时下不了那个狠心，可贾南风坚持要办，他也没办法。于是，司马遹遂被废为平民。隔了不久，贾南风又瞒着司马衷将他杀死。

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杀死司马遹之后不久，贾南风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赵王司马伦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号将贾南风逮捕。既是皇帝，又是丈夫的司马衷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臣子下狱、毒死。其后他的新皇后杨献容先后数次被人废黜，他也一直装聋作哑。这种但求自保，不顾亲人的丑恶行径，即使是在以昏庸为主要特征的历代末代帝王中都是罕见的。

有一位史学家在论及司马衷时，认为他一辈子软弱昏庸，做了17年的皇帝，却没有一个政令真正出于自己之口。

这种论断实在是有点冤枉了司马衷。虽然确实是个无能之辈，但要说一辈子没干过一件令行禁止的事那也不是，至少，他曾亲口下过命令杀死了一个人。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301年。“八王之乱”中第三王赵王司马伦伏诛。这年的4月15日，起兵勤王的河间王司马颙抵达京师。论功行赏，量罪施罚。半个月后，司马颙向司马衷报上了一份惩恶扬

善的名单。司马衷派人叫来了司马颙，说：“要诛戮的‘逆臣’里边为什么没有义阳王司马威？！”

“回陛下，司马威似乎罪不当死！”

“什么？你说什么？”司马衷大发雷霆说道：“是他附合司马伦，逼我退位。还从我手里抢夺玉玺，当时他凶极了！把我的手指都弄破了！你还说他罪不当死？别的人你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可司马威必须得死！”说完，拂袖而去。

因为此时还必须仰仗这个挂名的“皇帝”，因此，司马颙不得不执行司马衷的命令，处死了义阳王司马威。

司马威死后的第5年（公元306年）11月庚午日，司马衷被人用毒饼毒死，那一年他48岁！

贾南风成为皇后探秘

西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3年）二月某日，京师洛阳城内，侍中、守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的豪华府第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人流如梭，摩肩擦背。原来，今天是当朝皇太子司马衷的大婚喜日，而择定的妃子，便是贾充的二女儿贾午小姐。

主人贾充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笑容浮现在脸上。要知道，这一给他和他的家族带来无上荣耀和利益的婚姻，来之不易。

贾充，平阳襄陵（在今山西襄汾县）人。他是西晋的开国元老，早年就投身到司马昭手下效劳，很得信任。司马昭虽立司马炎为世子，但却更喜欢司马炎的弟弟司马攸，几次想废掉司马炎，让司马攸任世子。但贾充屡次进谏，说不可轻易废世子，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司马炎得以保住世子之位。后来司马炎篡夺曹魏天下建立西晋，贾充在其中也起到重要的打手兼谋士的作用。所以，成为晋朝开国皇帝的司马炎，对贾充当然是另眼相看，信任有加。不过，在为太子择妃这个重大问题上，晋武帝起先是并不考虑贾家女

贾南风成为皇后探秘

儿的，他看中的是侍中、尚书令卫瓘家的小姐。这卫瓘也是得他信任的朝廷重臣，学问、名声都很好。卫瓘自己倒是没有高攀皇家的念头。有一次，晋武帝要把女儿繁昌公主下嫁给他的第四子卫宣，他还不愿意，认为自己是小门第，不足与天子联姻，上表屡辞，武帝不许，他才无可奈何地同意。而贾充家则不然。贾充做梦都想着要当皇亲国戚。他在太子择妃这一段时间，四处活动，托他的朋友中书监荀勖等人向武帝吹风，说贾家的女儿是何等才貌双全，是太子妃的最佳人选。武帝起初不同意，他说，贾家的女儿向来被公认有五种缺点：好嫉妒、生子少、相貌丑、肤色黑、身材矮，这样的女子来配皇太子是不合适的，而卫家的女儿刚好在这五个方面都相反：贤惠、多子、貌美、色白、身长，这正是一个合格妃子所应具备的条件。贾充听说后，又叫自己的妻子郭槐出面，打通皇后杨氏的关节，让杨皇后在武帝面前打圆场。贾充又找了太子的师傅、司空兼太子太傅荀顗，请荀顗也相机帮忙。这样一来，武帝就不免动摇了，心想这么多人，包括自己的妻子和众多心腹大臣都这么说，或许也有他们的道理吧？况且贾充还对自己有恩哩。于是，他松口了，同意在贾充的女儿中选一个为太子妃。第一次选定的，是二小姐贾午。

有这么一段曲折经历，贾充在女儿吉期这一天终于到来时的高兴和轻松，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然而此时却出现了一点麻烦。

选定的新娘贾午，年仅十二岁，比太子小一岁。这样的年龄就去当新娘，本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偏偏她又长得又瘦又小。而宫中送来的华丽新妆，却是大致按照大姑娘身量裁剪的，贾午穿上去，还有一大截是拖在地上的，要想走动而不跌倒，得用两手把下摆提起来才行。可是，在堂堂皇宫举行的盛大典礼中，新娘这样一副模样多不雅观呀！贾充得到报告，心想这是个严重问题，如果女儿在婚礼上失礼丢丑，一开始就给皇帝和太子留下了坏印象，那可就糟

透了。怎么办？他眼睛一亮：不如让大女儿贾南风去顶上。南风已经十五岁，在那时已算是成年了，无论哪方面都比贾午强。先前之所以不选南风，只是因她比太子大两岁。但这其实不算缺点，因为女大于男，还能更快地生儿育女哩。贾充当即飞马入朝，求见武帝，把这想法奏上。武帝考虑了一下，觉得不无道理，下令改聘贾南风为太子妃。

喜从天降。兴高采烈的“黑珍珠”贾南风香汤沐浴之后，换上新礼服，满怀憧憬地跨上了金碧辉煌的喜车。在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庞大的送亲队伍开始向皇宫移动。

有谁能料到，这喜车载去的，竟是后来造成晋朝大乱的一颗灾星呢！

几天之后，晋武帝下诏并在宫中举行仪式，册封贾南风为太子妃。

不需要很长时间，贾南风就牢牢地控制住了她的夫君太子司马衷。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大的手腕，因为那太子根本就是个呆鸟。贾南风自己也不能不沮丧地承认这一点。

历史上的数百个皇帝中，平庸无能之辈比比皆是，但像这个后来被称为晋惠帝的司马衷那般低能的，却少之又少。他有两件轶事是十分有名、被收入各种笑话故事集的。一件是他当皇帝后，有一年发生大灾荒，百姓饿死无数，大臣们向他禀报，请求朝廷设法赈救。他惊讶地问：“这些人怎么会饿死呢？他们没饭吃，难道不知道吃肉粥吗？”又有一次，他听见青蛙大叫，就问左右侍从：“这青蛙是为官家叫还是为私人叫？”侍从们知道他是个呆子，就捉弄他说：“如果那青蛙叫的时候是站在官家土地上的话，它就是为官家叫。如果是站在私人土地上，那就是为私人叫。”他恍然大悟地点点头。从这两件事中，就不难看出这家伙的智商有多高了。

这样的准白痴如何能继承皇位治理天下呢？按理说，知子莫如父，晋武帝司马炎是应该知道他这宝贝儿子的底细的，但他还是

立司马衷为太子,并且不打算更改。他不愿承认儿子呆笨这个事实。而且司马衷是他二十来个在世儿子中年纪最大的,立子以长,符合惯例。他的儿子女儿加起来将近四十个,作为日理万机的开国皇帝,他实际上也不可能对每个儿女都了解得清清楚楚。退一步说,就算他知道司马衷的底细,他也不愿公开承认而让臣下知道他生了个傻子。

然而大臣们对这太子的为人却清楚得很。大家都知道此人不堪为君,但出于各种心态和自身利益,却没有多少人说出来。有的是明哲保身不愿多嘴惹事,有的则愿意让这傻子当受帝,有的虽觉得应该出面劝谏,但官小位卑,轮不到自己说话。

不过武帝心中到底不那么踏实,儿子大了,自己难得和他呆在一起,更很少有时间过问他的生活学习,实在是相当隔膜。不知他有何长进没有?他决定摸一摸底。

有一天,太子所在的东宫大小官吏全都接到诏令,要他们当天同时到宫中赴宴。可太子本人却没有接到同样的诏令。太子自顾自在那里傻玩,全然不去管那其中有何奥秘。贾南风觉得有点奇怪,但她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不一会儿,来了使者,带来皇帝给太子的一封诏令,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件急待处理的公文,命令太子立即拟好处理办法,交来人带回。太子傻了眼,痴木不知所措。贾南风大惊,知道这事关系到太子和她本人一生的命运,现在只有靠她了。她先用酒食把来人安顿好,一边火速派人到宫外找了一个懂行的文人来帮助拟稿。请来的枪手见是皇家公文,便引经据典,之乎者也,洋洋洒洒一大篇。贾南风身边有个宦官叫张泓,知书识字,他对此不以为然,对贾南风说:“这样答恐怕不妥当。皇上明知太子没有什么才学,只是试试他的办事能力,这样谈古论今文绉绉地答上去,皇上肯定怀疑是别人代作,追查起来,那就不好办了!”贾南风问他:“依你之见如何?”张泓道:“不如直截了当地把处理意见写出来,不去说别的话。”贾南风高兴地说:“这话很对!你马上

给我尽心另拟一稿,以后富贵少不了你的!”答好后,叫呆太子自己抄一遍,交来人带回。武帝心中正有点七上八下,一看答词,十分满意,马上当着众大臣的面特意交给卫瓘看。卫瓘看后,显出迷惑不解而又惭愧不安的样子。在一旁冷眼观看的贾充据此推断:卫瓘在此之前说过太子不行这类话。他当天就写信告诉贾南风,要贾南风记住“卫家老奴”这笔账。

这是贾南风入宫后遇到的第一起风波,被她巧妙地对付了过去,初次显露出她弄阴谋搞权术的本领。

不过她自己也曾差一点被废掉。原因是她那发疯般的嫉妒。正如先前晋武帝所说,贾家妇女的嫉妒是有名的。贾南风的母亲郭槐就是其中翘楚,曾无故怀疑丈夫贾充爱家中乳母,两次杀死乳母,致使两个儿子因思恋乳母而病死。贾充遂绝了后嗣。贾南风也正是继承了这份遗产。太子也有不少姬妾。此人呆固然呆,但在男女本能这方面他倒并不含糊,除了贾南风,他还经常去找其他姬妾侍寝。贾南风对此恨得牙痒痒,把一肚子气出在那些姬妾身上,经常无缘无故地打骂侮辱甚至杀害这些无辜的女子。更为恶毒的是,有两次,她竟然亲自手持锋利的兵器短戟,朝怀孕已久的太子姬妾的肚子上猛刺,肚子被划开后,血淋淋的胎儿掉了出来。真个惨不忍睹!晋武帝听说有这样的事,勃然大怒,打算废掉贾南风。这时,原来的杨皇后已死,新的皇后是原皇后的堂妹、大臣杨骏的女儿杨芷,也称杨皇后。这位杨皇后是个善良的人,她劝武帝说:“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贾南风年轻,嫉妒心强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后她会改过的;况且她父亲对国家皇上都有大功,还是饶她一回吧!”先前极力推荐贾氏女的荀勖等人也相继援救,最后武帝才答应放过贾南风这一回。杨皇后又训斥了贾南风一顿,希望她改过自新。贾南风不知是杨皇后救了她,以为皇后乘机打击她,对皇后恨之入骨。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晋武帝病死。他留下遗诏,命他

东晋孝武帝出生之谜

的叔父汝南王司马亮和杨皇后父亲车骑将军杨骏共同辅佐朝政。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

贾南风被立为皇后。她终于如愿以偿了！

东晋孝武帝出生之谜

说起东晋孝武帝司马曜，许多史学家认为，他确实是一个千古奇人。作为一个帝王，他不仅死得出奇，而且其出生也是一个奇事。

按惯例，他是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的。

原来，司马曜的父亲司马昱与司马曜的生身之母李氏并非天生地设的一对。

让我们先来看看司马昱。司马昱，字道万，系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最小的儿子。他曾先后参与过东晋康帝（司马岳）、穆帝（司马聃）、哀帝（司马丕）及废帝（司马奕）的废立。可以说，从公元342年他22岁时起，就因接受成帝（司马衍）的顾命遗诏而参与了东晋王朝最高领导层的决策。他之所以能够从22岁时就跻身最高核心的行列，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真实的本领——倘若他真有什么真实本领，那么挖空心思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桓温后来也不会选中他来当“汉献帝”的。司马昱本人也深知这一点，因而，在其政治生涯的中晚期，他一门心思盼望自己能生一个像孙仲谋一样的儿子，将自己未了的志向转由儿子来完成。但谁能想到在家庭生活上他也会遭受同样的不幸呢？

在司马曜的母亲李皇后之前，司马昱有过两任正妻。其中之一的郑氏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没有给他留下一男半女。第二任王氏的肚子倒是争气，一口气生下了三个儿子，但其中二子早夭，另外的一个儿子司马道生一门心思想谋反作乱，最终被废黜了王位。母以子贱，王氏也因之被打入冷宫抑郁而死。

“其后诸姬绝孕将十年”(《晋书·后妃传》)。

有病乱投医。一向对鬼神敬而远之的司马昱也迷信起来了。一天,他派人宣来了当时东晋都城最有名的卜者扈谦,请他占卜一下他这一生中是否还有子嗣,如有,当向何方寻找。

这扈谦装神弄鬼,振振有辞地将手中的筮草翻弄了几遍,开口说道:“后房中有一女,当产二贵男,其一终盛晋室。”

扈谦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有人将他的话与李皇后后来连产二子联系在一起,认为他筮验如神;也有人认为这纯属巧合。这二种说法孰是孰非,我们大可不必深究。说者无心,司马昱这个听者反倒有意,而且动了真心。“会不会是她啊?”他暗自在心里想。

原来,这时司马昱宠上了一个姓徐的美人。这位徐姓美人闺名昭容,在王府中被封为仅次于王妃的贵人,且“以德美见宠”,此时已为司马昱生下一女(即后来的新安公主)。听了扈谦的占卜以后,司马昱怎么琢磨怎么觉得卜辞中所说的“一女”是她。可天公偏不作美,“帝常翼之有娠”,而徐贵人却“弥年无子”。这时,东晋都城来了一个道士,此人姓许名迈,朝廷里的公卿大臣差不多全被他的谈吐迷住了。司马昱也不例外。有一天,他特意宣许迈进宫,向他垂询子嗣一事。许迈进了一言,让尚未登基的会稽王司马昱多多召幸后宫佳丽。结果,后宫美女不知侍寝了多少但司马昱的子嗣却仍然没有一个。望子心切的司马昱也顾不得什么忌讳了,召来了一个善于看相的妇科名医,把所有被他召幸过的后宫佳丽都叫来请相者一一观看。那人看了一遍以后,大摇其头,又把那些次一等的“婢媵示之”,相者仍然大摇其头。就这样不知看了多少,最后把宫中最下层的织坊女也一个个叫来。当看到一个“形长而色黑”,生得粗眉大眼的粗活女子时,相者的眼睛一亮,一拍大腿说道:“禀殿下,此其人也,此其人也!”

“什么?是这个人?”司马昱一百个不愿意地问道,“你没有搞错吧?”

东晋孝武帝暴崩之谜

“小民 12 岁时起拜师学艺，如今年 60 矣！悬壶 40 余年，所阅人多矣，但其中无一人及得上这位娘娘！殿下信得过小民，则国家日后有主，若信不过小民，则老身就此告退！”

见这位人称“赛华佗”的神医动了真格的了，司马昱反倒软了下来。他一反常态地笑了笑说：“息怒！息怒！既然没有看错，那孤家不妨试她一试！”

是夜，司马昱召来了那个李姓女子侍寝。《晋书·后妃传》就此写道：“后数梦两龙枕膝，日月入怀。”这是很明显的迷信说法了，我们当然可以不必去管他。但这个长得又黑又丑的李氏此后不久却接连为司马昱产下了两个儿子，这却是真的。

史家认为，没有李氏就不可能有东晋孝武帝，而没后宫佳丽十余年绝无子嗣，那么，天大的雨点，未来的皇太后位置也轮不到“形长而色黑”的李氏身上。用什么来涵盖这一切呢？只能用一个字：奇！

东晋孝武帝暴崩之谜

东晋孝武帝宠幸的张贵人年轻漂亮，生性活泼爱动，能说会道，撒娇装痴，弄得司马曜爱也不是，恨也不是，终日迷迷恋恋、颠颠倒倒。

这样过了几年昏天黑地的生活，司马曜已经三十五岁，张贵人也有三十岁了。这年秋末的一个下午，司马曜在清暑殿摆酒与张贵人、众姬妾共饮。司马曜因为国内水旱灾相继发生而愁眉不展，张贵人也为自己中年尚无子而闷闷不乐。喝了半天闷酒，司马曜终于忍耐不住，先开口了。他问张贵人究竟为何不乐，张贵人不好意思说出来，故意锁着眉头，没有回答。司马曜很扫兴，于是转过脸去和别的姬妾说笑。这些姬妾平时被司马曜冷淡惯了，今天看到皇帝垂青，忙不迭地大献殷勤。一会儿，司马曜就被哄得眉开眼

笑，忘记了刚才的烦恼，索性要气一气张贵人。他假装忘记张贵人在身边，一个劲儿只与众姬妾说笑。五、六年来张贵人一直宠冠后宫，何尝受过这种冷落，一时气得脸色铁青。

司马曜从未见到张贵人气成这种样子。他觉得张贵人生起气来越发妩媚动人，于是假装绷起脸来说：“张爱卿，你的岁数不行了，我现在喜欢比你更年轻的了。”说着，故意走到众姬妾群里，左拥一个，右抱一个，满殿中只听见开心的哄笑声。

张贵人不知道司马曜在和她开玩笑，信以为真了。她冷笑一声，一甩袖子，带着贴身侍从到后殿去了。

天晚了，酒宴散了，司马曜和以往一样再次驾临宫中的清暑殿，召幸爱妃张贵人，侍寝之前，一阵痛饮。一向以女中酒仙著称的张贵人已有七、八分醉意。司马曜却仍然殷勤劝酒。实在承受不住了的张贵人跪下请求退席，司马曜听了勃然大怒。他一本正经地说：“酒令如军令，何况出自朕之口。你敢抗令不遵，拒不陪饮，小心我定你的罪！”一向得宠的张贵人撒娇说：“我偏不饮，看陛下定我什么罪！”已经喝得大醉了的司马曜醉眼中突然觉得他一向视为天仙的张贵人突然变得丑陋起来：头发不那么有光泽，眼角出现了几尾细细的皱纹。于是，冷笑一声说：“我看你嘴硬能几时。告诉你，别觉得自己年轻貌美。实际上，你已年近30了。后宫里比你年轻的美人有的是！你若不听话，看我不把你打入冷宫！”说完，醉意又浓，忍不住昏然睡去。

张贵人心里这个气啊。自从得宠以来，真是说一不二。皇帝什么时候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啊，“莫不是我真的老了吗？”她在心里自问。突然，她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冷战：“不好，这昏君说得到就做不到，说不定真要把老娘打入冷宫呢！看后宫里那些小骚货，一个比一个骚，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让她们称了这份心！”酒壮邪胆。洗脸换衣以后，她召来了贴身宫女。命令这位名叫彩云的姑娘去谋害司马曜。一听说要派她去害皇帝，彩云吓得三魂出魄，扑通一

南齐东昏侯胡作非为揭秘

声跪在地上。张贵人见了，不恼反怒，她厉声喝道：“两条路，一条是你去杀死那个暴君，再一条是我杀了你，你自己酌量着办吧！”

见宫女有些动心，张贵人又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哄骗彩云说：“别怕，你只管用被子把他闷死，一切有我做主！”

见主子这样说，这个有几分蛮力的彩云权衡了利弊，悄悄溜到了司马曜的房间，将司马曜用被子闷死了。

这一年，司马曜 35 岁。

第二天早上，张贵人在殿中哭起来，哭声越来越高。众宦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齐聚在殿前听候旨意。一会儿，那个婢女走出殿来，向为首宦者报告说：“皇帝昨天饮酒过量，半夜中魔暴崩了，贵人正在举哀，请中官宣示内外。”

一个年富力强的皇帝，好端端地一夜之间死了，大家都有点怀疑，但因为没有真凭实据，谁也不敢说出来。当时，最有权力过问此事的是司马曜的母亲李太后、弟弟司马道子和太子司马德宗。但李太后是个憨厚的老太太，只知享福，缺少心眼儿；司马道子成天沉湎于酒色，自顾不暇；司马德宗与晋惠帝一样，是个白痴。这最重要的三个人不来过问，别人谁好过问！于是，一件天大的弑君之案，竟因为没有一个人来追查，就此不了了之了。

南齐东昏侯胡作非为揭秘

东昏侯萧宝卷是南齐政权的最后一位君主。在他短短三年的统治时间内，荒淫奢侈，冤狱不断，肆意玩乐，无恶不作。前后还不到二十年，南齐王朝很快就被萧衍取而代之，萧宝卷本人也作了刀下之鬼。

萧宝卷本名明贤，字智藏，是齐明帝萧鸾的第二个儿子。明帝永泰元年（公元 498 年）七月，萧鸾病死，萧宝卷登上了皇帝宝座，当时才十六岁。第二年，改号永元。萧宝卷自幼养成顽童习性，游

手好闲，不学无术。在做太子时，他常常带领侍从们在东宫内“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萧鸾死后，萧宝卷恨不得立即将其葬掉，对守灵哭丧更是感到厌烦，该他哭灵的时候，他总是推说喉痛，不肯举哀。太中大夫羊阐秃顶无发，哭灵时“号恸俯仰，帻遂脱地”，露出了油亮的光头，萧宝卷停止假哭，哈哈大笑，对旁边的宦臣王宝孙说：“此谓秃鹫啼来乎。”

迫于朝臣的议论，即位之初，萧宝卷尚不敢过于为非作歹，奢靡的生活也多少有些节制。他曾下令删省律科，并同意尚书令徐孝嗣的奏议，要求王侯贵人不得使用金银链锁，“自余新器，悉用埏陶，牢烛华侈，亦宜停之”，还下令蠲免遇水灾地区当年的赋税。

但当江祐、萧遥光等顾命大臣被诛灭后，萧宝卷便肆无忌惮了，他的奢侈欲望和顽童习性迅速地膨胀起来。他十分喜欢骑马，但由于生长在深宫，不通骑术，于是便有人给他制作了一匹木马，让他日夜在后堂游戏练习，竟练成了十分娴熟的骑马本领。以后，他就无止无休地走马荒郊，到处游荡。左右五六十人相随，数百名善走之士尾追，所经之处，官民躲避，不准留有一人。但萧宝卷出游行无定处，也不通知时日，弄得侍从们日夜担惊受怕，来不及回避的百姓则往往横遭惨祸。一些老人和病人无法躲避，萧宝卷的卫队就把他们抬走，来不及抬走的，就匍匐在地，吏司们捶击踢打，绝命者比比皆是。有个病人躲藏在溪边，官吏怕上司知道后查问，就把病人推入水中，用污泥涂住病人的脸面，病人一会就气绝身亡，家属连尸骨也无法找到。曾任魏兴太守的王敬宾刚刚病死，家人未及殓葬就被驱赶出门，等到回来，见停尸在家的王敬宾的两只眼睛已被老鼠吃掉。一次，萧宝卷去沈公城游玩，见一个妇女未曾离家回避，便问是怎么回事。左右告诉他，这是个临产的孕妇，无法走动，萧宝卷竟将孕妇的肚子剖开，看是男孩还是女孩。长秋卿王儼病重，萧宝卷的侍从也不让他留在家里，王儼竟死在路边。丹阳尹王志被驱赶得走投无路，只得藏在朱雀舫南的酒垆之中。又

梁武帝崇佛之谜

有一次，萧宝卷去蒋山定林寺游猎，一个老和尚因病无法回避，躲藏于草丛之间，但还是被军士抓来准备杀掉。一个叫韩晖光的侍从觉得和尚可怜，劝萧宝卷刀下留情。萧宝卷哪里肯依，训斥道：“汝见麋鹿亦不射耶？”下令百箭齐发，将老和尚活活射死。

游乐与奢侈是一对孪生兄弟，萧宝卷的玩乐是异常奢靡的。萧宝卷力气很大，能牵弓至三石五斛，特别喜欢玩一种叫担幢的杂技。初学这种杂技时，萧宝卷常常跌倒，手折腕伤，倒后来，七丈五尺的白虎幢也能担起来，并学会了用牙齿咬着担幢的绝技，虽牙折齿落，也在所不惜。为了热闹好看，萧宝卷担幢时，舍人、主书及左右主帅都要在场，侍立两侧。担幢时穿的衣服，使用的器具，一律缀以金华玉镜等珍宝。他外出游玩时，从万春门至郊外数十里之间，都要悬挂帷幔，称为高障。高障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设数千人齐奏鼓吹羌胡伎曲和鼓角横吹。半夜三四更回宫时，鼓声震天动地，旗幡刀戟遮天，几十里以内火光烛天。

毫无节制的宴乐游玩，空耗了无数的钱财和精力，萧宝卷还有什么心思去料理朝中大事？萧宝卷常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臣下节朔朝见从早上等到下午都不见皇帝的影子。他们走也不是，等也不得，一个个被害得腰酸腿疼，面露菜色，即使等得皇帝上朝，也往往匆匆而罢。有个宠臣叫朱光尚的，想借鬼神来劝阻萧宝卷到处游玩。一次，萧宝卷出游时坐骑突然受惊，朱光尚就乘机说道：“先帝对你成天游玩很愤怒，故而来警告于你。”萧宝卷大怒，拔刀寻觅萧鸾，找寻不着，就令人用柴草扎成明帝萧鸾的形状，将稻草人头斩下来，悬于苑门之上。

梁武帝崇佛之谜

萧衍登基之后，鉴于齐亡的教训，总是勤于政务，孜孜不倦。即令寒冬腊月，也是五更即起，批改公文，以至双手破裂。又注重

纳谏,特诏令于东府前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凡布衣处士,欲指陈时事,有所建议,可投书于谤木函中;凡功臣材士,如有功劳未达,才不尽用,可投书于肺石函中。萧衍还率先勤俭。“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其所用衣物,均已洗涤数次,平常吃饭只以菜蔬豆羹粝食为主。并且每日只吃一餐,遇有事务繁忙,便喝点稀汤充饥。每当简选长吏时,务必求选廉平,并亲自于殿前召见,勉之以为政清廉之道。又特下诏全国,如小县令有才干政绩者,即迁大县;大县令有才干政绩者,即迁二千石。当时朝臣中有二人皆以廉洁著称,遂分别提拔为内史、太守。由是上行下效,吏治有了不少起色。

萧衍和历代君主一样,也对开国元勋大加疑忌。梁朝开国功臣首推张弘策、范云和沈约。张范二人开国之初即相继谢世。唯沈约是萧衍好友,又助萧衍受禅登基。本应好好重用,但事实却非如此。萧衍先是重用徐勉、周舍,又继之以重用谢朓,最后起用寒士朱异,让其执掌权要 20 余年。沈约不被重用,虽不与计较,但常被诋责,不久即病重而死。

萧衍对开国元勋如此刻薄,对皇室权贵却是恩礼优加,关怀备至,甚至显得愚懦不堪。这突出表现在对其弟萧宏和其子萧综的态度上。

临川王萧宏是萧衍的六弟。萧衍尽管知道萧宏曾藏匿杀人凶犯,敛财聚货,甚至派人刺杀其本人,但对萧宏并不追究,仍封官加职。然而,不久,萧宏变本加厉,肆意妄为,竟与萧衍之长女永兴公主勾搭成奸,而且两人密谋篡逆,派二僮行刺萧衍,不料二僮稍事磨蹭,错过时机,被卫兵捉住斩首。永兴公主自觉无颜再见父亲,回宫即自尽身亡。临川王萧宏闻知事败亦忧惧成疾,不久亦死。

豫章王萧综是萧衍次子,其生母吴淑媛是齐东昏侯的宫姬,萧衍纳之为妃后,极为宠爱,仅七月即生萧综。天监三年(504)封为豫章郡王,邑二千户,至普通二年(521),入朝为侍中,镇右将军。吴淑媛色去宠衰,心怀怨望,便将随萧衍七月生综之事告知萧综。

梁武帝崇佛之谜

综由此认为自己是东昏侯之子。普通元年(520),魏元法僧降梁,陈庆之等为之接应,结果被魏所败。萧衍乃命萧综出镇彭城,都督诸军。不久魏调临淮王为东道行台,率兵进逼彭城。萧衍恐怕萧综失利,即召综还朝,综却于此时投奔魏军。魏朝见萧衍次子来降,非常高兴,当即授萧综为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阳王,邑七千户。萧综这时改名为缵,特地为东昏侯举哀,服斩衰三年。萧衍闻次子投魏,大为惊愕,遂削其爵土,撤除属籍,改其子孙为悖氏,并废吴淑媛为庶人。后来陈庆之随元颢伐魏,萧衍听说萧综有南归之意,令吴淑媛以萧综儿时衣服让庆之捎去,萧综却坚决不回。未几吴淑媛病故,萧衍又生怜惜之心,诏赐复综爵,谥吴淑媛为敬,又封综子萧直为永新侯。

萧衍为梁帝,初雅重儒术,设国子监,增广生员,立五馆,设五经博士。萧衍本人虽日理万机,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一看就是半夜。亲撰《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计200余卷,王侯朝臣质疑,萧衍皆亲为解释。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者不可胜数。然萧衍进入暮年,尤经萧宏、萧综两次事件打击,竟逐渐看破红尘,转入佛门,成为中国古代皇帝中惟一的在位和尚皇帝。为便于祭拜佛祖,萧衍令于宫城附近修筑同泰寺。寺中供奉莲座,宝相巍峨,殿宇弘敞。为来往便当,又令于宫城中开大通门直对寺门,萧衍早晚即可由此门入寺拜佛参禅。

普通八年(527)三月,萧衍亲临同泰寺,为表忠心事佛,竟舍身入寺,做了三天的住持和尚,然后才返回宫中,并下令改元为大通。萧衍信佛之后,不仅自己断绝女色,不食荤腥,而且下诏全国,今后祭祀宗庙神灵,不许再用牛羊猪等,只能用蔬菜水果。此令一下,朝野为之震动。都说祭祀尚不可杀生,那么肉也不可再吃了。如此群情汹汹,竟引动朝廷商议,拟用大脯代牛。报与萧衍,萧衍坚决拒绝用牲。最后经再三请求,才允许用面粉捏成牲像祭祖。臣

下无法,只好遵令而行。

当时有南印度僧菩提达摩闻听梁朝重佛,不远万里,由海路乘船至广州。萧衍听有远方高僧到来,立即命令地方官吏马上将其护送入都,亲自于内殿召见,谈论佛理。然而没过多久,达摩见话不投机即告辞出来,后来渡江至嵩山少林寺传经授徒,竟成为中国禅宗第一世祖。

萧衍礼遇高僧不成,于是转尊俗僧慧约为师,亲自受戒,并令太子王公以下,皆以慧约为师。此令一下,朝官权贵受戒者竟达50000人之多。萧衍又把佛经弄来精心研读,这样一来遂使朝纲废弛,奸小弄权。此时贤相周舍、徐勉已相继逝世。只有尚书令何敬容与寒士出身的侍中朱异,表里用事。何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旧闻且聪明识治,虽然趋势信佛,但也未妨碍政务。唯朱异善窥人主旨意,能阿谀以承上旨,任官30年,广纳货贿,蒙蔽朝廷,萧衍偏独信用,以致朝政更加昏暗。

大通三年(529)九月,萧衍再幸同泰寺。脱去御衣袈服,于寺中沐浴完毕即换上法衣袈裟,宛如一位入寺多年的老僧,当晚即在寺中僧房居住、素床瓦器私人执役,与寺中主持相似。次日天明,设四部无遮大会,萧衍着法衣亲自开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僧、尼)讲经。讲毕即再次将肉身舍入寺中,自号三宝奴。如此过了十天,王公大臣聚钱一亿万,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众僧于其时实在不好说什么,只有木然无语,算是做了答复。又过了一天,文武百官集于同泰寺东门,奉表请皇帝还宫。萧衍答书语意恳切,竟对群臣用“顿首”之辞,声称既已舍身入寺就无返俗之意。群臣连上三表,萧衍才很不情愿地回到宫中。

大同三年萧衍令修长干寺阿育王塔,发现佛爪发舍利,萧衍以为佛家盛事,亲赴该寺再作法事,并诏令大赦天下。中大同元年(546)春天,萧衍再至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开讲《金字三慧经》,又舍身寺中,并许以所王境土供养三宝。过了一月,王室公卿以钱

陈后主淫曲之王揭秘

二亿万奉赎。萧衍又推辞一番才停讲经义，下诏改元并大赦天下。萧衍回宫当晚，同泰寺发生火灾，浮图被毁。萧衍闻报说：“这是妖魔所为，应广作法事祈禳。”群臣无一反对，都说应该如此。萧衍乃下诏说：“道高魔盛，行善郭生，应大兴土木，重建浮图倍盛往日！”遂兴造十二级浮图，后因侯景之乱而止。距上次舍身同泰寺仅一年，萧衍因侯景来降，认为是佛祖保佑，于是又演出一场舍身闹剧。此次舍身入寺至群臣奉赎还宫，历时 37 天。不仅如此，年逾古稀的萧衍此时还刚愎自用，不知纳谏。当时有散骑常侍贺琛上谏书一篇，竟致萧衍大怒，责其空作漫语，徒沽直名。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其败亡之状是可想而知的。果然就在萧衍做皇帝后的第 47 个年头，发生了著名的侯景之乱。

陈后主淫曲之王揭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题为《泊秦淮》的七言绝句诗，是唐代诗人杜牧有感于南朝陈国败亡的史实，借古讽今，借景抒情之作。诗中引用的典故，正是对陈国君臣以及历代封建统治者醉生梦死，奢靡荒淫生活的尖锐揭露和辛辣讽刺。《后庭花》全称《玉树后庭花》，是南朝陈后主叔宝创制的一阕淫曲。陈后主之流整日沉湎于这些淫曲艳词之中，花天酒地，恣意挥霍，生活极端糜烂腐朽，最终在靡靡之音、酒气花香中葬送了偏安一隅的江左小朝廷。

陈后主，名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是宣帝的嫡长子，梁承圣二年（公元 553 年），生于江陵，第二年避难于穰城（今河南邓县），十岁时回到建邺，册立为已是安成王的陈项的世子。公元 569 年，慈顺太后黜废帝陈伯宗为洛陵王，立陈项为帝，陈叔宝以嫡长子的身份立为皇太子。

按理说，陈叔宝是既在宫中，又在战乱中长大的，多少知道一

些百姓的疾苦，生活的艰难，理应振作精神，富民强国，励精图治，使弱小的陈国于倾危中强盛起来。遗憾的是，陈叔宝却不思振作，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到吃喝玩乐上去了，把积弱已久的陈氏小王朝推到了悬崖绝路。

陈叔宝前代的几位皇帝在生活上还算是比较节制的。文帝陈蒨起自布衣，了解百姓的疾苦，“国家资用，务从俭约”。宣帝遗诏中，也要求“凡厥终制，事从省约”，不准用金银宝物随葬，“明器皆用瓦”，命令四方州镇、五等诸侯不得到京城奔丧，百司也只需三日一临。有鉴于此，陈叔宝即位登基后，多少得拿出一点姿态，以表示其继承先帝遗风的架势。

但在虚晃一枪、摆摆样子后，陈叔宝早已积蓄在心的奢靡享乐的欲望便压抑不住了。

叔宝爱好文学，尤其擅长于作宫体诗。南朝时期，宫体诗曾风靡一时，为封建统治者和上层贵族所喜爱和推崇。宋齐两代，宫体诗即已萌芽，齐武帝永明年间作诗讲究声律，词藻追求华丽，诗歌的内容从描写山水风景转向描写色情艳事，专门歌咏女人的容貌、发髻、装饰和体态等。梁陈时期，贵族阶层的生活更加腐朽堕落，描写色情的宫体诗更加受到欢迎，宫体诗的内容也更加闺阁化、庸俗化，风气日盛，泛滥成灾。梁武帝的太子萧纲及萧纶、萧绎都是此中老手，徐陵、庾信之徒更是一流大家，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可算是宫体文学的总集。

叔宝继承这些人的衣钵，更加迷恋于这种艳情诗的欣赏和创作，变本加厉，以至于痴迷疯狂。江总、孔范是后主的两名宠臣，又是当时宫体诗人中的代表人物，后主对他们格外垂青，两人都被任为朝廷大官，深受宠遇。他们几乎每天率领十几名长于作宫体诗的文士，与后主一起游宴于后宫，一边饮酒作乐，一边共赋新诗，互相赠答，时人号为“狎客”。

对某种文学形式和体裁的迷恋或偏爱，本无可厚非。但陈叔

北魏立嗣杀母之谜

宝则不同，他非但流连于此，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而且把创作、把玩宫体诗与其荒淫奢靡的宫廷生活紧紧地联在一起。他每天沉醉在宴乐之中，淫词艳曲是为了给他那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添兴助乐。他亲制《玉树后庭花》、《金钱两鬓垂》《临春乐》等曲目，挑选酒席应和诗中特别艳丽的诗歌以入曲，让宫女千余人日夜排练。这些歌曲，都是些盛赞嫔妃美女容色之作，昏君佞臣沉醉其中，通宵达旦，酣饮咏歌，连年累月，乐此不疲。

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从没间断过。为了取乐，陈叔宝常将其不断翻新。他有所谓“八妇十客”，“八妇”即张贵妃、孔贵嫔等八名宠姬，“十客”即江总、孔范等十名狎客。每次宴会欢乐，几乎都少不了这些人。后主让八妇夹坐在他前后左右，纷纷在彩笺上制成五言宫体诗作，让十客同时继和，谁要是和得迟一些，就要罚酒。狎客们有意无意地在酒宴上出足洋相，后主则高兴得哈哈大笑。

北魏立嗣杀母之谜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是魏晋南北朝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魏晋南北朝时，政权交替频繁，时局动荡，容易造就英雄。但像拓跋珪这样流亡十余年，寄人篱下，未到成年便能号召旧部，重整旗鼓再造江山的君主，却绝无仅有，称他为天之骄子，亦不为过。现在山西省大同市西北云岗石窟中，有一尊巨大的佛坐像，据说就是依照拓跋珪的形象雕成的。那尊雕像广额大耳，直鼻细目，确实不同凡响。看着它，不难想象出当年拓跋珪驰骋漠北，南征北战，开拓疆域，建立强大魏国的雄姿。但谁又能料到，这样一位天之骄子，最后竟死于宫廷之变呢！

拓跋珪十六岁重兴代国，不久，改国号为魏。远的部落的酋长、大小国家的国君，看到拓跋珪如此英雄，纷纷前来结好，其中不少送来女儿或宗女，要求结亲，以求政治上有所依靠。拓跋珪是个

英雄,但并非不好女色。他不但将送来者全部笑纳,灭了敌国还要把掳来的美女留在宫中。有时,听到别国君主有漂亮女儿,也要派人前去求婚。

拓跋珪宫中,有一位刘夫人,是刘库仁的侄女、刘头眷的女儿、拓跋珪的结发妻子,拓跋珪刚立国不久,就封她做夫人。刘夫人为拓跋珪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因为是长子,最有立为继嗣的资格,所以取名拓跋嗣。刘夫人最早跟随拓跋珪,又生有长子,加上善管内政,很有本领,在宫中威信很高,因此,受到拓跋珪的敬重。按说,刘夫人是最有希望立为皇后的,但代国宫中有一个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将被立为后的女子,必须亲手浇铸一个铜人,谁铸成,则说明受天命委托,可立为后;铸不成,则没有资格立为后。拓跋珪曾经举行隆重的仪式,请来最高明的助手,协助刘夫人铸像,但不知什么缘故,竟然没有铸成。因此,刘夫人就失去了做皇后的机会。

拓跋珪平定后燕后,掳来了后燕主慕容宝的幼女。因为她美貌动人,被收入宫中。这位慕容氏举止端庄大方,性情温柔和淑,很得拓跋珪的宠爱。刘夫人铸像失败后,在朝臣们的再次奏请下,拓跋珪选中了慕容氏,为她举行了铸像仪式。慕容氏运气好,没费什么劲儿铜人就铸成了,很快就被立为皇后。

刘夫人年长有威信,又生有长子,没有立为皇后;慕容氏年幼新来,反而立为皇后。这自然引起刘夫人和其他一些妃嫔的不满。这些妃嫔有的挑唆刘夫人去排挤打击慕容后,有的劝刘夫人沉住气,等儿子当上皇帝后一起算帐。总之,出什么主意的都有。

这些闲言碎语吹进了拓跋珪耳朵里,搅得他心里很烦乱。拓跋珪有许多儿子,他认为最有能力继承自己事业的,还是拓跋嗣。因为拓跋嗣是个仁义忠厚的孩子,拓跋珪对他很放心,知道他将来不会欺负自己的庶母和弟妹。但他不放心刘夫人。他知道女人们一般心眼小,好听谗言,不能容人,尤其是将来当了太后,权势无

拓跋弘之死揭秘

边,难免做出伤害非亲生子女的事情来。而且,如果太后扶植外戚,把持朝政,还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这种例子在史书上记载得太多了,拓跋珪读过这些史书,他知道得很清楚。于是,他想了一个有效的、但太残忍的办法。

一次上朝时,拓跋珪宣布了一条规定:今后,魏宫里立太子时,先要杀死太子的母亲。说完,又宣布了一道具体的诏令:诏立皇长子拓跋嗣为太子,同时,赐太子母刘夫人即日自尽。

诏令一下,朝臣们都惊呆了。半晌,拓跋嗣首先明白过来,他扑地一下跪倒在父亲面前,痛哭失声,要求父亲不要杀掉自己的母亲,要求父亲另立别人为太子。

对这条每立太子先杀其母的规定,拓跋珪是经过反复考虑后才下定决心的。他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所以,在拓跋嗣痛哭求情、随之群臣都跪下求情的时候,他非常冷静,缓缓地说:“这不是我自己的发明创造,五百年前的汉武帝就是这么做的。我这是为社稷着想,为大魏臣民着想的,希望你们也不要仅仅考虑某个人的生死,而不顾及国家的安危。”于是,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就在北魏沿用下来,直到一百年后的孝文帝时才被取消。

拓跋弘之死揭秘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是否是一个佛心凡性的人,姑且不管它,但自他退位后,帝国大政仍操于他手,却是事实。

由于殿中尚书胡莫寒在挑选侍卫时,引起西部敕勒部落的反叛,叛军攻城掠地,势头越来越大。拓跋弘便派太尉源贺率军征伐,降敌 2000 多人,又继续追击,大破其部,杀 8000 余人,俘虏男女 1 万余人,缴获牲畜 3 万余头。但刚扑灭西部之火,东部敕勒部落又起兵,他们趁漠北柔然汗国大举南攻北魏之际,举部投奔柔然。拓跋弘实在坐不住了,亲自披挂率兵,一直追击敕勒于石漠

(今内蒙古四王子旗),由于无法追上,才班师平城。几个月后,柔然又来犯边,前锋直指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拓跋弘再度亲率大军讨伐,准备北渡蒙古大沙漠,直入柔然老巢,但柔然骑兵北逃数千里,无奈,拓跋弘又无功撤回。这期间,柔然还几次进攻敦煌,拓跋弘调兵遣将,指挥若定,终于使北边稍稍稳定。

北方战事稍少,拓跋弘又把视线转向南方。这时,南方刘宋王朝内斗不已,拓跋弘想趁此良机大举南下,统一中国。所以,他下令全国,每10个男丁挑选1个人应征,每家必须出50石军粮。为了进军刘宋,他首先南下巡视。当他行至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县),正值这地方闹饥荒,变民四起。百姓听说太上皇来此巡视,丝毫没有收敛。拓跋弘一打听,才知道这地区原来很安定,因为百姓都怕枋头(今河南省浚县西南)镇将薛虎子。从前薛虎子曾得罪冯太后,被冯太后贬去看守大门。恰巧,有孙海等地方士绅500人联名上疏拓跋弘,请求重新起用薛虎子,拓跋弘立即下令,薛虎子官复原职。果然,他一到任,数州民变,全部平息。这件事很快传到冯太后耳朵里,她咬牙切齿,大骂拓跋弘多管闲事。

拓跋弘不但管闲事,正事他也一把抓。他退位第二年,有关部门奏报:全国已有1075所寺庙,每年祭祀用牲畜多达7.55万头。拓跋弘虽信佛,但认为杀牲太多,是对佛祖的违背,况且,也会误农事和牧业,便下令:从今以后,除非祭祀天地神祇和祖庙、农神坛,其他一律不准用牲畜,只准用酒和肉干。不仅如此,全国重要官员的任免,吏部都向他事先请示。最初,各个衙门有事,或遇到什么难题,特别是重大案件的审断,都习惯向“太上皇”当面奏报,听候他的裁决,然后再根据口头传达施行。后来,拓跋弘为了避嫌,也防止一些奸巧之人利用这一点假传圣旨,才规定不管案件大小,都要根据法律确定罪刑,不要动辄请示。但他对重刑案件,仍事必躬亲。凡是死罪,多数都被他驳回原判,这样,有些囚犯在监狱中押了好几年,都没有定案,许多官员很有意见,但拓跋弘说:“长久地

胡太后被溺死之谜

羁押人犯,当然不是件美事,但总比草草杀掉要好得多。人在囚禁中受到苦楚,容易转心向善,所以,明智的人总把监牢当成重生的场所。我之所以使囚犯们在监狱中受点苦,是希望他们改过自新。”他分明是“以佛治国”了。

冯太后对拓跋弘退位而不让权的做法,简直是忌之切骨!但一时又奈何不了他,后来,她越来越感到这个“太上皇”太碍手碍脚了,自己撤掉的官,他一句话就叫人家官复原职,这不是明摆着与自己过不去吗!况且,这个年轻的冯太后,虽已30出头,但风流不减当年,她并没有因李奕被杀而改操正行,反倒变本加厉起来。关于冯太后的生活丑闻连连传出,有人说,太卜(管占卜的长官)李冲被太后勾上了,有人说,秘书令(皇家图书馆长官)被太后留宿过夜了……谁也不知道冯太后的情夫到底有多少!一些人耳朵长、嘴巴尖,总爱交头接耳,传闲话,一旦被冯太后知道,重者掉了脑袋,轻者至少得挨鞭子。冯太后越是想瞒天过海,事情就越传得离奇。这样,拓跋弘不用主动打听,有些人就把小报告送去了。对此,拓跋弘大动肝火,暗暗发誓要除掉这个不要脸的太后!但还没容他下手,自己反倒遭殃了。

公元476年6月13日,天刚蒙蒙亮,冯太后派人请拓跋弘进宫,说有急事相商。拓跋弘已做了近4年的“太上皇”,冯太后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所以,他没容多想,便命人备轿出发。但他刚出北苑,就觉大事不好:今天的侍卫为何增加如此之多?想毕,催轿回宫。这时,就听得人喊道:“给我拿下!”众侍卫一哄而上,霎时,年仅岁的拓跋弘身首异处,一命归天。

胡太后被溺死之谜

北魏胡太后一伙自以为害死了元诩,就可以息事宁人,使尔朱荣失去了靠山。但是,他们的主意打错了。尔朱荣拥有重兵,早就

想窥伺皇帝位，而现在箭在弦上，岂有不发之理？

真可谓错上加错。胡太后毒死了亲儿子，外间虽不知详情，却早已纷纷议论了，而孝明帝没有子嗣（外人并不了解事情），立谁为皇帝呢？这可急坏了胡太后。可笑的是，胡太后竟自作聪明而为掩耳盗铃之戏，下令立潘充华所生的“皇子”为皇帝，可谓千古奇事！继而，她又觉得不妥：这样能瞒得了一时，却瞒不得长久啊！故而，又特下诏称：“潘充华原本生的是皇女，已故临洮王元宝晖世子元钊，为皇族近支，宜立为帝，文武百官加衔二阶，宿卫加三阶。”于是，年仅3岁的元钊即位。时到现在，胡太后还想长久专权，而立年幼无知的元钊！

自从胡太后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亲手导演了一场假皇子闹剧后，顿时群情震怒，舆论大哗！文武百官并没有感激胡太后的剧加赏衔，私下纷纷议论：朝廷把立皇帝大事都当成儿戏，国还有不亡之理？

胡太后的连连丑戏，正好给野心家尔朱荣制造了叛乱的借口。当他得知假皇子事已公开后，马上与谋士元天穆等商议政变。然后，打出“清君侧”的口号，发兵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很快与高欢部会合。胡太后得知此讯，如五雷轰顶，顿时乱了方寸，破例召开全体王公大臣们会议商讨对策，但宗室大臣们都早已厌恶胡太后的所作所为，没有谁肯致一辞，只有徐纥独自主张抵抗，胡太后也狗急跳墙，忙按徐纥计布置兵力，欲死守都城。

尔朱荣以正义之师自居，靠自己的兵强马壮，一路攻杀，如入无人之境，很快陈兵于黄河以北，与洛阳遥相对峙。然后，把早已串通好了的彭城王元勰第三子元子攸迎入军营，一边立其为皇帝（即孝庄帝），一边渡河攻取洛阳。由于胡太后早已丧失人心，朝廷军队哪肯再为她一人送死卖命，而昔日受胡太后宠信的守军庸将，各自为计，纷纷开门揖盗，洛阳很快沦入敌手。趁京城大乱，徐纥连夜夺取御马，远遁出城，开了小差。郑俨见势不好，哪还顾得上主

皇帝为何称为丐帮帮主

子加情妇的胡太后，也偷偷出京，远适乡里避难。二人以后都曾举兵反击，但大势已去，都败了。

胡太后见京城失守，慌中无计，忙命孝明帝的后妃们尽数剃发入道。这其中就有她的女胡皇后（出家到瑶光寺），而她本人也自行变服落发，想逃避乱兵，入“净土”而保全身命。

但是，胡太后毕竟没有免得一死，“佛祖”把她拱手献给了尔朱荣。尔朱荣派兵将胡太后和小皇帝元子攸一起押送到河阴（今河南孟津东），用竹笼子将他们投沉于黄河。同时，尔朱荣又召百官到河阴，诈称祭天，文武百官齐集，却命骑兵将他们层层包围起来，然后责斥天下之乱，尽由朝臣贪虐无能所至，话刚说完，便下令乱兵砍杀手无寸铁的群臣。结果，自高阳王元雍以下，死者相枕，多达 2000 余人，一时间，冤魂遍野，乱尸纵横，鲜血成流，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史称“河阴之变”。

“河阴之变”（公元 528 年）以后，北魏帝国便陷入内斗政变不已的乱局，时隔 6 年，这个历时 149 年的帝国便寿终正寝，分裂成东西两部分。这是谁之过？当然不能将罪责全记在胡太后的账上，但是，毫无疑问，胡太后实在是其中主要的死有余辜的亡国元凶！

皇帝为何称为丐帮帮主

公元 575 年，北齐都城邺城（今河北磁县）几万民夫含着血泪筑起的皇家宫苑——华林园内，突然变得热闹起来，热闹中透着一种古怪。本来锦衣玉食的后宫佳丽们分成了两拨：一拨如其旧，另一拨则衣着褴褛，华林园的东部成了这些衣着破烂者的天下，其入口处赫然写着“贫儿村”三个隶体大字。一位朝臣不明就理，上表弹劾宫门使，说他们竟使乞儿混入宫中，表章上去却如泥牛入海。这位官员也许根本没有想到，在皇宫里胡闹的根本不是什么外面

混入的乞儿——借给外面那些乞儿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到皇宫里胡闹——兴起“贫儿村”，在其中胡闹的乃是当朝皇帝高纬。在这种情况下，“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事实上这道表章也根本没有被递到高纬的手里。

高纬这人，不仅本身昏庸，而且耳根子太软，并无容人之量。正当斛律光兢兢业业，辅理朝政之时，北周施用反间计，派人在邺城大造谣言，说什么“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高山不推自崩，榭树不扶自举”，暗示斛律光权高震主。加上“盲眼老公”和“饶舌老婆”的添油加醋，高纬疑心病大发，罢掉斛律光的官职而后杀之。周朝的皇帝得知此一消息，高兴得大赦天下，举国为之欢呼。

斛律光死后，北齐益发变得主暗臣昏起来。因此，虽有一二正直之人敢于直言劝谏，但后主还是照样胡闹不已。

一开始，那些刚刚换上破烂衣服的宫女、太监们和那些依然锦衣玉食的宫人们都感到别扭。破烂衣服们感到别扭是因为她（他）们穿惯了新衣服、好衣服，而那些衣着一如其旧的人们感到别扭是因为她（他）们所要面临的是一帮昔日的同伴、好友，更别扭的是这群自甘下贱的人中竟有他们的主子——后主高纬。宫女也好，太监也好，他们的饭碗端的是谁的？还不是皇帝的。不用说饭碗了，连身家性命也都是皇帝所赐。现在，好家伙！易主为仆，易仆为主——虽然并非真地如此，但“像不像，作比成样”，他（她）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五个吊桶井里打水——七下八上”，生恐演得不够，被后主责打，演得太过了，又被后主拿去了他们“吃饭的家伙”。

他们别扭，后主可不感到别扭，他们害怕，后主可一点也不害怕，不但不别扭、不害怕，而且还感到前所未有的新鲜。

“听说西晋时的惠帝司马衷听见蛙鸣还要问一问臣子：‘蛤蟆叫声是代表公家还是代表私人？’”高纬想：“真是蠢极了！也许他从未见过真正的青蛙吧？可怜的家伙！像孤家这样既能当皇帝，又能扮乞儿，试问古今能有几人？！”思及于此，高纬甚至感到有些

皇帝为何称为丐帮帮主

飘飘然了。他抖起精神，拿出一乞二偷的本领，溜到了一个身材修长、光彩照人的宫女面前，连连施礼，高声叫道：“行行好！行行好！帮我一件破棉袄！”那宫女闻声一愣，见是皇帝，出于本能跪倒：“万岁爷，折杀奴婢了！”

“起来！起来！我这是向你乞讨呢！”

任凭高纬怎么启发诱导，那位宫女也不敢站起身来。因为她深知这皇帝喜怒无常，白天他当乞丐，你当施主，可谁知道到了晚上，他会不会登上宝座，把白天公然以施主自居的宫女、太监们弄来羞辱呢？这种事谁也不敢打包票。

就在两人纠缠不休之际，从后边转过一个老苍头。他一把扯起那个宫女，转身掏出一把银子来，交给后主，以一种既非施主，也非奴婢，而像是对一位朋友的口吻说：“英雄落魄，令人感伤！这点银子拿去，聊补一时之需吧！”言毕，深施一礼。

这几句话应对有方，高纬听了觉得十分受用。因为这是这些天来第一次有人不是称他为“主上”“万岁”的。

心里一高兴，他也不管自己身上是否穿着乞丐服装，高声说道：“老爱卿，姓甚名谁？凭你的口才敏捷，我看可以开府封王了。”

“臣刘桃枝谨准圣旨！”

就这样，一个老苍头竟以几句所谓得体的应对而被赐开府封王，此一举动，气煞了那些血战沙场的将军们。其实，倘若那些赳赳武夫知道了另外一些事情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为老苍头封王一事而生气，实在是不值得了。因为就在老苍头被封王后不久，号称在“贫儿村”的胡闹行为中有助兴之劳的华林园内所养的狗、马、鸡、鹰，都被分别以仪司、郡君、开府等称号，且都享有俸禄。

史书上称，北齐后主高纬“一戏之赏，动逾巨万，府藏空竭，乃诏郡县卖官，宁令率多商贾，竟为贪纵，民不聊生。”国力本很强盛的北齐王国在高纬这位“丐帮帮主”的手里，已真地与“贫儿村”没有什么两样了。

公元 576 年北齐的死敌周,发兵 14 万 5 千人攻齐。周军以隋公杨坚为右三军,丘崇等为左三军,以齐王宇文宪为前军,直指齐国要塞重镇晋州。守将飞骑入邺,禀报军情。凡三次,均未能见到正在打猎游玩的后主高纬,于是晋州因无外援而失陷。这一年的 12 月周武帝集结各路兵马与齐兵会战。后主与其宠爱的后妃冯小怜(冯淑妃)恐惧先退,齐军一败千里,一退再退退至邺城。

苻坚功败垂成之谜

苻坚即位后,立即施行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招纳贤才,整顿纲纪,把前秦治理成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

苻坚是个讲究用人的君主。他任用了当时最有才能的汉人政治家、军事家王猛为宰相。在王猛的辅佐下,灭前燕,俘前燕主慕容暉;灭前凉,俘前凉主张天锡;灭代国,俘代王涉翼健,统一了整个北方。苻坚对这些亡国的君主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容态度。他不但不杀掉他们,反而给他们盖了漂亮的府第,封他们做大官;没有文化的送入太学学习,当作贵宾招待;出征时,还让他们带领原部人马,担当重要任务。在中国古代史上,对亡国君主如此优待信任、给予实职实权并且是重职重权的,可能除苻坚外没有第二个人了。但苻坚又是个极天真的君主,他认为自己行的是王道,可以感化世上一切人,甚至敌国君主。他觉得,敌国的君主能为自己所用,更显出自己的伟大与仁慈,于是把这些亡国之君安排在都城做朝廷大官,而把一些本族的官员派到各地去戍守。对这种安排,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强烈反对,而且后来事实证明苻坚这种天真、可爱的豁达大度埋下了无穷后患。

苻坚年轻时,母亲苟氏给他娶了苟家的女子作妻子,苻坚即位时封为皇后。苟皇后很贤慧,只知道当个温顺的妻子,对其他事不大过问。苻坚志在富国强兵,对女色还未留意。统一北方后,他讲

苻坚功败垂成之谜

突起后宫生活来，见到美丽的女子，就收进后宫，纳为自己的姬妾。

灭掉前燕时，苻坚派苻姓族人和亲戚去镇守燕地，把前燕宗室贵族全部迁到长安及其附近居住，并亲自接见了前燕宗室人员。前燕是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国家。慕容部人身材颇长，皮肤白皙，称为白部鲜卑，接近白色人种，生得秀美。早在西晋时，汉人士族就经常买慕容部的青年妇女作婢妾。苻坚看到前燕降君慕容暉的身后站着一对少男少女，亭亭玉立，一团秀气，虽然满脸戚容，却越发使人醉心。原来那是慕容暉的妹妹清河公主和弟弟慕容冲，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苻坚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令人爱怜的孩子，他对清河公主一见钟情，就对慕容暉说，自己后宫缺人，非常想留下清河公主作伴儿，如果清河公主害怕寂寞，可以让慕容冲陪伴姐姐入宫。慕容暉已经亡国亡家了，听到苻坚喜欢自己的妹妹，一方面不敢不从，另一方面也想到妹妹入宫，将来对自己也有好处，就同意了。

清河公主举止娴雅，性情温和，加上容貌美丽，不久就得到苻坚的专宠。慕容冲虽然年纪尚轻，但长得颇具魅力。苻坚天天和他见面，看着他一天比一天长大、漂亮起来，又动了爱慕之心，慢慢地把他据为己有，同起同卧，如同夫妻一般。从此，苻坚心里只有清河公主和慕容冲，对其他宫人嫔妃再也不屑一顾了，每日的上朝也渐渐懈怠起来。

尽管宫禁森严，但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长安城里传出歌谣来：“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一时传得尽人皆知。帝王专宠妃子，已经不是好名声，再宠爱男妃，名声就更败坏了。当时王猛还没有死，听说后，马上要求接见。他苦苦劝说，陈述厉害，苻坚不得已，才把慕容冲迁出宫外。他在阿房城种了几万株梧桐、修竹，安顿慕容冲居住，自己则常常偷偷地前往相会。

时光流转，终于，慕容冲长大成人了。如果说，原来只是他年幼不懂事，则现在他知道了国仇家恨，萌生了一个男子汉应有的自

尊心。他对苻坚的柔情蜜意及送来的珍宝玩物开始厌恶起来，时刻盼望着有朝一日燕国光复，重新做他的燕国亲王。

英雄一世死得悲凉

建元十九年（公元 383 年），苻坚不顾群臣及亲属的反对，出兵淝水，大败而归。不久，前燕降将慕容垂、慕容泓各自起兵叛秦，重新打起大燕旗号。当时，慕容暉在长安，苻坚把他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责备慕容氏背信弃义，没有良心。慕容暉只是听着，不发一言，继而流出眼泪，最后终于放声大哭，伏地不起了。苻坚是个心软的人，看见慕容暉大哭，不觉怒气全消，他以为慕容暉确实不知情，就没有杀他。

其实，对慕容垂、慕容泓的叛秦，慕容暉心里非常高兴，自从亡国入秦以来，他时刻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他痛恨自己断送了祖宗的江山，常常在深夜时痛哭失声，不能入寐。现在，终于有人重整大燕旗鼓了！他不顾长安城中慕容宗室子弟被杀的危险，秘密派人通知弟弟慕容泓说：“我没有保住宗庙，是慕容家的罪人。你们不要考虑我的安危，要竭尽全力去恢复大燕旧业。哪天我的死讯传到，你就马上登基称帝！”慕容泓看到哥哥的信，万分激动，立刻派人联系在各地任职的慕容宗室子弟，对前秦发起进攻。

当时，慕容冲任平阳太守，在河东起兵响应。不久，慕容泓因过于严苛，被部下杀死，慕容冲被众人拥立为主，号称皇太弟，兵锋直指关中。慕容冲英勇善战，所向披靡，不久，就占据了老地方阿房城，进逼长安城下。

苻坚听说慕容冲进逼长安，开始时还不相信，及至登城一望，黑森森全是鲜卑军士，为首华盖之下，一个美男子戎装而立。苻坚认得是当年自己朝夕相处的爱卿，不觉叹道：“这奴才是从哪里钻出来的，竟然如此兵强马壮了？”他想起从前与慕容冲的种种柔情蜜意，不觉又悔又恨，大声呵斥说：“你们这群奴才只配放牛羊，何

隋文帝暴崩之谜

苦到这儿来送死！”慕容冲冷笑道：“以前确实是奴才，正因为现在不想再当奴才了，才来要和你换一下！”苻坚忍住气，还想化干戈为玉帛，他派人捧着一领锦袍送到慕容冲阵前，转达他的意思：“古来交兵，不断使节。你远来辛苦，行装仓促，送上锦袍一领，表明我的心意。想当初我待你恩德不薄，怎么今天翻脸不认人了？”慕容冲也派人到城下回答：“皇太弟有令：孤如今心怀天下之志，哪能顾及你一领袍子的小意思，如果你懂得好歹，就赶紧自己绑来见我，我会宽大你们，像你们当初宽大我们一样！”苻坚听了大怒，后悔当年没有听从王猛的劝告，以致养成大患。

不久，慕容冲自己称帝号于阿房城。因为记恨苻坚，他越战越狠，并迁怒于长安百姓，最后，他攻下长安，纵兵大掠，发泄了十几年积郁的恶气。

苻坚兵败后出逃，被以往他最信任的姚萇所执，因为不同意让天下于姚萇，被缢死于新平佛寺中，死年四十八岁。这个英雄一世的氐人君主、风流千古的贤明皇帝，就这样败死在自己当年宠爱的人手里。

隋文帝暴崩之谜

隋文帝杨坚生性简朴，勤于朝政，只是对皇后独孤氏颇有些忌惮。文帝有二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杨勇被立为太子。杨广为谋夺太子之位，与大臣杨素等结交，又想方设法讨好独孤皇后。他掩饰自己好色、奢侈的本性，假装生活简朴，不近女色，只与发妻萧妃恩恩爱爱。这使独孤皇后十分欣慰，而对杨勇宠爱小妾，冷落妻子，生活奢华十分不满。杨广又用甜言蜜语哄骗独孤皇后，时不时对太子杨勇进些谗言。这样，在独孤皇后的努力下，隋文帝废掉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

604年，隋文帝暴崩在仁寿宫，多传与太子杨广有关。

隋文帝晚年时，独孤皇后已死，在后妃中文帝最宠幸陈夫人与蔡夫人。隋文帝病重期间，只留陈、蔡夫人在身边服侍，太子杨广也经常入宫侍疾。面对貌美如花的二位夫人，好色的杨广不免心猿意马。一次，杨广找个理由将蔡夫人叫到另外一间屋里。回来时，文帝见蔡夫人脸上有伤，头发凌乱，遂问原因。蔡夫人哭着说：“皇太子非礼。”文帝大怒，大呼“独孤误我！”咬指出血，召柳述、元岩发诏书，宣杨勇进宫，想重新立他为太子。杨广急忙召来左仆射杨素，右庶子张衡，将柳、元二人拿下。并命令三十多个矫健的奴仆，都穿着妇人的衣服，衣内暗藏武器，在外防卫。同时派人假传圣旨，将废太子杨勇赐死。杨素、张衡则进宫内，用毒药将文帝害死（《通鉴考异》）。

另有传说，当隋文帝临终时，只有太子与陈夫人等侍疾。当陈夫人向文帝诉说太子无礼后，文帝勃然大怒，骂道：“死狗，哪可付后事！”下令召废太子杨勇进宫。杨素却秘而不宣，屏退左右侍从，命张衡进去拉扯皇帝，只见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高祖遂崩（《通历》）。

而《隋书》中记述，隋文帝病重时，杨广怕文帝死了以后，出现对自己不利的局面，写信请教杨素对策。杨素的回书送进宫内，却被错送到文帝手里，文帝才知道杨广勾结大臣、谋立太子的真相，于是想召还杨勇。杨广向杨素问计，杨素便矫诏命令东宫兵士守卫在外，禁止出入，又命张衡进去侍疾。张衡入寝殿后，命令陈夫人及后宫侍者全部离开。不一会儿即闻皇帝驾崩，夫人与众人相顾失色，知道皇帝死于谋杀。不多时，宫女送一金盒给陈夫人，说是太子所赐。陈夫人以为杨广要杀人灭口，不敢开启。后打开盒子，她才发现里面是五彩制成的同心结。众宫人向陈夫人道贺，这一夜，杨广就宿于宣华夫人宫中。

张衡之死亦是杨广弑父夺位的佐证。张衡因为立此大功，受到炀帝的宠幸。却因骄矜日甚，引起皇帝不满。大业八年（612

梅妃之谜

年),张衡被赐死。临死前他高呼:“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是说自己弑先皇,而拥立当今皇上,造此大孽,死也应份。他希望以此秘闻要挟皇帝。监刑者怕惹祸,急忙塞住耳朵,“促令杀之。”《隋书·张衡传》

隋炀帝在位时,荒淫无道,穷奢极欲。自己常慨叹,这大好头颅不知断送在谁手里。最终死于非命,断了隋祚,也是昏君应得的下场。

梅妃之谜

提起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人们自然会想到让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贵妃杨玉环,他们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在后世众多的诗、文、词、曲、小说、戏剧、民间传说乃至神话故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记述。殊不知在杨玉环之前,还有一位梅妃江采萍曾经深得皇帝的宠幸。自杨玉环入宫开始,两人为争宠甚至到了宫中路遇互不行礼的地步。杨玉环专宠后宫后,梅妃独居东宫,后不明不白地死去,为同情她凄苦境遇的人们留下了又一个千古之谜。

梅妃,人如其名,飘逸俊秀,清丽可人。她本姓为江,祖籍福建。9岁的时候就能吟诵《诗经》中的《周南篇》和《召南篇》,还对父亲说:“身为女孩,我要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益的后妃。”父亲见女儿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志向,便为女儿取名“采萍”。采萍15岁时果然被高力士相中,选送入宫。当时宫中嫔妃几近四万,个个浓妆艳抹、盛装俗饰,采萍的到来,仿佛为宫中送来一缕清风,她温柔婉约,淡妆素裹,清爽宜人。最难得的是,采萍不仅容貌秀丽,而且才高八斗,擅乐器、晓歌舞,还尤其喜爱梅花。她的住所周围,梅树随处可见,花开时节,便徘徊其间,赏花作赋,悠然忘我。玄宗怜惜她这份对花的痴爱,称她为“梅妃”。这段时间里,梅妃几乎是在独享

玄宗的爱,其他嫔妃虽心中不悦,但较之梅妃,都自愧不如。

然而好景无多,随着杨玉环的入宫,梅妃渐渐受到冷落。杨玉环与梅妃都堪称绝代佳丽,但两人的气质性情却迥然有异,梅妃娇小玲珑、清新淡雅、斯文柔弱,玉环却丰盈饱满、盛装华饰、千娇百媚。机警狡狴的杨玉环凭借自己雍容的风采和聪慧的天赋,极尽欢歌、畅舞、弹琵琶、击磬制曲之能事,很快就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让唐明皇痴迷地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杨玉环侍宠娇纵,妒意十足。一次皇上回想起往日与梅妃在一起的朝朝暮暮,入夜偷偷派心腹宦官接来梅妃,一路上摸黑前行不敢点灯,生怕被贵妃发觉。这一夜,玄宗与梅妃情意绵绵、互诉思念之情,不觉之中误了早朝。敏感的贵妃妒火中烧,径直来到皇上居所大闹一场,皇上惊慌应对,被藏在帷帐之间的梅妃也只得按照太监的说法悄悄地步行回到被贬居的上阳东宫了。备受冷落的梅妃,孤寂落寞,再也看不到往日前来进献梅花的使者,却常常见到为贵妃进贡水果的地方使节,不觉潸然泪下。她以千金重礼请求高力士找一个高明的词人,像当年司马相如作《长门赋》那样,为自己写一篇情真意切的辞赋,唤醒皇上对自己的往日情怀。但高力士一心攀附权高势重的杨家,草草以“无人会写”回绝了梅妃。心灰意冷的梅妃将满腹哀怨和一腔赤诚诉诸笔端,带着最后的希望自己写就了一篇《东楼赋》,喻自己为一枝飘零孤苦的寒梅,只能在梦中遥想当年与君王的绵绵情意……《东楼赋》呈献给皇上后,梅妃就日日盼望皇上能够为之所动,两人可以重修旧好。然而梅妃盼来的只是皇上赏给她的一斛珍珠,绝望的梅妃早已无心梳妆,她作了一首诗:“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如泪污红绡。长门自是无梳妆,何必珍珠慰寂寥?”连同珍珠一起又由使者原物奉还。

就这样,有了娇媚的杨贵妃,唐明皇虽偶尔也会想起梅妃,但总是怕激怒了贵妃而不敢有任何的举动。直至安史之乱,杨贵妃死于马嵬驿后,回到长安城的唐玄宗才开始四处寻找梅妃的下落。

杨贵妃归宿之谜

有人说兵荒马乱之中，她可能已经流落他乡。唐玄宗马上下诏，谁若发现梅妃，高额悬赏，官升三级，赏钱百万。一天，玄宗梦到梅妃哭泣着诉说自己已经被葬于梅花树下，便跃身而起，立即命人挖掘寻找，终于在温泉池边梅花树下发现了梅妃的尸体，骇然发现其肋下有明显的刀痕。究竟是无人顾及的梅妃绝望地自尽，还是死于乱兵或谁的刀下，都无从查考了。从此，又一个千古之谜伴随着梅妃的尸体被重新安葬，也永远地留给了后人。

杨贵妃归宿之谜

杨贵妃，号太真，小字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东南）人。她天姿聪颖，能歌善舞。初为唐玄宗之子寿王之妃。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因武惠妃去世，召杨贵妃入宫充任妃嫔，深得玄宗宠爱。天宝四年（745年）被封为贵妃。其姐姐兄弟均由此而显贵，堂兄杨国忠官至宰相。天宝十五年（756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和皇亲国戚，在三军将士的护驾下仓皇出逃。行至马嵬驿，随军将士哗变，杀死杨国忠，进而又迫使玄宗杀杨贵妃。唐玄宗迫于形势，只好忍痛割爱，舍弃贵妃。

杨贵妃的最终结局到底如何呢？她是死于暴乱之中，还是出逃他乡了呢？种种说法，把杨贵妃烘托得像谜一样传奇，后人至今追寻不止。

据史料记载，认为杨贵妃死于马嵬驿佛堂者居多。《旧唐书·杨贵妃传》载：唐玄宗迫于禁军将领陈玄礼等要求，只好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堂”。《唐国史补》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资治通鉴·唐纪》中亦有同样记载。

另一种说法是，杨贵妃系吞金而死。刘禹锡曾作《马嵬行》一诗，诗中云：“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

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倏忽葬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诗中可以看出，杨贵妃是吞金而死。陈寅恪先生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贵人饮金屑”之语得自“里中儿”，故而才与众说有异。又说：“吾国昔时贵显者，致死之方法多种兼用，吞金不过其一。杨贵妃缢死前，或曾吞金，是以‘里中儿’传得此说，亦未可知。”（《元白诗笺证稿》）

还有一种说法，在日本民间和学术界较为流行。认为马嵬兵变中被缢身亡的是杨贵妃的侍女。当时禁军主帅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亡，与高力士合谋，用侍女代死。尔后，派人护送杨贵妃出逃。在上海登船，逃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命方士到久津向贵妃面呈佛像两尊，贵妃亦以玉簪答之。但终究未能回国，在日本终其天年。

目前在日本不仅有杨贵妃东渡的种种传说，甚至还留有杨贵妃的多处遗迹。比如，在日本山口县向津具半岛油谷町久津二尊院内的右侧，有被称为“杨贵妃墓”的“五轮塔”。在荻市长寿寺中有供奉杨贵妃的“十三塔”。在日本的京都泉涌寺有“杨贵妃观音堂”，堂中供奉着“杨贵妃观音像”等等。以上遗迹，都作为名胜古迹编列在日本的导游手册中。

另一种说法是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于 20 年代，为白居易《长恨歌》撰文时分析，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不然为什么玄宗从四川回朝路过马嵬驿时，找不到杨贵妃的尸骨。据此推论说：真正的杨贵妃可能“金蝉脱壳”流落到当时的女道士院（娼妓院），当了妓女。笔者认为俞氏的这种推测，难以为凭。

更令人拍案惊奇的说法是，杨贵妃逃亡美洲了。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中称，他通过对古籍的考证，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伴往美洲了。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贵妃的死因与下落传闻越来越多，特别是

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借助丰富的想象,使杨贵妃这个历史人物,更具传奇色彩。

唐宣宗当和尚之谜

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为维护统治,封建帝王大都对佛教采取宽容的态度。而唐武宗时期,却发生了大举毁佛灭佛的运动,将佛像、佛堂的钟、磬等改铸为钱币、农具等物,史称“会昌法难”。而武宗之后的宣宗刚一即位就立刻诏告天下,复兴佛教。这叔侄二帝对待佛教的态度,据说都与宣宗未继位前的一段“出家”经历有关。

唐宣宗是唐宪宗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名叫李怡(后改名李忱),封光王。841年,他的侄子李炎即位,称唐武宗。唐武宗做了皇帝,对他的叔叔光王很不放心,百般迫害,故光王为避祸,长期流落民间,并曾遁迹为僧。一日游方,在庐山遇到希运禅师,一同观看瀑布。禅师刚咏一联:“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唐宣宗听后,应声而答:“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表达了他身在民间,却念念不忘帝业的雄心壮志。“其后竟践位,志先见于此诗矣”。几年后,真的登上了大唐的皇帝宝座,实现了他的平生夙愿(《夷溪诗话》《佛祖统计》)。

禅宗里有“顿悟”与“渐悟”之说。禅师们有时用“棒喝”的方式启发弟子的悟性。在佛教典故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唐宣宗做王子时,曾在寺中做小沙弥,因见黄檗禅师在大殿礼佛,就问:“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要礼拜什么?”黄檗打了他一巴掌,说:“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作如是礼。”(《削指录》)

而据《豫章书》和奉新旧志记载:唐宣宗为僧云游四方时,曾到过奉新县的百丈寺。奉新西南部的“驾山”因唐宣宗经常登临而得名,“驾山”之南的“王见山”因唐宣宗看过而得名。唐宣宗即位后,

对为僧云游的日子难以忘怀，对百丈寺僧人对他的照顾心存感激。因此一即位，就赐百丈寺“大智寿圣禅寺”匾额，并在天下推崇佛教。

黄檗山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大宗之一的临济宗的开创地。其中有一“皇叔塔”极为珍贵，据说就是为纪念唐宣宗李忱在此习禅而建的。始建于唐代的香岩寺，是唐朝著名国师慧忠的道场，有“千顷香岩”之称，与少林寺、白马寺、相国寺并称中州四大名刹，传说唐宣宗曾在这里削发为僧避难。霍山的灵山寺，也曾留下唐宣宗为僧时的足迹。

唐朝历代帝王多尊崇佛教，而唐武宗即位后，却大举灭佛。有人推论，是源于同他叔父宣宗的矛盾。武宗毁灭佛教的原因，在于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传说逃入杭州齐安寺为沙弥）。灭佛是为了查找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会昌二年、三年，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间盘查，特别是严查沙弥、俗客、保外僧，后来又对寺院实行戒严式的管制，这其实是借机对在逃的宣宗进行搜捕和追拿（《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

唐宣宗继位后，便“尽革武宗乱政”，下令恢复佛寺，并诛杀赵归真、刘玄靖等撺掇武宗灭佛的十名道士，“以平民怨”。其中就有对佛教报恩的个人因素在内。因为据说为隐藏唐宣宗，许多寺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唐宣宗出家为僧一说，未有明证，姑且存疑。

赵匡胤“暴死”之谜

子承父业，这是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制所沿袭的传统体制，封建君王将王位一般都传于自己的儿子，除非特殊情况下，很少有传位于他人的。然而历史上就有那么几位帝王其帝位的得来似乎不合正统，如宋太宗赵光义等皇位的取得都是作为千古之谜流传至今

赵匡胤“暴死”之谜

的。

宋太宗赵光义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匡胤于 960 年发动了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 17 年的皇帝，到 976 年便猝然离世了。其死因有两种说法，一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非正常死亡说，二是部分学者认为他属正常死亡，并非他人所杀。由于正史中对赵匡胤的死因没有明确记载，野史中的记载又说法不一，其死因便成为一大历史悬案。

持非正常死亡说者认为，赵匡胤死于其弟光义之手，也就是所谓“烛影斧声”之谜。他们的依据是北宋年间所编的《续湘山野录·太宗即位》中讲述的这样一个故事：

当天晚上天空晴朗，星光灿烂，宋太祖心中十分高兴。不一会儿，天空中乌云四起，天气突变，雷雹纷纷落下。宋太祖见势不妙，赶紧撤走仪仗，退阁回到寝宫，急忙地传呼掌管宫廷钥匙的官吏打开端门，传开封王（宋太宗赵光义）入内。宋太宗来后，太祖打发走宦官、侍女，兄弟二人便对饮起来。从殿外极目望去，只见烛光灯影之下，太宗不时地离开席位，好像不胜酒力的样子。饮酒完毕，宫中三鼓之声响起，这时地上积了数寸厚的雪，太祖走出寝宫，用柱斧戳入雪地中，回头对宋太宗说：“好做，好做！”说罢，太祖解衣带就寝，发出如雷声般的鼾声。这天晚上，宋太宗夜宿宫中。至五更鼓过，皇宫值夜禁卫寂无所闻，太祖猝死。宋太宗遵太祖死前发布的传位诏书，在太祖灵位前即皇帝位。等到天亮，宋太宗上明堂（古代帝王定明政教的地方），宣读完宋太祖死前留下的传位诏书，率领亲近大臣轮流观看玉制的葬服并瞻视宋太祖遗体，容颜安详、柔润就像是刚进行洗浴修饰过一样。这段话记述了赵匡胤在“烛影斧声”中突然死去。宋太祖之死是个疑案，因为宋太宗赵光义在宋太祖死去的这天晚上一个人与太祖在宫禁内休息，具有杀兄篡位的嫌疑。

至于赵光义杀兄夺位的原因，也有几种传说：一是说赵光义非

常好色，看上并调戏宋太祖赵匡胤的宠妃花蕊夫人，被其兄发现争斗起来后杀死兄长；另一种说法是家族内部的权力争夺，赵匡胤忽视了对赵光义的注意和防范，导致赵光义势力和野心的膨胀；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兄弟二人的政见不同，如在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上、对定都何处的问题上二人都有分歧，最后导致兄弟相煎。

持正常死亡说者则认为上述所谓“烛影斧声”之说纯属杜撰，他们以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为依据，其中记载：宋太祖晏驾后，皇后派内侍王继隆召长子赵德昭进宫继承王位。王继隆认为太祖在世时，素有传位给晋王之意。于是自作主张召赵光义进宫。赵光义闻讯后大惊，犹豫不敢前往。王催促说：时间紧迫，耽误时间，帝位就是他人的了。这时赵光义才匆忙随王继隆入宫。皇后一见来者为晋王赵光义，非常吃惊，只好说：我母子的性命都托官家了。赵光义见状，也哭着说：共保富贵，不要忧伤。以此而论，赵匡胤死时赵光义并不知晓，也不在宫中，因此也就不存在弑兄之嫌了。

那么，宋太祖赵匡胤究竟是何种原因暴死的？也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太祖很爱喝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而死。或者是与赵氏家族的遗传病有关，据考证，赵匡胤一族早亡者居多，即使活得较长的平均年龄也就 41 岁，与当时的上流社会平均寿命 62 岁相比小得多。

花蕊夫人之谜

历代帝王后宫中容颜绝伦的美女数不胜数，她们中有的以美艳著称，有的以巧慧受宠，更有一些才貌兼具的佳人，令后世的人们称颂不已。花蕊夫人就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其所处的时代战乱连绵，相关记载仅有百余字之多，而且同一个时代内有记载可循的约有三位丽人，被冠以“花蕊”之名，在后代史书的记载中也就难免被张冠李戴，所以关于花蕊夫人的身世及死因都成了千古之谜。

花蕊夫人之谜

花蕊夫人,单从其冠名上推想,就该属于那种有着倾国倾城的花容月貌,性情娇柔妩媚又恬静温顺的国色天香。这样一位丽人,她的身世经历又当如何?诸多学者参考史籍记述和传闻轶事进行了论证和探讨。

通常所说的花蕊夫人当是指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花蕊夫人,但前蜀的赵氏女子和小徐妃也都有过“花蕊”的称谓。北宋张商英所撰的《蜀梼杌》上记载,前蜀内枢密潘炕有一美妾,姓赵,名解愁,是其母做梦吃下了海棠花的花蕊之后生下的,不仅容貌堪称国色,而且“善为新声及小词”。当年王建欲招解愁入宫,遭到潘炕的拒绝。所以,这名赵氏姑娘虽有“花蕊”的美誉,但无缘“花蕊夫人”的尊称。而另一个“花蕊夫人”小徐妃,在宋代的《铁围山丛谈》中说她是前蜀王建纳的妾,在清代的《十国春秋》中说她是徐耕的二女儿,前蜀高祖时,进位为淑妃,在宫中称为花蕊夫人,也叫小徐妃。光天元年六月,尊为皇太妃。

至于后蜀的花蕊夫人,在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称其为徐匡璋之女,嫁与蜀王孟昶,封为贵妃,别号花蕊夫人,以赞其如花的容颜;后升号为慧妃,是得名于其诗书词赋方面的文采与才华。

有学者对照史书查考前蜀花蕊夫人小徐妃和后蜀花蕊夫人徐氏,认为小徐妃一说并不足信,很可能是解愁姑娘的“花蕊”之名几经误传被安置在了小徐妃的名下,也有可能是爱屋及乌,将后蜀花蕊夫人因绝伦美貌而获得的别号同样赋予了小徐妃。另有人称,小徐妃与后蜀花蕊夫人同属徐姓家族,徐耕有二子二女,两个女儿均入得宫中成为王建的两个妃子,大徐妃即贵妃,小徐妃即淑妃;二子之中的徐匡璋,又将女儿送入宫中,成为后蜀孟昶之慧妃,所以,后蜀花蕊夫人慧妃应称小徐妃为姑姑。

据说当年,后蜀王孟昶在宠妃张太华死后,备感孤寂落寞,下令普选天下美女。有着花样容颜,清秀脱俗又能诗善赋的徐匡璋之女艳压群芳,备受孟昶怜爱,得以宠冠六宫二十余年之久,直至

蜀国衰败，孟昶客死他乡。怜香惜玉的孟昶曾经作词赞誉花蕊夫人的美貌——“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开明月独窥人，欹枕斜横云鬓乱。”蜀国被赵匡胤所灭后，花蕊夫人又随孟昶等举族入宋。在宋都，孟被封为秦国公，但受封后第七天即突然死去。不久，花蕊夫人被招入宫中，应太祖赵匡胤之命陈诗赋词，她遂作了一首诵其亡国的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痛斥十四万蜀兵没有男儿气节，被几万宋军打得丢盔卸甲，弃城而逃。赵匡胤见其不仅仅是花容月貌、文采飞扬，更有着难得的爱国之心，对其备加宠爱。

自古红颜多薄命，花蕊夫人之死也存在多种说法。一说其至宋后，从未入宫，而是被送入输织室，后因罪赐死；一说为宋太宗赵匡义仿效曹操梦中杀人而一箭射死，还有一种更富戏剧性的说法，称赵匡胤在病重弥留之际，花蕊夫人和赵匡义同在一旁侍奉，赵匡义见太祖已然气若游丝，遂调戏早已垂涎已久的花蕊夫人，被太祖察觉，花蕊夫人于是被赵匡胤在临死前下令处死。

花蕊夫人留给后人九十余首被称为“宫词”的诗，从中虽难以找到描写她本人身世经历的词句，但也许恰恰是这不甚明朗的身世和传世芳名才得以留给后人更多的想象空间。

赵氏家族病之谜

关于太祖暴死有部分人否认太祖遭了赵光义的毒手，他们认为太宗确系篡位，但并非是致死太祖的凶手，太祖赵匡胤之死宜属暴亡。

日本学者指出，赵匡胤很爱喝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才一命呜呼的。

最近，又有学者研究证明，赵匡胤死于赵氏家族病。

赵氏家族确有家族病。赵氏第一、二代人口中共 28 人，其中

赵氏家族病之谜

天亡四人,光济一人年龄不详,其余 23 人平均年龄约 41 岁,比宋代上流社会的平均年龄 62 岁低得多。

如果把 55 岁以上无奇病死亡的称为正常死亡,共有四人,占总人数的 17% 其余暴死者三人,精神受刺激患病死者(包括忧悸成疾、自杀、狂病、惊悸中风四项)四人,可称为异常死亡者,占总人数的 30% 左右。还有 11 人情况比较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特征是享年不永,平均年龄只有 33 岁,可称为早亡人口。

在第一代人中,健康者只有赵光义一个,占 1/5。他的后代九人中,健康者一人,占 11%,其余都是有病之人。病人廷美的后代十人中有二个健康人,占 20%。病人后代有健康人,健康人后代也有病人。这种情况与孟德尔遗传学分离定律相吻合。

赵氏家族病究竟是什么呢?

《宋史》载太宗长子元佐患“狂疾”。元佐与廷美关系较好,廷美死后,元佐便发了狂,常因小小的过错就刺伤身边侍者。两年后,疾病渐渐好转。重阳那天,太宗举行内廷宫宴,元佐因为狂病初愈,没有邀请他。元佐得知后愤恨不已:皇子都出席了宴会,唯独不邀请我,显然是嫌弃我。于是纵酒狂饮,晚上又放火焚宫,于是被贬为庶人。仁宗朝时病死。

由此可知,元佐病因是由于突闻廷美冤死的噩耗,且惊且怒,精神过度受刺激引起的。主要症状是情绪亢奋,自制力丧失。稍不如意,就狂怒异常,以致杀人放火。而且是间断发作,不发作时头脑清醒,如果将病人隔离,创造一个安静环境,使病人少受刺激,就能自趋痊愈。真宗以后,元佐的病势已明显减轻了。根据这些症状,可以约略判定元佐所患之病是精神病中的躁狂病。

赵氏家族中还有另一种精神病,以德昭为例。这位青年皇子只因太宗一句气话自刎而死,他如有所想,不外是太宗怎样怀疑他,以后会给他捏造怎样的罪名,怎样侮辱他、折磨他,最后怎样对他下毒手。与其受辱而死,不如早做决断。这就接近于被迫害妄

想症了,医学上专名为忧郁症。患这种病的人,由于焦虑、恐惧,自伤自痛,不能自拔,最容易走自杀这条路。

赵氏家族前二代可以约略分辨出来患这两种病的还有元偃廷美等。

据今人研究,躁狂症引起的暴亡、早亡和精神病具有遗传性。赵氏第三代也符合这一规律。

德昭五子,一子寿终,一子早夭,余皆享年 30——40 岁左右。

德芳三子,卒年分别为 35 岁,38 岁,30 岁。

太宗诸孙夭亡比例很大:总 27 人,夭亡 15 人,占 1/2 强。无后者也较多。

由于早亡、暴亡、夭亡比例很大,北宋九朝中只有神、钦二宗是嫡长子继位,仁、哲二宗无子嗣,只徽宗一人在位时看到了嫡长孙的降生。南宋时,高宗不得已重立太祖后代为继承人。

早亡、暴亡、精神病等症,终宋一代宗室没有间断。因而说赵宋宗室有遗传性家族病,其表现是早亡、暴亡、精神病,应是可信的。

那么,赵匡胤到底死于何因呢?

一些学者认为,赵光义没有谋杀的可能性。因为“烛影斧声”之夜,夜宴是在皇宫中进行的,太祖召太宗入宫,太宗很难预先作准备。夜宴虽然屏退了宦官宫妾,附近并非无人,否则没法视闻烛影斧声了。太祖入睡时也无异状,又有侍寝在旁守护,说是受了太宗谋害就不可思议了。赵匡胤的死因是遗传性家族病,即是由于躁狂忧郁症愈后,又患了脑动脉破裂症(脑溢血)。躁狂忧郁症虽有缓解趋势,但缓解以后的病人比较容易患动脉硬化症。始发病多在 40 岁以后,40 岁以前的壮年甚至青年时期也时有发生。

太祖于十月庚戌发病,癸丑夜四鼓暴崩,中间三日为先期征兆期。其死前夜鼻息如雷,连侍寝者也觉其鼻息有异。这都是脑溢血的典型症状。

辽穆宗嗜睡

在太祖即位后的几年中,情绪或亢奋,或抑郁,趋向于两个极端,有患轻度躁狂忧郁症的迹象。

“杯酒释兵权”时,太祖曾说:“我没有你们的帮助就登不上皇位,但是我做皇帝却没有以前做节度使时快乐,甚至整夜都睡不着。谁不想富贵,一旦黄袍加身,就由不得你推却了。”这段话直如一介莽夫,浑不似开国皇帝之语言,显然是由于情绪抑郁、低沉而到了失控忘形的程度。

这位学者最后总结 赵匡胤前有躁狂症状,后有脑溢血症状,家族又有这类遗传病史,他的死亡是病歿,不足为怪。所谓“烛影斧声”的玄虚只是那些性耽疑古的历史学家的猜测而已。

据笔者陋见,“家族病”说对解释赵氏家族暴亡、早亡、夭亡现象很有说服力,但由此而完全否定太宗弑兄夺位的可能性则未免武断。任何一种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如果太宗与太祖之死毫无干系,事先并不知太祖已亡,而是等王继恩到晋王府时方才匆忙做篡位准备的话,其夺位活动肯定不会那么顺利,在短短的几个时辰里面就能宣布登基。况且,夺位之际又正值太祖亲信将领和军队北征,内侍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继恩也在关键时刻倒向赵光义,太宗继位前,皇后的言语神态,以及太宗登基六年之后不厌其烦地抛出的“金匱之盟”等等,这些都非“家族病”能解释得了的。

辽穆宗嗜睡

辽太宗耶律德光披甲征战,长年不休,结果弄得民力疲惫,人心怨愤,统治岌岌可危。太宗死后,其弟李胡和侄儿兀欲争立,几经明争暗斗,李胡失败,兀欲继承大位,为辽世宗。世宗仪容丰伟,善于骑射,乐于助人,没即位时很得太宗的喜爱,太宗视如己子。即位以后,世宗荒于酒色,轻慢侮辱各位酋长,很快便诸部反叛,怨声载道。世宗领亲兵平复叛乱,残杀无辜,在位五年竟无暇南顾。

天禄五年九月申朔，世宗领兵南伐。到归化州祥古山，世宗在行宫祭祀其已追尊为襄国皇帝的父亲。祭扫以后，君臣痛饮，结果大醉。燕王和太宁王乘机造反，杀死世宗。叛乱平复以后，君臣奉太宗耶律德光的儿子耶律璟即皇帝位，是为辽穆宗。

辽穆宗耶律璟小字述律，他是太宗的长子，母亲是靖安皇后萧氏。耶律璟于会同二年九岁时进封为寿安王，到天禄五年群臣奉他即位，时年二十岁，称为天顺皇帝。耶律璟即位以后，虽然尊为天顺，但政局极其不稳，叛乱此起彼伏。先有太尉忽右质谋乱，穆宗一举扑灭，诛杀无数。接着，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瀚等谋逆南奔，穆宗将其识破，诏暴其罪。不久，政事令萧眉古得会同林牙敌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谋乱，穆宗下令逮捕，杀萧眉古得、娄国等，杖李瀚。

扑灭了几次叛乱，政局稳固，穆宗开始讲求享乐，希望能够长生不死。应历七年四月朔日，穆宗回到上京。女巫肖古曾奏上延年益寿药方，穆宗大为兴奋。药方配制独特，尤其是要童男子的胆和药下服，穆宗觉得惊奇，并深信不疑。于是，接连几年服药，也接连几年杀死了无数的童男子，取其胆用以和药。到这时，穆宗才发觉延年益寿的药方是骗人的，穆宗回到上京以后，便吩咐推出女巫，当场射杀。

穆宗沉溺于美酒，乱杀无辜，日益变得喜怒无常。应历七年十二月，穆宗大猎七鹰山以后，趁着高兴，诏令天下：有罪的，依法论刑。我发怒时，难免祸及无辜，你们要据理切谏，不要盲从。但此后穆宗并没有什么好转，而是继续沉醉于美酒，终日昏睡。王子敌烈、前宣徽使海思、萧达干等不满于穆宗昏庸，密谋造反。事泄以后，穆宗治其罪，还郑重地敬视天地、祖先，告知贼臣谋反，随后召群臣议事。一年以后，穆宗便彻底地射猎游乐，动辄昏睡，干脆不理朝事。

穆宗在位十八年，从应历十三年以后他开始嗜酒、嗜睡。应历

十三年正月他一连酣饮九日，醉得几天不醒，醒来以后就杀死了兽人海里。两个月后，穆宗杀鹿人弥里吉，割下他的脑袋，将脑袋赏赐给掌鹿者。穆宗带近侍游猎，近侍射中了一只獐，穆宗认为近侍伤生，吩咐杖责近侍，结果近侍被活活杖死。接着，穆宗又杀掉獐人霞马，杀毚人曷主。后来，又支解鹿人没答、海里等七人。穆宗在最后的几年，除了昏睡、醉酒，便是动不动就杀人。他身边的近侍和仆从被他杀死的即有 近侍小六、近侍东儿、虞人沙刺迭、近侍喜哥妻、近侍随鲁、近侍白海、家仆衫福、押刺葛、枢密使门吏老古、挾马失鲁、狼人马里、豕人阿不札、术里者、涅者括等。穆宗真是杀人如麻，连他身边的近侍也不放过。穆宗如此沉醉、乱杀，结果召来了杀身之祸。应历十九年正月，大宴宫中，酒醉以后，命殿前都点检夷腊葛代行击土牛礼。酒醒以后，穆宗和群臣玩叶格戏，并诏令太尉化哥 我醉中处事有错，不要执行，酒醒以后复奏。接着，穆宗领群臣、近侍出宫游猎，射大熊，欢饮达旦，君臣大醉。近侍小哥、盥人花哥、浪人辛古等六人平日胆战心惊，不胜其苦，此时即乘机杀死穆宗，时年三十九岁。

从史书的记载上看，穆宗身体卑弱，怕见女人，因而不喜女色。《契丹国志》说，穆宗在藩邸时，述律太后想给他纳妃，他称自己有病，坚决拒绝。即位以后，嫔御美人满前，他连看都不看。朝臣考虑嗣统，上奏说椒房虚位，乞望立后坐镇六宫，穆宗置之不理。结果，他的左右近侍和一应房帷供奉，全都是阉人。也许，穆宗的残暴是源于他的天阉，天阉导致他的失性变态，于是，他终日除了睡觉，便就是游乐和杀人。

穆宗在中国历史上最驰名的不是游乐、杀人，而是终日酣睡。游乐和杀人是帝王们的专利，几乎史不绝书，因而没什么新鲜。但睡觉却是不同。除了天阉，享乐不尽的帝王哪里会终日睡觉？他们总觉得时间紧迫，享乐不够。穆宗则不同，美人他享受不了，与其去受罪，吃饱喝足以后倒不如去睡觉。于是，史书便这样记载

世界未解之谜之中国历史之谜

说 穆宗年少，好游猎，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寝，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有两首宫词对此也有精采的描述：

沉沉宫禁静无声，五凤楼开理鬓鸦。

怪底君王眠不醒，春风闲煞掖庭花。

延昌宫外夜冥冥，侍宴宫娥冷倚屏。

四鼓将残齐聒帐，何曾唤得睡王醒。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睡名的大辽睡王。

成吉思汗陵墓之谜

成吉思汗在 1227 年率军攻打西夏时因病身亡。据说遵从成吉思汗“秘不发丧”的遗命，他的遗体被送回故乡，陵墓深埋，万马踏平，坟地成为森林。所以成吉思汗身葬何处不得而知。1954 年建于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并非成吉思汗真正的葬身之处，而是一个象征性的陵寝，即假陵，其中并无成吉思汗的遗体。

那么成吉思汗的遗体到底埋葬在何处呢？史书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下落。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成吉思汗遗体就安放在阿勒泰山上。成吉思汗在率兵远征西夏时死于甘肃清水县，他临终前命令秘不发丧，以免涣散军心。诸将于是把他的灵柩运回蒙古安葬，“在把君主的灵柩运往阿勒泰山的途中，护送的人将沿途遇到的所有人作为殉葬者”。中国史书中的记载内容不详，或说“起辇谷”，或说“不儿罕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肯特山）。

中国新疆博物馆的考古学者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山脉所在的青和县三道海附近，发现了一座人工改造的大山，怀疑是成吉思汗的葬身陵墓，但也未能确认。

其实不只成吉思汗，元朝君主的陵墓都未能得到确切考证，这

成吉思汗陵墓之谜

与元代的丧葬风俗有关。元朝虽然入主中原,却仍然保留了蒙古习俗,反映在葬制习俗上,贵族实行秘密潜埋习俗。据史料记载,蒙古贵族死后不起坟,埋葬之后,“以马蹂之使平”,然后在这片墓地上,当着母骆驼的面,把子骆驼杀死,淋血在地上,派千骑士兵守护。到来年的春天,草生长茂盛之后,士兵迁帐撤走,而一般人所看到的只是茫茫草原,不知其墓地所在。如果皇帝要祭祀时,就拉着那只母骆驼引路,若见到母骆驼悲鸣之处,就算是墓地了。由于墓地上无任何标志,也就无法辨认灵柩真正所在地(《草木子》)。

现今成吉思汗的陵园坐落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镇东南面的敖包上,号称“八白室”。“八白室”是由八间白色的建筑构成。由于蒙古贵族有葬后灭迹,不留坟墓的习俗,埋葬地点不为人知,无从祭祀,所以,为了纪念祖先,便创立了经常可以祭祀纪念的灵庙,这种灵庙就叫做“八白室”。《蒙古源流》一书记载:“因不能请出金身,遂造长陵共仰庇护,于彼处另立白屋八间,在阿尔台山阴、哈岱山阳之谔特克地方建立陵寝,号为索多博克达明成吉思汗。其后遂留传至今。”

至于选择这里作为成吉思汗陵,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1226年,成吉思汗率兵征讨西夏时,路经蒙古西南部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地方。这时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一片迷人的景色吸引了他,使他久久不忍离去。他在沉思很久之后,对周围人说:“我看这个地方太美了,死后就把我葬在这里吧!”果然,在他西征的第二年(1227年),就病死在清水县军中。他的遗体就由诸王和那颜(蒙古贵族首领)按照他生前的愿望,千里迢迢运到这里安葬。从此,便把这里称之为伊金霍洛,意为“主人的陵园”。

成吉思汗陵的现有建筑,是解放以后重新修建的。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德王秘密派遣蒙奸、汉奸进行阴谋活动,企图将成吉思汗陵盗窃去归绥。内蒙古广大人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提出了强

烈抗议。在广大人民和抗日爱国人士沙王等提出迁移的呼吁下，国民党政府被迫成立移陵委员会，和沙王等人一起办理移陵之事。陵于 1939 年 5 月开始迁移，先迁到了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在榆中县放置了十一年后，又移置到青海省塔尔寺。解放以后，应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要求，于 1954 年春，由内蒙古自治区组成迎接成吉思汗灵柩回蒙的代表团，专程前往塔尔寺，同年 4 月 1 日将灵柩接回伊金霍洛。中央拨专款 80 万元，重建了陵园。

由于蒙古族的特有习俗，因而成吉思汗与元代其他帝王陵寝均不知所踪，而不像明、清都有庞大的帝陵群。

“上帝之鞭”蒙哥死因之谜

被誉为“上帝之鞭”的蒙哥（元宪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无敌手，马鞭指处，无不臣服。在他的征战下，元朝的疆域在不断扩大。1258 年 2 月，蒙哥亲率十万大军分三路进攻四川。一路上攻城拔寨所向披靡。转年二月，各路大军齐聚三面环水，形势险峻的合州钓鱼城。合州知州王坚带领南宋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保卫战。而这位骄横的“上帝之鞭”也鞭折城下命丧黄泉。钓鱼城也因之被各国史学家称为“东方的麦加城”。蒙哥到底是如何折鞭的？历史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久攻不下，忧愤而死。钓鱼城形势陡绝，易守难攻，蒙哥围城数月，久攻难克，反被南宋军队几次反击得手，损兵折将，不可一世的蒙哥难受其辱，终激愤而死。此说的出处来自南宋黄震所著的《古今纪要逸编》。

二、炮石击死。蒙军攻城时，损失惨重，先锋汪德臣也死于城下，蒙哥亲自督军上阵，蒙军攻势更加凶猛。这时宋军的大炮发了神威，直炸得蒙军人仰马翻，蒙哥也被炮石所伤，因伤势太重回营后便死去。持此说法的是刘泽华、冯尔康所著的《中国古代史》和

朱元璋大兴文字狱之谜

邱树林著的《元朝史话》。在当地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钓鱼城旁的呼天堡就是当年蒙哥中炮负伤后在此哀嚎呼天之处，后人就将此处称为“呼天堡”。

三、得病而死。此说出处较多，最早见于波斯政治家刺施特哀丁在 1307 年编著的《史集》中的记载，当时蒙军中流行痢疾，蒙哥也染疾而死。《元史·宪宗纪》中说蒙哥在六月身体有些“不豫”，七月癸亥崩于钓鱼山，肯定蒙哥为病死。《续资治通鉴》也认可此说。魏源编写的《元史新编》里认为蒙哥是因为“触暴雨，不豫”而死。

四、中飞矢而死。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和叙利亚阿部耳法刺底编著的《世界史节本》等史书都认为蒙哥是被宋军的飞矢射死的。合州立于 1517 年的《新建二公祠堂记》石碑碑文中也记载蒙哥是“中飞矢而死”。

五、淹死水中。此说源于小阿美尼亚海屯 1307 年口授的东方史《海屯纪年》，说蒙哥乘船进攻宋军，宋军“水鬼”潜入水下，凿穿船底，蒙哥与战船一同沉入水底，葬身鱼腹。

不管蒙哥是如何死的，但作为一个御驾亲征的大汗（皇帝）死在了征战的途中，历史也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朱元璋大兴文字狱之谜

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一贫苦农家。元朝末年淮北大旱，流行瘟疫，朱元璋的父母与大哥均病饿而死。17 岁时，朱元璋为了活命，出家为僧。后来参加红巾军，屡建功勋，至 47 岁建国称帝。

“祸从口出”，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历朝历代的文字狱都证明了这一点。明朝初年朱元璋以严刑治国，大兴文字狱，也是他刑杀作风的必然产物。但朱元璋时代的文字狱，又与他的出身与发迹有很大关系。由于他做过和尚，又当过义军（当时被称为“盗贼”），所以虽然当了皇帝，却仍然对自己的门第与经历耿耿于怀，

深感自卑，觉得在士大夫面前矮一截。因此对一些字眼十分敏感，如“光”、“秃”、“僧”、与“僧”同音的“生”、与“贼”发音相似的“则”字等都成为他的禁忌。据说朱元璋修玉牒（家谱）时，原打算将宋朝著名学者朱熹拉作祖先的，后来怕被人笑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明朝初期，许多士子不肯与新朝合作，也是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重要原因。士子们留恋旧朝，又看不起农民出身的皇帝，对新朝的前途缺乏信心，故此大多数人都不愿出仕。所以明初征辟士子，往往由地方官押解上路，如同囚徒。

而一些勋贵自以为出生入死打下天下，见到文人被重用，心存嫉恨，屡屡中伤。如有人在太祖面前说，文人善于讥讪。张士诚的名字是请身边文人起的雅名，却不知《孟子》中有“士，诚小人也”，其实是在借机骂他。太祖一查，果然如此，因此非常注意从臣子的文字中寻找“讥讪”字句，屡兴文狱（《三千年文祸》）。

因文字取祸，古来有之，却以明初“表笺祸”最为冤枉。如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二句，被怀疑是讽刺而遭砍头。因为“法坤”音同“髮髯”，“藻饰太平”音同“早失太平”。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璋解释说，“生”者僧也，骂他做过和尚；“光”则秃也，说他是秃子；“则”音近于贼，骂他当过强盗。因此勃然大怒，将徐一夔斩首。当时贺表谢笺的许多作者因为文字中有此类字眼而无端丧命，可称是文祸史上最荒唐的一页。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朱元璋命人撰写“庆贺谢恩表式”，颁布天下，命令以后如果遇到庆贺谢恩，官员们照表式抄录，送上即可。从此，文人学士乃至政府官员才避免因文字纠葛而蒙受不白之冤（《中国历代史话》）。贺表尚且如此，至于以诗文、疏谏取祸者，更不在话下。

文字狱的时间从洪武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前后达 13 年（《闲中古今录》），幸免者寥寥无几。以皇帝之阴暗心态嫁祸于天下臣民，

实在是封建时代文人的大灾难。

建文帝失踪之谜

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即建文帝，后世也称为明惠帝。由于明太祖实行分封诸王的制度，故各藩王均拥兵自重。诸皇子中以燕王朱棣实力最雄厚，也最有野心。建文元年七月，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发难，正式起兵，史称“靖难之役”。历时三年，朱棣登上皇位，是为明成祖。

当燕军入城后，径奔皇宫而去，却只见宫中一片火海，建文帝下落不明。几天后，军士们找到一具烧焦的尸体，传为建文帝遗体。朱棣叹息不已，于七日后以王礼为他举行葬礼。因为建文帝自焚而死与逃亡之说始终并存，故后来的史书都采取了比较严谨的说法。如《明史·惠帝本纪》上说：“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后面又说“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明实录》也有“出亡”二字，为建文帝失踪留下千古谜团。

据说金川门失守时，建文帝本欲自杀殉国，翰林编修程济向建文帝献出亡之策，为建文帝剃了发，换上僧服，从御沟逃出城。过了一会儿，宫中火起，皇后马氏投火自焚。人们纷纷传言建文帝亦死于这场火中。于是，成祖以礼葬之（《明清宫廷疑案》）。

也有传闻，说燕军入城后，建文帝下令焚烧殿宇。当他准备自焚时，一个太监拦住了他，情愿代君王而死。于是，建文帝乘乱逃走，而太监穿戴起建文帝的衣冠，骑着白马，径自奔向火中。人们远远望见，以为建文帝自焚而亡（《明清宫廷疑案》）。

还有传说更是神奇。当皇城将破时，太监王钺对建文帝说，太祖升天时，留下一遗篋，并有遗言，说临大难时开启。这只红篋四周都用铁封着，锁也用铁灌满。砸碎红篋后，里面度牒、袈裟、帽

鞋、剃刀，一应俱全，还有白银十锭。筐内有一张纸，写着逃跑的路线。建文帝长叹说：“天意如此。”程济当即为他削发。随建文帝出亡者总共有二十二人。决定逃亡以后，便在宫内燃起大火（《中国深宫实录》）。

明成祖曾在宫中整整搜寻了三天，只证明皇后马氏死于火中，却始终找不到建文帝的全尸。由于心中存疑，自永乐初年起，明成祖从未放弃过对建文帝下落的访查。先派胡濙以寻访张仙（即俗称“邋遢仙”的张三丰）为名，巡行天下，其实是在暗中找寻建文帝。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最主要原因也是成祖怀疑惠帝逃亡到海外，所以派他追寻建文帝行踪。至于耀兵异域，则成为次要目的（《明史·郑和传》）。

建文帝流落民间，据说主要居住、往来于云南山中。直到现在，云南大理民间仍有人以惠帝为鼻祖。史仲彬是建文帝出亡的协助者之一，曾数次南下与建文帝会面。他根据亲身经历撰写《敬身录》一书，于万历年间被发现，得以传世。程济则著有《从亡随笔》一书，完整地记录了建文帝逃亡期间的行踪。类似的书还有一些，后人多认为是伪造，不足为凭。

明英宗正统年间，有御史出巡，忽见一僧当道而立，自称建文帝，献诗云：“流落江南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年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不休。”御史以此上奏朝廷，皇帝下诏让大臣核查，却难辨虚实，后来死于狱中（《震泽纪闻》）。而据《罪惟录》中所载，此人乃是“冒牌”的建文帝，俗家姓名为杨行祥，洪武十七年出家为僧，被人怂恿，假冒建文帝，被囚于狱中，不久死去。

另有传说 明英宗时，因往事淡如烟，建文帝便在流亡 38 年后，由云南至广西，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被送往京师。由于在此前曾有老僧冒充建文帝，遂找到当年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对证。建文帝一见吴亮便问：“你不是吴亮吗？”吴亮慌忙否认。建

明成祖生母之谜

文帝说：“昔日我在便殿，将一片肉扔在地上，你趴着吃了，怎么说不是呢？”吴亮伏地大哭。他记得建文帝左脚上有黑痣，一看果然有。此后，建文帝居住在西内，宫女们称之为“老佛”。寿终正寝后，葬于西山，不封不树（《中国深宫实录》）。

人们对朱棣篡位，心怀不满，寄同情于建文帝，故有关建文帝出亡的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迄今仍无定论。

明成祖生母之谜

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勇武刚毅，颇有乃父之风。1402年，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将他的侄儿建文帝朱允炆赶下台，自己登上皇位，即为明成祖。据明成祖称，他是孝慈高皇后所生。而史学家们根据蛛丝马迹判断他的生母另有其人。那么，谁是明成祖的生母呢？

按《明史》记载，朱棣之母为孝慈高皇后。高皇后，安徽宿州马氏，是朱元璋的原配夫人，与朱元璋是患难夫妻。朱元璋得天下后，马氏入主后宫，因为朱元璋性情暴躁，经常委婉劝谏，对国事多有所益，勤于内政，贤明淑德，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后。据说朱棣出世时，“五色满室，照映宫阙，终日不散，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心异之，独钟爱焉”（《燕王令旨》）。朱元璋认为朱棣很像自己，一直非常喜爱他，这在历史上亦有记载。至于这种虚无缥缈的传说，则不过是为证明朱棣一出生就很神异，命中合当称帝而进行的臆造罢了。

朱元璋广纳妃嫔，其中有高丽和蒙古族人，而朱棣生母为高丽人硕妃的证据颇多。据考证，在孝陵神位中，左边一位是淑妃李氏，右侧一位即为硕妃。这是因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硕妃生明成祖，所以都享于配殿（《国史考异》）。另据奉先庙制，马皇后独居南面，诸妃皆列于东侧，惟独硕妃一人在西侧。明人尚

左,说明除马皇后外,硕妃的地位比其他妃嫔要高。南京《太常寺志》载,马皇后从未怀孕。朱棣为了抬高身份,自称是马皇后所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生母,只好把硕妃偷偷供奉在这里。有诗评论这一现象:“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静志居诗话》)。

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以纪念明太祖和马皇后为名,下令在天禧寺旧址新建“大报恩寺”及九层琉璃宝塔,实际上,是为了纪念他的生母硕妃。据《养和轩随笔》记载,作者幼时会游大报恩寺,见正门大殿封闭不开,父老们说,这是明成祖生母硕妃殿。马皇后将朱棣认作自己的儿子,而用铁裙之刑将硕妃赐死。

也有传说,朱棣是元顺帝与其妃洪吉喇氏所生。洪吉喇氏是蒙古人。元顺帝弃大都逃跑时,元顺帝第三位妃子格勒哈屯(洪吉喇太师的女儿)已怀孕七个月,因行动迟缓,没来得及随元顺帝出逃。朱元璋见其妩媚动人,遂下令收为妃子。三个月后,洪吉喇氏生下一子,朱元璋虽然莫可奈何,但看到男婴相貌非凡,便也承认了这个儿子,即后来的燕王朱棣(《明代皇帝秘史》)。

还有记载,说明成祖生母为蒙古人甕氏,因其原为元顺帝的妃子,所以秘而不宣。宫中另有庙供奉着她的神位,代代祭祀(《广阳杂记》)。

关于明成祖的生母,通常认为硕妃的可能性最大,却也未能形成定论。

权妃死因之谜

权妃,朝鲜族人,不仅姿容秀丽,而且善吹玉箫,入宫后深得明成祖朱棣的宠爱。关于她的身世,特别是她的死因,史籍上一直有着不同的记载,有说是被同族的吕氏投毒所害,也有说是为他人诬陷。实际情况如何,后人已不得而知,只有不断追踪史籍的记载,

权妃死因之谜

尽可能地去探寻一个合理的解释。

史中有载,永乐六年(1408年),权氏与李氏、吕氏、崔氏和任氏五位朝鲜族姑娘,被明朝太监黄俨等人选中,带回京师。其中,权氏最先被招入宫,册封为显仁妃,很快以她的聪慧明秀博得明成祖的宠爱(也有史籍记载她曾被尊封为贵妃)。帝王后宫之中,云集各方选秀而来的佳丽,而这其中有幸得到皇上专宠之人,通常也就必然地成为了其他众嫔妃嫉恨的对象。因此,权妃的死被认为是因争宠而为人所害也就很容易被接受了。按永乐十二年,即权妃死后第二年《李朝太宗实录》的记载,与权氏同为朝鲜族的嫔妃吕氏嫉妒权氏得宠,暗中与宦官勾结,密谋从一银匠家中借得砒霜,投入茶中,致权氏中毒身亡。这个死因是事后权、吕两家的侍女因琐事吵嘴时泄漏出来的。明成祖闻言后尽杀吕氏及宫中有牵连者共计数百人。

事隔十年之后,在《李朝世宗实录》中,又为吕氏做了翻案。认为“吕氏下毒说”实际上是另一位商人出身的吕氏的诬陷。《李朝世宗实录》中称,还有一个商人出身的吕氏,自她入宫后,非常希望能凭借同姓之缘与朝鲜族的吕氏互结友好,但遭到拒绝,由此深感屈辱,她强抑心中愤怒,伺机报复。恰遇权妃身亡,遂诬告是朝鲜族的吕氏为争宠投毒所害,让吕氏最终难免杀身之祸。

两种说法各具其理,主张“吕氏下毒说”的人士认为,记载这一说法的《李朝太宗实录》,写于权妃死后的第二年,而记载“他人诬陷说”的《李朝世宗实录》距案发时间却长达十年之久,且其时明成祖已崩,因此此种说法不足为凭。但是,主张“他人诬陷说”的人却认为,明成祖在世时判决的案子,在当时的《李朝太宗实录》中不可能有其他相异的记载,而且,当时皇上为此事诛杀数百人,纵使其中有误,也难有人敢站出来说话。所以,距事发时间短的记载并不意味着其准确性一定就高。反之,十年的历史沉淀,又遇明成祖已经不在人世,知情者方敢渐吐真言,一个皇帝钦定的冤案才有可能

得以澄清。而且“吕氏下毒说”的提法是在商人出身的吕氏受宠时提出的，而“他人诬陷说”却是在商人出身的吕氏与当年明成祖身边太监黄俨相互勾结的事实败露后，两人自缢身亡时提出的。所以，后一种说法应当更具真实性。

如此，权妃之死终因史料有限，一直难有定论，而历史必须尊重史实，不容人们根据现有的记载去凭空推测或臆想。历史上的一个个千古谜案代代相传，让后世的学者始终无暇停下求索的脚步，也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明英宗“南宫复辟”之谜

正统十四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役”中被瓦剌军俘虏。朝中于谦等大臣扶保英宗之弟朱祁钰继位，即为明景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后来瓦剌送英宗回国，住在南宫。当景帝晚年重病之际，英宗又在大臣石亨等拥戴下，重新登上皇帝宝座。这一段历史真应了一句话“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既可笑，又可悲。

当英宗被俘后，孙太后以懿旨令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为监国，主持国政。又下令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正统十四年九月六日，郕王即位，改元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史称明景帝。瓦剌军入侵北京，在于谦等主战大臣的坚持下，明军顽强抵抗，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瓦剌开始由战转为求和，并主动提出送还明英宗。朝中大臣们多数表示赞同，景帝心中不情愿，却又不能说出口。最后迫不得已，说出自己的担心：我并非贪图皇位，当初是你们把我推到这个位子上的，现在太上皇回来了，怎么办呢？于谦说：“天位已定，孰敢他议。”景帝得到群臣的保证，这才答应接英宗回朝。

于是景帝派右都御史杨善出使蒙古，却又为他制造了许多障

明英宗“南宫复辟”之谜

碍，比如带去的礼物很菲薄，敕书中也不写明迎归太上皇的意思。而杨善却错领会了景帝的意思，自以为若能迎回太上皇，必立下大功，所以多方筹划，做了许多努力，使太上皇朱祁镇于景泰元年八月南归。

太上皇将要抵京，景帝命令礼部拟具迎接的礼节。当礼部拟具上来时，景帝却命一切从简，只命令以一抬举舆两匹马到边境迎接。待太上皇到安定门，才换上法驾。“上皇至，自东安门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逊良久。”（《明史》）兄弟两人相向而泣，似乎表现出一种劫后重逢的欢喜。而朱祁镇回来不久，景帝就将他软禁在南宫。因为英宗在位时间较长，仍有一些拥护者，所以景帝很怕英宗卷土重来，对南宫防范非常严密。南宫居室狭隘，供给的饭菜时有短缺，纸笔也很少提供，怕英宗与外人串通（《野获编》）。逢年过节，或英宗生日诞辰，景帝都不许朝臣去朝贺。朱祁镇名义上是太上皇，实际无异于囚徒。

因为太子是英宗之子，所以自从英宗归来，景帝十分不安，便开始筹划易储，要废掉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却无人响应，就连自己的皇后汪氏也反对易储（因朱见济并非汪后亲子，而是景帝之妃杭氏所生）。景帝便极力笼络朝臣，于是陈循等一些大臣转而赞同易储。后经朝议同意，景泰三年五月，景帝下诏废朱见深为沂王，令其出宫居住在王府，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十一月，朱见济忽然染病身亡。朱见济既死，大臣们希望“再建皇储”，掀起复储之议，欲恢复沂王的太子名分。景帝盛怒无比，对敢于提出复储的官员进行了严酷打击。

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而皇位继承人尚未确立。十四日，群臣在朝堂上商议立储一事，有人提出请沂王复位东宫，也有人表示既已废去不宜再立。最后大家表示只提建储之事，而不提具体人选，由景帝自己定夺。景帝见到群臣的上疏，不允所请，说自己不过偶感风寒，十七日当临早朝。十六日，主持政务的王直、于谦

世界未解之谜之中国历史之谜

等人再次商议请沂王复位，推举大学士商辂起草奏稿，因天色已晚，决定第二天早朝再奏（《明清宫廷疑案》）。

而就在这一夜，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大臣石亨、徐有贞，联合太监曹吉祥、蒋冕等人，密谋拥英宗为帝。十六日晚，徐有贞、石亨等人拿出预制的孙太后懿旨，调集军队向皇宫进发。当夜四更，曹吉祥等打开长安门，石亨等率兵千余人闯入皇城，直奔南宫。英宗事先已得知众人的计谋，遂走出来问有何事，众人伏地说“请陛下即位”。将准备好的御辇拉来，扶英宗上车。到东华门，守门者命令停止前进，英宗喝道“朕太上皇也”。守门者不敢阻拦，一行人顺利入宫，拥着朱祁镇至奉天殿，山呼万岁，钟鼓齐鸣。群臣得知太上皇复位，面面相觑，无人敢表示反对。这样朱祁镇在做了七年太上皇之后，终于重登大位。

景帝在病榻之上听说英宗复辟，只是连声说：“好！好！”二月，孙太后下谕，将景帝废为郕王，迁居西苑，待遇极差。不久，郕王薨于西宫，年仅三十，谥号为“戾”。毁弃他生前选好的寿陵，以亲王之礼葬于西山（《明史》）。也有人说，景帝之病本已好转，他是被英宗派太监蒋安用帛勒死的（《病逸漫记》）。

直到成化十一年（1475年），才为郕王恢复帝号，谥景帝。敕有司修缮陵寝，祭飨于明帝诸陵（《明史》）。

明英宗宠信太监，致有土木堡之变。而景帝对兄长朱祁镇所持态度，则未免引人讥弹。英宗将景帝八年改为天顺元年，成为明史上惟一拥有两个年号的皇帝。

嘉靖崇仙之谜

由于明武宗荒淫无羁，死后没有留下子嗣，皇位传给了他的叔伯弟弟朱厚熜，这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又称为明世宗。嘉靖虽然在朝政上没有什么建树，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崇仙皇帝和醮斋皇帝

嘉靖崇仙之谜

的别号,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国历史上,修炼丹药、企求长生的皇帝很多,明世宗朱厚熜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在位 45 年,从即位的第三年开始沉迷于各种道术,一发而不可收。由于他一心求仙修道,因此,他的三公九卿多是道士、青词高手以及一些投机分子。自小求神的“张天师”被他请入宫中封为“正一嗣教真人”;其弟子邵元节更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官拜一品的礼部尚书。邵元节死后,替代他的陶仲文越加被嘉靖宠信,先后升任少保、少傅、少师之职。严嵩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他的得宠也和道术有关。原来,嘉靖崇仙不仅要修道、炼丹,还要给上天献祷文,表辞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也称为青词。严嵩就是因为爱报告祥瑞,青词写得好,又和道士们交好才被宠信的。

嘉靖七年(1528 年),严嵩被派到湖北祭陵,回朝后立即报告祥瑞说“每逢仪式天就放晴,汉江涨水、群鹤翔舞”等等。皇帝听罢非常高兴。此外,他对道术的恭敬态度也赢得了皇帝的欢心。曾有一次世宗做法事特制了香叶冠,为了表示恩宠赐给近臣每人一顶,很多辅臣不屑戴在头上,只有严嵩用轻纱笼之,戴在头上进宫,以示自己对道术的虔诚。因此,严嵩深得世宗的信任,在嘉靖二十年到嘉靖四十一年 20 年时间里,立朋党、除异己,朝政大权在握,贪赃枉法。世宗虽对这一切了然于心,却无心过问,致使明朝的政治每况愈下。

嘉靖皇帝一心修道还差点葬送了他的性命,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的“壬寅宫变”。因为有人说用每天早晨的露水炼丹可使人长生,于是皇帝命宫女清早采露,采得的露水不够就要受责罚。宫女们不堪忍受,决定杀死皇帝。她们趁皇帝熟睡之际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不想慌乱中却将绳子打成了死扣,怎么也收不紧,有一个宫女害怕了,跑出去呼叫,嘉靖才因此得救。这件事使后宫的很多宫女被凌迟处死,皇帝却更加相信是他修道诚

心,神灵保佑才逃过此劫。从此以后不进后宫,不理朝政,日夜静修服丹,只求成仙。严嵩正是这一时期惟一能见得到皇帝的大臣,朝政大权也因此集中在他手中。

虽然嘉靖穷其毕生精力潜心修道,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成仙。相反,由于长期服用丹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大,大臣们动辄被杀头或廷杖,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个个自危,就连集千般宠信于一身的严嵩也没能逃脱被罢黜的结局。加之,全国上下大兴土木,修建道观,致使国库极度空虚,边境北有蒙古进犯,南有倭寇侵扰,战火连年不断。就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明世宗朱厚熜驾崩升天,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

懿安皇后下落之谜

明熹宗朱由校皇后张氏,名嫣,字祖娥,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其父张国纪,因女儿致贵,被封为“太康伯”。天后元年(1621年)四月,张氏被册立为皇后。熹宗在位七年,昏庸无能,朝政被宦官魏忠贤和乳母客氏所垄断。因此,史学界称天后(1621 - 1627)七年间为明代最黑暗的时期。张皇后为人正直,常在熹宗面前历数魏忠贤及客氏的不法行为,但始终未能引起熹宗警惕。直到病危之时,熹宗才听取了张皇后的规劝,认清了魏忠贤及其党羽篡权的野心,同意将帝位传给信王朱由检。

思宗(即崇祯皇帝)继位后,为巩固政权,在张皇后的帮助下,不负群臣众望,干脆利落地清除了阉党魏忠贤及其同伙。崇祯为感激张皇后,授予皇嫂“懿安皇后”尊号,享受皇太后待遇。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十九日晨自缢于万寿山(煤山)。皇后周氏也在宫中自杀身亡,惟独懿安皇后下落不明。为此引起种种传闻,成为明清之际的一桩历史疑案。

努尔哈赤死因之谜

据史料记载，懿安皇后下落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说懿安皇后自缢身亡。据李治亭等主编《明代皇帝秘史》载：崇祯帝命皇后周氏自缢后，崇祯曾亲自到坤宁宫验尸。并赐白带给袁贵妃以及西宫众嫔妃，令她们“谨守贞节，保全祖制。”嫔妃们除自裁者外，逃跑者均被抓回，崇祯亲自操剑一一杀死。尔后又寻问懿安皇后下落，并遣太监送帛自尽，太监亲见“张皇后自尽了”。贺宿《懿安事略》亦载：“崇祯甲申，贼入京师，宫中鼎沸。后闻变自缢。”笔者认为此说可信。

二说懿安皇后被农民起义军将领李岩义救。据彭孙贻《平寇志》载：“伪将军李岩入成国公府，懿安皇后在府中，闻帝后并崩，仓促将就缢。岩询知为后，呼肩舆令老宫人送归母家。”另有多种资料记载此种说法，似也可信。

三说懿安皇后化装出走。计六奇《阴季北略》载：“上之出南宫也，使人诣懿安皇后所，劝后自裁，仓促不得达。两宫已自尽，宫人号泣出走，宫中大乱。懿安皇后青衣蒙头，徒步走入朱纯臣（成国公）家。”此说似不可信，据有关史料考辨，青衣蒙头外出者，并非懿安皇后，而是一位宫人。

四说懿安皇后出迎义军。据赵士锦《甲申纪事》载：“相传懿安皇后出迎并献金银，后不知下落。”笔者认为，此说不符合懿安皇后之性格，皇城沦陷在即，她不可能不顾大明江山，弃崇祯帝而投降。

关于懿安皇后的葬地，车吉心主编《中国皇后全传》载（周）文说：懿安皇后自缢身亡后，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福临命把张皇后的遗骸合葬在熹宗陵。

努尔哈赤死因之谜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烽火四起。崇祯皇帝继位后，希望励精图治，但一来积重难返，二来崇祯帝刚愎自用，不善用人，因此虽然

勤勉于政务，但仍然挽回不了局势。与此同时，北方的女真族却日渐强大。满洲英雄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开疆拓土，统一女真各部，虎视眈眈地瞄准中原大地。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见时机成熟，亲率八旗精锐西征，连续攻克了锦州、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等，所向披靡，势不可挡，更使努尔哈赤雄心勃勃。二月，清兵攻到宁远城下。当时明朝大将袁崇焕守城，守兵只有二万人。二十日，努尔哈赤命令攻城，袁崇焕命家丁罗立施发红夷大炮，击退敌人。后来清兵进抵城下，袁崇焕一面命扔下棉油火把焚烧敌人战具，一面组织敢死队出城杀敌，击退清兵。二十一日，清军乘夜出击，仍以失败告终。二十六日，清军被迫退兵（《清朝史话》）。

同年八月，努尔哈赤死于暖鸡堡，终年68岁。关于努尔哈赤之死，众说纷纭，但都与宁远战役有关。

据说努尔哈赤于此役中炮负伤，不治而亡。张岱的《袁崇焕列传》中说，大炮击中清军的黄龙幕，伤一裨王。《中国皇帝要录》、《历代帝王传记》等均持此说，认为努尔哈赤在此役中负重伤，于是撤回沈阳，不久即死。《明熹宗实录》中则写道，大炮击毙清军一大头目，清兵用红布包裹抬走，放声大哭。有人推测，死者即为努尔哈赤。

而稻叶岩吉的《清朝全史》引朝鲜人记载，有名叫韩瑗的译官，被袁崇焕请至宁远，亲眼见到清军被诱入外城。守城兵士先从城墙往下投掷矢石，又发地炮，杀得清兵人仰马翻，于是撤退。第二天，袁崇焕派使者献礼物给努尔哈赤，说：“老将久横天下，今日败于小子，岂非数耶？”努尔哈赤本已负重伤，见到礼物，又听到这些讥嘲之话，于是愤恚而死（《清代帝王后妃传》）。

据清太祖武皇帝、高皇帝两朝实录，宁远之役，的确令努尔哈赤恼恨不已，但随后他仍在继续征战。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台吉奥巴晋见时，努尔哈赤还亲率贝勒大臣，出郊迎十里，并对其说：

大妃阿巴亥葬地之谜

“今尔我无恙，得相会足矣！”说明宁远之役并未受重伤。

也有史书说努尔哈赤是死于疽发背死。宁远兵败，使努尔哈赤精神上大受创伤。他对诸贝勒大臣说：“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三朝辽事实录》）心情始终郁忿难平。又因长期鞍马劳累，且年事已高，遂积劳成疾。这年七月，身患毒疽，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八月初七，病情加重。十一日，乘船顺太子河而下，欲返沈阳，行至暖鸡堡死去（《清代皇帝传略》）。努尔哈赤患的病叫“肉毒瘤”，俗称“搭背疮”，为老年人的危难大症，极难治愈。宁远兵败，努尔哈赤心怀忿恨，也是诱发此病的重要原因。

努尔哈赤在宁远之役受挫，郁郁而终。他死后第二年，皇太极由广宁进兵围攻宁远，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大妃阿巴亥葬地之谜

大妃阿巴亥，姓乌纳喇氏，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阿巴亥12岁时嫁给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侧福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正妻叶赫纳喇氏（后追封为孝慈高皇后）病死，大妃阿巴亥被立为大福晋（皇后）。

阿巴亥面貌端庄，体态丰满，具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因此极受宠幸。她与努尔哈赤结合26年，共生三子，即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四子多尔衮，第十五子多铎。

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阿巴亥因受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谗言所陷，遭到废黜。次年弄清事实后，又复立为大福晋。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因战伤死于沈阳附近的暖鸡堡，时年68岁。

据说，努尔哈赤死后，阿巴亥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她与群臣共扶努尔哈赤的灵柩回到沈阳宫中。但是她没有料到，一场争夺

汗位继嗣的斗争已经开始了。皇太极为了不使汗位落在多尔衮手中，串通四大贝勒，蓄谋以父皇“遗命”殉葬为由，逼死多尔衮的生母阿巴亥，扫清他争夺汗位的障碍。他率众到后宫，宣读努尔哈赤“遗命”，说阿巴亥心怀妒忌，留之恐后为国乱，“俟吾终，必令殉之”。阿巴亥知道这是阴谋，开始拒不从命，后来迫于无奈，佩戴上努尔哈赤赏赐的珠玉，于八月十二日辰时自缢而死。

最初阿巴亥与努尔哈赤一同装殓，葬于沈阳城内西北角。天聪三年福陵建成，《太宗实录》详细记载了努尔哈赤和孝慈皇后合葬的情况，但只字未提大妃阿巴亥是否葬入福陵。

按理说阿巴亥为夫殉死，合葬福陵是理所当然的事。原因有二：

一、阿巴亥是名副其实的大妃。顺治七年（1650年）又被追封为孝烈武皇后。这说明阿巴亥的地位是荣宠不衰的。

二、《太宗实录》中有努尔哈赤的继妃富察·衺代随葬福陵的记载，由此推论，阿巴亥葬入福陵应是不可置疑之事。

那么，《太宗实录》为什么没有阿巴亥葬入福陵的记载呢？笔者认为原因也有二点：

一、阿巴亥的封号是顺治七年，多尔衮摄政时封的，次年多尔衮获罪，阿巴亥封号遭罢去，牌位也被撤出了太庙。《太宗实录》无阿巴亥葬地记载可能与此有关。

二、《太宗实录》是康熙年间编纂的，那时多尔衮的罪尚未昭雪，其母受到牵连，移葬福陵时，奉事之官避讳提阿巴亥合葬之事也在情理之中。

以上只是推论而已，阿巴亥到底葬于何处，至今仍是个谜。

太后下嫁之谜

博尔济吉特氏，史称“孝庄文皇后”，蒙古族，出生于风景美丽

太后下嫁之谜

的科尔沁草原。为蒙古贝勒寨桑之女,天命十年(1625年),其兄吴克善台吉将她送到后金,嫁给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侧福晋,时年13岁。1636年皇太极称帝,封博尔济吉特氏为庄妃。1638年26岁的庄妃生皇第九子福临。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病逝,6岁的福临在多尔衮的拥立下登基,次年改元顺治,尊其生母为皇太后,时庄妃年32岁。

多尔衮(1612-1650),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太宗时封和硕睿亲王,清世祖以冲龄即位后,多尔衮即称摄政王,他为满清王朝入主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

关于孝庄与多尔衮的情感,多数史料都这样记载:皇太极病重时,孝庄与多尔衮一直随侍在侧,两人时常眉目传情。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不争皇位,而力主皇太极之子福临继承大统。孝庄为此感激不尽,并以太后身份传懿旨,令多尔衮便宜行事,随意出入禁中,不须避嫌。由此使多尔衮的权势愈来愈大,连见皇帝、皇太后时也免除了跪拜。更有一些奉承者说:皇上既然尊摄政王为父,何不使父与母婚配呢?于是顺治帝颁诏天下:“朕以冲龄践祚,抚有华夏,内赖皇母皇太后之教育,外赖皇父摄政王之扶持,仰承大统,幸免失坠。今皇母皇太后独居无偶,寂寞寡欢,皇父摄政王又赋悼亡,朕躬实深歉从,诸王大臣合词吁请,玆谓父母不宜同居,宜同宫以便定省,斟情酌理,俱合朕心。爰择于本家某月某日,恭行皇父母大婚典礼,谨请合宫同居,着礼部恪恭行事,毋负朕以孝治天下之意!钦此。”(据清末发现“顺治遗诏”)清末刊行的明末遗臣张煌言的《苍水诗集》中有四句宫词。也有孝庄下嫁的记载:“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可见太后下嫁确有其事。何况当时兄死弟娶嫂是游牧民族的风俗,本不足怪。后人还为此赋得打油诗一首:“清宫秘闻传京都,阿嫂竟尔嫁小叔,若闻此事真与假,宁信其有不信无。”

易木撰《皇室秘闻》记载了孝庄与多尔衮结婚大典的盛况:孝

庄召江南一精巧织工来京,布置“新房”,“未及一月,上自幔帐承尘,下至椅垫地毯,均以金银玉彩丝线织成,游龙戏凤,花卉翎毛,五彩缤纷,灿烂夺目。”尔后,孝庄“又命人去苏杭一带采购绣丝冰茧、缕金象玉,以为壁饰;又定制大玻璃屏¹²扇。”“还命画工摹画《全宫妃女捧金莲送房图》”,画中有孝庄与多尔衮及内监、宫女等,画工精细,姿态动人。据传,多尔衮死后,顺治为掩其丑,“将图焚烧了”。否认太后下嫁的史学专家和学者,也为数不少。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著有《太后下嫁考实》,认为张煌言为明朝遗老,坚持抗清多年,他的诗句为“谤书”性质,不可信。孟森先生还认为,当时李朝与清廷关系密切,清廷的一些重大礼仪活动,李朝都有使节参加,可《李朝实录》中却没有太后下嫁的记载。因此,可以认为太后下嫁多尔衮,应属子虚乌有之事;此事之所以广为传播,是由于多尔衮夺取了大明江山,并纳了他的侄儿豪格的福晋为妃,明朝遗老斥此为乱伦,于是将此事附会太后,以泄亡国之恨。

总之,“太后下嫁案”争论了三百年,孰是孰非,至今未有结论,仍有待于专家学者挖掘史料,找到有力的证据,解开谜团。

顺治继位之谜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1643年9月21日)夜间十点左右,52岁的清太宗皇太极在沈阳清宫中的清宁宫东暖阁南炕上端坐而逝。由于他的死非常突然,未及指定皇位继承人,因此哀悼仪式刚一结束,一场围绕皇位继承人的斗争就剑拔弩张地拉开了序幕。

皇太极后妃中,地位较高的妃子所生的皇子,只有永福宫庄妃生的第九子福临,时年六岁;麟趾宫贵妃生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年仅三岁。其余皇子均为身份较低的妃子所生。最有希望继承皇位的是长子豪格,时年36岁。豪格于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晋封肃亲王,掌户部事,而且久经战场,卓有威名。他的文韬武略与手

握的军政重权，使他成为一部分大臣瞩目的目标。当时索尼、图赖、樊拜等大臣都倡议立肃亲王豪格为君。豪格也积极活动，取得了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支持。而济尔哈朗的地位、资望仅居于礼亲王代善之下。

豪格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即睿亲王多尔衮。他是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虽小豪格三岁，但在天命、天聪、崇德各时期的政治、军事地位均高于豪格。正当两黄旗紧锣密鼓地策划拥立豪格时，多尔衮所掌握的两白旗的大臣也在积极筹划拥立多尔衮为帝。他的同母弟英亲王阿济格和豫亲王多铎是他坚决的支持者。

太宗死后第五天，睿亲王多尔衮前往三官庙，召见内大臣索尼（正黄旗人）商议册立之事。索尼对多尔衮的回答十分果决“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清史稿》）。当晚，图赖来找索尼，告诉他一定要坚持拥立皇子。

次日黎明，两黄旗大臣首先在大清门共同对天盟誓，接着命两黄旗精锐护军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然后才依次进入崇政殿。崇政殿正中停放着皇太极的梓宫，东西两庑列坐的王公大臣为解决他的继嗣问题举行着决定性的会议。两黄旗护兵全副武装地包围了崇政殿，使会议充满了杀机。

会议一开始，索尼和樊拜率先提出立皇子，被多尔衮厉声喝退。接着，阿济格和多铎劝多尔衮即帝位。多尔衮见局势发展得如此严重，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说：“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中。”多尔衮说：“太祖遗诏中也有肃亲王。”多铎又说：“不立我，就当立礼亲王。”礼亲王代善是太祖次子，太宗之兄，资望最高，一向养尊处优，无意卷入斗争漩涡。因而模棱两可地说：“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清史稿》）。豪格见此，故意推辞说：“福少德薄，非所堪当。”退出会场。此举是为让他的早有预谋的两黄旗大臣们更方便地促成实现自己的意图。果然，两黄旗大臣们见主子离去，一齐佩剑上前，说：“吾

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这无异于以武力相胁迫。代善见状，起身而去。英亲王也退出会场。多铎则一言不发。多尔衮不愧是一位睿智之王，在这样严重的僵持时刻，他随机应变，提出一项影响清朝历史的重大意见，说：“你们的意见很对。肃亲王既然谦让退出，没有继续的意思，那么就应当立先帝之子福临。只是他年岁幼稚，暂由我和郑亲王分掌八旗军兵，左右辅政。待他年长之后，当即归政。”（《沈馆录》）这一意见既与两黄旗大臣提出的“立帝之子”原则不悖，而又排除了豪格，不影响多尔衮实际掌握大权，实是一个以退为进的绝妙主意。两黄旗大臣无话可说，众人都无异议，于是，角逐了数日的继嗣问题，就这样一锤定音。诸王大臣遂形成决议，共立誓书，对天宣誓而罢。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内外诸王率文武群臣齐集笃恭殿前，跪迎福临即皇帝位，颁诏大赦，宣布以明年为顺治元年。这就是历史上的顺治帝。

顺治出家之谜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大清帝国第一位入主中原的天子福临告病身亡。其子玄烨即位，就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然而不久，有关顺治帝出家的消息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演绎颇多，给顺治之死染上神秘的色彩，成为迄今仍无法定案的历史之谜。

据说天台寺有一蜡制的僧装顺治像，头戴宝冠，身披黄袍，面目骨架与顺治画像十分相似。而康熙多次到天台山拜祭，或赐匾额，或赐金帛，证明天台山确为顺治出家之所（《清稗类钞》）。传说在杭州西湖罗汉堂塑像中，有一黄冠黄袍的罗汉，即为顺治，是康熙南巡时塑造的。而且顺治出家，王公大臣都知道。有人说，顺治皇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出走，而忌辰推迟到正月初七才宣布，

顺治出家之谜

是密令寻找，未能找到才发丧（《白话野史大观》）。

野史与民间传说最广的说法，是顺治因一代名妓董小宛去世而遁入空门。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顺治十七年八月，贵妃董鄂氏病逝。数月后，顺治遁入五台山，皈依佛门。董妃即冒辟疆之妾，秦淮名妓董小宛，于明朝弘光末年，被掠到北京，入宫后，赐姓董鄂氏，专宠于皇帝。冒辟疆惧祸，作《影梅庵忆语》，假说小宛已死。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梅村）在《清凉山赞佛》四诗中，有“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之句，并用双成典故等，将董字嵌入其中，令人感觉到蹊跷。

而据史书记载，董鄂妃确有其人，却并非董小宛。董鄂妃出身于满洲世族之家，“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廷”，备受宠爱。顺治十四年，董鄂妃生下皇四子。次年正月此子不幸夭折，董鄂氏伤心欲绝，染病不起，于顺治十七年八月病逝，年仅 22 岁。顺治下令“辍朝五日。”又破例追封董鄂氏为皇后，并加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敬皇后”。还亲自撰写“董鄂妃行状”的祭文，又命大学士金之俊写了《孝献皇后传》。

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亦非空穴来风。据说埋葬于清东陵孝陵中的是空棺，而没有福临的遗体。有人考证，满洲有火葬旧俗，清太宗皇太极、摄政王多尔衮都为火葬。孝陵中不仅有埋葬顺治遗物的衣冠冢，其中还有顺治的宝宫（骨灰坛）。但由于顺治火化不见于《清实录》记载，故引起人们的怀疑。

顺治笃信佛教，与当时名僧玉林琇、木陈忞、玄奘等都有来往。据说其火化仪式也是由佛家名僧茆溪森主持。顺治曾对木陈忞说“朕于财产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党亦风云聚散，没甚关系。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北游集》）并在西山慈善寺题壁诗云“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我今撒手归山去，管他千秋与万秋。”董鄂妃死后，顺治决意披缁山林，请玉林琇的大弟子茆溪森为自己举行净发仪式。玉林琇闻讯赶来，命

取来干柴，要当众烧死茆溪森，才使顺治答应蓄发（《续指目录》）。而顺治虽出家未遂，却得了“行痴”的法名。据载，为顺治剃发的佛师茆溪森的塔铭上有“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之语。以顺治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在董鄂妃仙逝后，心灰意冷而入空门，亦符合多情天子的性格。

与传说相反，正史则记载顺治因病而逝。《平圃杂记》对此亦有详细记述：顺治十七年底，福临染上天花，礼部奉旨宣布免去元旦大朝庆贺礼。正月初二，顺治为祈求佛法庇佑，亲自把最宠爱的太监吴良辅送到悯忠寺剃度，作为自己的替身。正月初四，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初五，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全部撤去。接着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下令释放所有在牢囚犯，以祈祝皇帝康复。初七日夜，福临死于养心殿。

顺治从宣布生病到死亡，不过三四天，且只有 24 岁；又因以上种种疑点，而使顺治出家的故事愈传愈广，成为千古奇闻。

雍正继位之谜

康熙晚年，两度废太子，诸皇子虎视眈眈地瞄着太子的宝座，费尽心机，明争暗斗，令康熙头疼。而在激烈的夺嫡之争中，皇四子胤禛最终以胜利者的身份登上皇位，接着展开对众兄弟的残酷报复。关于雍正嗣位的传闻，一直是历史上著名的悬案。

一是篡改遗诏说。雍正喜欢结交剑客力士，康熙病重期间，雍正带着剑客入京。当时康熙已经拟好诏书，欲传位十四皇子。雍正则将遗诏盗出来，将“十”字改成“于”字。自己入宫问疾，命令心腹在宫外阻止其他人进宫。康熙临终时，宣召众大臣，过了许久不见人来。蓦地睁眼，却看见雍正站在跟前，十分震怒，取下玉念珠向雍正扔过去。过了一会儿，康熙就驾崩了。雍正走出来告诉大臣们，说皇上已册立自己为太子，并且取出念珠为证，大臣们无法

雍正继位之谜

辨别真假,于是奉之登极(《清朝野史大观》)。

二是下毒说。是说胤禛向康熙进奉了一碗人参汤,康熙皇帝喝完就死了。影射胤禛在人参汤里放毒药,害死了康熙(《清代皇帝传略》)。当时在园内的意大利人马国贤回忆时也写道:皇上驾崩之夕,园子里有呼号的声音,其不安之状,说明一定是发生了某种“突然大变”。(《明清宫廷疑案》)

对于这两种说法,始终有人存疑。如篡改遗诏一说。清代文书中在写道皇子时,都写作“皇某子”,若是十四皇子,即书写为“皇十四子”,而不会只写“十四子”,因此雍正根本无法改动。何况当时“于”与“於”并不通用,在正式诏书中,不会写作“于”。至于人参,有资料表明,康熙认为北方人不宜用参,不喜欢服用。雍正即使要下毒药,也不可能用父皇素来不喜欢的东西呈献。

第三种说法是,雍正嗣位事件,是以武力为后盾,精心策划的一场宫廷政变。康熙六十一年冬,皇上在畅春园“静养斋戒”,一时与外界隔绝。胤禛极力拉拢守卫京师的步军统领隆科多,使畅春园处于胤禛与隆科多严密控制之下。先给康熙下了迷魂药,十一月十二日夜,康熙昏迷不醒,隆科多矫诏将皇子们急召到畅春园,让他们参与对康熙的照料,实际上是变相软禁。而胤禛则做了充分的应变部署后,才回到畅春园。康熙既崩,隆科多假称受先帝所托,宣读遗诏,由胤禛继位(《中国深宫实录》)。

雍正以非法手段取得皇位的传闻,当时就有多种。甚至朝鲜李氏王朝祝贺胤禛登极的专使回国后都指出“雍正继立,或云出于矫诏”(吴膺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

雍正为驳斥社会上种种传言,自撰《大义觉迷录》一书。书中记载,当康熙去世,新皇继位时,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禔都有十分激烈的反应。如果平时康熙有传位于胤禛之意,两人何至如此?而雍正任政局稳定后,遂对众兄弟展开报复。将皇八子、皇九子名字改为阿其那、塞思黑(满语中“猪、狗”的意思),进而远谪,两人郁

郁而死(也有说被雍正派人害死)。皇十子胤禩被幽禁。皇十四子胤禵因是同母兄弟,故只派去看守皇陵。而这些都说明事发时众位皇子因受到武力威胁,被迫奉胤禩登极,而后时有愤激不平之语,遂被雍正加以迫害。

第四种说法认为胤禩是康熙的指定继承人。一是康熙晚年对胤禩的重视有增无已。康熙五十七年四月,命胤禩奉送太后灵柩安放地宫,读文告祭。康熙六十年命胤禩前往盛京,告祭祖陵。六十一年十一月南郊大祀,因自己身体不适,特命胤禩恭代。甚至应胤禩之邀,几次赴胤禩花园筵宴游玩,父子关系颇为融洽(《清代皇帝传略》)。二是康熙极为喜爱胤禩子弘历,对弘历的宠爱,远远超出其他皇孙。康熙六十一年夏天,康熙在承德离宫传见弘历生母时,连称她为“有福之人”。以爱孙而传位于子,历史上亦有先例。故礼亲王昭槤在《啸亭杂录》中评论说,康熙对弘历宠爱异常,“而燕翼之贻谋因之而定也。”据朝鲜《李朝实录·景宗实录》记载,朝鲜官员金演曾听译员讲过,康熙病重时,“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禩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禩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雍正勤于政务,在位时颇有建树。然而关于他嗣位的由来,始终是历史界争论的一个热点。

雍正尸体无头之谜

雍正十三年(1735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日凌晨,一代枭雄雍正帝,突然暴死于圆明园离宫中。由于官书记载内容不详,致使雍正之死传闻不断。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吕四娘入宫行刺,并取走雍正项上人头。起因是雍正年间,湖南人曾静固守夷夏观,游说大将军岳钟琪,劝他举兵造反,却被岳钟琪告发,曾静在狱中,供认自己反清的思想

雍正尸体无头之谜

多受老师吕留良影响。当时吕留良已经死去，雍正便下令将吕家全家问斩，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等相继被戮。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孙女，由于机缘凑巧，躲过了这场大难。作为吕家惟一的幸存者，吕四娘决心复仇，学了一身好武艺，尤其精于剑术。由于吕留良一案株连甚广，激起了汉人义愤，所以在当时著名侠客甘凤池等的积极协助下，吕四娘始终没有被清廷抓住。雍正十三年八月，吕四娘混进宫中，用飞剑将雍正头砍下。清政府为了掩饰真相，制造了雍正病死的假象（《清朝野史大观》）。也有人说，吕四娘入宫行刺，还有一名叫鱼娘的女子协助下手。

另有传闻，说雍正死于湖南卢氏妇人剑下。相传卢某因为谋反被雍正所杀，其妻谙于剑术，为夫报仇，刺死雍正后自刎身亡（《阴清宫廷疑案》）。

清代宫廷制度，凡侍寝的妃子，都要赤身裸体裹在被中，由太监背到皇帝寝宫。据说满族初入关时，并无这项规定，这种奇特的规矩，是在雍正以后才制定的。传说雍正的仇家之女潜入宫中，做了雍正的妃嫔，终于等到一个侍寝的机会，趁机将雍正刺死。这种制度就是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因雍正遇刺说始终见于野史稗史，故又有传言，说雍正棺内只有尸身而无人头，清廷用金子造了一个假头入棺安葬。

近年来较为流行的观点是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雍正崇尚方术，对于道教，特别是对修炼功夫，非常感兴趣。雍正继位之初，日理万机，操劳过度。加上后来私生活方面有失节制，健康日渐恶化，不得不乞灵于药石。大约从雍正四年开始，雍正就经常服用道士炼制的“既济丹”。除了自己食用外，他还赐给宠臣服用。雍正曾先后召道士贾士芳、娄近垣等人入宫。雍正十二年，娄近垣离开宫禁后，雍正命张太虚、王定乾等在西苑为之炼丹，终于因长期服用丹药而导致中毒身亡（《清代帝王后妃传》）。雍正死后第三天，乾隆忽然下谕旨，将炼丹道士全部驱逐出宫。同时，告诫内监、宫

女,不许妄说国事,如有闲话者,“定行正法”。新君登极,百务待理,却急于对几名道士做如此处置,是雍正死于药石的有力佐证。

总而言之,雍正帝之死因,至今尚无定论。

年羹尧被杀之谜

年羹尧是清代康熙、雍正间人,出身进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曾平定西藏、青海回民起义。雍正二年平定青海后,十月入京觐见受封。时功盖天下,位极人臣,受封为一等公,父亦封一等公加太傅衔,二子分封子爵、男爵,其家仆皆封四品顶戴副将,一时炙手可热,权势显赫。然不到一年后便被雍正皇帝尽削所有官爵,列⁹²大罪,终赐自杀。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于寻常,被史家列为“雍正八案”之首案。然为何被杀,却众说纷纭,成为清史上一个颇有兴味之“谜”。

一些人认为这与雍正夺嫡有关,故杀知情者。不光是稗官野史,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燕京学报》36期,1946年6月)都持此说。据说康熙临终时指定十四子胤禵嗣位,四子胤禛串通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矫诏篡立。其时十四子胤禵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新君立后,为酬羹尧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这不过是“迷汤”,实则对这些知情者已存杀心,最后终杀之。

有些人不同意此说。认为雍正初羹尧受宠,并非雍正先笼络而后杀之之由,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他为其藩邸旧属,又有郎舅之亲,故常对他恩赏有加,这决非对他灌“迷汤”。且雍正继位时,他还在川平乱,未参与焉,何以得知内情?故上说不能成立。

《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以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

年羹尧被杀之谜

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清代轶闻》作者亦认为“年挟拥戴功，骄益甚”。且年残暴对待部下，任人惟亲，乱劾贤吏，引起公愤，也为雍正帝所不容，故被杀。

更有一说，认为年羹尧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爽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做皇帝的事。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一文中亦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进而认为这说明年羹尧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而已。

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主要是雍正为人阴鸷猜忌，不能容人，尤其不能容功臣。加之年羹尧自恃有功，言行不检点，雍正更不能容忍，在翦灭其兄弟胤禩、胤禵后，借题发挥，以羹尧所上贺章字迹潦草，并把“朝乾夕惕”四字颠倒为“夕惕朝乾”作为借口，暗喻臣下劾奏，连降羹尧 18 级，罚至杭州看守城门，终罗织罪名，令其自尽，家产抄没入官。

到了近现代，各说众多，或认为年被杀乃“鸟尽弓藏”之必然现象，或说是主奴间有旧怨在先，羹尧又恃功骄傲在后，使君主生疑、畏、厌、怒之心等等。

杨后樵对《雍正朱批谕旨》作了长期研究后，在其著作《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专辟一章谈“清世宗与年羹尧的恩怨轳轳”。根据史料，力排他说，提出独到见解。他认为：首先，胤禵并未受年羹尧的钳制，因胤禩继位极为秘密，手操京师兵权的隆科多，于圣祖（康熙）驾崩后翌日，即令六日内紧闭京城九门，故消息无法泄漏，更谈不上胤禵挥兵争位受年扼。其次，既如此，年也并

无拥立之功，故雍正杀年以灭口的杀知情者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了。恰恰相反，他认为从雍正朱批中，可发现很多雍正对年羹尧的赞语，如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九日付德折朱批：“军旅之后，获兹膏泽，实乃大将军年羹尧忠勤之所感召。”又如稽曾筠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折朱批：“西海一事，岂人力所能者，皆因年羹尧能此二字，天下大臣，皆当法其心也。”（《雍正奏折》）更有在朱批中称年羹尧为忠臣、功臣、恩人的。且年在雍正二年入京觐见之前，与雍正并无个人私怨，雍正及在京百官均“极盼”与年羹尧这一功臣相见。然入京觐见不到两月，雍正即屡屡下旨严斥，何也？主要因年恃功自傲，妄荐亲信胡期恒为甘肃巡抚、岳周为西安布政使、刘廷琛为广西布政使，滥参四川巡抚，致疑。雍正后曾有朱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雍正朱批谕旨》）一函，石礼哈）可见已招世宗猜忌。总之，杨启樵认为年羹尧被杀原因有三：一是世宗赏罚分明、功赏过罚，毫不留情；其次，世宗因派到年羹尧手下监视年的情报员被收买，大为恼火；其三乃是年羹尧骄横贪暴自致死地。结果“年羹尧自难逃越鬼门关，而多年来，却使世宗反蒙杀功臣的污名”。

以上诸说，至今未统一，还请读者自辨吧！

乾隆身世之谜

乾隆是历史上执政最长的皇帝之一。他在位时，清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有关乾隆的传说很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乾隆身世之谜。

传闻最广的是说乾隆为海宁陈氏之子。据说雍正为皇子时，与陈家关系极好。正巧两家同月同日生子，雍正很高兴，命将陈氏之子抱来。等还回去时，陈家发现竟然已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一女婴。陈氏惊恐万分，不敢声张。雍正即位后，对陈家非常宠眷。

乾隆身世之谜

到乾隆朝，待陈家愈加优厚。当时陈氏父子已回海宁闲居。乾隆南巡至海宁的当天，即幸临陈家，询问陈氏家事。临行到中门时，命把门封了，对陈氏说“以后除非天子临幸，此门不要轻易开启”。也有人说，雍正本人不知道换子之事，是一个妃子为了固宠，用自己的女儿换了陈家的儿子。而在陈家长大的这个女孩，长大后嫁给常熟蒋姓人家，蒋家特筑小楼让她居住，后世称为“公主楼”（《清朝野史大观》）。

据传乾隆因为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经常在宫中穿汉人的服饰，甚至想下令满族人全部改穿汉装，经大臣百般劝谏方止。有人写诗道这件事“钜族盐官高渤海，异闻百代每传疑。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辇”。高渤海，指的是陈氏祖上原为渤海高氏，后来改姓陈。后两句是说乾隆曾驻跸陈家，并试图恢复汉装（《明清宫廷疑案》）。海宁陈家住宅有“爱日堂”、“春晖堂”的匾额，据说也是出自乾隆御笔。而“爱日”、“春晖”都是用儿子孝敬父母的典故，这也成为乾隆生于海宁陈氏的证据。

而有些学者肯定正史的记载，认为乾隆生于雍王府，生母为钮祜禄氏。

持此说者认为，雍正在弘历之前，生过四个儿子，虽然其中三个早殇，而弘历时尚在人世，已年满8岁，雍正刚刚34岁，正当壮年，完全有生育能力，何须换别人的儿子？乾隆六次下江南，前两次并未到海宁，显然巡幸江南另有目的，并非像有些人臆测的是为“省亲”。陈氏为海宁望族，他家的花园也是当地名胜，接驾自在情理之中（《明清史论著集刊》）。

至于“爱日堂”、“春晖堂”，据考证，乃是康熙亲笔所题。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在便殿时，提出给周围大臣家中的名堂赐字。海宁陈家的陈元龙在场，因为家有老父，年逾八十，就请康熙写“爱日堂”的御匾（《国史馆·陈元龙传》）。“春晖堂”则是赐给陈邦彦之母黄氏的。因黄氏守寡41年，抚育邦彦成人，陈邦彦做官后，黄氏被

封为淑人，康熙御赐“春晖堂”的匾额，以示褒奖（《海宁州志》）。

由于“夷夏观”的存在，汉人认为乾隆因是汉族血统，才有清朝国运之昌，因此乾隆为陈氏之子的传说久盛不衰。而乾隆究竟是满族，还是汉裔？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乾隆九进孔府之谜

历朝皇帝为了维护统治，都高举儒学的旗帜，因而十分尊崇孔子。从西汉至清朝，先后有 12 个皇帝 19 次来曲阜祭祀孔子。而惟独乾隆皇帝到曲阜次数最多。据史料记载，从乾隆十三年（1748 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乾隆皇帝九次巡幸曲阜，祭拜孔子。至于乾隆进孔府的次数，则有不同说法，有说七次、八次的，也有说九次的。孔德懋在其所著《孔府内宅轶事》中说乾隆共进孔府九次。现从此说。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乾隆如此“钟情”于孔府呢？除了尊重孔子，发扬儒学外，最重要的原因是 乾隆的女儿下嫁孔府。

据说乾隆有一女儿，是孝贤皇后所生，乾隆十分钟爱。公主脸上长了一块黑痣，相术上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惟一方法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那就只有山东曲阜的孔家了。因为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与皇帝并行，而皇帝到曲阜后，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头大礼，这是别的王公贵族都无法企及的。因而乾隆第一次到孔府时，就说定将公主下嫁。但清廷制度，满汉不能通婚，乾隆就将女儿寄养在汉族大臣于敏中家里，然后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给第 72 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府后人称之为于夫人。于敏中一家随之搬入孔府居住，并世代代居住于此。按照孔府家规，衍圣公的兄弟都不能住在孔府，成年后要搬到外面的十二府中去居住。而独有这外姓人家于家有此特权，那便是因公主下嫁的缘故。

乾隆自称“十全老人”之谜

孔宪培与公主结婚时，文武百官都有厚礼相送。有一府台，只送了一把小金斧。乾隆问起来，他说，以后留着给御外孙砸核桃吃。乾隆听了很高兴，说这把小金斧是所有礼物中最好的礼品。就因为这句话，这把小金斧成为孔府珍贵的传家宝。公主结婚后，每逢生日庆典，乾隆还派官员前来贺寿，均有厚赐。公主没有生养，过继侄儿孔庆镕为后。孔庆镕刚一出生就被抱到公主这边，并立即呈报皇上有了御外孙。乾隆十分喜悦（《孔府内宅轶事》）。

在曲阜名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之一的孔林内，有一著名的“于氏坊”，位于孔林北侧，颇为引人注目。这就是孔宪培与其妻于氏之墓。因为于氏是乾隆皇帝的女儿，所以当她死后，孔府为其立了这座“鸾音褒德”牌坊，规模宏大。凡乾隆南巡或东巡时，都必定要到曲阜来。

孔府每年要进行多次祭祀，有时皇帝还亲临曲阜致祭，因此，孔府里有着技艺高超的戏班，每年至少要演出百余场“皮黄”（京剧）。然而，有两出戏却是一直被禁演的。一出是《打金枝》，就是因为乾隆皇帝的爱女下嫁孔宪培，孔府既然有“金枝玉叶”，当然不能演《打金枝》。另一出是《打严嵩》，也是因为严嵩的孙女嫁给了64代衍圣公孔尚贤，所以《打严嵩》也成了孔府的禁戏（《中国演员报》）。

乾隆与孔府有“姻亲”关系一事，未见正史记载，仍是历史上的不解之谜。

乾隆自称“十全老人”之谜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长寿的皇帝之一，晚年自号“古稀老人”、“十全老人”。年过七十谓为“古稀”。那么，“十全老人”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种说法是，“十全”乃十全十美之意。乾隆有十七个儿子和

十个女儿。当他 73 岁时,已有了玄孙。乾隆自感“五世玄孙,一堂衍庆”是历代帝王不曾有过的大喜事,便在雍和宫、景福殿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等处,写了几块“五代五福堂”的匾额,并自封为“十全老人”。

另一种说法是,“十全老人”的名称来自于乾隆的《御制十全记》。乾隆自负文治武功为古今第一人。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在允准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修贡停战议和之后,82 岁的乾隆皇帝亲撰《十全记》,记述执政以来的“十全武功”,谕令军机大臣将此文缮写成四种文字,勒石树碑于布拉达宫前(1965 年迁至龙潭园地),“以昭武功而垂久远”。后来则自诩为“十全老人”。

据《十全碑》记载,所谓“十全”者,是说他在位期间的十场大胜仗,即:两次平定准噶尔部,一次征服回部,两次征服大、小金川,一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征服缅甸,一次征讨安南,两次降服廓尔喀(《清代帝王后妃传》)。在这些战役中,乾隆亲自遴选将帅,运筹帷幄。每逢将士出征,乾隆都要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战役结束后,都要祭告宗庙,论功行赏。又在紫禁城内建紫光阁,将有功将帅之像绘于其上,赋诗立传,并将缴获的战利品收藏其中。在承德兴建普乐寺、普宁寺、安远庙等建筑,以纪念这些历史性事件,极尽渲染之能事(《清代皇帝传略》)。

而实际上,所谓“十全”其实并非全是胜仗。第一次出征金川,因久战不下而收兵;缅甸之役,一等公明瑞败死在小猛育,大学士傅恒受挫于老官屯,被迫允和;出征安南,统帅孙士毅狼狈逃回,提督战死,全军溃败;初征廓尔喀,双方并未正式交锋,自然算不得“凯旋”而归。仅此而论,“十全武功”就有四次“不全”。即以取胜的六大“武功”而言,也曾遭受重大挫折,损兵折将。战死于疆场,或因贻误战机而被处死的大臣人数众多,其中有不少显赫的重臣。而且八旗士卒战斗力疲弱,不敢言战。乾隆帝自己也“庙谟常误”,由于在选将、指挥上的失误,都曾导致军事上严重受挫(《乾隆皇帝

“香妃”之谜

大传》)。

这十场战役的起因与性质不同,况且并非十战全胜,称之为“十全”,颇有文过饰非、讳败扬胜之嫌。但经过这些战役,乾隆奠定了中国疆域广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也是功不可没的。

“香妃”之谜

庙貌巍峨水绕廊,
纷纷女伴谒香娘。
抒诚泣捧金蟾锁,
密祷心中愿未偿。

自从听园居士萧雄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他的《西域杂述诗》中刊出了这首题为《香娘娘庙》的诗以及一段关于“香娘娘”神奇身世的欲露又隐的记述之后,关于“香妃”的种种传说就不胫而走。不仅许多野史笔记纷纷载录,而且1914年故宫古物陈列所还在紫禁城内武英殿西侧的浴德堂,向中外游人展出了据说是出自郎士宁手笔的“香妃戎装像”,像下并附有一篇绘声绘色的小传,大意云:香妃原是回部的一位王妃,姿色妙丽,生而体有异香,不须熏沐,因而国人皆称之为“香妃”。乾隆帝知道了这件奇事,在兆惠率军西征时,就嘱咐他务必弄个明白。后来兆惠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果然将香妃带回京师。乾隆帝于是专门建了一座宝月楼给她居住,楼外毳幕韦鞬,都是一色的维吾尔式毡房,同时将仿土耳其式样建筑的浴德堂作为她的沐浴之所,希望供此种种以悦其心而稍解其思乡之念。谁知香妃虽被殊眷,却心怀破国亡家之恨,常以白刃自随,不管乾隆如何百计劝诱,她始终不屈。太后微闻其事,担心皇帝有所闪失,一次趁乾隆祭天住宿斋宫之际,把香妃召入慈宁宫赐死。这次在深宫中举办的关于帝后秘史的官方展览,将香妃的传说推上了信史的位置。此后,日人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萧

一山的《清代通史》和美国出版的《中国清代名人传略》等著名史籍中,都陈述了上面的故事,而且有的还发展得更为丰满和传神。《中国历史大辞典》、日本《东洋历史大辞典》以及 1960 年日本出版的《亚细亚历史事典》中都列有“香妃”的专条。京剧和话剧界还曾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浓笔重彩,将香妃面对乾隆的淫威宁死不屈的贞烈形象展现于舞台。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位传奇性的女子?根据《清史稿》和《清皇室四谱》的记载,在乾隆帝的四十二位后妃中,确有一位、也只有一位来自西域回部,不过她的封号是“容妃”。1937 年,孟森先生著文论定了这位容妃就是香妃,同时也揭示了传说香妃事迹中的许多不实之处。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又进一步挖掘官私记载,特别是故宫档案的利用和 1979 年容妃墓的打开,已使香妃之谜大白于天下。

原来容妃(香妃)出生在新疆世世为回部酋长的和卓氏家族。“和卓”在波斯语中就是伊斯兰教首领的意思。她是大、小和卓波罗尼都的远房妹妹。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霍集占和波罗尼都弟兄二人发动反清叛乱时,容妃之兄图尔都和其五叔额色尹协助清军平息了叛乱,立下卓异的功勋。后被召进京,容妃同往。

容妃在宫廷中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二月初四日她被封为“和贵人”。这一年她 27 岁,乾隆帝五十岁。旧史说香妃进宫不几年既被太后赐死,其实太后死于乾隆四十二年,比容妃早死十一年,而且容妃在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由贵人晋封为嫔,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日由嫔晋封为妃,都是出自太后的懿旨。

容妃一入宫就跨越了“常在”和“答应”两级阶梯而直接封为“贵人”,说明了她在乾隆帝心中地位的重要。做贵人时,她每年得到官分赏银 150 两,封嫔妃以后,每年官分赏银是 300 两。为了庆祝她的四十寿辰和五十寿辰,乾隆两次都赏了她大量珍玩宝物和

“香妃”之谜

重达 450 两的银元宝。每年四季,她不断得到八方封疆大吏们进献的干鲜果品。她先后九次随侍乾隆帝前往风景秀丽的热河行宫避暑,并前往木兰围场,观赏围猎时那种奇趣无穷的景象。乾隆三十年,乾隆帝第四次南巡,容妃是随行的六位后妃之一,饱览了江南园林之美和湖山之胜。乾隆三十六年,她又随乾隆帝东巡,游历了东岳泰山,拜谒了曲阜孔庙。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拜谒满洲的龙兴之地——盛京,容妃已列为随行六位妃嫔的第二位。这次她参加了福陵、昭陵祭祀清朝缔造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隆重典礼,并在盛京故宫的凤凰楼和崇政殿,与皇帝一起接受了诸王大臣的叩拜。由于后妃中只有她是回族人,因此无论在宫中还是出巡途中,她的膳食都由皇帝指令专门安排,遵从回民习俗,食用多为羊、鹿、鸡、鸭、野鸡、乳品和各类素菜。

从乾隆四十九年庆祝了五十千秋之后,容妃就很少露面。乾隆五十二年的宫廷档案有她服用“平安丸”的记载。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55 岁的容妃离开了人世。当年九月二十五日,她的灵柩被送往河北遵化昌瑞山南麓的清代帝后陵园中安葬。

容妃从数千里外的雪原来到繁华的京师,进入神秘的皇宫,登上嫔妃的宝座,生前享尽何等荣华,死后安卧在崇隆的宝顶之下。然而二百年后当人们重新看到她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她的墓室长年浸泡在积水之中,停放在金券宝床上的红漆棺槨,已被盗墓人用利刃砍了一个长 1.75 米、宽 0.6 米的大洞,棺中空空无物。她的头骨滚落在棺木外的西侧,附近是她那条长 85 厘米的花白发辮。身骨已经融蚀,陪葬宝物大部荡然无存,惟有零星散落的珍珠、宝石。从棺头正中金漆手书的阿拉伯文《古兰经》“以真主的名义”来看,她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而且她的信仰在死后也和生前一样受到了尊重。其实,这不仅关系着她一个人的荣宠,同时也是清廷巩固对周边民族统治的整个民族政策的组成部分。

既然香妃(容妃)墓确切无疑在清东陵,那么萧雄所歌咏的新

疆喀什的“香娘娘庙”(香妃墓)必是出于误传,原来这座墓中葬的是一位男性——香妃的曾祖父阿吉·穆罕默德·尤素福·和加!

和香妃墓一样令人迷惑的,还有香妃像。传世的香妃像有三幅,其中两幅是油画,一为身穿欧式盔甲的半身像,即 1914 年古物陈列所展出的“香妃戎装像”,一为身穿西式长裙的全身像,即“香妃洋装像”。另一幅是一旅行家摄于裕陵寄赠孟森的据说是祭祀时所用的神像,即“香妃旗装像”。前两幅油画传为郎士宁所作,但画上并无郎士宁署款。目前中外学者已基本否定这两幅为香妃画像,因为一则画中人面貌并无维吾尔女性的特征,二则作品的风格也与郎士宁不同。第三幅画像上是一位身着红色满装的年轻少妇、眼窝微陷,鼻梁隆起,圆脸庞,颧骨稍高,是回部女子带着柔媚娇怯的典型相貌。从笔法看,也很似出自郎士宁之手。容妃的头骨经有关部门复原,认为她是圆脸庞,高颧骨,前额稍突出,与肖像颇为吻合。另外,乾隆帝在香妃死后三年吟咏香妃生前所居的宝月楼,曾有“卅载画图朝夕似”之句,可见香妃确曾有过一幅画像,而且是被乾隆帝挂起经常观看以释怀念之情的。由此种种,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这幅“香妃旗装像”就是香妃(容妃)的画像。

孝全皇后死亡之谜

孝全皇后钮祜禄氏,是道光皇帝的第三位皇后。生于嘉庆十二年(1807 年),比道光皇帝小 25 岁。其父颐龄曾在苏州做官,孝全也随居苏州。据说,孝全幼时既贤慧又聪明伶俐,动手能力极强,可以巧妙地拼凑“七巧板”,并且有所创新。后人赞誉她为“蕙质兰心并世无”(《清言词》)。

道光初年,孝全被选入宫。由于她明慧温柔,才智过人,16 岁(道光三年)时,即由全嫔册封为全妃。道光四年封为全贵妃。道光十一年(1831 年)生皇四子奕訢,即后来的咸丰皇帝。道光十三

孝全皇后死亡之谜

年孝慎皇后病逝后，孝全晋升为皇贵妃，统摄后宫事务。道光十四年正式被册立为皇后。

这样一位春风得意的皇后，升迁神速，死亡也快。只做了六年皇后，就于道光二十年正月暴崩，年仅 33 岁。

孝全之死，正史记载不详。我们只能挖掘其他史料来弄清孝全皇后暴崩之谜。

据张季皋等编的《中国历代皇宫大案奇案疑案荟萃》记载，孝全死于“才艺过人”，是婆婆（皇太后）害死的。书中记述：皇太后六旬万寿时，道光皇帝作“寿颂十章”，孝全皇后做“贺诗十首”同去祝寿，场面异常热闹。祝寿后，皇太后对道光说：“妇女重德不重才，皇后才艺过人，恐怕不是福相。”这番话传到孝全耳中，她感到很委屈，认为自己将来可以子得福，成为皇太后，何言无福。于是婆媳之间便心存芥蒂，加上有人从中挑拨，矛盾日益加深。道光十九（1839 年）年冬，孝全患病，皇太后亲临看视，颇为关心。新年后孝全病愈，至太后处请安，太后赐酒一瓶，孝全饮后，当夜暴亡。为此怀疑孝全之死，是皇太后所为。

孝全暴崩，《清宫词》有：“如意多因少小怜，蚁怀鸩毒兆当筵”词句。此诗原注为：“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摄六宫事，旋正中宫，数年暴崩，事多隐秘。其时孝和皇太后尚在，家法森严，宣宗（道光）亦不敢违命也”。据此诗分析，孝全之死与筵席的鸩毒有关，是孝全违背了家法，孝和皇太后执行家法的结果。至于违背了哪条家法，注释中没有提及，后人只能用“事多隐秘”来解释了。

另据罗惇融《宾退随笔》记载：孝全为了立其子奕訢为皇太子，欲毒死其他皇子，于是在宴请诸皇子的家宴中，置毒于鱼腹。吃饭时，奕訢不忍心毒杀众弟，于是暗示大家不要吃鱼。事后孝全阴谋败露。皇太后大怒，立赐孝全自缢。孝全在皇太后的逼迫下，投环而死。还有一种说法是，孝全发现皇太后知道此事后，畏于家法，羞惧难当，自己服毒而亡。

孝全暴崩真相如何,至今无定论。据说,孝全死后,道光异常悲痛,特谥大行皇后为“孝全”皇后,并从此不再册立皇后。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孝全葬入慕陵地宫。累谥为:孝全慈敬宽仁端惠安惠诚敏符天笃皇后。

1851年(咸丰元年)奕訢即皇帝位,是为咸丰皇帝。后人推论他的登基是以孝全皇后的暴死换来的。此说是否可信,目前尚未有史料作证,有待于我们继续探索。

咸丰死因之谜

咸丰是道光皇帝第四子,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死于咸丰十二年七月,死时年仅30岁。

咸丰初年,北京有“蹶龙病凤”的童谣,是说咸丰腿有残疾,皇后亦多病。咸丰自幼身体羸弱,据说这与他未足月出生有关。据宫中传言,咸丰生母很聪明,当太医视诊的时候,总问能否让孩子早点生出来。太医说可以,但恐怕对寿命有影响。咸丰的母亲说,你可以试试,若生一个大阿哥,我必有重赏。于是太医用了保胎速生药,咸丰之母因而早产。同月十九日,皇五子奕詝诞生。当时皇上幸妃都有记录,奕詝胎妊本在咸丰之前,结果竟迟了十天才出世(《老太监的回忆》)。

咸丰当政之初,尚勤于朝政,很想有所作为。而内有大规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外有英法联军入侵,令咸丰头痛不已,于是转向淫乐以排遣愁闷。据说京城有雏伶朱莲芳,长相秀美,歌喉婉转,还善于作诗,咸丰非常宠爱她,经常传进宫中伴驾。有御史陆某,也与这朱莲芳很有交情,便上书进谏,说皇帝不该沉迷酒色等等。咸丰看了大笑,说“陆老爷子吃醋了”,竟不以为意。又有山西孀妇曹氏,美艳而风流,喜欢在鞋上镶嵌明珠。咸丰帝宠幸无比,宫内外都称其为“曹寡妇”,还有人在圆明园发现了春药。(《清

慈安暴卒之谜

朝野史大观》)也有传说圆明园中有“五春之宠”。所谓天地一家春,是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慈禧)的住所,而其他四春: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居住的都是汉族美女。

咸丰皇帝因纵欲自戕,身体更加虚弱。每逢遇到坛庙大祀,常因为腿软而担心登降失仪,于是派奕訢恭代。加上内忧外患,国事艰难,遂患有吐血症。用现代医学知识判断,大约是得了肺病。太医为他开了“疗疾法”,认为饮鹿血既可以治病,又可以补阳分之虚。咸丰于是养了一百几十只鹿,每天饮鹿血医治。咸丰十年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将奕訢留下,办理与洋人议和事宜,自己带着肃顺等大臣及后宫妃嫔出逃热河,竟命令“率鹿以行”,由于大臣们的劝阻,才作罢。咸丰十一年春,他在热河行宫病倒,此后或危或安。只要病情稍好,仍旧娱情声色。次年七月,病情恶化。十七日,咯疾大作,急命取鹿血,仓猝中没有取到,遂驾崩(《满清外史》)。病逝前夜,谕令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肃顺等八大臣共辅朝政。

咸丰帝于忧患与淫乐中度过了其短暂的一生,死后葬于定陵。

慈安暴卒之谜

慈安太后,姓钮祜禄氏,广东右江道穆扬阿的女儿。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文宗为皇子时即入其府第成婚。咸丰二年(1852年),被封为贞嫔,继而又封为贞贵妃,册立为皇后。咸丰十年(1860年)随文宗巡幸热河。次年文宗死后,年仅5岁的穆宗(同治)即位,尊慈安为“母后皇太后”,尊慈禧为“圣母皇太后”。北京政变之后,慈安、慈禧在养心殿设坐,共同垂帘听政。同治十二年(1873年),两太后将政务移交给穆宗。同治十三年(1874年)穆宗死后,德宗(光绪)即位,两太后又垂帘听政。

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下午四时左右,内廷

突然传出东太后慈安暴亡的消息，王公大臣得悉无不大吃一惊。慈安到底是怎样死的，后人众说纷纭。

一说慈禧与慈安交往甚恶，慈安无法忍受，饮恨自尽。光绪即位，两后再度垂帘听政，慈禧纵恣无度，慈安倦怠朝政，甚至静摄不出。1881年初，慈禧患血膨剧疾，由慈安独视朝政，慈禧大为不悦，诬蔑之词颇激，以致慈安不能忍耐，恼恨之下，“吞鼻壶自尽”（《清稗类钞》）。

二说慈禧与慈安说话时，东太后觉腹中饥，西太后令侍者进饼饵一盒，东太后食而甘之，谓似非御膳房物。西太后曰：“此吾弟妇所馈者，姊善此，明日当令再送一份来。”东太后称谢。西太后曰：“妹家即姊家，请勿以谢字言。”后一二日，果有饼饵数盒进奉，色味花色悉如前。东太后即取一二枚食之，顿觉不适，然亦无大苦，到戌时遽逝矣（《皇宫五千年》）。

三说慈禧指使李莲英将毒药放在汤里，慈安喝后，顿觉腹内巨痛，倒在地上猝死。据说慈禧和李莲英为了阴谋得逞，先把慈禧宫内的两个传膳太监派去给慈安用，过了半月余，忽在一天午饭前，把两个小太监叫到慈禧宫内，让他们传膳途中把毒药放在碗里，当时两个小太监非常惧怕。慈禧说：“不要怕，有我做主，事成之后重赏你们，如若违令，要你们脑袋。”然后把一包药交给了一个太监，遂命李莲英监视执行。而这两个传膳太监，就在慈安暴崩那天夜里失踪了（《红墙往事》）。

四说慈安死于疾病。《光绪朝东华录》载有慈安遗诏，称她“体气素称强健，或冀克享遐龄，得资颐养。初九日（光绪七年三月九日）偶染微疴，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慈安在其遗诏中所言“体气素称强健”及发病情况与其他有关史料的记述基本吻合。但是“病势陡重”似乎无法解释。如果不是慈安“有意”编造，恐怕也会有难言之隐。不然怎会自己对“病情”提出质疑。

慈禧身世之谜

另一疑点是，慈安暴崩次日早八点钟，宫里传话要王公大臣到钟粹宫哭临。进宫以后慈安已经小殓，但没有看见慈安的内侄恩焘“承恩公”。按清朝惯例，后妃崩逝，要传娘家前属进宫瞻视，方可小殓。然慈安死后却无预其事者。惟见慈禧端坐矮凳之上，并无久病形态。她淡淡地对大臣们说：东太后向来没有病，近日亦未见动静，忽然崩逝，真是出人意外。人死不能复生，你等快去商议后事。于是左宗棠偕王公大臣等出宫。“众感叹为创闻”（《述闾秘录》）。

凡此种种，慈安死因，至今仍是谜。

慈禧身世之谜

慈禧的封号，是历代后妃中最长的，全称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简称慈禧太后，或西太后。据容龄著《清宫琐记》载：“慈禧的祖上原姓辉发那拉氏，明万历年间辉发国亡国，慈禧远祖巴尔扈逃亡叶赫国，就改姓叶赫那拉氏。”

《清史稿》记载：慈禧是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的女儿。咸丰元年（1851年），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四年（1854年），册封为懿嫔。六年（1856年）三月庚辰，生下穆宗，晋封为懿妃。七年（1857年）晋封为懿贵妃。十年（1860年），她随文宗到了热河。十一年（1861年）七月，文宗去世，穆宗即帝位，她与孝贞皇后一起被封为皇太后。

关于慈禧的出生地，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有说北京，有说安徽，有说山西，有说内蒙古呼和浩特。《清史稿》说她“生于南中”，但“南中”在哪，是“南方”吗？如果是，笔者分析，此说是由慈禧之父曾在“南方”任安徽道员一事穿凿附会出来的。据史料记实，惠征是咸丰二年七月到安徽任职的，那时慈禧18岁，并已入宫，封为兰贵人了，何为“生于南中”呢？最近又有人说慈禧生于浙江平湖

县,理由是,慈禧去世时,平湖人曾为她举行国丧,并把她的出生地满洲旗下营命名为“凤凰墩”,把附近的桥命名为“凤凰桥”,这些故地至今还在。此说亦无史料根据。

慈禧的身世与家境,史学界没有统一的说法,民间传闻更加离奇。说法最多的是:“慈禧的父亲惠征,是正黄旗满洲人,初任山西潞安府知府,以后升任直隶霸昌道(张家口)道台,不久又调任福建汀漳龙道台,死在福建任上。”据说惠征为官时,慈禧年龄虽小(十多岁),但亭亭玉立,生得杏眼蜂腰,修眉俊眼,异常漂亮。经常随父亲出入官场,见多识广,深谙此中权术。这也为她以后执政打下了基础。

民间传闻说,慈禧家境贫寒,靠替人家哭丧的收入糊口,或说靠义父吴棠的周恤生活;还有的说靠她的亲戚穆将阿的提携为生,以至经常遭到油盐店的老板侮辱。据《清官遗闻》记载:慈禧父亲死后,家境贫苦,归丧途中舟过清江浦,清江知县吴棠家人误送白银300两,吴棠知道后,不但未追回,而且登舟行吊。因此,慈禧当政后,吴棠这位平庸的官僚,多次得到提拔,以至升任四川总督一职。这种说法似乎不足为凭。

据程文等著《慈禧太后大传》记载:慈禧之父惠征,生于嘉庆十年(1805年),监生出身,长期任笔帖式。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任吏部文选司主事。道光年间颇受当朝赏识,以至官为四品正道台。咸丰二年(1852年)又被调往安徽,委以重任。惠征虽然后来因操办粮台不利而罢官,并不久离开人世,但家境绝不至于贫寒。

据多种史料证实,慈禧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在朝中为官,虽然谈不上显贵,但也可以说是名门世族。况且慈禧的母亲也是名门闺秀,她父亲惠显在道光年间历任安徽按察使,驻藏大臣,工部左侍郎,并兼京营右翼总兵,最后调任归化城副都统,是地方的位居二品的封疆大吏。由此可以推断,慈禧并非出身于贫贱之家,父

慈禧病亡之谜

亲死后也没经历过贫穷日子,因为从时间上证实,慈禧之父死于咸丰三年,而慈禧在咸丰二年即已入宫,故上述说法为无中生有。慈禧的生活无论惠征生前或死后都是富足的,她始终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那些编造的慈禧出身卑微的故事,笔者认为毫无根据的。

慈禧病亡之谜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慈禧死于中海仪鸾殿,终年74岁。

慈禧病亡情况,后人传说纷杂。由于她的死,与傀儡皇帝光绪之死仅一天之隔,而且帝、后矛盾甚深,因此,帝、后之死便成为历史上的一大疑案。

关于慈禧的病因,多数史料均说她是因患痢疾腹泻不止而最终衰竭而死。据《慈禧外记》载:西历1908年11月15日太后仍于六点钟起床,处理朝政。“至午时太后方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其根则由于夏间病痢太久,体气大伤也。”同日《内起居注》亦云:“是日,圣祖母太皇太后疾大渐,未刻,慈驭升遐。”从以上记载分析,慈禧之病由痢疾引起,而且逐渐加重,其病症并无必死的迹象。另从脉案记录分析,御医对慈禧之病,用药一直比较平和,并且主要由太医院主治,从未召外地名医入宫应诊。这说明慈禧并没有病入膏肓。反之,从她不断发布懿旨的背景内容来分析,她仍要继续把握清廷大权。直到22日临终前,才宣布授予摄政王载沣有裁定政事之权。由此可见慈禧为慢性病,导致病重是“因前数日感触劳乏,以致旧病复发”突然死去的(《慈禧外记》)。

《慈禧外记》第二十七章,记载了“慈禧宾天”的景况:太后自知末日将至,命军机大臣草拟遗诏。拟成后,太后审阅,“改定数处,又加入数句,即遗诏中不得不再行训政之语。”“谓余垂帘数次,不

知者或以为贪权,实则迫于时势,不得不然也。”并说:“反观一生,无悔恨之事也”。“太后遂向侍从之人谓长别之语,闻者无不伤心。太后神志清明,虽弥留时,仍接续谈话,态度安闲,一如平日。后渐昏沉,侍者皆谓时已至矣。忽又清醒,故临终前数分钟,犹未绝希望也。”“其最后之一言,乃出人意料之外。其言曰:‘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语罢遂瞑,时当下午三钟也。”“太后崩后,口张而不闭,或谓此乃灵魂不愿离其体魄也。”或曰“其崩也,亦如其生前,具有兴奋勇厉之态,盖太后实一不可测度之人也”。

笔者认为,以上所记慈禧病亡经过,虽多有颂扬之词,但基本史实还是可信的。慈禧之死和光绪之死并无必然联系,从两者病案记录,并对病理、病状、药方分析,慈禧与光绪均属于正常病亡。

慈禧随葬珍宝之谜

同治十二年(1873年),慈禧的陵寝即在清东陵(河北省遵化市昌瑞山)兴建。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慈安与慈禧两陵同时竣工。由于慈禧的陵墓不及慈安陵墓豪华,自光绪二十年始,直至她病亡,历时十四年又花巨资,进行了拆修、重建。终于使其陵寝成为清代帝王中最豪华、最富丽堂皇的陵寝。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死后,清王朝对她实行了厚葬,将大量奇珍异宝葬入地宫,其价值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帝王都无法相比的。那么,慈禧随葬珍宝究竟有多少呢?

目前有两种记载:

一种记载出自清宫档案,按“内务府簿册”载,殓入棺中珠宝玉器有:正珠、东珠、红碧玕、绿玉、珊瑚寿字、珊瑚喜字、珊瑚雕螭虎、龙眼菩提等朝珠。大正珠、正珠、东珠、红碧玕、绿玉、珊瑚圆寿字

慈禧随葬珍宝之谜

等念珠。绿玉兜兜练。正珠挂纽。金镶正珠、金镶各色真石珠、金镶珠石、金镶各色真石，白钻石葫芦。金镶红碧玕正珠、金镶藤、镀金点翠穿珠珊瑚龙头、白玉镶各色真石福寿、绿玉镯。正珠、东珠、金镶正珠龙头等软镯。绿玉、茶晶、白玉皮、玛瑙等烟壶。洋金镶白钻石、洋金镶珠带别针等小表。洋金镶白钻石宝桃式大蚌珠、白玉鱼蚌珠、白玉羚羊等别子。白玉透雕活环葫芦、绿玉透雕活环、珊瑚鱼等珮。汉玉珞、汉玉仙人，汉玉洗器。白玉猫、黄玉杵、汉玉针、汉玉羚羊、雕绿玉扳指。蓝宝石、红碧玕、紫宝石、子母绿、茄珠、大小正珠、绿玉、蚌珠、绿玉镶红碧玕等抱头莲。珊瑚绿玉金镶红白钻石等蝙蝠。金镶红白钻石蜻蜓。金镶白钻蜂。红碧玕、绿玉穿珠菊花。金镶各色珠石万代福寿。金镶钻石等冠口。金翠珠玉等佛手簪。红碧玕、绿玉、珊瑚、红蓝宝石、红白钻石、子母绿等榴。黄宝石、钻石、红碧玕、白钻石、大正珠等帽花。

另一种记载出自《爱月轩笔记》，作者为慈禧最宠信的大太监李莲英的侄儿。当年李莲英亲自参加慈禧殓葬仪式，该书记录得比较详尽。据《爱月轩笔记》记载：

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上一层金丝镶珠宝锦褥，厚七寸。上面镶着大小珍珠 12604 颗，红蓝宝石 85 块，祖母绿 2 块，碧玺、白玉 203 块。在锦褥上又盖上绣满荷花的丝褥一层。上面铺五分重圆珠一层，共计 2400 粒。圆珠上又铺绣佛串珠薄褥一套，褥上有二分珠 1300 粒。慈禧尸体入殓前，先在头部放置一个重二十二两五钱四分的翠荷叶。荷叶满绿，为天然长就，叶筋非人工雕成，甚为珍贵。脚下置碧金玺大莲花，重三十六两八钱，系粉红色，荧光夺目，世上罕见。慈禧尸体入棺后，头顶荷花，脚蹬莲花，寓意“步步生莲”，祈盼亡灵早日进入西方乐土。

慈禧身上穿着金丝绣成的寿衣，外罩绣花串珠褂。这两件衣服上缀着大珍珠 420 粒、中珠 1000 粒、一分小珠 4500 粒，大小宝石 1135 块。另外，慈禧胸前的佩饰，以及围绕全身摆放的珍宝不计

其数。

据说,正要上棺木盖时,一位公主又赶来献宝。将玉制的八匹骏马和十八尊玉罗汉,放入棺中。这些宝物均为稀世珍宝,价值连城。至此,才封闭棺盖。

关于慈禧随葬珍宝的总价值,《爱月轩笔记》作者之子李营舟说:“慈禧葬物若均追回,足以富国。”

以上两种记载,都有根有据。孰是孰非,哪种记载可靠,至今没有定论。笔者认为,清宫档案的记载应是可信的。但是,面对如此巨多的珍宝,也很难记录得准确无误。

光绪“衣带诏”之谜

光绪帝载湉即位时,清朝已是千疮百孔,内外交困。18岁时,光绪帝在名义上亲政,而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年轻的光绪帝敏而好学,不甘心做亡国之君,希望拥有实权,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这样,光绪帝逐渐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在与康有为等维新名士接触后,更下定决心,效法日本,希望通过变法使清朝强大起来。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坚决抵制维新思潮。这样,在清廷内部形成了两种势力,即后党与帝党。

随着光绪帝维新的热情日益高涨,帝党与后党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光绪帝决心顶住重重压力,将变法进行下去。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给死气沉沉的清王朝注入了一些活力。从这一天起,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亦即“戊戌变法”。

6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授康有为专折奏事的特权。不久,委任梁启超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擢升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为军机处章京(四品衔),专门办理拆阅奏

光绪“衣带诏”之谜

章,草拟诏书的事宜。维新力量逐渐发展起来了(《百年风云》)。

为抵制变法,保守派设置了重重障碍。“明定国是诏”发布四天后,慈禧即采取了行动,包括 将皇帝的老师、支持变法的军机大臣翁同龢撤职;任命后党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北洋三军,控制京畿地区;下令新授二品以上的官员要向她谢恩,从而控制了大臣的任命权。

为使新政顺利推行,光绪帝准备在宫中设立懋勤殿,以便安插维新党人。9月14日,光绪带着军机章京拟好的开懋勤殿上谕及保荐康有为、梁启超、杨深秀等维新人士作为懋勤殿顾问人选的奏折,前往颐和园求见慈禧,希望说服太后同意。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尝试极大地触怒了皇太后,慈禧甚至指责他要把祖宗的家业葬送于康有为之手(《清代皇帝传略》)。

从慈禧的话语里,光绪帝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从慈禧住所出来,光绪帝已是面色苍白,他担心守旧派会在近期采取行动。因为京师早已流言四起,而主要内容就是废掉皇上,另立新君。光绪帝回到玉澜堂,立刻写下一份“密诏”(即通常所说“衣带诏”),交给维新党人。

关于这道密诏,有两种不同说法。其一是下达给军机章京的,篇幅较长,语气婉转,有如下字:“将旧法尽变,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全变,而不致有拂圣意?”慈禧死后,1909年,杨锐之子杨庆昶将这“密诏”呈缴都察院,由赵炳麟“疏请宣付实录”,载于《光绪大事汇编》卷九。

另一说密诏是直接写给康有为的,语气急迫,因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而产生深深的恐惧感。内容大致如下:“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后来康有为等在海外奔走,向外国求援,就是以此“衣带诏”为凭据。

总之,因为风声紧迫,光绪急切地希望维新人士想出办法。据说,康有为等看过密诏后,抱头痛哭。无奈维新党人虽有官位,却无实权。在康有为授意下,礼部右侍郎徐致靖向皇上举荐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认为袁世凯是支持变法的。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破格授予他侍郎候补的头衔,让他专管练兵。9月18日夜,谭嗣同带着皇帝的密诏,只身一人前往北京法华寺(袁世凯住的地方),策动袁世凯救驾,希望他去天津杀掉荣禄,再带兵回京包围慈禧所住的颐和园,软禁慈禧。袁世凯假装慷慨应允,取得了谭嗣同等的信任。9月19日,慈禧突然回宫,使光绪置于她的监视之下。9月20日,袁世凯一回天津,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宣布再次“训政”,同时派兵搜捕康有为等。从此,光绪在囚禁中度过了他凄凉的后半生。而康有为因先得着光绪的手谕,仓惶出逃,后流亡日本。谭嗣同因为想通过江湖势力营救光绪,故坚决不肯离开,后与林旭等一同被捕。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维新变法彻底失败。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声哀”。“衣带诏”的主人早已“日落瀛台”,而“衣带诏”的公案仍留待后人去考证。

光绪死因之谜

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清廷宣布皇帝载湉“崩于瀛台之涵元殿”。第二天,即十月二十二日,慈禧皇太后那拉氏亦“崩于中南海之仪鸾殿”(《德宗实录》)。七十多岁的老嫗与正当壮年的皇帝竟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相继死去,其巧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由于帝、后长期不和,且光绪帝临终前一直被幽禁在瀛台,人们不禁对光绪之死产生极大怀疑。

据官书《清德宗实录》、《清史稿》、《光绪朝东华录》等记载,光

光绪死因之谜

绪帝因病而死。有人考证,光绪帝自幼多病,且长期遗精,²⁸岁以后,病情加重,体质每况愈下。从光绪三十四年的病情记录及脉案来看,光绪当时已病入膏肓。因此病逝之说应该可信(《清代帝王后妃传》)。一直为光绪治病的杜钟骏著有《德宗请脉记》,对光绪帝的病情、诊病经过及光绪帝临终前病状,均有详细记述,也证明光绪帝是正常病死。但此书说光绪临终前一天并未请医就诊,而事实上,当时有四位名医入宫诊病,包括杜钟骏本人(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光绪帝脉案)。这就颇令人怀疑了。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光绪被害而死,却有不同记述。

《清稗类钞·迷信类》中记载,因慈禧太后病笃,不愿先皇帝而死,遂命亲信太监毙之。屈桂庭在其所撰《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中说,皇帝忽然肚子疼,在床上乱滚,大声喊痛,而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症状,随后便听说皇帝驾崩了,暗示皇帝毒发而死。

较为接近皇帝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西太后病重时,有人说光绪听说太后有病,面露喜色。太后怒道:“我不能先你死。”于是,禁门增添兵士,伺察出入,像是发生了非常的变故。太监们出东华门净发,声言皇帝驾崩了。次日午后,宫中传出令醇亲王监国之谕。二十一日皇后看望皇上,才知皇帝不知何时气绝。

在宫中当过女官的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断言光绪之死是李莲英所为。理由是李莲英怕太后死后,皇帝和自己算账,所以下毒害死了光绪。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有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光绪临死前一天还好好的,只因为吃了一剂药就死了。后来才知道这药是袁世凯派人送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光绪死于饥饿。

谷虚《清宫琐记》中有太医周景濂所描述的光绪宾天时的情形。据说皇帝本来没什么大病,平时所用都是平和药剂。光绪死前的几天里,侍疾的太医中已饿死二位,其余的每天也只供给很少一点食物。光绪归天的早晨,内监召太医进入,只见皇帝躺在东

床,用手召周太医进前,瞠目指口,反复四次。而此时内监只剩一人,宫中器物早都被偷光,只剩下一个玉鼎。周太医知道皇帝想吃东西,却无处寻觅,而且自己也已两天未进食了。一会儿,醇亲王到,问皇帝病状。周太医说“当是驾崩”。醇亲王用怀镜接近皇帝嘴唇,见无嘘气,匆匆离去,报与皇后。皇后赶来探视,随即宣布皇帝驾崩。

光绪自幼在慈禧淫威之下,长成后欲强国变法而遭失败,反而被囚瀛台,痛苦终生。死得却又不明不白,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珍妃堕井之谜

珍妃,姓他他拉氏,满洲正红旗人。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13岁的珍妃和15岁的姐姐瑾妃同时被选入宫,第二年姐妹二人都被封为嫔。

光绪二十年,西太后万寿庆典前夕,光绪帝奉慈禧懿旨,晋封姐妹二人为妃。

珍妃天真活泼,聪明伶俐,能歌善舞,擅长书画,双手能写秀丽的梅花篆字,深得光绪帝的宠爱。正因如此,使作为慈禧内侄女的隆裕皇后醋意大发,由忌而恨,经常在慈禧面前说珍妃的坏话,慈禧本人也愈加对珍妃不满意。时间一久,矛盾越积越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接受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的变法主张,推行新政。珍妃积极追随光绪帝,极力支持维新,引起了慈禧的强烈不满。光绪二十四年九月,慈禧发动政变,捕杀了维新派,把光绪帝幽禁在瀛台(今中南海内),同时也把珍妃贬入冷宫。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决定出京到西安暂避。光绪帝曾提出愿意留下与各国举行和平谈判。慈禧坚决反对,于次日晨,挟持光绪帝,带着皇后和大阿哥,以及少数太监、宫女仓皇出逃。跟随逃亡的王公大臣仅十余人,随

珍妃墮井之謎

扈兵勇千余名。出逃之前慈禧处死了年仅 25 岁的珍妃。

珍妃是怎样死的？历来传闻很多，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从笔者所见资料中，说法最多的是，慈禧西逃前命人把珍妃叫出冷宫，说：“我们想带你走，但外面土匪很多，你年纪还轻，如果遭到污辱，岂不玷污了大清国的国体，还不如死了。”珍妃不从，想见光绪帝，慈禧太后就命太监崔玉桂把珍妃强行推入井中。

还有文献记载说，慈禧临行前，命人叫珍妃换好衣服一齐走，但珍妃却披头散发，没换衣服就来见慈禧。慈禧一见大怒，说：“到这时候了，你还装模作样，洋人进来了你活得了吗？赶紧换衣服走！”（《文史资料》第 6 集）珍妃却理直气壮地说：“国难当头，我不走，而且皇上也不该离开京师。”慈禧非常生气，但因时间紧迫，暂时忍耐，仍命珍妃换衣服和她一起出逃。珍妃此时却改变口气说：“皇阿玛，妃子面出天花，身染重病，两腿酸软实在走不了，让我出宫回娘家避难去吧！”（《文史集萃》第 6 集）慈禧见珍妃在危急时刻，不但不听话，还公然顶撞她，随命总管太监李莲英把珍妃处死。李莲英命令二总管崔玉桂和太监王某将珍妃拖到了贞顺门内的水井旁，将珍妃推入井中，崔玉桂还搬起井旁的一块石头砸了下去。

另一种说法笔者认为比较合乎情理。1938 年《故宫周刊》第三十期出版了《珍妃专号》，刊载了珍妃之死悲剧的历史见证人，原清宫太监唐冠卿的叙述，照录如下：“庚子七月十九日，联军入京，崔玉桂率快枪队四十人守蹈和门，我也率四十人守乐寿堂。时甫过午，我在后门休憩，突然看见慈禧后自内出，身后并无人随侍，我想她可能要去颐和轩，遂趋前扶持。乃至乐寿堂后，后竟循西廊行，我颇惊愕。后曰：‘老佛爷何处去？’曰：‘汝勿须问，随我行可也。’及抵角门转弯处，遽曰：‘汝可在颐和轩廊上守候，如有人窥视，枪击勿恤。’我方骇异间，崔玉桂来，扶后出角门西去，窃意将或殉难也，然亦未敢启问。少顷，闻珍妃至，请安毕，并祝老祖宗吉祥。后曰：‘现在还成话么，义和拳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继

语音渐微，啾啾莫辨，忽闻大声曰：“我们娘儿们跳井吧！”妃哭求恩典，且云：“未犯重大罪名。”后曰：“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么？你先下去，我也下去。”妃叩首哀恳，旋闻后呼崔玉桂。桂谓妃曰：“请主儿遵旨吧！”妃曰：“汝何亦逼我耶！”桂曰：“主儿下去，我还下去呢！”妃怒曰：“汝不配。”我聆至此，已木立神痴，不知所措。忽闻后疾呼曰：“把她扔下去吧！”遂有挣扭之声，继而砰然一响，珍妃已坠井矣。斯时光绪帝居养心殿，尚未之知也。”

珍妃被害时年仅 25 岁。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回京后，为了掩盖她残杀珍妃的罪行，对外宣称珍妃是为了免遭洋人污辱投井自杀的，并于当年十一月三十日下懿旨说：“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闱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著追赠贵妃位号，以示褒恤。”

起初珍妃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田村，1913 年 2 月 22 日隆裕皇后去世时，珍妃棺柩由北京移至清西陵梁各庄行宫暂安。同年 11 月，以贵妃葬仪，埋葬于光绪陵寝崇陵旁的妃嫔寝内。1921 年 4 月溥仪册谥为：“愍恪顺珍贵妃”。

珍妃之死，清末野史笔记小说中还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都不足为据。

溥仪葬地之谜

爱新觉罗·溥仪（1906 - 1967），是清朝入关后第十帝（即末代皇帝），字浩然，西名亨利·溥仪，为第二代醇亲王载沣长子。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十一月即皇帝位，时年 3 岁，其父载沣监国摄政，改元宣统。1911 年（宣统三年）八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 年 2 月 12 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宣布退位，在位仅三年。

溥仪自 1912 年退位，至 1967 年 10 月 17 日病逝。其间经历过

溥仪葬地之谜

“张勋复辟”，拥其第二次当皇帝（仅 12 天即告失败）。1924 年被冯玉祥国民军逐出紫禁城，次年移居天津。1932 年 2 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改长春为新京。1945 年日本投降，被苏联红军俘获。1950 年被遣送回国，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 年 12 月被特赦。次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1961 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1964 年被选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1967 年在北京逝世。

溥仪是因患肾癌逝世的，享年 61 岁。溥仪死后葬入皇家陵寝了吗？他生前营造过“万年吉地”吗？此事至今鲜为人知。据李青《勘舆说帖》证实，1915 年溥仪 10 岁时，废清皇室决定为溥仪选择“万年吉地”。担任此任的即是精通风水的广东廉州府李青。李青在笔帖式锡泉等人的陪同下，踏遍了河北省易县西陵的山山水水，经过勘测与卜算，认为泰东陵旺隆村北（俗名狐仙楼），是一处上吉佳壤。陵穴定在西北的山坡上，与崇陵遥遥相对，清皇室经过讨论，并派人实地验证后，认为可以选用，并即时将此地圈禁起来。据徐广源《清朝皇陵探奇》记载，当时“溥仪小朝廷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更何况时局不稳，小朝廷自身难保，所以陵址虽然已经选定，但一直未能兴工。”还有一种说法，出自陈宝蓉著的《清西陵纵横》，说：“溥仪入承大统后，便于崇陵旁的旺隆村北选定了‘万年吉地’”。并“于宣统二年破土修建，采取了先地下，后地上，由后向前逐步施工的办法。施工一年有余，完成了地宫开槽奠基和明楼宝城等基础工程。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便倒台了，至此宣统陵寝工程被迫停止，再没有恢复兴建”。两种说法，孰是孰非，有待考证。

那么，溥仪逝世后，是土葬还是火化呢？据溥仪的夫人李淑贤说，溥仪的遗体是 1967 年 10 月 19 日火化的，对于骨灰如何处理，周恩来总理当时作了明确指示：一、可由爱新觉罗家族决定。二、可由家属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其他基地的任何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10 月 21 日家属聚会进行了讨论，经家族一致商定，

将溥仪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溥仪的后半生》）。

溥仪之弟溥杰说：“周总理等领导同志“对溥仪的后事非常关心，曾对我说，是否要建立一座漂亮的陵墓？作为一个市民，我明确拒绝了。”

据新华社报道，为了祭奠这位在“文革”中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公民”，1980年5月29日在政协礼堂，为溥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颖超、乌兰夫、彭冲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全国政协副主席季方、刘澜涛等三百多人出席了追悼会。会后根据中央指示，将溥仪的骨灰重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副室。

至1994年溥仪葬地又有变化。《清室皇陵探奇》记载：1994年旅居海外的张世义先生在易县崇陵西北兴建了一座华龙皇家陵园。为了提高陵园知名度，增加效益，张先生经过不懈努力，劝动了溥仪的夫人李淑贤，将溥仪的骨灰盒迁葬西陵。

安放仪式于1995年1月26日举行：由李淑贤把骨灰盒捧至墓穴前，陵园工作人员将骨灰盒放入水泥筑的“椁”内。面南朝北，盖上“椁”盖，最后浇上混凝土。这就是清末最后一个皇帝的“万年吉地”。

此前，关于溥仪的葬地的传闻很多，笔者认为应以此为准。

袁世凯猝死之谜

1916年（民国5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命呜呼！

偷鸡不着蚀把米，用现在人们常喜引用《红楼梦》的一句话，那就是叫做“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袁世凯自从辛亥武昌首义后，从养晦一度的彰德家乡再度出山，摄政王载沣甘愿让位，由他出任清王朝国务总理大臣，在南北议和后，又代孙中山当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年后又爬上了正式大总统宝座，真可谓是步步高升，可是袁世凯野心勃勃，他的目的是做皇帝。现在皇帝是当上

袁世凯猝死之谜

了，却遭到全国各界反对，年纪还未过 60，一顿可以吃一只带猪蹄膀或一只全鸡的袁世凯，终于在亿万人众声讨中呜呼哀哉了。

袁世凯死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制复辟的大背景时代。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鉴于他的接班人，仍是袁世凯北洋系统的老同事、老部下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之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因而对他的死因讳莫如深，据讣告说是病死的。但通常说是气死的，诸说不一。

说是病死的，佚名《袁氏盗国记》还作了详细说明，“五月二十七日，经中医刘竺笙、萧龙友百方诊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初四日病势加剧，即请驻京法国公使馆医官博士卜西京氏诊视病状，乃知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病入膏肓，殆无转机之望。”佚名《袁世凯全传》也称袁世凯所患，“相传为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佚名《袁氏盗国记》、《袁世凯全传》都是袁世凯死后推出的出版物。自有其可信处，因而二十世纪 50 年代刘厚生《张謇评传》说“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如果及时采取外科手术治疗，决无生命之虞。可是在医疗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意见分歧，大儿子袁克定相信西医，主张动手术；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相持不下，贻误时机，终致不治。”又说据当时形势“说他会被活活气死，这断然不可能”。

此说以为袁世凯是因医疗误时而致命的，与此相近之说，是袁世凯患病后不肯服药因而毙命的。据说，当年袁世凯归隐彰德时，有术士算命，“称袁不得过五十八岁。袁问有何禳解否？曰此事甚难，非得龙袍加身不可。袁默然无语。饮术士以酒，比出户，而毙，盖鸩之以灭口也。然自此遂怀异志。革命以来，适得称帝之机会，愈自喜，谓龙袍一加身，即安然富贵矣。谁知事不如愿，各省纷纷反对，不特称帝不成，抑且性命难保，于是积忧成疾；昏迷之中，恒见术士来索命。医者以药进，袁皆拒而不服，指之为鸩，盖其视药与当年饮术士之酒无异。左右颇知其隐，而不敢喧之于众，但改用

针砭而卒无效，世所传信任针医出于袁大公子之意，不知其别有原因也！”（《袁世凯轶事》）

但是，多家均以袁无论得病与否，症结还是因帝制失败、众叛亲离而气愤成疾的。所以如“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袁世凯全传》）“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亡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心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也”。（《袁氏盗国记》）袁世凯子女也说，袁当时是患膀胱结石症，“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因为气愤，方致患病，连气带病，病中加气，恶性循环。那么袁世凯因何以气病死的？

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四川督军陈宦背叛，宣布“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陈宦通电），是袁世凯的一贴催命药。所谓“袁氏自遭各地反抗，忧郁成疾，逮四川警报至，疾益剧，至是殁”。“六月六日，愤疾而死”。（《民国徐又舒先生树铮年谱》）“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此说时人多无异词，白蕉说：“袁自南方独立，内政外交事务之纷扰，已昼夜焦虑，体力不支；帝制失败，更羞愤万状，迨其亲信川督陈宦、湘督汤芑铭反戈独立之报至，遂以忧愤死。”（《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炳麟也说：“陈宦以四川独立，世凯犹不信，见其露布，始怒，命秘书发电痛诋之，秘书不肯，世凯惭怖，呕血至碗许，渐不支。”（《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为什么陈宦背袁，导致袁世凯加剧病死呢？这是因为陈宦是袁世凯的亲信、帝制拥戴者，而且又有实力。据说，当袁派陈宦带兵入川前夕，他向袁辞行时，就行三跪九叩之大礼，“项城惊异道，何必如此。陈对以陛下登极大典，臣恐未必能躬预，故先行庆贺。项城即说，即改国体亦废跪拜礼了。陈又跪下，三嗅项城之足而

袁世凯猝死之谜

退。”(《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陈宦先是用臣子见皇帝礼节,而后又是学喇嘛拜叩活佛的最高敬礼,真可谓是阿谀奉承到了顶峰,果然使袁世凯对他感觉良好,以为只要陈宦坐镇成都,“倚以镇慑,谓西南可无事,江上刘戍,亦自谓慎固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因而陈宦在这年5月22日宣告独立,对毫无思想准备的袁世凯是最大打击,“陈宦的叛离,最使他恼火”。(彭明《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此中还有一个原因是陈宦又为袁的其他亲信起到了带头羊作用。他们就是5月26日宣告陕西独立的陈树藩和5月29日宣告湖南独立的汤芑铭,所以有人说:“袁世凯最后服了一贴‘二陈汤’以致送命,这三个人对他宣布独立是他所料不到的,因此活活气死了。”(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但也有不同意袁世凯是因陈宦等背离而气死的。

有人说是袁世凯虽有野心,但其铤而走险,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做皇帝,源于接受杨度劝设筹安会、复辟搞洪宪帝制。由此使他悔恨交剧,在他患病时,“匿避天津之杨度回京,比至,项城已不能语,但怒目视杨,似自恨为杨所误者。……越六时而项城死”。(《袁世凯轶事》)并以杨度后来为袁世凯送的挽联为证:“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也有一种说法,说是据当年袁世凯身边的人回忆,“袁世凯的死主要由于贪恋女色所致”。(引自《人间百事通》,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此说以为袁生活十分腐朽糜烂,除原配夫人外,另有姨太太九人,由此每天服用鹿茸、海狗肾等补药,以满足性生活需要。自1916年春节起,身体日趋不佳,以后常患腰疼,经法国医生抢救无效,死于尿毒症。

此说完全排斥了当时政治大背景对袁世凯的精神、心理负面,显然出自不明国事的个人想像、推理,以致传播,信以为实。但袁世凯死时,民间确有谣传,通常说是袁世凯知帝制失败,且总统宝

座也遭国人反对。竹篮打水皆是空。在悔恨交加中，吞金自尽。与此相近者，还有说他是被章炳麟说梦吓死的。

据说，章炳麟为袁世凯软禁于龙泉寺时，有一天，他要住持宗仰和尚向袁世凯转达他的一个梦，梦中说是章炳麟做了阎罗王，迟早要审判袁世凯；现正在试验一种刑具，就是像袁世凯那样的奸贼，到底让他心火自内烧死的好，还是采用铁床铜柱把他烤死的好，还没有最后决定，要他等待着吧！宗仰和尚即将此梦转告，袁世凯听了又惊又气，遂“一气成疾”，“袁后来真的因此被气疾而死”。（《章太炎爱骂人》，台湾《中央日报》1990年5月1日）此处所说，以袁世凯之一代奸雄，当然不可能被这种鬼话所吓坏的。但出自口诛笔伐，正也反映时人对复辟者的厌恶痛恨。

在袁世凯本人，却始终没有向后来者交待他为何人而气出毛病、难以治愈的了。人到死时，其言必善。可是，这个窃国大盗即使在咽气前，还不讲真话，只是喃喃地叫道：“他害了我！”他是谁？有人说是老部下冯国璋、段祺瑞，他们希望继任总统所以对帝制暧昧，或者是陈宦、汤芑铭始从终弃，反而对他倒打一耙；也有说是“太子”袁克定，为了当上合法接班人，极力怂恿老子做皇帝，更有说是杨度等“筹安会”成员，甚至是其他部僚、朋友。这句话所指的是谁，语焉不详，且用意和含义令人难解，看来此时此刻的袁世凯的思维定势，仍在玩弄权术，正如有人说的，“他最后一句话没有指明‘他’是谁，这也是奸雄到死都在玩弄诈术的地方。他用这话减轻自己的罪责，又嫁祸于人，又用这句不明不白的话刺痛那些拥戴他当皇帝，而后来又背叛他的人。”（田遨《杨度外传》）

袁世凯一生都在欺世盗名，这大概就是他最后留给历史的一个谜团吧！

西施的归宿如何

明代的戏曲作家梁辰鱼写过不少剧本，最有影响的是《浣纱记》，讲的是春秋末期吴越交战的故事，以西施与范蠡的爱情作为全剧的线索。剧情是这样的：

越国大夫范蠡在一个春光明媚的艳阳天出访民间。来到诸暨苎萝山下若耶溪，遇见正在浣纱的西施，被她的天姿国色所倾倒。就以溪水之纱相订白首之约。不久吴王夫差为报杀父之仇，领兵打进了越国。越军被打败，越王勾践做了俘虏，范蠡作为人质跟随越王夫妇到了吴国做奴隶，他和西施的婚事就耽搁了下来。三年以后，吴王夫差放回了勾践夫妇和范蠡。勾践回国以后，卧薪尝胆，准备十年生聚，力图报仇雪耻。他采用范蠡所献的美人计。西施被范蠡的爱国热情感动了。虽然不愿意充当“美人计”的主角，也只得自叹薄命，同意去吴国。夫差一见，果然大喜，宠爱无比。他自以为打败了越国，天下无敌，更没有把越国放在心里。最后，吴国终于被越国灭掉。勾践正要论功行赏，范蠡却不愿做官，接了西施，泛舟湖上，改名隐居去了。

剧本所讲的故事，有些情节是虚构的，而西施和范蠡却实有其人。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县）人，越大夫，曾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亡吴国。范蠡深知勾践的为人，他给越国另一大夫文种的信中说：“飞鸟打光了，再好的弓箭也该收藏起来，兔子打完了，就要轮到把猎狗烧来吃了。越王这个人，可以跟他共患难，不可以共享安乐。”劝文种赶快离开越王。他自己也隐姓埋名出走，先游齐国，称鸱夷子皮。后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西施是春秋末越国苎萝（今浙江诸暨南）人，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但是，对西施的结局，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说西施后来被投水杀

身,这种说法最早见记载的是《墨子·亲士》篇,其中说:“西施之沈,其美也。”(“沉”,古作“沈”。)这句话的意思说西施是被沉于水中的,她的死是因为她的美丽。《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袋。这句话是说,吴国灭亡后,越王把西施装进皮袋沉到江里去了。《吴越春秋》是叙述吴自太伯至夫差、越自无余至勾践的史事。但它比《墨子》一书要晚出好几百年,而它所记载西施的死反比《墨子》详细,可能出自民间传闻。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曾作《景阳井》绝句一首:“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

另一诗人皮日休也有诗题《馆娃宫怀古》五绝,第五首是:“响屧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

从这两首诗可以知道,唐代也流传过西施被沉于水的说法,可是都没有说起西施和范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种说法,《越绝书》是这样记载的:“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越绝书》是东汉袁康所撰,记吴越两国史迹及范蠡等人的活动,多采传闻异说。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秋娘诗》中有句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不作皮袋解释,而指的是范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范蠡亡吴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姓氏书辨证》卷三中也说,范蠡到了齐国以后,自号鸱夷子。因为有范蠡泛于江湖的传说,或许是后人不忍这位绝代佳人遭到如此可悲的结局,就流传出西施和范蠡偕隐五湖的美满姻缘的故事,以寄托对他们的同情。梁辰鱼就是根据这个故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浣纱记》。新出的《辞海》(修订本)也这样说:“西施一作先施。春秋末年越国苎萝人,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偕入五湖。”并没有提到她被沉

屈原自沉汨罗江之谜

于水的传说，大概也是愿意她有一个完美的归宿吧。

《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都提到范蠡但没有讲起西施，更不用说她和范蠡有什么关系。是司马迁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传说，还是司马迁特意不写进去，今天就无从知道了。因此一代佳人西施的结局众说纷纭。是被沉于水，或者跟随范蠡归隐于五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结局？这个谜尚待进一步探索。

屈原自沉汨罗江之谜

2200 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怀着满腔忧愤，毅然投入波涛翻卷的汨罗江中，结束了他那坚贞不屈、才华横溢的一生。千百年来，他的死一直为人民所惋惜、哀悼。那么，屈原为何投江自沉呢？

清朝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著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楚）亡可待也”。据此，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眼见国亡而殉国难之举。持此说者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在《屈原研究》中说：“郢都陷落时，屈原逃奔江南，江南也不能安住，所以接连作了《涉江》、《怀沙》、《惜往日》诸篇，便终于自沉了。”在《屈原考》中进一步发挥说：“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认定：“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有人对上述说法持有异议，认为据《史记·屈原列传》和《哀郢》中的有关史料来看，屈原写《哀郢》约为顷襄王十四年（前 285 年），屈原沉江约在顷襄王十六年或十七年，即前 283 年或前 282 年，而《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中载明，白起于顷襄王十九年

(前 280 年) 开始攻楚, 第三年 (前 278 年) 攻破郢都。因此, 屈原写《哀郢》和自尽在先, 白起破郢在后, 从时间上推算, 屈原根本不可能是殉国难。从《哀郢》的内容上分析, 诗人在文中一再述说自己心头的悲哀, 哀自己无罪遭贬逐而“东迁”, 哀“故都之日远”、“哀见君而不再得”、哀人们沉湎于一片“平乐”而看不到大祸将临。明朝张京元在《删注楚辞》中云,《哀郢》是“原既去国, 还顾郢都, 念其将亡而哀之”。显然, 屈原写此诗与郢都陷落并无关系。诗人投江前作的绝命诗《怀沙》中也并未流露出痛惜国破家亡而决心殉国难的情志。而且, 如果屈原是殉国难, 史家势必书明, 以志褒彰, 但是, 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和唐朝沈亚之的《屈原外传》这些对屈原结局深表同情的史家所撰写的史籍中, 均不见有屈原是为国难而殉身的记载。那么, 他究竟何故自沉呢? 有人认为, 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 而当时的顷襄王已经忘却了疆土被蹂躏、父王被骗拘死于秦地的国耻父仇, 反认秦为友, 又“专淫逸侈靡”“驰骋乎云梦之中, 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 国内奸佞弄权、城池不修、百姓离心, 既无良臣, 又无守备, 楚国已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救民之志的诗人却受谗言而身遭黜逐, 报国无门,《哀郢》中他就悲愤地诉说: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 何日夜而忘之”,《怀沙》中他更尽情倾诉冤屈: “郁结纆轸兮, 离愍而长鞠。抚情效志兮, 冤屈而自抑”, 表白自己遭受长期放逐、满怀的忠贞无处申诉, 只有“伤怀永哀”的郁苦心情。《屈原外传》说: 屈原“晚益愤懣, 披蓁茹草, 混同鸟兽, 不交世务……王逼逐之, 于五月五日趋清冷之水”。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受到楚王的“逼逐”, 被重新启用的希望已经绝灭, 身心交瘁的诗人不忍心眼见祖国和人民蒙难, 也不愿在衰老不堪的晚年再忍受“逼逐”, 于是, 他在《怀沙》中斥责了楚王的昏愤, 在《惜往日》中写下了“宁溘死以流亡兮, 恐祸殃之有再, 不毕辞以赴渊兮, 痛痛君之不识”, 决心以死谏来震醒昏愤无能的庸君, 这才是屈原之所以忍受了再次长时间放逐而依然等待, 最后绝望而自

貂蝉之谜

觉的根本原因。

还有人认为，屈原屡次遭受佞臣的诬陷、排挤，又被阻断君门，投诉无路，蒙受冤屈，对这类祸国殃民的贼子，他切齿痛恨，怒斥此辈是“谗人”、“党人”、“邑犬”，《怀沙》中他就痛斥他们“变白以为黑”，“倒下以为上”，“鸡鹜翔舞”、“邑犬群吠”，这自然愈益遭致群奸的诬陷，诗人表示“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宁愿一死，也不向群小屈服。西汉桓宽《盐铁论·颂贤》中就指出：“夫屈原之沉渊，遭子柳之譖也。”所以，屈原是由于受奸佞相譖而逼得投江自尽的。

貂蝉之谜

王昭君、西施、貂蝉和杨贵妃“四大美人”中，要数貂蝉最迷人，因为她竟使英雄豪杰为之神魂颠倒。也数她最不可捉摸，因为人们至今还不清楚她的真面目。比较接近的说法，似有以下四种。

一说她是王允的歌妓。王允，东汉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字子师。初为郡吏，灵帝时，任豫州刺史，献帝即位任司徒。王允为了剪除董卓，想用美人计来达到目的。可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因此常常闷闷不乐。歌妓貂蝉为了使王允开心，每每使劲歌舞，但也无济于事。后来，王允对她说明了其中的情由，并要求她助一臂之力。貂蝉知情后，表示愿为王允效劳。她按王允连环计的要求，以她的姿色挑起了吕布和董卓的矛盾，最后，借吕布之手杀了董卓，为王允排除异己力量立下了汗马功劳。事成后，貂蝉在花园里为王允祈祷拜月，时值有一片彩云遮月。王允见之曰：“貂蝉美色使月亮躲到云后面去了。”据此，后人都传说貂蝉有“闭月”之容。

一说她是董卓的婢女。董卓，东汉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字仲颖。本为凉州豪强，灵帝时，任并州牧。昭宁元年（198年）率

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曹操与袁绍等起兵反对，他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为太师，后来为吕布所杀。据《后汉书·吕布传》载：“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常小失意，卓拔戟掷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侍婢情通，益不自安”。这段记载，就是平常传说的凤仪亭掷戟之事。可见，貂蝉是与吕布情通的董卓的婢女。

一说她是吕布之妻。吕布，东汉末五原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南）人，字奉先。初从并州刺史丁原，继杀丁原归董卓，又与王允合谋杀董卓，后任奋威将军，封温侯。最后为曹操所擒杀。吕布之妻，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载：“布见备甚敬之，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从这段记载来看，吕布的妻子是随军生活的。上书又载：“建安（汉献帝年号）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阁外，同声大呼，布不知反将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又载：“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骑断太祖（曹操）粮道，布妻谓曰：‘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在蹉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得宠私藏妾身耳，今不须顾妾也’”。布得妻言，愁闷不能自决”。这里记述的这位科头袒衣的妇人，应是吕布之妻貂蝉。

还有一说她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据《三国志·关云长传》注引《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布于下邳，云长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云长心不自安”。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秦宜禄的妻子是很有姿色的。另外，因为关羽原先想娶其为妻的，可是因为曹操“自留之”，因此引起关羽的妒恨。关羽毕竟是个烈性子，他火冒三丈，一刀便把秦宜禄的妻子给杀了。元人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就是以此事附会而成。因此，秦宜禄之妻也成了传说中的貂蝉。

骆宾王的归宿之谜

四大美人都因其有姿色而得宠于一时,但是她们都处在统治者争斗的锋芒上,因此都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们的死,都不是寿终正寝。貂蝉也应了自古红颜多薄命之说。

貂蝉的结局如何呢?貂蝉作为王允为剪除董卓的连环计中的美人,她正好是政治权势斗争中的一个风云人物,处于这样地位的人,用“危在旦夕”这个词形容其处境是不会过分的。如果说貂蝉是董卓的婢女,且与吕布情通已被董卓发现,那么她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董卓既能对吕布掷戟,当然也会对侍婢飞刀。因此,貂蝉的性命迟早是难保的。若以吕布之妻作貂蝉推之,她过的是危险的军营生活,最后也是香消玉殒。若以貂蝉是秦宜禄之妻推之,她引起了曹操和关羽不和,被关羽一刀结果了性命,成了屈死的刀下之鬼。

骆宾王的归宿之谜

初唐诗坛,承六朝余绪,以绮章绘句为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首先奋起扫荡这股形式主义诗风的当推陈子昂和初唐四杰。他们实在是后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的先导。所谓“初唐四杰”是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而骆宾王则是“四杰”中年辈最长、阅历最多、遗闻佚事流传最广的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骆宾王,浙江义乌人,7岁能诗,有神童之名。但这位神童的命运并不佳,一生书剑飘零,沉沦下僚,为人作幕,只当过主簿一类小官。他“十年不调为贫贱,百日屡迁随倚伏”,曾宦游西北西南,自诩“剑动三军气,衣飘万里尘”。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年),擢迁侍御史,这是他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官职,但为时不长,终因好向武则天上书言事,而被诬下狱。在狱中,他忧心如焚,愤而作《萤火赋》、《在狱咏蝉》以明志。获释后任临海(今属浙江省)丞,故后人

亦称之为骆临海。684年，骆宾王在扬州遇“李唐旧臣”徐敬业。其时唐高宗已死，政权全归武则天。这位女皇帝大肆斥逐李唐旧臣，起用武氏集团中人。两个统治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徐敬业是唐朝开国功臣徐懋（后赐姓李，称李懋）之孙，他联络朝臣，在扬州举兵，以恢复大唐王朝为号召，应者云集。骆宾王一生仕途失意，郁郁不得志，又蒙谗下狱，自然对武氏政权不满，于是毅然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他曾以慷慨淋漓的笔致，为徐敬业草写《讨武氏檄》。檄文历数武则天的秽行劣迹，阴谋祸心，申明大义，备述起兵目的，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作结，写得气势不凡，极富煽动性。相传武则天看到此处时，赫然变色，连忙打听檄文是谁所作，左右答说是骆宾王。她听了后，十分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是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但是纵然骆宾王才高八斗，无奈徐敬业武略不济，起义仅经历了三个月就失败了。嗣后，关于骆宾王的下落就成了一桩疑案，传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上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骆宾王被杀。《旧唐书》本传载：“敬业败，（宾王）伏诛。”《资治通鉴》卷二〇三载：“乙丑，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新唐书·李懋传》载：“徐敬业与敬猷、宾王率轻骑遁江都……其将王那相斩之，凡二十首，传东都，皆灭其家。”此外，与骆宾王是世交的宋之问写过一篇《祭杜审言学士文》，文中说：“骆（宾王）则不能保族而全躯。”从后两条资料来看，似乎在敬业兵败后，非但骆宾王本人身遭杀戮，而且累及全家和族人。

第二种说法，骆宾王投水自杀。唐人张鷟《朝野僉载》云：“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

第三种说法，骆宾王逃遁隐居，或云出家为僧。《新唐书》本传载：“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这个记载与《李懋传》所述互相

骆宾王的归宿之谜

抵牾。约当徐敬业兵败 20 年之后,唐中宗曾命郝云卿搜辑骆宾王的遗文,郝云卿在《骆宾王文集序》中说:“文明(唐睿宗年号,684 年)中,与嗣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这可能是《新唐书》本传所自。说骆宾王兵败后出家为僧的则是唐人孟棨,他在《本事诗》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诗人宋之问一次在杭州灵隐寺玩月赋诗,他先吟了两句:“鹫岭郁嵒峩,龙宫锁寂寥。”苦无佳句可续。正沉吟间,来一老僧,问其所以,宋之问以实相告。老僧听后即说:“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并接连吟了十句诗,完了篇,句句精警。宋之问大惊,叹服不已。次日拜访,说再也未见此人。别人告诉他说,此僧就是骆宾王。当徐敬业兵败之后,徐、骆两人逃遁,官军追捕不及。因惧失落要犯有罪,遂杀了两个与徐敬业、骆宾王面貌相似者的头,用匣盛起,报送京师。以后即使官军知晓了这两人的下落,也因怕犯欺君大罪,而不敢捕杀。后来则骆宾王来此寺中为僧。还有一种说法是,骆宾王一直隐居于现在江苏南通一带。明人朱国祯的《涌幢小品》载,在明正德年间,江苏南通城东发现了骆宾王的墓,墓中人衣冠如新。这墓后来迁往狼山,遗迹至今犹存。到清代雍正年间有一个叫李于涛的,自称是李愬的 37 世孙,他说他们的家谱中记载,敬业兵败后,骆宾王与敬业之子同匿邗之白水荡,以后骆宾王客死崇川。骆墓即是敬业之子所修(见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附录》)。

以上三种说法中,因第二种说法类似谰语,也别无旁证资料,所以不大人相信。引起争论的是第一、第三两种说法,前者主死,后者主生,生死存亡,势不两立,历来争论不休。

主骆宾王兵败被杀的论者认为,从正史看,除了《新唐书》本传说骆宾王兵败后“不知所之”外,其余均说骆宾王兵败被杀。最有力的证据是宋之问《祭杜审言学士文》中的那句话。骆宾王与宋之问的父亲是同僚,再者骆宾王诗集中还有三首赠宋之问的诗:《在江南赠宋五之问》、《在兖州饯宋五之问》、《送宋五之问》,关系密切

如此，所以宋之问文中说骆宾王“不能保族而全躯”是完全可信的。同时，持这一观点的论者还指斥孟檠《本事诗》所载宋之问在杭州灵隐寺遇骆宾王月夜联句事为虚妄，荒诞不经，是大有诗意的虚构之说。因为如上所言，既然宋之问与骆宾王如此熟识，则两人相逢时，岂有对面不相识之理？

但是，主骆宾王兵败后仍存活世间的论者认为，孟檠的《本事诗》所载，固有阙漏，然而其中关于用假首级报送京师的说法，也未尝不能成立。王那相为了邀功请赏，干出以假乱真的勾当，也属情理中事。因此，宋之问《祭杜审言学士文》中的“不能保族而全躯”那句话，安知不是他在看了假骆宾王的首级之后才写下的呢？退一步说，宋之问即使在当时看出了首级是假的，恐怕他也未必肯说真话。以理揆之，其时骆宾王家族遭害，或则有之；自身伏诛，或则非确。这样，用宋之问《祭杜审言学士文》中的一句话作为骆宾王兵败被杀的力证，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再说，郗云卿是奉诏搜辑骆宾王遗文的官员，他应当对骆宾王的下落作过一番详细周密的调查，那么，为什么在《骆宾王文集序》中，他要一口否定骆宾王被杀的说法，却说骆宾王“因致逃遁”呢？那是载入史册的大事啊。可见郗云卿对王那相报送到京师的两颗头颅是否真的属于徐敬业与骆宾王的，是持怀疑态度的。还有的论者认为，骆宾王的《夕次旧吴》、《过故宋》、《咏怀》三首诗，全是黍离之感，故国之思，如“西北云逾滞，东南气转微”、“惟当过周客，独愧吴台空”等，恐非一般的抒发怀古之幽情，无病呻吟之作，当是兵败后，骆宾王故地重游时发出的感喟。

看来，在有新的、确凿的材料发现之前，这桩公案还得一直争论下去。

李白死亡之谜

唐代宗宝应元年(662年),李白贫病交困,到安徽南部的当涂,投靠在那儿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这颗诗坛上的一代巨星陨落了,享年仅六十有二。关于李白之死,后人有多种说法,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其一认为是死于“腐胁疾”,即病卒说;其二认为是死于“揽月落水”,即溺水说。

说李白是病卒的,最早见于李阳冰为李白诗结集写的《草堂集序》,以后的碑碣著述多持此说。范传正写的《墓铭》说“至今尚疑其醉在壬日,宁审乎寿终百年”。李白嗜酒成性,特别到了晚年,“狂饮”更是他生活中的一大特征,所以醉而致疾致命的可能极大。晚唐诗人皮日休作《李翰林诗》(《七爱诗》之一)也说“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这就明确无误地说李白因醉得疾,他的灵魂是带着醉意升天的。郭沫若以他谙于医道的口吻说,李白⁶¹岁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曾决计从军,行至金陵发病,半途而返。此为“腐胁疾”之初期,估计当为脓胸症。又说,他⁶²岁在当涂养病。脓胸症慢性化,向胸壁穿孔,成为“腐胁疾”。十一月卒于当涂。

说李白是溺死的,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所述:“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宋代洪迈《容斋五笔》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在前面冠以“世俗言”三字。所谓“世俗言”者,就是说它是民间的一种出于美好的想象而产生的传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富有浪漫气息的民间传说的出现,并不是在王定保或洪迈的记述之时,而是在李白去世不久的时候就已广为流传了。到了元代,王伯成编《李太白流夜郎》杂剧,其中有李白入水中,为龙王所迎去之说。虽然艺术不等于现实,但对李白的死因,更釉上了一层夺目的神奇色彩。

那么作为正史的《旧唐书》和《新唐书》是怎么说的呢？它们在提到李白之死时，都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并没有明确肯定他的死因。既没有说是“腐胁疾”致死，也没有说“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旧唐书》上说他是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的，这也许正可以用来证明“醉死此江边”（唐代项斯《经李白墓》句）的传说是有几分可靠的。所以清代王琦对此有段评论：“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耶？抑小说多妄而诗人好奇，姑假以发新意耶？”这就是说“病”和“溺”两者或许都有可能。

李白一生，流离坎坷，经历奇瑰。爱酒、爱月、爱狂、爱傲视权贵。他才气横溢，却命运多舛！到了晚年穷极悲苦又不甘寂寞，时时喟叹自己愤懑的一生。虽胸怀大鹏之志，而命运之神为其安排的却是“中天摧兮力不济”的不堪，“白发三千丈”之忧烦，没奈何，竟日呼酒买醉，可惜“举杯消愁愁更愁”。心，越来越恼，酒，越喝越多。大量的酒精已经侵蚀、损害着他的肌体，而他还兀自举杯浇愁，直至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药。以此推论，他的族叔李阳冰的话应该是可信的。李白在去世前曾赋《临终歌》一曲，浩叹一生壮志未酬的悲怆。如是悲歌一曲，岂临终遗言乎？

所以，刘大杰以文学史家无可置疑的笔触写道：“（李白）六十二岁，以腐胁疾死于当涂……说他入水捉月而死，那是不可信的。”所谓李白之死的“谜”，似乎并不存在。

然而，有人认为稗官野史之言，也并不是纯属毫无价值的无稽之谈。李白一生浪迹江湖，热爱自然。他的诗，有许多是写月的。诗人把美丽的月亮看成是高尚皎洁的象征。他的诗，又有许多是写酒的。诗人把美酒看成是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举杯望明月，俯首看现实，创痛巨深，贫病交加，一切美好向往都一一幻灭了。一个傲岸不羁，竟欲驰骋于天地之外的人，竟落到如此潦倒的田地，那是不堪忍受的。严酷的现实，逼得他几乎要发狂了。诗人在《笑歌行》和《悲歌行》里，十分清楚地描绘出了自

杜甫死因之谜

己哭哭笑笑的狂态。一个处于半疯狂状态的人，“醉而落水”反倒更能博得人们的同情。

安旗对李白的死，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摹拟式的描绘：“夜，已深了；人，已醉了；歌，已终了；泪，已尽了；李白的生命也到了最后一刻了。此时，夜月中天，水波不兴，月亮映在江中，好像一轮白玉盘，一阵微风过处，又散作万点银光。多么美丽！多么光明！多么诱人！‘我追求了一生光明，原来在这里！’醉倚在船舷上的李白，伸出了他的双手，向着一片银色的光辉扑去……只听得船夫一声惊呼，诗人已没入万顷波涛。船夫恍惚看见，刚才还邀他喝过三杯的李先生，跨在一条鲸鱼背上随波逐流去了，去远了，永远地去了。”显然，作为当代学者、富有诗人气质的安旗，他是宁肯相信这位“天上谪仙人”是跨鲸背而仙游羽化的。

杜甫死因之谜

唐代大诗人杜甫究竟死于何因，研究者们意见很不一致。自唐中叶以来，关于杜甫死因的说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啖牛肉白酒而死”；一是“溺死”；一是“病死”。

据《旧唐书·杜甫传》载：“永泰二年（当作大历五年，即770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耒阳，时年五十九。”《新唐书》本传的记载也大体相同：“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看来，杜甫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这种说法是有着传统的权威性的。但是，牛肉白酒究竟是怎样致死的呢？这个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不同解释。早在两唐书之前的唐人邓处诲在《明皇杂录》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杜甫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令尝馈牛炙白酒。后漂寓湘潭间，羁旅憔悴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

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甫饮过多，一夕而卒。”看得出，两唐书均采此说，只不过没有清楚述明牛肉白酒是怎样致之于死地的罢了。而邓处诲则说得明白 杜甫是吃得过多，胀饫而死的。后来研究杜甫的人，有同意邓说的，有反对邓说的。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于杜甫的死因作过专门的论述，他认为杜甫的确是死于牛肉白酒，不过不是“饫死”，而是由于中毒。郭沫若的分析看起来是比较科学的 杜甫阻水耒阳的时候，正值暑天，晁令送来牛肉白酒，杜甫一次没有吃完，剩下的由于冷藏得不好而腐败了。腐肉是有毒的，特别是在腐败后 24 至 28 小时毒性最烈，能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致死。再加上杜甫年老病多，又有白酒加速毒素在血液中循环，因此吃腐肉白酒中毒而亡是很有可能。

至于溺死一说，最早见于唐人李观的《杜诗补遗》。这部书里有这样一段话：“甫往耒阳，晁令不礼。一日，过江上州中，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为惊湍漂没，其尸不知落于何处。洎玄宗还南内，思子美，诏天下求之。晁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牛肉白酒胀饫而死，葬于此矣！’”对于这种说法，众多的人认为纯属无稽之谈，后世有王得臣、黄鹤、邓昂、钱谦益、仇兆鳌诸家纷纷为之辨诬。的确，人们的指责是有道理的，因为玄宗死于宝应元年（762 年），他怎能在大历五年（770 年）思念子美呢？虽然如此，也有人想象出杜甫是与屈原一样怀沙自沉了。因为这样正好“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了。不过，这一想象没有丝毫根据，也就不值得深究。

较多的研究者还是坚持杜甫病死湘江舟中的观点，他们对于有关杜甫死因的种种不同记载和传说，都作了一番详细的颇为合乎情理的解释。

大历五年（770 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夜间放火作乱，杀死湖南观察使兼潭州刺史崔罐。这时，在潭州贫病交加的杜甫仓皇携家眷出逃，准备溯郴水往依在郴州任上的舅氏崔伟。不意行至

杜甫死因之谜

耒阳县境的方田驿时,突然遇上江水大涨,不能行舟,只得泊于方田。杜甫在这里五六天得不到食物,耒阳县令聂氏闻讯,立即着人送去丰厚食物,并且来书相邀。杜甫作诗感谢,诗题云:“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后因水势不退,诗不能致聂令,只好回头下衡州去了。大水退后,聂令派人在江上寻找杜甫,不见踪迹,即断定杜甫葬身大水,遂建一衣冠墓于耒阳县北,以纪念这位闻名于世的诗人。后来因为有了《阴皇杂录》、《杜甫补遗》、新旧《唐书》的记载,所以产生了杜甫啖牛肉白酒而死、溺死等传说。但是,他们的记载毕竟没有杜甫本人诗句和杜氏子孙处理先人丧事经过的事实可信。

杜甫回衡州后,小作停留,然后沿江而下。过洞庭湖时,有《过洞庭湖》诗云:“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诗中“南风正”、“回樯”等字眼,准确证明了杜甫从上游而下的情景。杜甫一秋一冬居于舱内,风痹病日益加剧,最后卧病舟中。偏偏这时天不怜人,甫幼女夭亡,于是伟大的诗人便溘然长逝了。如果说杜甫在耒阳殁于牛肉白酒,那么杜诗所记述的这些事实又该作何解释呢?杜甫死后,家人无力归葬,遂暂寝岳阳。43年之后,杜甫孙杜嗣业始从岳阳启其灵柩归到河南偃师,葬于首阳山下。杜嗣业扶柩道出荆州时,拜请元稹为他的祖父作墓志铭,铭文中有“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句,这也可以作为杜甫病死湘江舟中的证据。

杜甫是病死舟中,还是殁于牛肉白酒或者葬身郴水,尚不能最后定论,有待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

注 据《文汇报》1990年6月15日报道:天津市劝业场卫生院主治医生仇化国、杨一工,结合杜甫的作品,从医学角度系统地分析杜甫的生活经历及晚年的健康状况,认为杜甫真正死因是糖尿病。报道说,有关专家认为,仇、杨提出的这个与许多专家、学者不

同的结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结果。

“苏门四学士”之谜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与苏轼、苏辙兄弟交友或接受他们指导的人很多，黄庭坚、秦少游、张耒、晁补之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前，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答李昭书》）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不过“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后来还有一个陈师道，不过虽在苏门，而位不列入四学士之中。

这几位作家虽然以苏东坡为核心，但他们的创作却并不互相仿效，基本上是各走各的路。黄庭坚以学问为诗，议论为诗，善于点化前人诗句，颇有形式主义之嫌，成为江西诗派的宗主，与苏轼并称苏黄。秦少游主要成就在词，是柳永之后最重要的婉约词作家之一，他的诗与词一样，风格柔婉，修辞致密，以纤丽见长。张耒诗的成就较高，不做作妆饰，风格平易舒坦，内容也最贴近现实，但有时却流于粗率轻滑。晁补之的成就，在四学士中排名最末。不过，他和同时代的徐积、郭祥正也许是欧、苏之后向李白学习的仅有的几位北宋诗人。

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也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但他们同苏轼一道，有力地推动了北宋文学艺术的发展。

李师师归宿之谜

李师师是北宋末年誉满京华的名妓，她的事迹虽然不见于经传，但在平话野史里，却也够热闹的了。加上《水浒传》的作者说她和水泊梁山的招安有密切关系，于是，成了徽宗宣和年间的一个风流人物。然而，李师师的下落如何，有谁知道呢？

关于李师师的史事，宋人笔记多有记载，张端义《贵耳录》、张邦基《墨庄漫录》还提到她附和风雅，曾和大词家周邦彦、晁冲之有来往，两人并有诗词相赠。《青泥莲花记》称：“东京角妓李师师，住金线巷，色艺冠绝。徽宗自政和后，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往来师师家，甚被宠昵。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为东京城里这个风流天子的一大件丑事，李师师权势倾中外，路人皆知，所以《瓮天胜语》有“山东巨寇宋江，将图归顺，潜入东京访李师师”等语。后来，宋徽宗赵佶干脆拉下遮盖的客商身份，公然把她召进皇宫大内，册封为瀛国夫人或李明妃，可是，好景不长，未几，赵佶因为金兵时而威逼，禅位给太子钦宗，自己躲进太乙宫，号称为道君教主，李师师失去靠山，“废为庶人”，并被赶出宫门，地位一落千丈。“靖康之年，尚书省直取金银。奉圣旨：赵元奴、李师师，曾经抵应倡优之家，逐入籍没，如违并行军法。”（《三朝北盟会编》）也有说是她自知富有钱财，难躲抄家，乘着金兵扰乱河北，“乃集前后所赐之钱，呈牒开封尹，愿入官，助河北饷。”（《李师师外传》）无论是大抄家或自动缴纳，经过这次大变动，李师师是一贫如洗了。不久，金兵第二次围攻汴京，并俘虏徽、钦二帝和赵氏宗室多人北返，对李师师的下落，诸家记载说法大相径庭。

南宋时佚名的《李师师外传》是叙述最为详尽的一篇，邓广铭教授的《东京梦华录注》称此篇“一望而知为明季人妄作”，传中称金人破汴，主帅挾懒索师师，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之，”乃索

之多日不得，张邦昌等为踪迹之，以献金营。师师骂道：“吾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乃脱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作者为此说：“然观其晚节，烈烈有侠士风；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清人黄廷坚也赞誉李师师为国殉节事，“师师不第色艺冠当时，观其后慷慨捐生一节，饶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贱，不得与坠崖断臂之俦，争辉彤史也”。（《琳琅秘室丛书》）但后人对此多持异议，鲁迅把这篇外传，辑录在《唐宋传奇集》，称之为传奇。剧作家宋之的说：“外传的作者所写的是传奇，恐怕是感慨多于事实，作者大概是想借李师师的忠义以讽世的”（《皇帝与妓女》）。这种说法，近世蔡东藩的《宋史通俗演义》、李逸侯的《宋宫十八朝演义》均采纳之，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早在南宋，对李师师的下落何处，自有另一种文字，《青泥莲花记》说，“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墨庄漫录》亦称：“靖康间，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毯吹笛袁糠、武震辈，例藉其家，李生流落来浙，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这里李生就是指李师师，和《青泥莲花记》相异处，即流落地不一。前者指在湖南，此处指是浙江。清初陈忱《水浒后传》或宗其说，称李师师在南宋初期，流落临安（杭州），寓居西湖葛岭，仍操旧业为生，“唱柳耆卿‘杨柳外晓风残月’”。宋人平话《宣和遗事》亦同样有记述，惟添加了“后流落湖湘间，为商人所得”。因而宋人刘子晕《汴京记事诗》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这个说法，凄凄切切，充满惆怅之感，颇有“门前冷落车马稀”和“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苦味，很可能是时人的借托。

李师师在汴京失陷后，还有人说她也被俘虏北上，逼嫁给一个身有病残的老军为妻，耻辱地了结一生。但有人说，当时金帅挞懒是按张邦昌等降臣提供的名单索取皇宫妇女的，李师师早已当

上了女道士，自不在此例，所谓是“师师必先已出东京，不在求索之列，否则决不能脱身”。总之，李师师是与亡国君主有关系的女子，其情事必也涉及国事，她的故事带有传奇色彩，所以关于她的传闻轶事也就多了。

李清照晚年有没有改嫁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就像女词人自己所说的一样，李清照晚年流荡无归，屡遭打击，谢世以后，还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晚年有没有改嫁张汝舟。

这个谜起源于宋代，在宋代人赵彦卫的著作《云麓漫钞》中录有李清照的一封信——《上内翰綦公（崇礼）启》（下简称《谢启》），这封《谢启》记录了李清照晚年改嫁张汝舟的经过。按照《谢启》的说法，清照是在重病期间被骗结婚的，婚后，张汝舟暴露出市侩面目，她不堪虐待，宁愿坐牢也要揭发张汝舟的罪行。按照宋代法律书籍《刑统》的规定，妻告夫，虽属实，仍须徒刑二年。当时有个叫綦崇礼的官吏帮了李清照的忙，使李清照免受牢狱之苦，于是，清照写信对綦崇礼表示“感戴鸿恩”。关于清照改嫁一事，除了《谢启》比较详细记载以外，宋代历史性的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简称《要录》）及不少其他宋代学部著作均有记载。

但是在明代有一位叫徐渤的学者却提出李清照改嫁之说不可信，他的观点主要是说清照年老和官宦出身不可能改嫁。到了清代，许多学者都为清照改嫁“辨诬”。在此以后，也有不少人摆出证据来证明李清照确实改嫁过。争论的双方各执其词，莫衷一是。

清代人卢见曾从清照对丈夫的眷恋和对金石卷轴爱护的角度否定清照改嫁。继卢见曾之后，俞正燮又较全面，较有代表性地论述了清照改嫁不可信，其主要是否定了宋代著作记载改嫁一事的可靠性。首先，对于《谢启》，他认为，如果按照《谢启》的说法，李清

照改嫁张汝舟，不久与其反目，清照便告发汝舟行贿得官的罪行，最后涉讼而与之离异，那么，《谢后》为什么称此事为“无根之谤”？另外，《谢后》中有“持官书文字来辄信”的话，俞正燮认为，男女婚嫁，世间常事，朝廷不须过问，官吏岂有文书。再加上《谢后》文笔劣下，前后矛盾，中间杂有佳语，定是篡改本。针对《谢后》提供的内容，俞正燮推断，只有把《谢后》看做是清照感谢綦崇礼解救“颁金通敌”（李清照另一冤案）一案，才说得通，至于改嫁之类的内容是别人硬加上去的。其次，对于《要录》，俞正燮认为，《要录》的作者李心传与李清照远隔万里，他的记录很可能是误听误载。俞正燮还引了别人的材料说，《要录》中所载辛弃疾为韩侂胄作寿词，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要录》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到了近代，也有不少人提出李清照改嫁一事不存在。况周颐考证了张汝舟、李清照在赵明诚死后的行踪，证明两人踪迹判然，不可能有改嫁之事。不久以前，黄墨谷几次著文为清照“辨诬”，除了附和俞正燮等人的观点外，也摆出了不少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于《谢后》，他认为，从李清照的自传性文章《后序》中可以看出，“颁金通敌”一案发生在建炎三年，但是，延续到绍兴元年仍未解决。何况，《谢后》是事后的感谢信，当然有可能作于绍兴三年以后。这样，《谢后》中提到的背景和綦崇礼的官衔等与事实就不矛盾。另外，綦崇礼与赵明诚是亲戚，清照如果真有改嫁之事，而且又涉讼，她会腆颜去求他帮助吗？所以说《谢后》是为了感谢解救“颁金通敌”冤案才作的。第二，黄墨谷对其他宋代著作记载清照改嫁情况提出异议。照他看来，宋代这么多人记载清照改嫁一事，可是，赵明诚的表甥，又是綦崇礼的儿女亲家谢假在他的著作《四六谈麈》中不但不提清照改嫁一事，还称清照为赵令人李，并且引了清照对明诚表示坚贞的祭文，“坚城自坠，怜杞妇悲深”。第三，黄墨谷对李清照自传性文章《后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按照历法和宋代著作《容斋四笔》、《端桂堂暇录》

的记载,《后序》应当作于绍兴五年,这时张汝舟已经除名三年了。换句话说,即使清照有改嫁一事,《后序》也应该提到。除了上面这些说法外,黄墨谷还提出,如果摒弃清照《后序》所反映的内容,摒弃清照诗、词、文章和她的生平事迹来谈论清照改嫁一事是不全面的。李清照曾经讲过,“虽处忧患而志不屈”等述志的话,在明诚死后,她又为颁行《金石录》耿耿于怀,在 68 岁时还上表于朝。这些情况,也是否定清照改嫁的极好佐证。

与俞正燮、黄墨谷等人观点相反,另一些学者认为,在记载清照改嫁的材料中,“就时间而论,胡仔、王灼、晁公武、洪适都是清照同时代人。就地域论,胡仔、洪适之书,一成于湖州、一成于越州,并不是去天万里,而胡仔、王灼成书时清照仍然健在。要说在清照生前他们就敢明目张胆地造她的谣言,伪造《谢后》这是很不近情理的。南渡后明诚的哥哥存诚、思诚都曾做到不小的官,赵家那时并不是没有权势”。(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针对《谢后》的真伪问题,黄盛璋提出,清照“颁金通敌”冤案发生在建炎三年,从《谢后》中提到的“克复”、“底平”和称綦崇礼为“内翰承旨”等情况看,《谢后》当作于绍兴三年以后,因为建炎三年,朝廷正在仓皇避乱,不可能有“克复”、“底平”等事。再说,当时綦崇礼只担任中书舍人的官职,此职不能冠以“内翰承旨”的头衔。由此可见,发生在建炎之年的“颁金冤案”与《谢后》风马牛不相及。

对有人提出张李二人在明诚卒后到汝舟编管前踪迹判然时,黄盛璋提出,从宣城、广德经吴兴有一条“独松岭道”,故不能否定张汝舟未去过杭州。最后,黄盛璋从宋代社会习俗中分析改嫁一事,他认为,妇女守节直到明、清两代才趋严格。《宋史·礼乐志》中记有治平、熙宁年间诏许宗女、宗妇再嫁之事。可见,改嫁在宋代是极为寻常的事,当然宋人对清照改嫁一事不会大惊小怪。

陆游与唐婉爱情悲剧之谜

陆游 (1125 - 1210) 字务观,越州山阴 (今浙江绍兴) 人。南宋爱国诗人。因为坚持抗金的主张,一生屡遭统治集团内部投降派的打击,政治上很不得志。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却得到后人的高度赞誉。其早年的一首《钗头凤》词以及与这首词相关的凄婉的爱情故事也被后人广泛传诵。

绍兴十四年 (1144 年),陆游 20 岁左右,与舅舅的女儿唐婉结了婚。婚后生活美满,但不知为了什么,陆游的母亲竟会对自己的内侄女非常不满起来,最后甚至蛮不讲理地硬逼着陆游和她离婚,另娶了王氏,唐婉也迫于家长之命改嫁给同郡的赵士诚了。

十年以后的春天,他出游于故乡禹迹寺南的沈家花园,恰好唐婉和后夫也来这里游玩,陆游看到了唐婉,想起当年情景,以及别后十年来消息的隔绝和人事的变迁,不堪回首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提笔在一堵粉墙上题了一首悲痛绝伦的词: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这就是为后人所传诵的《钗头凤》。唐婉看到了这首词,自然更触动了她的“一怀愁绪”,回去以后,也和了一首词,不久便抑郁而终。这一幕婚姻悲剧,在诗人心底成为不可平复的创痛。后来虽然时过境迁,已为陈迹,但他总是缠绵悲戚,不能把它忘掉。直到他的晚年,每当年底,总还要登到禹迹寺的楼上眺望,怀念自己跟唐婉的爱情,并且写了不少的诗来抒发自己心头的隐痛,如: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柳絮) 此身行作稽山土,

陆游与唐婉爱情悲剧之谜

犹吊遗踪一泫然！

这是他 75 岁时的作品。距唐婉逝世已有四十年光景，陆游想念前情，不禁泫然泪下。

这是一个悲剧。陆游与唐婉，志趣相投，琴瑟相和，陆母理应高兴，为何反而逼着儿子离婚？这违反常情之举引起了许多猜疑。最早记载陆、唐悲剧的一则史料是《耆旧续闻》，但没有明确说明唐婉为什么不得婆婆的欢心。此后的刘克庄说是陆游父母怕陆游沉溺于儿女情中，荒废学业，于是逼着儿子离婚（《后村诗话》）。陆母不是不喜欢唐婉，而是“出于对儿子的期待，不允许他在功业未就之际，便沉溺于温馨的爱情眷恋之中，这一动机交织着为家国着想，又有为陆游仕途筹划的思想因素在内。”

这种说法，属于推论，不是考证，于是有人提出疑问 陆母要真有那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又何必要让儿子年纪轻轻，又刚落第时就急急忙忙地娶媳妇？此其一。其次，陆游科场不利，与唐婉的婚姻并无关系。陆游第一次应考失败，时年 18 岁，尚未与唐婉结婚。第二次考试本是名列第一，只因触怒权贵秦桧而被贬黜落榜。这年陆游 29 岁，唐婉早被离弃，他与续娶王氏所生之长子也已有五岁。陆游的科场失败，与唐婉毫不相干。因此，说陆游的父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陆游的前途和事业而逼子离婚，难以使人信服。

有人据陆游《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推测说，是因为唐婉婚后不育，老夫人“弄孙”心切，又听信了坏人的谗言，于是逼迫儿媳离婚。《钗头凤》中的“东风恶”，或者就是暗喻“姑恶”。

还有人说是，唐婉不通人情世故，礼节不周，惹得老夫人不满意。加之陆游考试落榜，陆父因主张抗战触怒秦桧被革职，抑郁而死，给陆母很大刺激。唐婉心胸豁达，对公公之死没有形诸颜色，使老太太大为不快。一次偶然机会，老夫人遇见王氏女郎，爱其端

庄婉顺，便强迫儿子，以“不孝翁姑”为由休弃唐婉而娶王氏。这种说法，也有疑窦。陆游娶王氏在二十三、四岁，陆父卒于稍后，唐婉早离陆家，不可能有遇公公死不形诸颜色而得罪婆母之事。

也有人说陆母因陆、唐生辰八字不合而迫其离婚。但实际上，宋朝，特别是南宋，结婚制度十分严格，订婚前，第一关便是男女双方都要经过“问卜”（或祷签），甚至连媒人上门说亲的日期都要经过“占卦”，得吉无克方可往下进行“回帖”、“定帖”、“相亲”、“插钗”、“双缄”、“下财礼”等等，若有一关卡住都不能成亲。至于正式结婚，更是繁文缛节。门第之家，尤为讲究。如果陆、唐两人的生辰八字不合，那就根本不可能结婚，更谈不上结婚以后又因此离婚。

各种说法，都不是无懈可击。于是有人从封建礼教上去找原因。认为陆唐婚姻悲剧，从根本上说，是受制于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和伦理观念。由于他们相爱逾恒，违反了封建社会夫妻之间“尊敬不重爱”的伦理观念，才引起了陆母对唐婉的不满。

更有人提出，故事是后人据《钗头凤》附会而出，不足深信；也有人说，《钗头凤》根本就不是写陆、唐爱情的。诸种说法，莫衷一是，皆有待于深入考证。

真有潘金莲其人吗

武松杀嫂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潘金莲是人们憎恶的淫妇形象。她私通西门庆，害死武大郎，最后被武松杀死。她虽然年轻貌美、口齿伶俐，但却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反面人物。历史上是否真有潘金莲其人，也是读者们所关心的。

《水浒传》、《金瓶梅》都写了潘金莲，但两书故事情节和潘金莲的性格却不一样。

佚失的元杂剧《双献头武松大报仇》，可能是最早写武松杀嫂

真有潘金莲其人吗

的文艺作品。创作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小说,把潘金莲写成既是私通奸夫害死本夫的淫妇,又是封建剥削和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造成武松杀嫂这一悲剧的主要根源是罪恶的封建社会制度。书中写潘金莲原是清河县大户人家的使女,因为不肯依从男主人的调戏而向女主人告状。男主人怀恨在心,把她嫁给一个面目丑陋、身材短矮、头脑可笑、比她大十几岁的武大郎。这种不相称的强迫结合,当然谈不上婚后的幸福。武大郎在清河县因一帮无赖子弟纠缠其妻,不得已只好迁到阳谷县居住。武大郎在阳谷县遇到打虎的兄弟武松,把武松领到家中。潘金莲第一次见到仪表堂堂的小叔子,便产生了爱慕之心。武松是一个正统思想很重的人,潘金莲没有达到目的。武松出差以后,她经不住老奸巨猾的王婆和有钱有势、奸诈刁钻的西门庆的引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武松出差回来,弄清了事实真相后,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为兄报仇。

写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把潘金莲写成了一个残忍、刻薄、嫉妒、说谎、毒辣的淫妇。她毒死武大郎嫁给西门庆,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经常毒打丫环秋菊,甚至连她亲生父母,也常遭到她责骂。西门庆第六房妻子李瓶儿生了儿子,潘金莲非常嫉妒,用猫吓死了小孩,从而使李瓶儿本人也因思念儿子而死去。武松没有杀死西门庆,而是误杀李外传被刺配孟州。西门庆纵欲身亡后,潘金莲在王婆家暂住待嫁,被遇赦而回的武松杀死。武大郎、潘金莲原住阳谷,以后迁居清河,西门庆是清河恶霸。《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比《水浒传》里的潘金莲更坏,虽然在西门府中,也曾遭到西门庆的打骂,她也是一个由丫头而变成为恶霸西门庆的帮凶的人物。

在评话、戏剧舞台上,潘金莲的形象与小说相比也有许多不同,明人沈璟《义侠记》传奇中的潘金莲,基本上是根据《水浒传》小说改编的。一方面写她初嫁武大郎时是无可奈何的,但对自己的

丈夫还有一定的感情。说什么：“夫虽丑，义非轻，一夜夫妻百日恩。”另一方面却写潘金莲作丫头时，即私通家主，被主母发现，强迫她嫁了武大。京剧《挑帘裁衣》、《武松杀嫂》等，也都是根据《水浒传》和《义侠记》而改编的。扬州评话、杭州评话、山东快书等曲艺都有潘金莲私通西门庆、武松杀嫂为兄报仇等曲目，主要情节也是根据《水浒传》小说改编的，但也敷衍了许多详细情节，对潘金莲增加了许多丑恶、毒辣性格的描写。例如武大捉奸，是潘金莲挑逗西门庆打伤武大，写潘金莲给武大灌了毒药以后，用被子把武大裹起来，自己上去坐着，不大一会儿就把武大憋死了。

五四运动以后，在反封建和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思潮影响下，欧阳予倩于1926年创作了五幕话剧《潘金莲》。剧中写潘金莲是一个敢于反抗张大户淫威的聪明伶俐的美丽丫环，被逼与武大郎成婚。她由于横遭摧残，才产生了变态心理，为西门庆引诱，才谋杀了丈夫。她是值得同情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道德观念迫害下的受害者。剧中认为武松是一个封建道德观念很重的人。剧中潘金莲有一句说白：“我想夫妻不相配，拆开了再配过，又有什么要紧！”这是代表作者思想的台词。

自从荒诞川剧《潘金莲》演出以来，大家对潘金莲的议论又多了起来，历史上有无潘金莲其人，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曾有人指出：从各种文艺作品的不同描写看，她是由作家虚构出来的典型人物，西门庆、潘金莲是根据《南史·齐废帝东昏侯本纪》所记的地名、人名而虚构的人名。（见《中国语文通讯》1982年第1期）

也有人指出，潘金莲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她是山东阳谷人。阳谷潘氏自认是潘金莲母系后裔。清初王世祯《香祖笔记》说：“阳谷西北有冢，俗称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传》，潘之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根据这个记载，历史上可能真有潘金莲其人。

董小宛之谜

也有人说,所谓潘金莲,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真人真事,而后又在传说中加以渲染,增加一些虚构的情节,才成了各种文学作品所取材描写的典型。经过文学家的加工创作,与历史上的潘金莲,便越来越远了。

董小宛之谜

明末南京曲院名妓董小宛,可以说是个有相当水平的戏曲演员。当时南京妓家有“朱(珠)市”妓和“曲院”妓之分,朱市妓身份较低,“曲中羞与为伍”,曲院妓即所谓“倡兼优”者,擅于戏曲演唱,其中艺术水平较高者即为“名妓”。明末张岱《陶庵梦忆》“过剑门”一则记载:“南曲中妓,以串戏为韵事,性命以之。杨元、杨能、顾眉生、李十、董白以戏名”。董白即董小宛。

董小宛后嫁给“明季四公子”之一的如皋冒襄(辟疆)为妾。冒襄对戏曲也有特殊喜好,蓄有一个规模不算太小的家班,常教歌僮排演新剧。吴梅村有诗“念家山破定风波,郎按新词妾唱歌”,描写他们的相得之状。

清末开始流行小宛入清宫为顺治帝所宠幸的传说和戏剧,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这位名妓的个人命运,而且还涉及到满汉民族矛盾问题,故能长期引起人们的关心。一般剧中所谓小宛入宫是由洪承畴挟仇报复,当系编剧之虚构,但据近人刘成禺的《世载堂诗》所称,近代训诂学家和文学家黄侃(季刚)在大学讲授清史时,曾说“小宛入宫,实顾亭林主谋,有献西施沼吴之意”,而且“称获确证”,可又“匿不示人”。因而也无法确定其可靠性,只能姑存一说。后来,孟森(心史)、冒广生等都力辩小宛入宫之妄,因为顺治帝比董小宛要小14岁。

然而,证明了董鄂妃不是董小宛,并不能同时解决董小宛下落的疑问。这个疑问不单单是后人出于对吴梅村的那些与董氏有关

的“朦胧诗”的猜度。张明弼的《冒姬董小宛传》也同样使人感到迷惑。张明弼与冒襄、陈则梁等“四五人，刑牲称雁序于旧都”，是在南京义结金兰的兄弟。他对于董小宛嫁给冒襄之前的遭遇，嫁后的种种生活细节，知道得都很详细。文中的描写也很具体和动人；惟独对她的疾病与死亡只有轻描淡写的五个字：“以劳瘁病卒”，而且特别申明：“其致病之由，与久病之状，并隐微难悉”。既曰“久病”，以张明弼的盟兄弟身份不应一概不知，既若不知，尽可不写，何必来这么两句！故而罗瘿公曰：“非不得已，何至言其致病之由与久病之状隐微难言！”（《宾退随笔》）而且张明弼似乎还有意无意地引导读者与冒襄自己的文字联系起来：“详辟疆忆语哀辞中”。其实《影梅庵忆语》和“哀辞”中对小宛久病之状也同样一笔带过，最为不详。结果弄得疑团越来越大。而所有持董小宛确病死于如皋的研究者，对这个疑团都未能作出针对性的解释。

其实，吴梅村的诗也并不是每句都朦胧得不可理解的。比如“手把定情金盒子，九原相见尚低头”（《古意》），且不管下句究竟是指小宛失节自愧于冒襄，还是吴梅村自责有负于朱明王朝，上句的“金盒子”按传统的修辞方法用以象征爱情是无疑的。那么《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之七“钿盒金钗浑抛却，高家兵马在扬州”，似乎可以理解为由于高杰的乱兵以及由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引起的兵匪相杂，使小宛和冒襄之间的情爱不得不“抛却”了。为避祸乱，冒襄曾挈家至浙江盐官（今海宁县）投奔盟兄弟陈则梁，途中多次遭险，后来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至今望秦海，鬼妾不曾归”。鬼妾是谁呢？有人查出冒襄之妾除小宛而外，蔡氏、金氏、吴氏均娶于离乱之后，一同逃难之妾只能是董氏。《影梅庵忆语》中也有一段着重写了“秦溪蒙难”之状：“遇大兵，杀掠奇惨”，“姬之惊悸瘁瘠，至矣尽矣”。要不是有什么奇祸落到了小宛头上，不至于使一路上始终比较镇静多智的她惊悸如此。有的研究者认为，也许董小宛就是此时落在乱军匪徒手中，受辱而亡或下落不明，故有秦海不归

陈圆圆香魂归何处

句。

若此说能够成立，在《影梅庵忆语》中似乎也可找到多处暗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陈衍（石遗）就曾指出《忆语》结尾处“姬曰，甚异，前亦于是夜梦数人强余去”是有所含意的（《石遗室诗话》）。而且文中又反复渲染小宛为救冒氏老小不惜自己落入乱军之手的决心。吴梅村《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的“引文”也说到“高无赖争地称兵，奔进流离”时，董氏表示“苟君家免乎，勿复相顾，宁吾身死耳”。这和《忆语》也可相互参证。

若此说能够成立，小宛的悲剧对世代官宦望族的冒家来说，是会感到不光彩的，公开的说法自然的病故，而对外人对病状也自然“难悉”了。至于冒襄异母弟冒襄在陈迦陵《妇人集》中关于董氏的记载之后注明“姬后天”，冒襄“哀辞”中说“安香魂于南阡”，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现如皋城南中学南面，龙游河边彭家荡旧时确实有个董小宛墓。笔者至如皋调查与冒襄有关的戏曲史料时，在冒襄别业水绘园中听得一位高龄的张老先生说，发掘董小宛墓时，穴中随葬之物有之，却不见骨殖，言之凿凿。

若董小宛既未献入清宫，又未没于兵，上面一些诗文中的疑团怎么解释？她的骨殖又到哪里去了呢？

陈圆圆香魂归何处

陈圆圆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女子。由于她的经历同明、清两朝及李自成、吴三桂等四方政治势力都有一定联系，因此她比同时期的董小宛、顾横波、李香君、柳如是等几位著名女性还要引人注意，被认为是身系一代兴亡的关键人物。然而陈圆圆是怎么死的，却是一个未获得确切答案的神秘的谜。

陈圆圆本名陈沅，关于她的事迹，历史记载非常简单。《明史·李自成传》、《清史稿·吴三桂传》仅提到吴三桂因爱姬陈沅被刘宗

敏掠去而愤起引兵进攻李自成的情节。《甲申传信录》记述较详，说李自成入北京后，刘宗敏居皇亲田宏遇第，向吴三桂之父吴襄索取陈沅，吴襄回答说陈沅已送宁远（今辽宁兴城）吴三桂处，而且已死。姚雪垠《论〈圆圆曲〉》一文据此断定陈圆圆于崇祯十六年死于宁远。这一结论引起了一些异议。有人认为此说理由不够充分，因为吴襄在刘宗敏威逼之下说陈沅已死，很可能只是敷衍之辞，并非实话，而且刘宗敏索取陈沅一事本身也值得怀疑。钱谦益《国榷》、计六奇《明季北略》、叶梦珠《续绥寇纪略》都采取了《甲申传信录》中所谓陈沅已送宁远的说法，但未提到她到宁远即病死的情况。

据明、清之际的传说，陈圆圆并非死在宁远。吴伟业《圆圆曲》即采取了时人传说，记述了陈圆圆在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后为李自成所得，后来又复归吴三桂的情节。诗中还有“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的句子。这是说吴三桂奉命向陕西、四川进兵时，陈圆圆一直是相随的。但是陈圆圆以后如何，诗中就未涉及了。

康熙时陆次云的《圆圆传》所述陈圆圆的故事比较完整。传说中吴三桂在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后，建苏台，营郾坞，华贵无比，陈圆圆常歌“大风之章”，向他献媚，吹捧他“神武不可一世”，因而受到吴三桂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房之宠。后来吴三桂的叛乱，本是出于陈圆圆的“同梦之谋”。陈圆圆的结局，也和吴三桂一起“同归歼灭”。这里，被“歼灭”的细节未具体言明，大概是指被清军所杀或作为罪囚被处死。

钮琇的《圆圆传》写于陆次云之后，关于陈圆圆在云南的生活写得比陆传要详细些，但陈圆圆的行为与陆传所云截然不同。钮传说，吴三桂晋爵为王之后，在昆明占据五华山永历故宫，他欲将陈圆圆正妃位，陈圆圆婉言推辞了，吴三桂就另娶一女。而后娶之女悍妒绝伦，群姬之艳而进幸者则杀之，只有陈圆圆能顺适其意，

陈圆圆香魂归何处

她屏谢铅华，独居别院，不与争风而且亲若姊妹。吴三桂图谋叛乱，陈圆圆有所觉察，但自感力不能禁，就以年迈为由向吴三桂求为女道士，得到许可后便离宫入山，幽居净室，与药炉经卷为伴，晨夕焚修，为善是乐。此传写到吴三桂失败后其家被籍没时，并未见圆圆的名字。关于她的下场只写道：“其玄机之禅化耶？其红线之仙隐耶？其盼盼之终于燕子楼耶？已不可知。”钮琇把圆圆之死作为疑问提出，为后人留下了一桩神奇的悬案。

俞樾《左台仙馆笔记》卷九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嘉庆年间，苏州有个叫郑生的到云南旅游，春日踏青时顺便到府城外商山访察陈圆圆的墓，没有找到，在荒野草丛间忽迷归路。不一会天黑了，他到某富家投宿。女主人姿容绝代，羽服霓裳，热情接待了他，并叙及同乡情谊，还出示小诗10首，求郑生传于世间；又赠他翠玉笛一枝，并吟诗一首赠之。诗曰：“叹息沧桑易变迁，西效风雨自年年。感君吊我商山下，冷落平原旧墓田。”之后送他出门。此时天色微明，郑生回头一看，第宅全无，他只身仍在深山中，手里玉笛尚在，诗笺皆是陈年败纸，触手欲腐。郑生顿悟所遇之女乃陈圆圆的幽魂，叹为奇逢。这个故事涉及鬼魂，纯属小说家言，但由此也可以看出，陈圆圆的死因一直受到后人关注。

道光年间，阮元的次子阮福随父亲去云南，他留心陈圆圆的遗迹并考察她的死因，可能得到一点线索。事后他作《后圆圆曲》一首，并遵父命把它寄给了陈文述。陈文述为此诗题七绝10首，连同其序与注俱收入《颐道堂诗选》卷二十四中。序的大意是说，阮福至商山寺莲花池考察陈圆圆墓，并得到滇中耆老相传之文献，诗中所述陈圆圆最后的事实信而有证，足可与吴梅村《圆圆曲》并传。其诗注云：“辛酉，城陷，圆圆自沉莲花池。”据此说，陈圆圆是在吴三桂失败后投水自尽的。清末丁传靖的《沧桑艳》传奇写到陈圆圆之死，就采用了阮福考察的结果。此剧《魂游》一出，陈圆圆幽魂自述终生悔恨并抒发兴亡之感云：“我陈圆圆，自闻吴王凶耗，即在莲

花池投水以殉。离魂恹恹，泉路迷茫，冥王以我现此色身，误人家国，幸闻变身殉，此一节足盖前愆。”作者的观点，带有我国封建时代“女人为亡国祸水”的偏见。他认为陈圆圆色身误国，罪莫大焉，最后自杀，才可略作弥补，否则就要堕入地狱。但是，所谓陈圆圆投水而死的说法亦不能令人信服。《沧桑艳》传奇是文学作品。其说不足为凭。阮福考察的结论也还缺少有力的旁证。

因此，陈圆圆究竟是怎么死的，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扬州八怪”之谜

自从隋朝开发大运河以后，扬州便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都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扬州的商业、手工业发达至极，仅关税收入就高得惊人，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可知当时的扬州不仅是王公贵族寻欢作乐的场所，也是文人墨客大显身手的地方，从清初到乾隆末年，活动在扬州的著名书画家就有百数十人之多，书画作为商品，在扬州大为盛行，所以有郑板桥的“润格”（即现代所谓稿费），在画史上传为趣谈。

当时，扬州开放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这一社会舞台上穿梭般地表演的各种人物，成分非常复杂，文化艺术各方面的交流也频繁而广泛，同时又远离京城，政治环境相对比较自由，使得这里的文人书画家们思想活跃，较少正统意识，所以他们敢于藐视权威，“胆大妄为”，各自发挥着自己的艺术想象力，按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创造自己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八怪”的这一群书画家，大多为布衣文人，其中高凤翰、李鱓、郑燮、李方膺曾做过地方小官，后被罢官，不再出仕，以卖书画为生，因此他们的书画与那些达官贵人以书画为余事大不相同，他们作书卖画既为生计，又不甘被他人牵着走，其个性气质及其对艺术本质的醒悟，又要求他们表现自我，于是他

“扬州八怪”之谜

们的艺术创作在两者之间谋求统一,将自我追求与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扬州八怪”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兼善诗、书、画。这一点在其画作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其中金农、郑燮、高凤翰、汪士慎、高翔等人还兼工篆刻,其画作更为“四合一”自我风格的绝妙体现。就其书法成就而言,“八怪”多兼工隶、真、行诸体,草书则有黄慎兼工,篆书作品不易见,但其隶书中多含浓厚的篆法,而真书与行书也常有篆意流露,“扬州八怪”中书法成就尤为杰出者,当推金农、郑燮,其次有高凤翰。就其绘画成就而言,“扬州八怪”突破了当时的形式主义画风的束缚,以一种清新而生气勃勃的姿态振奋了中国画坛,在中国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扬州八怪”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具有倾向性的群体特征,由于他们的书画有着共同的反传统、反正统、标新立异、不随潮流的强烈个性色彩,尤其与当时号称正宗的四王(即清初八家中的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画风迥异,而被时人目之为“怪”。光绪年间李玉棻著《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最早将他们归纳为“八怪”,指金农、黄慎、郑燮、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陈师曾《中国绘画史》加闵贞、郑昉;《中国画学全史》去高翔、李方膺,增高凤翰、闵贞;黄宾虹《古画微》去黄慎、增华岳、边寿民、陈撰;俞剑华《中国绘画史》列几家之说之同者于前,异者于后,共十三人,也有说十五人的,实际上所谓“八怪”,历来都无法确定为八人,只宜看作是一个泛指,其实民间俗语也有谓人作“八怪”的,意思通常是指某人的长相、行动做派或者是写的字、画的画等等皆与常人相异,使人一时不能接受,词义有戏谑、调侃之意。“扬州八怪”虽非特指此意,却反映了康雍乾之世在商业、手工业高度发展、十分繁荣的扬州出现的一种艺术文化现象。

“八大山人”之谜

“八大山人”是清初著名书画家朱耷（1626 - 1705）的别号。朱耷极擅诗歌创作、书法与绘画，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朱耷的诗格调古怪而幽涩，充满了神秘性和讽刺性，其书法源于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王宠、董其昌等人，以秃笔传达出傲岸不驯的情态和流畅秀健的神采，别具一格。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含着一种国破家亡的心情。朱耷擅长花鸟、山水，其阔笔写意花鸟画，以象征寓意的手法、夸张奇特的形象、简朴豪放的笔墨、孤傲雄奇的格调，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风貌，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他的花鸟画，大多缘物抒情，或表现自我，将物象人格化，以寄寓讽喻之意。如 65 岁所作的《牡丹孔雀图》，站立不稳的尖石上蹲着 2 只孔雀，尾巴 3 根花翎，似乎是影射着清王朝贵族大臣的奴才相。晚年所作的鱼、鸟多描绘成“白眼向人”的样子，鲜明地传达出画家傲兀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他的花鸟画，对象特征经过极度夸张，呈现出奇特的表情，加以险怪的构图、雄健酣畅的笔墨，形成了一种光怪陆离、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这种率意为而，自由奔放的画法，进一步发展了明末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达到了笔简意赅、形神毕具的至境。所作题材比较广泛，有花卉、蔬果、虫鱼、禽鸟及畜兽等，以册页最为精微。

朱耷的山水画，以水墨山水为主，也有设色之作，笔法多取自董其昌，却能变温静平和为荒凉寂寞，易矫饰秀雅为质朴雄健，而布局多承倪瓒，能用他人之法来抒自身真情。他与清初四王同受董其昌影响，却走着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显示出鲜明的独创性。存世山水画作品不及花鸟画多，代表作有《兰亭诗画册》、《山水》（现藏上海博物馆）等。

“八大山人”之谜

朱耷一生经历十分坎坷，他本是江西南昌人，明朝宗室的后裔，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少年时应试得中诸生，19岁时惨遭国破家亡之痛，遂装哑不语。清顺治五年（1648年）落发为僧，与母亲同住江西新建县西洪崖多年，朱耷是清初四高僧之一（即弘仁〔江韬〕、髡残〔刘介丘〕、八大山人〔朱耷〕、石涛〔朱若极〕）。皆明末遗民，八大山人和石涛，系明宗室，后出家为僧。均深通禅学，寄情书画，各有独特造诣）。36岁时回家乡南昌，据《青云谱·净明忠孝宗谱》记载，他曾弃僧入道，经营青云谱道院，任道院住持，62岁离开青云谱。他的性格倔强，行为狂怪，常借诗文书画，发泄内心积郁，终其一生，都誓不与清王朝合作，而寄身于山林之间，一生都沉浸在悲恸情怀之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八大山人”，这个别号一直用到他去世，而且以前字号皆弃而不用，足见其重视程度。“八大山人”具有很深的寓意，听上去像是隐居世外、不问世情的方外之人，但仔细观察朱耷的题款，人们发现原来纵向书写的“八大山人”四个字的草书，原来竟是“哭之”、“笑之”的字样，再看他笔下所刻画的一花一鸟一木一石以及山水人物，一切形象几乎都是变态、畸形的，原来他是以此发泄内心的愤懑之情，嬉笑怒骂皆成图画。这在当时国破家亡、清政府高压政策的特殊情形之下其实是相当难得的，尤其是这样一个相当独特的题款和那些饱含深情的书画作品结合在一起，更加深刻表现了他的悲恸情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朱耷由于身处明代宗室这个特殊位置上，不满于清代的统治，以至于对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加以歪曲，虽然显得有些过火，但是，他那“八大山人”所独有的、富含强烈讽刺意味的绘画艺术，却具有创新的意义。这一点同他的全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一样，是不可抹煞的。

赛金花之谜

赛金花，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了。提起她的名字，无人不晓，谈及她生平行事，却又众说纷纭。她本为苏州一贫家女，为生活所迫而入青楼，而后嫁给状元洪钧，并随洪出使德法英俄四国，洪钧死后，她又重坠风尘，艳名盛于京津沪，往来皆达官贵人。庚子之变时，她又与八国联军及日后和议有关，名震一时，其后重操旧业，中间也先后嫁过铁路职员曹瑞忠（一说黄某）、前江西议员魏斯灵，但曹、魏都因病逝去。她晚年生活凄苦，居北京一陋巷，1936年死于贫病交加之中。赛金花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是受各界瞩目的新闻人物，有关她的采访记、传记、诗词、小说、话剧、回忆录等等，光目录就可开出一大串。颂之者称她“爱国爱民，舍身济世”、“当代伟人”，贬之者称她“夜事夷寝”、“秽乱宫禁”、“民族罪人”。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赛金花生平的谜处很多，如姓氏，她自称姓赵，名彩云，为妓后冒姓富，后被人写成傅。但刘半农等的《赛金花本事》附言称，她姓赵“也是冒出，实乃姓曹，为清代某显宦之后”籍贯，她自述为徽州休宁县（安徽休宁县），但曾朴说是江苏盐城县，年龄，她有时自称为辛丑年生（1871年），有时自称为甲辰年生（1874年），据冒广生和瑜寿的考证，应是甲子年生（1864年）。其他如：赛金花晚年系狱的原因、再婚的情况，都有不同说法。在所有关于赛金花的谜中，争论最多的，还有庚子之变时的“赛、瓦公案”和“促成和议”两事。刘半农等的《赛金花本事》、曾繁的《赛金花外传》，均据赛金花自述写成，所叙情况大致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德兵闯入赛金花居处，赛懂点德语，遂打听过去在德结识的几个名人包括瓦德西的情况，士兵很惊奇，于是不敢胡来，回去报告联军统帅瓦德西，瓦遂于第二天接赛进兵营，以后往来频繁。瓦、赛是否初次

赛金花之谜

相识呢？据刘半农记赛金花自述说：“我同瓦以前可并不认识，他问我到过德国吗？我说小时同洪钦差去过。”但曾繁记赛金花自述则是“到德国”那年结识了瓦德西将军，他和洪先生是常常来往的，故而我们也很熟识”。在北京相见时，“瓦德西与我虽有十年阔别，但我的容态依然不减当年贵为使节夫人的时候，瓦德西隐约间还认得我。”赛金花在几次自述中都谈到瓦德西托她代办军粮。当时中国粮店都不敢开门，“我当时在北京颇有点名气，人们听说赛二爷出面，才敢应承。”“后来各国的军粮也由瓦德西介绍，都归我办，”“他们除军粮之外，还要很多货物，还要女人，女人要漂亮，又要没有毒的。我又替他们找了二十几个良家妇女……这样联军的食色问题我都替他们解决了。”她又细诉民众罹灾之苦，恳求瓦下令士兵停止杀戮抢掠，“瓦将军便下令不准兵士违律妄行”，“嗣后北京民众皆得安宁矣”。“我之所以能为北京万民建立一点功绩，将彼等从屠杀中拯救出来，即是如此。”赛又自述“议和之时曾陷入僵局，由于德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杀死，其夫人态度强硬之至，提出许多苛厉条件，如要西太后偿命，要皇上赔罪，“把个全权和议大臣李鸿章弄得简直没有办法了。我看着这种情形，心里实在起急，又难过，私下里便向瓦德西苦苦的劝说了有多少次”，又经瓦介绍去劝克林德夫人，建议为克林德公使建立一座大牌坊，用皇上之名义刻上碑文，树立在公使遇害地方，以纪念公使，“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候我心里高兴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哩！”

但也有人认为，赛金花没有见过瓦德西，就是偶尔见过一二次，她也不敢跟瓦德西谈国事，因为她那几句德国话就不够资格，再说联军总司令不过是只管军事，至于一切国事的交涉，仍由各国公使进行。（齐如山《关于赛金花》）。瑜寿的《赛金花故事编年》对赛金花所说与瓦德西在京相见的时表示疑问，赛氏自述是在洋兵侵入北京后到京，没几天就遇到德国兵来骚扰，又过一天见瓦德

西。但“把时间尽量放宽来算,最多不会出八月底,而这时瓦德西根本还没有到北京。八国联军是八月十五日攻陷北京的,而瓦德西迟至十月十七日才赶到(见瓦《拳乱笔记》),中间时间相差到一个半月以上,这消息极可以证明赛氏那一段口述,其确实性是有点问题的。”另有梦蕙草堂主人所作著《梅楞章京笔记》称赛金花打算去外国兵占据的南海游览,乃女扮男装,与三人以见瓦德西为名,骑马入南海,守门德兵告知瓦外出,因而未能进南海。此事为二记者得知,“遂各戏草一稿”,“谓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与瓦德西元帅如何如何”,“妄人又构《孽海花》一书,蜚语伤人,以讹传讹”。也有人分析道,在当时侵略军的横暴淫逸,无恶不作的情况下,赛氏由于本身的悲惨职业,其被迫而和若干德国军官往返,是必然难免的。因之她利用这点便利,保全并救护了许多同胞,这也必然是事实。那么,如何评价赛金花的这种行为以及她自述中表现出的糊涂思想呢?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她身上同时体现着奴性和人性。她认不清八国联军的侵略者本质,她以为帮助清廷促成和议就是为国家出力,可谓奴性十足;但她不忍看民众涂炭于兵乱,尽自己力量加以保护,还保留没有泯灭的人性。自然,讴歌赛氏事敌寇而救北京是很不恰当的,但在清廷百官仓惶乱窜之际,去怒骂周旋于敌军中一妓女为民族罪人,也实属轻重倒置。

赛金花去世后,报载“京市各界人士,感念其于庚子拳乱时之功迹,纷起设法援助”,不少名流为之办理善后事宜,葬赛氏于陶然亭旁。这大概说明她对人民似乎做过一点好事。

赛金花晚年对一些史事的追述有前后矛盾之处,有些无聊文人和小报也着意渲染某些事情,这使得赛金花变得愈发神秘。但一些学者、记者、作家对赛金花进行研究、报道和再塑造,则是把赛金花的传奇般经历作为反映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赛氏经历来揭露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有学者认为,在晚清史上赛金花与那拉氏可谓一朝一野相对立,足见其影响之大。正因为赛金花偶

“两昆仑”之谜

然地处于当时多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焦点，所以，对赛氏之谜的探索也就带一点社会意义了。

“两昆仑”之谜

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谭嗣同等六人被押上菜市口刑场，不经审讯即被处死。其中最为慷慨自若的，是被梁启超称为晚清思想界彗星的谭嗣同。他在临死前夕，于囚狱里用炭渣在墙上题过一首七绝诗，这就是脍炙人口，传诵不绝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表现出谭嗣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并寄莫大希望于后来者。诗的前两句用典，含义清楚，最后一句提到的“两昆仑”是比拟还是专称，则引起了当时和后来者的多种推断和猜测。

其一，认为“两昆仑”是指王五和胡七。20 世纪 30 年代，新闻记者陶菊隐的《新语林》在记述谭嗣同逸事时说，当年谭嗣同住在北京半截胡同浏阳会馆时，有两个侠士，即单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胡致廷）“同时教授他武艺”。据说谭嗣同有一身好武功，好气功，而且擅于耍使各种兵刃，乃得力于他俩的精心教授。因为他俩学的是昆仑派，“浏阳（谭嗣同）绝命诗所说两昆仑是指你（指胡致廷）和王五的，因为你们都是昆仑派。”由此来看，似乎有些道理。

其二，认为“两昆仑”是指胡理臣和罗升两位仆人。蔡尚思等编的《谭嗣同全集》里，谭训聪（谭嗣同后人）在附注中所持另一种说法，“胡理臣、罗升，两仆人，《狱中题壁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盖指两仆，盖昆仑奴之称也。”注释者作此说，似以谭嗣同下狱，与仆人信件有“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等语为凭证。

其三，认为“两昆仑”是指康有为和王五。谭嗣同的战友梁启

超说：“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少年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梁启超是谭的同道，在谭嗣同被捕前夕，两人还慷慨话别。可以说他对这位挚友的思想、行为是十分了解的。所以此说数十年间成为权威之言。李志等编《近代爱国人物剪影》还对王五此人做了介绍，说他原名白正谊，字子斌，父母双亡，年轻时为北京前门外顺兴镖局王五夫妇收养，始改姓王，因善使单刀，人称“大刀小王五”，后在反抗八国联军侵略者的战斗中牺牲。据称王五在谭嗣同被捕前几分钟，还催他逃走，后来还打算劫法场搭救。在梁启超看来，王五在谭嗣同心目里，乃是属于师友之类的大侠士。

其四，认为“两昆仑”是指唐才常和王五。参加辛亥革命的蔡寄鸥所写的《鄮州血史》即主此说，书里则将“两昆仑”解释为王五和唐才常；后者和谭嗣同肝胆与共，他们一起在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诗里寄予希望的是唐才常。

其五，认为“两昆仑”是指谭嗣同和唐才常。皮明麻的《唐才常和自立军》也说：“很可能一指谭嗣同自己，”作者坚持另一个“昆仑”乃是唐才常。“因为两人为刎颈交，在此以前，谭又曾电约唐才常赴京，谭的绝命诗视才常如昆仑之杰，对他寄托着无限的信赖之情。”

其六，认为“两昆仑”是指谭嗣同本人与康有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的《论谭嗣同》篇中，则将“两昆仑”解释为“康有为和他（谭嗣同）或去或留各有自己的抱负。”戊戌八月初六，政变发生，那拉氏囚禁光绪，重新垂帘听政，下令搜捕维新派。初七，谭嗣同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将自己的诗词文稿及所著《仁学》交梁保存，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决心以死酬主警世，促梁启超东渡以图维新事业于将来。初九，日本友人数人再三劝谭到日本避难，谭不听，慷慨与言：“各国

“两昆仑”之谜

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这三日内,谭还与王五密谋潜入宫中劫救光绪,因荣禄等加强了皇宫警戒,事终未成。王五苦劝谭出奔,愿以身保护,谭坚拒不行。谭还代父写家书,以洗其父与自己的干系。初十日,谭被逮下狱。在狱中三天,写遗康有为、梁启超书各一封,给家仆胡理臣、罗升二人手札三封,壁上题诗一首。其遗康有为书云:“……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其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也。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此二书尽言国事,念念不忘者变法事业。给家仆的手札三封则尽是送衣服及日用品诸种日常琐事,绝非以大事相托。八月十三日,遇害,临终时语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从上列题诗前后数日内谭嗣同的所作所为可以清楚看出,他的全部神思与言行已完全集中在一个焦点上——维新变法事业的命运上,真正是殚精竭虑,慷慨激烈,舍生求死,以期保护君王并望变法事业有成于将来。入狱后,面对屠刀,他仰天长笑,义无反顾,并将热血激励来者,死而无憾;魂牵梦绕、拳拳于心者是被逼出走的康、梁、王五等同志的命运如何?是否有忠臣义士举义勤王?自己留下殉法酬主,是死得其所,让“去”者承担救主与复兴新法的重担吧。不论留者与去者,对圣上、对新法、对朋友都是忠贞不贰,一片刚烈,像巍峨昆仑一样顶天立地。

“去留”究系何意?谭嗣同在言谈、书信和题诗中,三次用程婴杵臼典故,表明自己留死的决心和对“去”者康有为的期望,总之,“生死去留”都是为新法事业。

从诗的内容与脉络来分析,第一句是用张俭的典故喻指被逼出走的维新志士,主要喻指康有为,兼有梁启超之意。第二句用杜根的典故隐喻期待举义勤王的忠臣义士救主诛贼,这里包含着曾有此谋划的王五,但并非以杜根喻王五。第三句是作者剖心明志。

第四句是喻指“为其难”的“去”者康南海，“为其易”的“留”者自己，都如巍峨昆仑一样光明磊落。

谭嗣同一代豪杰，他以昆仑相喻者，自非等闲之辈。两昆仑所指任由后来者见仁见智，只是，斯人已逝，谁又能洞悉谭嗣同彼时彼刻的心境呢？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谜

1927年我国近代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投身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噩耗传来，举世震惊。王国维是近代研究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北方民族史、西北地理史最有贡献的学者之一，他精通英、日、法诸国文字，先后从事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等学科的研究，有人誉之为“民国以前学术之集大成者”。他一生著述 60 种，手批手校之书共 192 种，以其研究成果之丰硕，对人类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国维自投昆明湖时，正当 50 岁之盛年，他的死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对于其死因的探讨，几十年来，一直吸引着不少史学工作者，但歧义纷呈，莫衷一是，至今也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法，比较有影响的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1. 殉清说。持此说的人很多，主要依据是：(1) 王国维曾遗书于三子贞明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论者认为这是他不忍看到清王室和个人屈辱的下场，情愿一死以殉清室。(2) 王死后，罗振玉向已退位的溥仪献上王的一份“遗折”，溥仪看后大为感动，遂发“上谕”，加以谥号。(3) 据王的夫人透露，“先生前于逼宫之役（指溥仪被冯玉祥逐出宫廷一事），即有死志。”反对此说者也大有人在，比如人们就王国维为何不在清亡时殉清，而是在时隔十几年以后的 1927 年等等。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谜

2.“罗振玉逼债”说。持此说者根据溥仪《我的前半生》说的，王国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儿女亲家罗振玉使用各种手段逼债，终于走投无路投湖自尽。但否定此说者认为罗一向对王都很尊重，二人相交甚厚，不致发生这样的事。

3.“内外交困”说。持此说的依据是：(1) 清室退位后，北大曾发过一个宣言，反对清室出卖产业，丧失国宝，王国维在北大和清室两方面都有职务，所以进退维谷，再加上与他关系甚好的罗振玉正以贩卖中国古籍为业，声名一向不好，北大也有人怀疑王也参与其中，使他更加难堪。(2) 王致力于学问一生，晚年突遭世变，丧失了精神上的寄托，加之他与逊清王室密切的关系，所以诚惶诚恐。(3) 王一生饱受凄凉困苦，体弱多病，晚年家境益趋贫寒，长子又早死，一再的打击终于使他丧失生活信心

除了以上主要意见，还有人认为：1927年正是国共合作，北伐热火朝天的年代，而一向反对共和、坚持复古的王国维对此极为害怕，于是走向自绝之路。对于他的自杀动机，有人说主要出于他所持的尊孔复古立场及对现实产生的强烈不满，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很快就会出现总崩溃，于是甘愿成为其牺牲品。

王国维之“生死之交”，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说：“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笔者按：系指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写的碑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为此是大事。”凡此种种，书不尽言，王国维之死，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说不尽”的一次奇特的死亡，对于其死因的探讨，至今依然争议不止。

小凤仙之谜

小凤仙是一个幼年即堕入青楼的妓女，她与蔡锷交往及助蔡锷出走，使她与民国初年的政坛发生了传奇性的联系。以往野史对此渲染颇多，近年来又因《知音》、《一代风流》、《蔡锷与小凤仙》等影视剧的问世而使她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

小凤仙的出身、家世及堕入青楼的原因，各家说法不一。有说其父为清季武官，落职后贫不能活，遂质凤仙于妓寮；有说小凤仙本是一旗人姨太太之女，父母双亡后无奈而落入妓院；也有说其父为仇人所陷，倾其家产而鬻凤仙，辗转入青楼。无论何种说法，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小凤仙早年生活比较贫困而坎坷多变，这种经历对她后来的思想不能不留下影响。

民国初年，蔡锷智走云南，组织护国军，反对帝制。小凤仙在蔡锷智脱袁世凯的羁绊中无疑起过一定的作用，然而蔡锷究竟怎样飞出侦探四布的牢笼，小凤仙究竟怎样帮助蔡锷脱身，各家记载颇多分歧。

天忏生、冬山说蔡锷带着小凤仙至天津，在旅馆内诈称有病，由后门逸，乘日本轮船出走。（《黄克强蔡松坡轶事》附录《小凤仙逸事》）哈汉章则谓出走之日，蔡锷设计打了一夜牌，次日绝早至总统府，并打电话约小凤仙午间到某处吃饭。乘人不察时，蔡锷密由政事堂出西苑门，乘车赴津，绕道日本抵滇。（《春耦笔录》）也有人说蔡锷由津渡日时，小凤仙曾要求一起东行，为蔡劝止。甚至还有蔡锷东渡日本，小凤仙亦同舟而行，至蔡由日转道昆明时才回北京的说法。事实上，这些说法多属当时文人添加的枝叶。关于这个问题，雷飙回忆他听蔡锷口述的赴滇经过最为详细：一日晚间在小凤仙处请客，正当宾客满座、狂歌畅饮之际，蔡锷悄悄离去，单身赴崇文门车站乘火车赴天津，次日早晨到达，住进日本共和医院。袁

小凤仙之谜

世凯得到报告后,立即派蒋百里与一个参议官赴津挽留。蔡锷告诉他们这次来津确实是为了养病,并请他们转达于袁世凯。蔡锷知天津非久留之地,当天晚上即隐姓埋名,化装后去塘沽坐船赴沪。不料船到上海时,岸上军警林立,侦探上船搜查,于是蔡锷便不上岸,乘原船赴日本神户,而神户警察搜查也十分严密,只能再乘该船返沪,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秘密买通船上的服务员,请他代购去香港的船票,这才辗转由香港到越南,最后抵达云南。(《蔡松坡先生事略》,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册)雷飙是追随蔡锷多年的僚属,他的说法可信度较高。

蔡锷病逝后,小凤仙的归宿又如何呢?天忤生等人谓,蔡锷去世后,小凤仙痛不欲生,留下一绝命书后饮鸩自毙。《民国通俗演义》即取材于此。但这全属虚构。

当蔡锷遗体自日本运回,北京各界为他举行隆重追悼会时,小凤仙白马素车,亲临祭奠,并挂一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北京晚报》)前些年也曾发表过文章,说小凤仙直至解放后还在人间,隐姓埋名,同一个工人结了婚,居东北某地。当梅兰芳赴朝鲜慰问志愿军路过东北时,她还拜访了梅兰芳,并要梅为她保密,这都说明小凤仙并未因蔡锷的去世而自杀。流传很广的小凤仙的另一副挽联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这副挽联文情俱佳,对仗工整,显然非小凤仙的文化素养所能属,而系文人代笔。它的作者有人说是易顺鼎,有人说是樊增祥,也有人说是杨云史。易、樊、杨三人均为当时擅长诗文的名士。还有人说这出自前清翰林朱文劭的手笔,也有人认为这是易宗夔寄居北京时应友人邀,代小凤仙作的,以后收入他所著的《新世说·伤逝篇》中。无论此联出自何人手笔,都较适当地表明了小凤仙与蔡锷各自的身份及其因缘,它因这段传奇而产生,也因这段传奇而为后人广为传颂。

关于小凤仙的最后归宿,近年来报刊披露甚多。蔡锷病逝之后,小凤仙沦落东北。1928年,赵四小姐随少帅张学良由天津到东北奉天(沈阳)，“徐娘半老”的小凤仙往其住地求息。五十年代初,小凤仙以“陈娘”名义居住在沈阳市皇姑区原来寿泉街三胡同的平房里,她开始没有工作,靠丈夫的收入养家度日。抗美援朝时,梅兰芳到东北,小凤仙闻讯,托人捎信给梅要求一见。梅与其倾心交谈,后介绍其在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当保健员。小凤仙于1976年病故,她是栽倒在自家平房旁的公共厕所里,患突发性脑溢血。

《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作的吗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

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

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

我不负神兮神何殒我越荒州？

这怒涛滚滚般不可遏制的悲愤,绞肠滴血般痛苦的诘问,诅天地咒神祇,雄浑不羁的气魄以及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这震撼人心的诗句就是出自著名的《胡笳十八拍》。文姬归汉,千古美谈,家喻户晓。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胡笳十八拍》是否是蔡文姬所作,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蔡琰,字文姬,汉代文学家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妙于音律。然而身世悲惨,自幼随父亡命,初嫁河东卫仲道,未二年,夫亡。无子,归母家。兴平中,天下丧乱,为胡骑所掳,展转流落匈奴12年,生二子。后曹操用金璧把她赎回,虽归故土,却抛别了亲生二子。以后改嫁同郡董祀。现存《悲愤诗》二首,一为五言,一为骚体。另有《胡笳十八拍》一篇。目前五言《悲愤诗》肯定是蔡琰所作,另二篇尚待研究。

《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作的吗

《胡笳十八拍》是否蔡文姬作，历来说法不一。持肯定意见的有李颀、王安石、严羽、李纲、王应麟、韩愈、黄庭坚、罗贯中等；持否定意见的如朱文长、苏轼、王世贞、胡应麟、沈德潜等。

郭沫若作话剧《蔡文姬》，著文六谈《胡笳十八拍》，认为《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所作。他说，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如果有过这么一位诗人代她拟出了，那他断然是一位大作家。郭沫若认为就连李白也拟不出，李白还没有那样的气魄，没有那样沉痛的经验。但是文史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争论有四个方面：

一、《胡笳十八拍》所描写，同历史事实和地理环境不合。

第一，刘大杰等指出，诗中所叙“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那种汉兵与匈奴连年累月的战事，在那时根本没有。说明作者对南匈奴和东汉王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东汉末年，南匈奴已内附。郭沫若认为，“烽火”、“征战”是对乌桓而言。谭其骧指出，当时乌桓活动范围限于上谷、代郡以东，距离文姬所居的南庭匈奴河套地区尚远。再者蔡文姬归汉是建安八年，而曹操平定三郡乌桓则在建安十二年，在时间上也不对头。这与诗中“两国交欢兮罢兵戈”也不符。反驳者认为，文姬在匈奴时正是“胡、狄雄张”，边境不靖时，诗中所述，怎能不符历史事实呢？

第二，刘大杰等指出，汉末南匈奴分为二支，於扶罗、呼厨泉一支居河东平阳，在今山西临汾，文姬可能被他们掳去。而诗中“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与地理环境不合。郭沫若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并认为文姬是被居于美稷一支的南庭匈奴所掳，即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但《后汉书·董祀妻传》明言，文姬入匈奴是在兴平二年，其时率众从汉献帝入长安的正是呼厨泉所部的右贤王去卑，说文姬不是去卑掳去，难

令人信服。而美稷事实上在今山西汾阳西北。谭其骧指出,长城、塞上对南庭匈奴倒用得上,但不论河东、南庭和陇水相去甚远,绝不相干。有亲身经历的蔡文姬,无论如何不会乱用名词以至于此。对蔡文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至胡的也不清楚。这位作者难道还有可能是文姬自己吗?反驳者认为,不论美稷、平阳都在山西境内,相去不远,匈奴活动范围达山西北部、内蒙伊克昭盟、陕西北部、甘肃东部,文姬入匈奴后未必长住平阳。而且诗歌可以有夸大和想象。所谓陇水,本非专名,是指陇山之水,那么诗中写到长城、陇水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否定者认为,诗中有“戎羯”一词,而羯族是晋武帝后“匈奴别种入居上党以后才有的名称”,蔡文姬不可能在五胡乱华之前预先知道。辩之者证曰:《晋书·载记·石勒》中的材料证明,羯族非晋时才有。郭沫若释“羯”为“狄”之误,或“猖”字之通假,根据不足。

二、不见著录、论述和征引。

刘大杰等认为,《胡笳十八拍》不见于《后汉书》、《文选》和《玉台新咏》,又不见于晋《乐志》和宋《乐志》,六朝论诗的人也没有称述,《蔡琰别传》也没有引它的诗句,由此断定,唐以前没有此诗,是唐人伪造。

郭老的反驳是“不见著录、论证和征引是因为它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为文人所不齿,是靠民间流传下来的。但此说也不稳妥。苏东坡和朱熹也是文人,却喜欢该诗。反驳者认为,刘大杰这个论证是不科学的。六朝文献大多没有保存下来,不能因此否定整个六朝文学。这是过去“辨伪”学者所习用的一条规律。但这种对古文献鉴定的“默证法”有很大的局限性。类书可能遗漏,选本根本不能包括一切,专书也有作者见闻的限制,有的古书可能脱简或残缺,按照“默证法”《胡笳十八拍》只能存疑!蔡琰原是有集子的,梁时尚有《蔡文姬集》一卷,隋时亡佚了,所以才发生问题。

《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作的吗

南宋以前无人怀疑《胡笳十八拍》，假如其他方面不能证明该诗为他人所作，则“默证法”的论断便难成立。事实上，“文人”所著录、论述和征引过的东西并不那么可靠，相反他们所不曾著录论述和征引过的东西，有时更可靠一些。

三、关于风格、体裁问题。

这是否定派的共同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语言、风格、作家思想与艺术造诣三个问题。

刘大杰等认为，从语言结构、修辞炼句及音律对偶上看，比起东汉诗来，更有不同特征。诗中“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两句，炼字修辞如此精巧，对仗如此工整，平仄如此谐调，东汉诗中何曾有过？“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在东汉诗赋中，都没有这种错综句法。用语方面，诗中“泪阑干”是唐时始有的词汇。语句方面，“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是袭用北朝民歌《陇头歌辞》。用韵方面，《胡笳十八拍》先韵和寒韵不通押，和曹植《名都篇》、《美女篇》的通押迥别，也是唐人用韵方法。

郭沫若认为，《胡笳十八拍》中有一些词句讲对仗，颇似后来的七言律诗。这是最成问题的地方。有两种可能，一是独创，一是后人润色，在她之前四言五言都讲对仗，七言诗在西汉时已流行民间，为何不能是文姬独创？就算后人润色也有九个指头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有人指出，全诗 1200 多字，精练工整对仗的只有两联，比起同期建安诗人的诗篇不算多，怎能抓住两联就说它不是东汉风格呢？反驳者认为刘大杰等混同了语言和风格，思想修养和艺术造诣的关系。语言不能独创，风格可以。体裁受时代限制，但可以在旧文体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一步。郭沫若举《乌孙公主歌》证明，文姬是在骚体和七言民歌基调之上树立了她的独创性。

反驳者又指出：关于“泪阑干”，东汉《周易参同契》、《吴越春秋》中已有，非唐时才有。关于用韵，上述例子是偶合，《胡笳十八拍》无此规矩，以十三拍为例，四韵通押，怎能说是守唐人宫韵呢？

而且唐人作近体诗才守宫韵，作古体并不一定遵守。

四、《胡笳十八拍》是否董庭兰作。

如果胡笳声不是文姬所作，那么《胡笳十八拍》更不是她作的了。刘大杰引唐刘商《胡笳曲序》的小序：“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而董生就是董庭兰。证明是胡震亨《唐音癸签·乐通·琴曲》条云：“刘商《胡笳十八拍》自序：似董庭兰《胡笳弄》作。”刘大杰进一步证明，曲以拍名起于唐代。最后撰定《十八拍》琴谱的是陈怀古和董庭兰。最初配董庭兰谱为歌词的，始于刘商。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歌词，产生于刘商之后。

郭沫若在解释序文时，“增字解经”，改“后董生”为“后嫁董生”，把创作权给了文姬，但原文无讹脱之迹，是错的。但驳之者认为，刘商这段序文不可信，如序中所言蔡琰“入番为王后”、“作《离鸾》、《别鹤》之操”，都与过去记载不合。而朱长文《琴史》卷四《董庭兰传》：“天后时，凤州参军陈怀古善沈、祝二家声调，以胡笳擅名。怀古传庭兰。”沈家即沈辽。《崇文总目》载：《大胡笳十八拍》，沈辽集，世名沈家声。沈辽早于陈怀古，陈怀古为董庭兰师，所谓董庭兰作之说，不攻自破。为了否定蔡文姬作《十八拍》，释沈辽集之“集”为“作”，未免牵强。

《历代帝王图》作者之谜

《历代帝王图》，又称《帝王图》，绢本设色，纵 46.7 厘米，横 39.5 厘米，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原画为手卷式，画有历代帝王的图像，目前只剩下西汉昭帝刘弗陵、东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陈文帝陈蒨、陈废帝陈伯宗、陈宣帝陈顼、陈后主陈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等汉至隋十三个帝王

《历代帝王图》作者之谜

像。

画家通过对人物形象如面容、神态、眼神、眉宇和嘴唇等精心描摹，勾画出各个帝王不同的时代、经历和个性特征。如对隋文帝杨坚的形象处理上，画家在描绘其体貌奇特，仪表绝人的同时，又以深沉的眼神、紧闭的双唇，着意刻画出其“雄图内断，英谋外决”的性格，这与另一幅隋炀帝杨广的虚浮的面容、萎矮的身躯所体现的“内怀险躁、外示凝简”形成鲜明的对照。又如西汉昭帝刘弗陵文静丰颐的面庞，从容沉着的神态，似在显示其宽厚有识；而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美须眉、大口、隆准，又似隐现着他宽广的胸襟与情怀，那舒展的双眉、上翘的嘴角、含笑而通达的容止，则又表达出刘秀聪达多识、仁智明恕、乐施爱人的品质。此外，刘备被描绘为双眉紧锁、眼神疑虑，孙权则仪表温文尔雅，曹丕则目光敏锐逼人，均各具情态。而深沉卓识，励精图治的宇文邕，同软弱平庸、无所作为的陈宣帝，则形成强烈的对比，陈宣帝又和骄奢淫逸的亡国之君陈后主的鄙俗举止有微妙的区别，全图处处都显示出画家卓绝的洞察力和艺术技巧，欣赏者无不为古代画家的匠心独运所打动。

现在我们见到的这幅画作同样没有署上作者的名字，这大概是因为画是挂在皇宫之内，为统治者“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起借鉴作用的，没有必要署上微不足道的画家之名，还是画家没有署名的习惯，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历代传说此画是唐代人物画家阎立本所作，这个说法主要来自宋人富弼的题跋，史籍却记载是宋代画家杨褒据白麻纸唐画传摹，并设色傅彩的，但后人都同意富弼的题跋。

有许多古代名画都是因为署名问题为后人留下千古谜题，这固然为人们欣赏作品时，增添了知人论世之难，但也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总之，由于古今价值观的不同，对于这样的谜题也不必过于执著。不过，《历代帝王图》在富弼以后流传有绪，却是难得之事，富弼以后由杨褒转入吴升家，后为周必大之侄所藏，南

宋及元代曾入内府，清初顺治年间归金陵李吉安所有，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说，此画在乾隆年间被求官者购去，道光年间，又落入阳湖蔡友石手中，孙星衍、李恩庆、李佐贤等人均有详细著录。清末，此画归福建林寿园所有，以后辗转落入梁鸿志手中，盗卖出国。

《五牛图》之谜

《五牛图》纸本设色，宽 20.8 厘米，长 139.8 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在现存的古代绘画作品中，唐代和唐以前的画迹中很少见到画在纸上的作品，独幅画大多画在绢帛之类的丝织品上，《五牛图》画在麻纸上，为流传的唐画中仅见。

作品画牛五头，形态各不相同，中间一头为正面，透视非常准确，反映出早在唐代，中国画家就已经能够熟练运用透视画法表现对象了，其余四头为侧面结构，都非常准确，造型非常生动，画家用粗简而又富于变化的勾线，轻淡而沉着的敷色，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耕牛的持重性情，表现出那强劲有力的筋骨和厚重的皮毛质感。画风淳朴自然，符合画家追求的“田家风味”。元代赵孟頫称其“神气磊落，稀世名笔”。

《五牛图》相传是唐代后期著名画家韩滉的杰作。韩滉（723 - 787），字太冲，据《唐朝名画录》、《历代名画记》及汤垕《画鉴》等记载，韩滉“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以牛羊最佳”，而“牛图是其所长”。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云：“韩滉《五牛图》虽着色取相，而骨骼转折，筋肉缠裹处，皆以粗笔辣手取之，如吴道子佛像衣纹，无一弱笔求工之意，然久对之，神气溢出如生，所以为千古绝迹也。”宋代大诗人陆游在观赏《五牛图》时说：“每见村童牧牛于风林烟草之间，便觉身在图画，而引起辞官求去的愿望。”（《渭南文集》）这虽是诗人的借题发挥，但也说明韩滉的牛图中所赋予的农村风情，有引起观众联想的魅力，《五牛图》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清明上河图》之谜

《五牛图》原作并没有作者款识，本幅及后幅上有赵孟頫、孙克表、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的题记，《清河书画舫》、《珊瑚网》、《郁氏书画题跋记》等书均有著录。由于赵孟頫等人的一再题款，并力证它是韩滉的作品，从此遂成定谳，很久以来即使有人提出疑问，也只是证据不足，所以著录此画的图书，对于作者问题大多不做深入的探讨。

还有一幅著名的画作《文苑图》，也被认为是韩滉的作品，但我们从张彦远、朱景玄等唐人的著述中，得知韩滉的创作是以田家风俗人物为主，反映文人生活的创作未见评述，《文苑图》与《五牛图》风格大不相同，《五牛图》以粗拙滞重的线形见长，而《文苑图》则以勾笔简细，微有顿挫和转折的细线，尚有张萱的圆润秀挺笔法的余风，这种线描还表现在五代一些人的画作中，但不如《文苑图》精巧。隋唐时代以来，画家逐渐趋于专业，有人终生甚至只画一二种东西，如果如人们认定的《文苑图》、《五牛图》皆是韩滉的作品，那么一个画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在画史上是极为少见的，所以有些论者对此也曾有过疑问，但多数人采取调和论，承认这都是韩滉的作品。

那么韩滉到底是不是《五牛图》和《文苑图》作者？韩滉到底是不是兼具两种截然不同艺术风格的特殊画家？确实是令人回答不好的问题，所以人们只好只谈欣赏，不论其余了。

《清明上河图》之谜

《清明上河图》是宋代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风俗画的杰出作品，全图绢本设色，宽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采用的是传统中国绘画手卷的形式，画家运用鸟瞰俯视的方式，随着画卷的缓缓展开，用不断推移视点的方法来

攫取景物,全图所描绘的人物计有五百多个,牲畜五十多头,车船各二十多只,无不逼真生动。作品构图严密紧凑,安排有条不紊,各得其所。各种人物不仅衣着不同,神态各异,而且劳逸苦乐,对比鲜明。最有趣的是画中的人物组合是按照一定的情节进行的,那些富有戏剧性矛盾冲突的场景描绘,使人们在观赏时产生无穷的兴味,如虹桥争道的行人和桥栏观景的闲人,与河中倒桅大船上的船工,对比产生动静各异的效果;酒楼上一边宴饮,一边向外眺望的酒客,与楼下从车上装卸货物的车夫,作坊里制作弓箭的匠人,对比产生忙闲不均的感觉等场面,表现出画家对于生活观察细致入微,表现手法活泼生动的艺术功力。

除了上述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整幅作品由于是真实展现了12世纪中国城乡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貌,还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人们对于北宋时代汴京的人文情貌最直接的了解就来自《清明上河图》,从中不但可以考见当时的建筑形制;而且酒楼外耸立的“观楼”,简直就和后代广告牌式的建筑装饰一样。我们还可以根据它研究当时的服饰制度和车马乘骑方式等等。如果将画中所描绘的极其珍贵的形象资料,与宋代记述都城生活和风土人情的《东京梦华录》等宋人笔记以及描写宋代社会生活的《水浒传》合而观之,会产生更加丰富生动的立体印象,人们誉之为“伟大的历史画卷”。

《清明上河图》以它独有的强大艺术感染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张择端之后直至明清时代竟出现了数十种摹仿之作,为收藏这幅杰作,还会发生过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清明上河图》大约是在清嘉庆四年(1799年)流入清宫内库的,1911年后被溥仪带到长春,抗战胜利后,入藏到故宫博物院,这其中的曲曲折折,已被写成多种文学作品,广泛流传。

《清明上河图》本身也给我们留下许多不解之谜,首先,关于画作的名称就有很多歧义,多数研究者认为作品描绘的是北宋国都

《满江红》作者之谜

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的汴河两岸早春清明时节的情景，因汴河俗称“上河”，故名。但近年有研究者认为“清明”并非指画中表现的时间季节，而是画家将作品进献皇帝时，歌颂当时经济繁华、生活富足所用的词语，这一派研究者从画作所描绘的内容推断，图画所表现的时间不是清明，而是秋天的景色，并从画中找出内证，比如，画中人物带扇子的达十多人，有几个孩子光着下身在街上嬉戏，河岸小贩的桌子上摆着切开的西瓜等，分明是一派秋色，为何不说是夏天，而定为秋天呢？这是因为当时著名的“汴京八景”一向是以“汴水秋风”居首的，描绘承平治世的宫廷画家自然不应当画错了。

另外，关于作者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无名款，卷后有金代张著在 1186 年的题跋，认为此图为翰林张择端所绘，元代收藏家杨准在一段跋文中提到，画卷前曾有宋徽宗赵佶题写的标题，由此得知张为徽宗时画院的画家，其余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从现有史料来看，只知道他是北宋末年的宫廷画家，擅长风俗画，自成面貌，留存的张择端画真迹，只有这幅《清明上河图》。究竟张择端何许人也，他创作此画的意图何在，其创作方法与创作周期如何，还须研究者进一步的考证、发掘。

《满江红》作者之谜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首《满江红》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通篇风格粗犷，音调激越，一气呵成，不可抑勒，一般认为这是宋代抗金名将岳飞所作。但近代许多人提出疑义，于是文史界就此展开了论战。

一派为否定说。

最早对此词作者提出怀疑的是近代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对《满江红》一词提出怀疑，主要根据有二：(1) 此词不见

载于宋元诸书中,而突然出现于明朝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的岳坟词碑中,不言何据。嘉靖年间徐阶将其编入《岳武穆遗文》,来历不明。(2) 岳飞之子霖、孙珂二代收录岳飞遗稿,不遗余力,前后达三十几年,但岳珂编的《金陀粹编》却无此词。于是他向传统看法提出挑战,并由此引发了百年的《满江红》作者之争。

著名的词学专家夏承焘教授支持余嘉锡的怀疑,并提出了新的论据。认为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最有问题,“以地理常识说,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内。而贺兰山在今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怀疑此词的真正作者是明代在贺兰山参加过抵抗鞑靼侵扰的如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所作。

台湾学者孙述宇将此词与岳飞的《小重山》做了比较,认为词中用了不少岳飞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事迹的典故,实在是罕见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另外《满江红》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风飒飒的英雄诗,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低沉、惆怅,两者的风格和格调截然不同,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笔。

另一派则坚持岳飞说。主要论据是:(1) 该词之所以没能收入岳珂专为其祖辩诬的《金陀粹编》,是因为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岳珂没能及时发现此词。岳飞冤死时,被簿录其家,连奏议文字迹也遭毁弃。发还文稿时,“其佚篇盖不可殫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四库全书总目》卷158)。(2) 宋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见于明清的甚多,历史上也常有一些重要篇章在当时被遗漏或湮没而后又重见天日的,如韦庄《秦妇吟》、张文成《游仙窟》,甚至孙臆的《兵法》,都是后来很晚才为人发现的。(3) 词中的“胡虏”、“匈奴”、“贺兰山”皆借古喻今,并非实指。

台湾学者李安认为《满江红》词乃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九江”。他的根据有三条:(一)

《满江红》作者之谜

岳飞 30 岁时 (1133 年) 受到朝廷的恩宠, 始掌指挥大权, “因责任重大, 身受殊荣, 感动深切, 乃作成此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 才有“三十功名尘与土”之句。(二) 岳飞自 20 岁离开家乡转战南北, 至 30 岁由九江奉诏入朝, “计其行程, 足逾八千里。故词中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三) 岳飞 30 岁置司江州时, “适逢秋季, 当地多雨, 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

香港学者苏信就“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阙”一句, 做了解释。他说 西夏与北宋之间屡有战事发生, 真宗、仁宗时向西夏贿赂求和, 才换来了暂时的安宁。岳飞对这段五十多年前的历史当然熟悉。因此岳飞便在《满江红》一词中以贺兰山借指敌境。此外, 苏信还把岳飞在收复建康城之后写的《五岳词盟记》与《满江红》一词做了对照和比较, 认为两篇作品的风格和情怀是完全一致的, 纯系一人之手笔。故而不应怀疑《满江红》词是岳飞之作。

邓广铭也不赞成否定说。他认为 第一, 南宋宝庆初已刊的赵与时著的《宾退录》, 有岳飞《题新涂萧寺壁》的七绝, 岳珂编《金陀粹编》时也未收入《岳王家集》,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满江红》也一样。第二, 不能因为不曾见到, 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第三, 河南省汤阴县的岳飞庙中, 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 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 在明英宗天顺二年 (1458 年) 所写。这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 (1536 年) 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早了 78 年。也排除了王越作伪的可能性, 因为王越取得“贺兰山大捷”前 40 年, 《满江红》已被刻上石碑了。

陈非曾 1995 年著文, 指出岳飞绍兴三年 (1133 年) 赠祝允哲的《满江红》及祝的和作, 与岳飞后来的《满江红》风格、内容一致, 因此认为, “当是岳飞后来在特定处境中, 以自己的原作为基础, 适当吸收和作中的一些词句, 并改词题为《写怀》, 表达自己轻视过去 (已建勋业不足道) 神往未来 (赶走敌人收复失地) 的精忠报国的胸

怀。’至于贺兰山，按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一书的观点，共有三座贺兰山，一是宁夏中部，二是河北磁县，三是江西赣州西北，岳飞词中的“贺兰山”应指河北磁县西北部的那座贺兰山，此地曾是抗金战场，岳飞也曾驻过此地附近，贺兰山就是他的练兵场。“这一座贺兰山在‘连结河朔’中是重要的战略据点，又是‘直捣黄龙府’必争之地，对于岳飞有着特殊的意义。”

至此，关于岳飞《满江红》一词的真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看来这场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其实无论它是不是出自岳飞之笔，《满江红》都是一首慷慨激昂、充满爱国精神的好词，也仍然会被人们广为传诵。

杂剧《西厢记》的作者是谁

描写崔莺莺与张珙的恋爱故事的元代杂剧《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取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数百年来，它所表达的“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祝愿，深深叩动着青年男女的心弦，连《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也称赞它“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西厢记》原刊本现在已无从见到，现存的大都是明人校订本。也正是从明代开始，对于它的作者是谁，出现了几种不同说法。元末钟嗣成的《录鬼簿》认为是王实甫，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及稍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也持有同样看法。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人提出《西厢记》是关汉卿作或者关汉卿作王实甫续和王实甫作关汉卿续三种意见。《西厢记》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所谓“关作王续”、“王作关续”，意即其中第五本系由王或关补续。王实甫和关汉卿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因此《西厢记》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各家都拿不出证据确凿的理由来。主张“王作关续”最早的明代戏曲作

杂剧《西厢记》的作者是谁

家徐复祚在《三家村老委谈》中,指出《西厢记》第五本“雅语、俗语、措大语、自撰语层见叠出”,文学风格和语言与前四本不统一。明末卓人月将《西厢记》第五本和前四本分别与宣扬“始乱终弃”的《莺莺传》作了比较,认为《西厢》“全不合传,若王实甫所作犹存其意,至关汉卿续之则本意全失矣”(《新西厢》自序),也主张“王作关续”。明崇祯十二年张深之校正本,更是署明“大都王实甫编,关汉卿续”。到了清初,金圣叹批本《第六才子书》盛见流行,“王作关续”说也几乎就成了一时之定论了。

解放后,国内比较通行的看法都认为《西厢记》为王实甫一人所作。解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所谓“王作关续”,是封建统治者对《西厢记》的排斥和丑诋。谭正璧也认为《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的说法是可信的,但他又认为,关汉卿也是作过《西厢记》的,不过不是杂剧,而可能是小令(《乐府群珠》卷四中,就有关汉卿作的总题为《崔张十六事》的《普天乐》小令十六支),这就是后人误传关汉卿作或续作《西厢记》杂剧的由来。从二十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又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例如,陈中凡既否定王实甫独作说,也不赞成“王作关续”说。他认为《西厢记》确实原属王实甫的创作,但那不是多本连演的杂剧。元杂剧的通例是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独唱到底,而现存的《西厢记》却打破了这些限制,在王实甫生活的元代前期还不具备这种条件。再则,《西厢记》与公认为王实甫所创作的《丽春堂》等剧相比,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有极大的差异。因而可以推知现存的《西厢记》是在元曲创作阵地南移到杭州,受到南戏影响后,由元代后期曲家改编而成的。其中第五本所用的曲调完全打破了前四本遵用北曲联套的习惯,唱法也不尽相同,自由运用声腔尤见进步,证明第五本尤为晚出。不久前,又有人从《西厢记》全剧情节发展的时间上的疏漏,结局与主题的不同等方面,论证了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认为《西厢记》在第四本“惊梦”之后便告结束,不仅符合我国传统戏曲

的结构特点,而且改变了当时戏曲作品以大团圆来结尾的通病,否定了夫荣妻贵、衣锦荣归的封建正统观念,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极其高明。而第五本的结局,只有在元末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由于重新开放科举仕进之阶而有了一些变化之后才可能产生。同时,从史料记载来看,无论是最早有关《西厢记》记载的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还是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都只摘引了《西厢记》前四本,而没有任何第五本的资料,因此推断“王西厢”的原本应是四本,金圣叹将第五本定为“续书”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关于《水浒传》的作者,自来异说纷纭。

流传较广的说法,认为此书的作者为施耐庵。

历史上确有宋江其人。宋江等三十六条好汉聚义的故事,南宋时即在民间广为流传,有的说书先生将其逐渐演绎成评话。宋末元初,有一本叫《大宋宣和遗事》的书,其中记载了宋江故事的轮廓。到了元末明初,施耐庵将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话本加以艺术加工和创造,完成了百回本《水浒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水浒传》系施耐庵所作。

但是,有的学者提出来,元末明初决不会出现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水浒传》最原始的本子应是郭勋的百回繁本《忠义水浒传》,这是郭勋指使他的门客编写而成的。在创作过程中,著者参考了宋元人的话本、笔记、诗词、元杂剧等。据考证,郭本《水浒传》中若干地名均为明代建制。明初以前无人提及《水浒》,而可考的早期述及《水浒》的文献已在嘉靖以后。《水浒传》成书当在明嘉靖十一年——十二年(1531 - 1532年)。嘉靖时还没有公开署真名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于小说卷端之例，所以施耐庵并非真实姓名，而是《水浒传》原作者为逃避文网伪托的姓名。

有的学者认为，施耐庵确有其人，并非伪托之名，《兴化县续志》载“施耐庵墓志”，说他原籍苏州，后迁居淮安。元朝至顺年间中进士，卒于明洪武初年，年 75 岁。现在兴化县新垛乡施家桥村尚有施氏墓地。根据新发现的《施氏长门谱》和《施廷佐墓志铭》，可以说江苏省大丰县白驹镇是施氏故居和宗族所在地。

从《施氏长门谱》和《施廷佐墓志铭》两件文物史料看，元末明初年间，兴化白驹有过一位名叫施彦端的人。《施氏长门谱》记，“第一世始祖施彦端”，旁注“字耐庵”三字。

施彦端是不是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呢？学者们看法不一，各执一是。

《施氏长门谱》乾隆四十二年序言中说，自明迄清所传族谱已消亡，此谱系后人“访诸耆老，考诸各家实录”修辑而成。根据此谱体例，各代姓字均书写在正文行内，独“字耐庵”三字写于行侧。有人经仔细辨认，认为“字耐庵”三字笔迹墨色与他字有异，可能是抄录后增添的。《施氏长门谱》与《施氏族谱》均附录了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咸丰谱中记“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这段至关重要的话却不见于乾隆谱。据考，施耐庵著《水浒》的说法很可能是咸丰五年施氏后裔在建立施氏宗祠，重新修谱时添加进去的。

关于施氏的历史记载不仅零零星星，且多有自相矛盾之处或伪造之嫌。施氏家谱出自清咸丰年，不足为据。再据版本分析，施耐庵不可能是元末明初人。一些人士认为，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论断难以成立。

另一些人士认为，《施氏长门谱》中“施彦端字耐庵”的记载不能轻易否定。施彦端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施廷佐墓志铭》不仅有关于始祖施彦端的记载，所列几代谱系与《施氏长门谱》

也大体相合。兴化、大丰一带不断发现有关施耐庵的文物史料,又流传许多关于施耐庵的传说,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水浒传》的作者为罗贯中。

论者认为,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于前,创作《水浒传》于后,两书存在的明显差异恰好表现了作者在世界观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创作上也日趋成熟。

罗尔纲在《学术月刊》上撰文《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也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他说,罗贯中的老师施耐庵是不会来抢劫他的学生的著作的。

罗尔纲将《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两书中的赞词、叙事以及对人民大众态度等相互对勘,发现《三遂平妖传》全部赞词二十一篇,其中有十三篇插入《水浒传》中十五处。罗尔纲认为,这种情况表明,只有同一作者的著作才会如此。

《三遂平妖传》为罗贯中所作,世无疑问。据以上考证,《水浒传》也是罗贯中所作。

关于罗贯中为《水浒传》作者的说法,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中也有记载。

罗贯中是一位小说家,他撰写的长篇小说除《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外,尚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及杂剧《风云会》等。罗贯中生年约为元天历三年(1330年),卒年约为明建立二年(1400年),是元末明初人。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年间的学者断然否认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因为到嘉靖年间,罗贯中去世已百年有余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水浒传》的作者不光是施耐庵,也不单是罗贯中,而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

持此说的论者认为,《水浒传》所见最早本应是天都外臣序本,其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明代高儒《百川书志》著录其所见本,曰:“《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

《三国演义》成书之谜

次”。郎瑛《七修类稿》所记与此略同。根据此说,《水浒传》是施作罗编,由施耐庵、罗贯中二人通力合作而成。

历史上有没有施耐庵这个人?施彦端是不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学者们有争议。罗贯中一生写了许多小说,是不是写了《水浒传》?缺乏史料记载。至于施作罗编、二人合作撰《水浒传》说,学者们也议论纷纷,不以为然。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看来还得寄希望于发掘新的有价值的文物史料,方能解开作者之谜。

《三国演义》成书之谜

三国的故事最早记载在史书上面,如两晋人陈寿所写的《三国志》,那是二十四史中的一部,是学者所写的“正史”。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并不是由某一个文人独立创作的,它的成书过程很漫长。

三国的故事在民间开始流传,至少在晚唐时就已开始。晚唐有位大诗人李商隐有一篇《骄儿诗》上记载了当时讲三国的事情:“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宋代时,说书唱戏很发达,因为三国故事的内容很生动,就自然成了艺人们喜欢采用的素材。北宋时,有个专门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很受欢迎。说“三分”也就是讲说“三分之国”的故事。南宋到元,三国故事开始大量被搬上舞台,金元时代演出的三国剧目就有《三英战吕布》、《赤壁鏖兵》、《隔江斗智》等三十多种。元代还产生了一部《全相三国志平话》,它是三国故事最早的写定本,是根据口头说唱写下来的。但由于没有经过文人的加工,写作上粗糙,文词鄙陋不通,人名、地名也多谬误。

以上这些说唱和本子,基本上都是拥戴刘备、张飞一伙而反曹操的,不管如何简陋粗糙,却为更精备完整的《三国演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罗贯中正是通过改编、整理,并参阅陈寿正史而写出影

响深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这本书最早的刊本是嘉靖本,全书二百四十则(节)。自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了之后,新的刊本也纷纷上市。一般都以嘉靖本为底本,做了些插图、考证、评点和文字上的增删,以及卷数和回目上的整理工作。古人没有“版权”一说,因而怎么改,怎么出都没关系。有的就将嘉靖本的两“则(节)”合并成一回,以至形成了后来的一百二十回的构架。

清朝康熙年间,毛宗岗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底本,经过辨正史实、增删文字、更换论赞、改回目为对偶,使全书水平又一次提高,封建“忠”、“义”思想也更增加。这就是后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写的是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故事。通过对魏、蜀、吴三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等复杂斗争的艺术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人民在动乱时代的苦难,表达了反对战争分裂,向往国家统一和歌颂忠义仁政、谴责暴政奸诈的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作为以政治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历史小说,凝聚了在漫长封建时代中所积累下来的丰富的军事、政治斗争知识和实际经验,反映了以智者为中心的英雄史观。善于描写战争是它艺术上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时以人物为中心,着重描写双方的战略战术、形势对比和地位的转化,从而使大大小小的战争千变万化,各具特色。人物塑造也十分成功。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摇曳多姿。所写四百多个人物,大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尤其注意把人物放到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表现其思想性格。关羽、诸葛亮、曹操、张飞、刘备、周瑜等,已成为中国文学画廊中的著名艺术典型。其中不乏浪漫主义成分,惟人物性格缺少发展。作品结构宏伟、布局严谨。头绪纷繁却又剪裁得当,情节曲折,场面壮观。采用半文半白的浅近文言,语言简洁生动。清初毛宗岗假托金圣叹之语,称之为“第一才子书”。

《西游记》作者之谜

《三国演义》标志着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在推动历史演义小说的繁荣及戏剧、评话等的创作,均产生过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西游记》作者之谜

《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不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脍炙人口,《西游记》本身也给人们留下许多不解之谜,《西游记》作者到底是何许人也?至今还是个谜。

中国古代读书人,大多遵循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教诲,著书立说大多是“代圣人立言”,对于署名一事本无所谓,至于像《西游记》这样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小说家言”的著作,则署名与否更非必要之事了。对于《西游记》的作者,仅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已经很难说清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不解之谜。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长期以来聚讼不止,焦点逐渐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金元之际,借成吉思汗之力将全真道教发展到全盛时期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另一个是早已湮没无闻的明代嘉靖时期的江苏淮安贡生吴承恩。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明代《西游记》刊本,都不署撰人。清初有位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在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中找到了一篇被明代金陵世德堂在万历二十年刊刻的《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中删去的第九回唐僧出身事迹,编著了一部笺评本《西游证道书》。在这本书里,汪澹漪首次将《西游证道书》署上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的大名。此后又有人用《大学》和《周易》解释、研究《西游记》,在谈到《西游记》作者时,都毫不含糊地认为就是丘处机所作。

清代同治元年刊本《山阳志遗》的作者吴玉搢对丘处机说首次提出疑问,他提出另一位作者吴承恩,他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淮贤

文目》一书中的吴承恩名下有吴的著作书目，其中有《西游记》的名目，但篇幅、卷数皆无；二是认为《西游记》“书中多吾乡方言”。但这些都不足为证，由于吴玉搢拿不出更确切的证据，所以只是怀疑而已。

清末冒广生著的《射阳先生文序跋二》中，断言“其（吴承恩）所著《西游记》风靡一时，盖振奇之士也。”他的证据是他见到了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乃是一篇游西域的游记，因而证明丘处机不是《西游记》作者，确认吴承恩才是《西游记》作者。

1923年，胡适根据上述材料，在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证据的前提下，“大胆假设”，将《西游记》的著作权正式授予吴承恩，迄今出版的各种《西游记》版本都无一例外地署名吴承恩。吴是否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呢？当代仍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异议。

关于吴承恩，我们知之甚少，李安纲先生在《苦海与极乐》一书中，从各种角度深入探讨了《西游记》的文化内涵，得出结论：“吴承恩决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因为他根本不懂中国儒、道、释三教的传统文化精髓。”那么，《西游记》作者到底为谁？还须有心之人不断探索。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聚讼纷纭近400年之久，迄今仍无定论。

《金瓶梅》问世时，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并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但因此书丰富的思想内容、娴熟的艺术手法，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日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因此学者们对于探索它的作者问题，始终抱着很大的兴趣。

从现有的各种材料记载来看，晚明就有人提出了《金瓶梅》为“某大官家中的教师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所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

作,由于这些看法纯系传说,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过《金瓶梅》一书乃“出于嘉靖间大名士之手”的话,而研究者们一时又找不出更为确凿的材料来证明这种推测性论断的不可靠性,因此,尚能迷惑一些人。入清以来,“嘉靖间大名士”如徐渭、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卓吾等人,都曾被假定为《金瓶梅》的作者。不过最为流行的看法,则是指嘉靖年间的大文学家王世贞。据传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因献《清明上河图》的赝品,为唐顺之识破,因而得罪于权臣严嵩和严世蕃父子,最后被残害致死。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给严世蕃投其所好。书的内容隐射严嵩父子,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而书上又涂有毒药,书阅毕,严世蕃即中毒而亡。这个故事后来成了“寓意说”、“苦孝说”的根据。

1932年,山西省发现了《金瓶梅词话》,书前刻有“欣欣子序,兰陵笑笑生作,明万历四十三年”字样。它比原来的明崇祯天启年间的刻本——《绣像金瓶梅》和在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根据崇祯本批点的《第一奇书金瓶梅》都早。由于这一新版本微露了作者的端倪,因而研究者们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辨更为重视。1933年10月10日《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率先对上述旧说提出质疑。该文用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查阅了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以翔实的史料作依据,剖析了前人据以立论的主要根据——《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族的关系,得出历史上的王世贞之父并非献假图受害,严世蕃亦非中毒身亡的结论,就有力地否定了牵强附会的“寓意说”和“苦孝说”,也否定了《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的传统看法。吴晗还从书中大量运用的是“山东方言”这一点来看,认为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三年官,但要像当地土著一样使用方言写出如此巨著是不可能的。他明确提出,《金瓶梅》应为万历十年——三十年的作品,作者绝不可能是所谓的“嘉靖间大名士”。时隔不久,有不少研究者撰文支

持吴晗的观点。例如,王采石在《民治月刊》第二十期上发表《王世贞未作〈金瓶梅〉之确证》,说:“《金瓶梅》叙宋代之事俱不得要领,与王世贞‘博雅’的史学修养存在矛盾。”赵景深也发表了《谈〈金瓶梅词话〉》一文,确定“笑笑生”为山东峰县人。这样,王世贞非《金瓶梅》作者,在当时似乎已成为定论。然而,“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却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更趋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六说:

一、王世贞说。有的研究者主要根据《明史·王世贞传》和《万历野获编》以及有关王世贞的身世、生平、籍贯、爱好、文学素养、社会经历、思想风貌、创作时间、生活习惯等,与《金瓶梅》全书对勘,认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与王世贞的各种情况都“很对口径”、“王世贞的影子完全摄在《金瓶梅》中”,所以,“王世贞是最有条件写此书的作者”。

二、李开先说。有的研究者认为,李开先的身世、生平和“对词曲等市井文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等,与前人对《金瓶梅》的说法不谋而合,作品本身证明它同李开先关系密切,把《金瓶梅》和李开先的《宝剑记》作比较,就会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所以,《金瓶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而这个写定者是李开先。

三、贾三近说。有的研究者从新发现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册中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后的四篇题跋中,纠正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的两处错误,从而也否定了王世贞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以前有关《金瓶梅》作者的各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破绽,即籍贯不是“兰陵”(即山东峄县)。《金瓶梅词话》序中的“兰陵笑笑生”,是峄县人无疑,而此“笑笑生”是贾三近。因为在嘉、万年间贾三近的生平经历、文学素养、世界观和精神气质、笔名和《金瓶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

梅》全书所反映的内容较为相符。贾三近所作《左掖漫录》当是《金瓶梅》的原稿。

四、“吴依”说。所谓“吴依”，是“生长在吴语地区，或是受吴语影响较深的人”的昵称。有的研究者从《金瓶梅》书中多次运用吴语词汇这一点来证明“改定此书的作者当为一吴依”，并不一定是山东人。还有人曾将《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两书进行对照，从作者所用的方言中发现了许多疑问。特别是作者对山东的地理知识，“似乎十分模糊”，说是“山东人”的可能性不大。

五、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说。有的研究者从明人有关《金瓶梅》的记载、词话源流及书中保留的说唱文学特点的例证认为，《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大文学家个人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民间艺人参加的、经过多人加工整理的作品。还有人更进一步指出，在《金瓶梅词话》以前，应该有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后来却把这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改写为《金瓶梅词话》，虽保留了词话的名称，实际上是普通小说。

六、屠隆说。有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成书的确切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间”，这样，作者定非“嘉靖间大名士”。从《金瓶梅》的内容来看，作者应是一个很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玩世不恭，而又做过京官，“好叙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说戏曲游戏文字”的人。明代万历年间文学家屠隆在《开卷一笑》中曾用过“笑笑先生”的代名，“笑笑先生”当为“笑笑生”，而“兰陵”应为江苏武进，是屠隆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他的书斋是“婆罗馆”，正是取名于武进的古巷。从屠隆的籍贯和生活习尚看，符合著《金瓶梅》的作者条件，万历十二年，屠隆在京师正意气风发之时，被讦与西宁侯纵淫而罢官，使他看到世态的艰险，同时更纵情于诗酒声色。这种遭遇和身世以及对社会的认识，都和《金瓶梅》中所揭露、鞭挞的相一致。屠隆对人欲的看法是“既想治欲，又觉得欲根难除”，这与《金瓶梅》既“企图否定过度的淫欲”，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赞赏”的

观点也是吻合的。屠隆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善恶并采，淫雅杂存”，不必对“淫”的描写躲躲闪闪。这些都是产生《金瓶梅》的特殊思想基础。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对其著作权问题的各种研究，都有助于深入探讨此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这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红楼梦》的原作者是谁

产生于“乾隆盛世”的文学名著《红楼梦》，是我国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是一部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作者在继承民族文化的传统基础上进行了巨大的创造和发展，融散文、诗、词、曲、联为一炉，并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特色，登上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高峰，受到了很高的评价。不仅在中国文坛，而且在世界文坛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现在已被译成了三十多种文字，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奇珍。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红学”。

一般人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的，高鹗续了后四十回。鲁迅先生说：“《红楼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因为这是书上写着的。”这种看法在有关史料（如《八旗画录》和《八旗艺文编目》）中亦有记载。还有几乎和曹雪芹同时代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这样写着：“康熙年间，曹栋亭为江宁编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所以，自清乃至近代鲁迅、胡适等都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无疑。

但是，“红学”研究者在对《红楼梦》进行长期研究中，透过对许多历史资料的真伪辨析，认为《红楼梦》除了曹雪芹这样一位卓绝的“披阅”、“增删”整理加工者外，还应该有一位原作者。因此，“红学”研究者在《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多少年来，一

《红楼梦》的原作者是谁

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一、脂砚斋眉批设疑问。脂砚斋在庚辰本第十三回有一条眉批曰:“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曹雪芹是壬午(1762年)除夕去世的,而庚辰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年秋定的。当时曹雪芹尚在世。如果其作者是曹雪芹的话,脂砚斋在评书时是绝不会“失声大哭”的,也决不会问出“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再把时间倒推三十年,当时曹雪芹只有十几岁,按常理讲,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根本写不出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的。

二、《红楼梦》成书过程作证明。在《红楼梦》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空空道人因空见色,自色生情,传情入色,由色悟空,遂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目,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这显然告诉读者,《红楼梦》的原作者是“空空道人”,又名情僧,曹雪芹只不过是对该书进行“披阅”、“增删”而已。又在《红楼梦》甲戌本第十三回的一条批语中有“命芹删去”的说法。这就证明了《红楼梦》的成书,有一个原作者,又有一个进行“披阅”、“增删”的,他们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三、《随园诗话》有误影响深。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关于《红楼梦》作者的记载显然不确。别的不说,把曹雪芹和曹栋亭之间的辈分都弄错了,芹和亭之间本是祖孙关系,而袁氏却把他们说成是父子关系。并把《红楼梦》说成是“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专写妓女和妓院生活的书,这岂不有点贻笑大方的味道,这也说明袁氏说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所以成书于《随园诗话》后的《八旗画录》和《八旗艺文编目》两书,显然受到袁氏说法的影响。《八旗画录》不得不实事求是地说:“对曹雪芹此人并不了解”,“惜文献无征(即证)不能详其为人”。

另外,在《红楼梦》的最早的几个版本中,都有戚蓼生、程伟元和高鹗等人写的序,他们都未肯定曹雪芹为《红楼梦》的作者。戚、高的序连曹雪芹的名字都未提。程伟元的序也只说:“《红楼梦》小说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于何人,惟书内记曹雪芹先生删改过。”

四、当代学者探本源。鉴于以上原因,当代“红学”研究者对《红楼梦》的原作者进行了这样的推测(见《求索》1986年第1期):

第一、《红楼梦》原作者年龄应比曹雪芹大6-10岁的样子,这样他才能了解曹家鼎盛繁华的生活,而在小说中重现。再者,他的辈分应比曹雪芹高一辈,这样才符合“自传”说法的人物辈分关系。

第二、那些评书者,在谈到《红楼梦》的作者时,大都讳莫如深,不敢直书其名,只用了一个化名——“空空道人”。在写曹雪芹时,毫无忌讳,直书其名,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因而,《红楼梦》原作者可能是一位带罪的朝廷命官,后被削职隐匿民间或出家为僧。

尽管如此,曹雪芹为《红楼梦》的成书“泪尽而逝”,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投入对《红楼梦》的伟大而艰巨的“披阅”、“增删”的再创造中去,他的光辉业绩是名垂史册的。

现在仍然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红楼梦》原作者,像一颗埋在泥土中的璀璨的珍珠一样,他的业绩也是同样永放异彩的。

《红楼梦》的原作者到底是谁?“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

《聊斋志异》成书之谜

《聊斋志异》的作者是蒲松龄,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他是在什么背景下写成此书的呢?一般认为,此书是蒲松龄在广采民间传说、野史逸闻的基础上,加以亲身见闻,经过艺术加工再创造而成。而且这部“孤愤之书”是作者有感而发,借谈狐说揭露封建社会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罪恶,歌颂被压迫者的反抗,歌颂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批判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果真如此吗?

《聊斋志异》成书之谜

蒲松龄(1640 - 1715)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从青年时代起,为了求得科举进身,“日夜攻苦,冀得一第”。19岁初应童子试,考取秀才,在县、府、道的考试中连得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此后却屡试不第。他31岁开始出外谋生,先在江南宝应县知县孙蕙处当了一年幕宾,以后便长期在缙绅家设馆教书,70岁撤帐家居。直到71岁,才援例选了岁贡生,四年后,他就去世了。学者们据其生平,广征史料,论证其写下此宏篇巨著的原因。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家境贫困。蒲松龄一辈子生活在农村,过着“家门暂到浑如客,囊米将空始欲愁”的穷愁潦倒的日子。蒲松龄生于小康之家,稍长家境败落。他才富五车,也只好穷守敝庐。为养家糊口,蒲松龄到外乡坐馆,以“舌耕”度日。在此期间,他多次为人代笔,写寿屏锦幛、叙跋疏表,无所不包。康熙十二年淄川大旱,眼看要过年了,孩子们闹着要吃要穿,而家里却无隔夜粮,甚至连给灶王爷供奉的祭品都没有。蒲松龄呼天唤地,悲从中来。绝望之中,他只能把搜神志怪、神异故事当做自己的精神食粮,勉强撑持着活下来。

二、科场失意。蒲松龄一生接受的是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他始终把金榜题名、荣宗耀祖当做正统的人生道路,而把科场失意看成是遗憾终身的大事。因其父蒲磐的影响,蒲松龄从小喜爱读书,经、史、诗、文皆过目成诵。19岁时,在县、府、道连考三个第一,中了秀才。但此后几十年,屡次考试总以“病鲤暴腮,飞鸿铩羽”结束。康熙十七年,他再次落第,和朋友李文貽泛舟大明湖,借以消愁。面对良辰美景,他愁上加愁,泪水潸然而下。之后,写下了《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一词,感叹自己固然是抱玉卞和,无奈考官是糊眼冬烘鬼,也难以进身。在历尽辛酸之后,蒲松龄逐渐清醒。八股文的重压、科举考试对读书人的荼毒,功名不就的失意,考官的愚智不分,一股脑儿涌上心来,他满腔悲愤,似骨鲠在喉,必求一吐为

快。他的创作具有明确的目的,即为了反映自己生活的时代,抒发自己的情怀。他在《感愤》诗中说:“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在《聊斋自志》中写道:“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因此,从《聊斋志异》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的胸中磊块,而且透过作品的狐鬼精灵、奇人异事,还可以真实地看到清代顺治、康熙王朝的时代冈石。

三、知识渊博、广具才能。年轻时,蒲松龄和朋友张笃庆、李希梅、王鹿瞻等,曾结为“郢中诗社”,以求在学问、道德、文思方面有所发展。他们赋诗酬答,相互磨砺。由此练就了文字功夫。康熙年间,蒲松龄曾住进青云寺苦读,晨诵夕读,不遗余力。青云寺以它的甘泉春雨、朝霞彩虹陶冶了蒲松龄的文学灵性。他不仅擅长短篇小说创作,而且精通诗文词曲。他毕生写下了大量的作品,著有《聊斋志异》四百九十余篇,诗九百余首,文四百余篇,词一百余阙,俚曲十四种,戏三出,杂著数种。在他的许多不同体裁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揭露官府豪绅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反映社会黑暗和民生疾苦。如诗《空城雀》、《日中饭》、《道殣》,文《纪灾前编》、《纪灾后编》,词《贺新凉》等。《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它在作者四十岁前后就基本写成,以后又经过长期的修订增补。虽然它的题材多数来自口头传说,但是大多经过作者的再创作,赋予新的内容和思想意义。

四、幕宾生涯,增广见识。康熙九年九月,蒲松龄应朋友之邀,做了扬州府宝应县知县的幕宾。在此,他多次随知县视察民情,治理河道,欢宴游历,应付上司。大半生身居穷乡僻壤的蒲松龄,惟一次混迹官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方面,他目睹了吏治的黑暗,另一方面,南方山水的钟灵秀气也使这位老夫子陶醉其中,欲发泄而后快。他是一个平生很少出远门的人,看起来仅仅登过泰山和崂山,多次到过济南而已,所以有机会到淮南游历就不免感受特深,沿途的景物他都写进诗篇中去。形成了他的诗的特点,进

《镜花缘》的作者是谁

而也就形成了文章的特点,甚至影响到《聊斋志异》的风格特点。蒲氏在南游时已经在搜集故事,先用诗的形式写出试看,然后再写成小说。蒲氏有《独坐怀人》诗一首,中有句云:“途穷书未著,愁盛酒无权。暮笛惊残梦,深窗坐小年”,虽说是“书未著”,其实“书”的内容已经在残梦后的深窗下酝酿了。假如蒲氏不曾有南游的亲身经历,没有多少篇七言律诗的试写,小说是不容易写到这种境界的。

五、胞妹不幸。蒲松龄的妹妹,嫁了一个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丈夫。蒲家经济窘迫又无权势,无法顾及其妹。后来,妹妹来求胞哥帮忙,兄妹相对无语,只有泪长流。聪明、善良的胞妹的不幸遭遇,使蒲松龄对下层妇女的生活境遇、社会地位有了进一步认识,成为其描写妇女不幸和抗争的主要契机。

以上只是蒲松龄写成《聊斋志异》的外在、内在原因。其实,蒲松龄整整花费了三十余年时间,写成四百九十余篇聊斋故事,大概不会像写一部辞书那样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如果非要说是有什么原因的话,那应该是生活,是不如意的生活硬从强烈希冀科场进身的蒲松龄身上挤出一部流芳百世的《聊斋志异》。

《镜花缘》的作者是谁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清人李汝珍将费时十数载写就的《镜花缘》稿交由苏州一刻坊刊行。以后几十年,7次刊行。1955年,张友鹤又据苏州原刻本校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镜花缘》重新印行。但是,在前后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关于《镜花缘》作者问题却争论不休,成了一大疑案。

《镜花缘》苏州版初刻未就,就先有人据《镜花缘》二稿传抄本于江宁桃红镇私刻售行。接着,在一般市民和知识阶层中便陆续出现了关于《镜花缘》作者的种种口头传说。到二十世纪20年代,

知识界正式展开了争论。先以江苏海州的吴鲁星,继而有江苏板浦的许绍蘧,力主《镜花缘》作者并非李汝珍,实为板浦“二许”(许乔林、许桂林兄弟。他们是李汝珍的子舅)。提出了“许作”说(《镜花缘》为“二许”所作)及“许凑”说(《镜花缘》不是李汝珍一人作,而是李与二许一起凑趣而成)。与此相反,孙佳讯先生等,连续著文,据实一一驳述,力主《镜花缘》确为李汝珍一人所作。其间,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也分别就《镜花缘》的文学价值、著者及版本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镜花缘》脱稿后,李汝珍曾附信将稿送给许氏“斧正”,实意是要许氏为之写序。当时许氏兄弟在海州地区声望较高,几乎妇孺皆知。许乔林遂为之作序一篇,篇末署“海州许乔林石华撰”。囿于当时文禁尚严,《镜花缘》书并未署李汝珍的姓名。直至道光元年(1821年)本,书末才增刻《松石歌》(“松石”即李汝珍)。阅读者未见著者姓名,只见书序撰者,率说《镜花缘》著者是许乔林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民间传说的主要起源。

其后,吴明星等人又据许乔林所作序文内容指出两个疑点:序文中有“相传北平李氏以十数年之力成之”的字句,“许和李同时之人,又姻而兼友,岂有李作一百回的大著,他不知道,用‘相传’二字轻轻地说过去呢?”“况且又未指李氏为何人”,这是疑点之一;另外,序文中又用“昔人称”,“同时之人所作的书,‘昔人’如何得而批评呢?”这是其二。据此,吴认为:《镜花缘》实在是许氏托名李氏以传其书。

对于序文所引起的疑点,孙佳讯认为,许乔林写此序时,鉴于文禁尚严,思想上不无顾虑,这和李汝珍既亲自出马到苏州监刻《镜花缘》,却又不署姓名同出一种“文禁尚严,动笔墨岂有不小心”的心理。用“相传”可给人留下序文作者与书著者素昧平生的印象,又用“昔人”以给人隔世之感,这是为万一“劈版禁书”追查责任留有回旋余地。

《人间词序》之谜

“许作”说的主要证据是说“许氏事迹与此书内容有类似的暗示”，譬如《镜花缘》中“妙算谈天”好似许氏所著《算牖》内容。其实，李汝珍算学虽不如许氏，但李有通算学的老师凌廷堪指导。即使书中吸收许氏算学方面的谈资，作小说也并非犯忌的。

另外，《镜花缘》道光元年本附“题词”十四家，这些题词人都和作者同时，从评语、眉批看起来和作者关系还甚为密切。不少“题词”都或明或暗地点出了《镜花缘》的作者，总括起来，可以结论：该书作者姓李，字松石，籍贯北平。譬如从《镜花缘》第七十三回“看围棋姚妹谈弈谱”为例，该处眉批有“作者本系高手。谈棋自得精微”。而许氏却不知棋道。许乔林曾自言：“余不知弈”。这种从同时期人所作眉批中说明作者是李汝珍的证据不乏其例。更明显的是，作者李汝珍假书中人物之口，数次提及一百回《镜花缘》故事系“士人李某”、“老子后裔”所编。

至于“许湊”说，仅据李汝珍小说与许氏著作内容有某些相似之处，就推论《镜花缘》为李、许所湊，无论怎样自圆其说，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例如小说中用到的关于“打灯谜”，似与许氏所著有关系。这些知识性的资料，并非自成一家之言。李、许关系密切，相互为引是完全可能、也是完全允许的。很难说谁湊谁。况且，这些内容李汝珍并非门外，他“枕经藉史，子秀集华，兼冠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也是许氏对李汝珍的评价。

《人间词序》之谜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附录》中收有署名为樊志厚的两篇序，人们对这两篇序的作者归属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是王国维的假托之作，有人认为是真有樊志厚其人作序。那么，究竟谁是对的呢？

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樊志厚是王国维的化名。《人间词序》只

是王国维托名为樊志厚所作。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王国维的弟子赵万里。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此二序均为先生自撰，而假名于樊氏者。”基于这种观点，徐调孚先生在1939年开明书店即将重印《人间词话》之时，把这两个序一并收入附录之中而刊行于世。但序后王幼安先生做了如下说明：“此二序虽为观堂手笔，而命意实出自樊氏。观堂废稿中曾引樊氏之语，而樊氏所赏诸词，观堂集林亦不尽入选，可证也。”（《人间词话·附录》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显然有违徐调孚先生的原意。赵万里先生否认有樊志厚其人，认定樊志厚是王国维的化名，而王幼安先生则承认有樊氏者，却未道出樊志厚确属何人。

反对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雨。他于1982年在《人民文学》上撰文，认为樊志厚不是王国维的化名，而是山阴樊少泉，字炳清的人。《人间词序》是出自樊少泉之手。这与赵万里先生的看法恰恰是对立的。

历史上的山阴樊少泉，1898年与王国维同时就学于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1900年由于庚子之变，东文学社解散，樊氏与王国维各归故里自学英文。王国维后来任职于湖北农校，他常于闲暇之中作词以自娱，或与樊氏一起品评古人的词作。樊志厚《人间词序》中所说的“每夜漏始下，一灯荧然，玩古人之作，未尝不与君共。君成一阙，易一字，未尝不以讯余。”当指此时的生活。1927年5月3日，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死后樊少泉作《王忠懿公事略》以悼之。文中追述了王国维的一生经历，其中对1902年间的事情做了如下说明：“二十八年壬寅参事（罗振玉）至粤，适通州师范学校聘君为教授，遂未皆往。在通州授课之暇，兼为诗词。”这一段经历，连赵万里先生也未能说得清楚，可见樊氏当时与王国维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文章的末尾，樊氏对王国维进行了很高的评价：“公质朴少华，不事交游，故初不露头角。参事力为振拔，名乃大著，远播欧美，且资之以成其学。故论者敬君之品学，尤重参

《二泉映月》之谜

事之能知人而有以裁成之也。炳清往岁与公同学相交垂三十年，知公深，谨为传略，以告当世。”1898年到1927年，在时间上与樊氏所说是吻合的。樊氏与王国维早年是同窗好友，而且都喜读词，甚至在品评古人词作中也有许多共同的想法。而当1906年，王国维即将刊行自己所作的《人间词话》的时候，自然会想到樊氏，因为在品评词作方面，只有樊氏才是知音，所以樊氏作序，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赵万里先生毕竟是王国维的弟子，刘雨的观点也并未获得一致的公认。《人间词序》究竟出自谁手，还有待于考证。

《二泉映月》之谜

一曲如泣如诉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曾让世人流过多少同情的热泪，如此动人心魄的乐章，是那样的让人欲罢不能，人们陶醉艺术氛围之中时，也曾为作者不幸的身世扼腕不止。

《二泉映月》是盲人艺术家华彦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乐曲采用江苏民间音乐素材写成，运用多种二胡手法和不同力度的变化，生动、细致地表现出饱尝生活艰辛的社会底层人们悲怆的心情和倔强的性格。

整部乐曲是在一个短小的、类似叹息的引子后开始的，继之出现了呈微波形旋律线的第一乐句，恰似对往事的沉思。第二乐句从第一乐句尾音高八度音上开始，在低音区回旋的较为昂扬的旋律，流露出无限感慨之情。进入第三乐句，出现了带切分音的较为急促的节奏因素，旋律柔中带刚，情绪更为激动，全部乐曲将主题多次变奏，使内心的感情得以极为充分的抒发，多次变奏不是表现相对不同的音乐情绪，而是为了更加深化主题，从不同侧面来丰富和加深单一、集中的音乐形象。

《二泉映月》可以说是用华彦钧的心和血凝就而成的。华彦钧（1893 - 1950），人称瞎子阿炳，江苏无锡人，自幼随父亲雷尊殿学

世界未解之谜之中国历史之谜

艺,对他的艺术生涯影响至重的是它的养父——一个孤独贫穷的道士华清和。华清和号雪梅,精通各种器乐,尤以琵琶为最,阿炳继承了华的全部衣钵,对于各种器乐也是相当精通,更以二胡、琵琶的演奏技艺最为精湛,深受人们欢迎,华清和去世后,阿炳经常同民间吹鼓手交往,并参加他们的活动。俗言“福无双至,祸不单行”,25岁的华彦钧在道产变卖殆尽的时候,双目又完全失明,极度不平的生活经历,虽然给他带来很大困难和痛苦,但他没有沉沦,而是将全部情感熔铸在音乐之中,并保持着刚直、倔强的性格和伟大的爱国热情,尽管已经沦落为街头流浪艺人,他仍然倾心艺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作为一位民族艺术家的高风亮节,在日伪统治无锡的时候,他不畏强暴,坚持在群众中演唱抗日新闻。全国解放后,当地政府曾认真计划录制他的演奏曲目,但遗憾的是,只初步录了六首,他就在1950年病故了。

阿炳以悲惨经历和全部心血铸就的《二泉映月》,已经成为民族音乐艺术中的奇葩,它以感人的乐章、精湛的艺术表现手法,永远留存于世界艺术之林。

陶渊明故里之谜

陶渊明在他的《桃花源记》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恬静、纯朴的田园风光。读着他的不朽文章,令人不禁在想,养育了陶渊明这样一位伟大文学家的地方,是不是就和他笔下的“桃花源”一样?陶渊明的故乡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古往今来有着多种不同的说法,至今仍像谜一样。

最早研究陶渊明故里的人是南北朝时期刘宋的颜延之,他在《靖节徵士诔》中写道:“有晋徵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南朝梁沈约在他所著《宋书·隐逸传》里,也说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人,即今江西九江西南荆林街人。唐代李延寿所撰《南史·隐逸

陶渊明故里之谜

传》，也与沈约观点相同。

但关于陶渊明的故里还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陶渊明故里在“栗里”。这一观点始于唐代颜真卿的一首《栗里》诗。唐代诗人白居易也有一首《访陶公旧宅》诗，诗中讲：“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有人认为这首诗中所说的“栗里”，就是陶渊明的故居。宋、元、明许多文人如陈舜俞、朱熹、王伟、桑乔等文史名家也都同意这种说法，认为陶渊明故里是在“栗里”。

到了清代，王谟在他所著《江西考古录》“陶公故居”中提出陶渊明的故居共有三处：一处在瑞州新昌县东二十五里；一处在南康府城西七里，为玉京山，亦名上京；一处在九江府西南九十里柴桑山。

本世纪八十年代，争论就更热烈了。1980年，一位文史专家在《江西历史文物》上撰文称：“颜真卿栗里诗是一首残缺不全的五言古风，没有体现出‘栗里’面貌来。……朱熹根据颜真卿诗定温泉栗里是渊明故里，其实错了”。他认为“定荆林街鹿子坂为陶渊明故里，是最为妥当的”。

1983年，彭泽县文化馆在一次文物普查时发现了陶渊明后人保存的《定山陶氏宗谱·本宗迁居（民国十七年重修）》。陶氏宗谱上记载：陶渊明的父辈由鄱阳迁居柴桑，即今江西九江县马回岭。陶渊明先居住在柴桑，后迁居栗里，即今江西星子县丹桂乡。

依照陶氏宗谱上记载，陶渊明故里之谜应能有个答案了。但由于“柴桑”、“栗里”分属两个县市，两县之间为陶渊明故里命名展开了一场论战。九江市认为“柴桑”在九江市，陶渊明故里应在九江；星子县认为“栗里”属星子县，陶渊明故里应在星子县。这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但至今莫衷一是。

不知是由于陶渊明一生经历的复杂，还是后人对他的敬仰，人们至今仍然不肯轻易首肯任何一家的说法，陶渊明故里到底应该

在哪里,至今仍然悬而未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跟随着陶渊明的笔触一起走进“桃花源”,在他的不朽诗文里,来寻觅这位伟大文学家的精神家园。

“三星堆”之谜

1929年,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在住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不经意间叩开了沉睡三四千年的三星堆文明的大门,并由此拉开了七十年来对三星堆的相继发掘研究的帷幕。随着一大批国宝级珍稀文物出土,一连串惊人之谜接踵而来: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模样不同寻常的青铜面具,几乎千篇一律地全是粗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阔扁嘴,几乎没有下巴颏。这种面具代表了什么?从何而来?属什么人种?在达到其最高峰时,三星堆文明又为何突然从成都平原消失……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距成都40公里。燕道诚居住的“月亮湾”,位于三星堆遗址古蜀国内城的宫殿位置,正是当地所说“三星伴月”中的“月”,而“三星”指的是目前在1号、2号祭祀坑出土的三座土堆,“月”与“星”距离很近。古遗址群距今约4800年前到3000年左右,它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现已发现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已发掘出粮食容器、海贝、青铜雕像、玉石器群等珍贵文物。成为四川迄今为止发现的范围最大、出土文物最精美、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真正使三星堆名扬四海的还是1986年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国宝重器轰然出世,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曾撰文称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三星堆文化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三星堆”之谜

七十年来对于三星堆的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者不懈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年代序列,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面貌、内涵和特征已基本确定。

考古材料反映出巴蜀文化的历史进程。在距今 5000 年左右到 3700 年以前,在成都平原北部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古代氏族部落群体。到距今 4000 年左右,三星堆人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典型的器物群,标志着他们已有了一个完整的民族文化传统。他认为当时的三星堆,范围扩大,房屋密集,居民猛增,周围修建了城墙,社会分化和分工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成为中国与黄河文明等并存的又一古代文明中心。到距今 3000 年左右,即商末周初时期,三星堆文化突然神秘地消失了,给后世留下一片“茫然”,而巴蜀文化的中心则转移到成都地区。杜宇族从此兴起了。

在巴蜀民间,历来传说蚕丛是其始祖,经柏灌、鱼凫,再延续到后来有较多实物证据的杜宇、开明时期。但是,蚕丛及鱼凫这段历时数千年的历史时期,一直被认为是神话。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现,彻底地证实了鱼凫族的存在,并初步找到了一些蚕丛氏和柏灌氏存在的线索。

三星堆考古专家们指出,三星堆遗址这个再现于世的“鱼凫”古国,为探讨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各地文明起源的具体形态、进程及相互关系,为整个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认识和新的资料,值得进一步大规模深入研究。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三星堆是一座无论规模、布局,还是建筑工艺都令人吃惊的古城。1985 年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提出了三星堆可能是蜀国古都的推断。这一推论很快通过考古发掘得到证实。关于三星堆的神秘消失,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三星堆考古专家陈德安介绍,从现有资料看,整个古城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 2000 米,南北宽 2000 米,面积约 3.5 平

方公里,估计当时城内居住人口应在3-5万之间。而城墙墙基宽约40余米,顶部宽约20米,可容5辆桑塔纳轿车在城墙上并排行驶。他认为三星堆毁于一场大洪水。他认为当时的三星堆很像今天的成都,北邻鸭子河,马牧河由西而东贯穿全城。虽然由于三星堆的古蜀先民“择水而居”的理念,成就了它的繁荣,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即:1、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2、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3、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4、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5、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6、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7、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道出了谜团长期无法破解的原因:主要是还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文字记载。

三星堆文化之谜的破译究竟如何进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大观园之谜

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仅成功地塑造了宝玉、宝钗、黛玉、凤姐等一系列鲜活、可人的艺术形象,让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甚至他们的气质、性格、思想等等都活生生地如同生活在我们身边,还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一个世外仙境般的大观园,让一系列的欢笑、悲伤、欺瞒、虞诈、生生死死、是是非非都在这里现实又无情地发生着、经历着。人们如痴如醉地品味和想象着大观园中的一切,也探讨和争论着人间凡尘中是否真的存在如此这般的一个大观

大观园之谜

园,如果有,那么它究竟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早在乾隆时期就开始了。

有人说那红楼一梦就发生在南京小苍山,即随园的故址。当时一个名明义的满州人写了二十首《题红楼梦》的诗,在其中一首诗的小序中写道:“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胜。盖其先人为江宁织造,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持相同的观点:“曹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

也有学者依据脂砚斋在“后一带花园”上批示的“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推断大观园就是曹家显赫时用过的江宁织造署西花园。这个西花园现已改为大行宫小学,据说在修建学校时,曾经在西北角发现了一块刻有“红楼一角”的碑石,后来还发掘出了完整的假山基底和西花园水池,这些实物的发现似乎更加证实了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

还有人根据《红楼梦》中刘姥姥说的“在这长安城中……”等细节认定大观园是在古城西安。

《红楼梦传奇》的作者陈钟麟则把贾家写成在南京,薛家在北京。

还有人依据《红楼梦》中提到红梅、翠竹、青苔、湘帘等景致,认为这个园址一定在南方。

更有一些专家认为《红楼梦》毕竟是小说,而虚构、综合等等都是小说的创作方法,它完全可以来源于生活又不等同于生活。他们认为荣、宁二府和大观园很有可能根本就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创作的蓝本,它是曹雪芹凭借多年的生活积累和想象创造出来的一个“惟一”,其中有着大江南北各处名园的精华。胡适也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至于大观园的问题,我现在认为不成问题,贾妃本无其人,省亲也无其事,大观园也不过雪芹的‘秦淮残梦’的一境而已”。

针对这种说法,许多人提出了异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大观园之所以引人入胜,其魅力就在于真实性。因为后花园的描写在明清小说中就已很常见,之所以没有给读者留下更多的审美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写作手法上虚构的成分太多,使后花园的描写仅仅流于形式,引不起读者的想象和共鸣。曹雪芹的成功在于它突破了这种模式,为读者缔造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真园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红楼梦》时,也就这一问题指出曹雪芹“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说明他也认为人间是真是有一个大观园存在的,而曹雪芹的写实手法,才是他新人耳目之所在。

但是,大观园究竟在何方?

红学家俞平伯著书《红楼梦辨》,并设置专门章节详细论述了这个地点问题,但是最后仍然不得不感慨:“所以说了半天,还和没有说以前,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们究竟不知道《红楼梦》是在南或是在北?……非但没有解决希望,反而添了无数的荆棘,真所谓‘所求愈深所得愈寡’了。”

另一位资深红学家周汝昌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的考证,他从内部结构、建筑风格、民间传说、园子内部的水源,甚至外部及周边的地形地貌等特征,反复论证了他的观点,即大观园就在位于北京西北部的恭王府。周汝昌认为《红楼梦》从姑苏、淮扬两地写起,这两个地方全是曹寅曾经仕宦的地方,但是伴随着黛玉入贾府,其实也就是书中的重点从姑苏转入了北京。从正文内容来看,第二回中,贾雨村在提及甄家时,曾用了如此的定语——“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说明甄家是在南京,第五十六回中,又有这样的描写——“刚说着,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说:‘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一语未完,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来请安……’贾母便问:‘多早晚进京的?……这些年没进京,也想不到今年来。’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进京的。’从对话中的

紫禁城之谜

内容应当可以看出,是南京甄府家的人“奉旨进京”来到贾府,显然贾府不可能也同在南京了。再者,文学界一般单独使用一个“京”字,都通指首都。周汝昌还从宝钗吟咏大观园景物的“芳园筑向帝城西”以及书中提到的“出西门,找到花儿匠……”、“兴隆街”(城内的)等说法,确认贾府的地点应在北京西北部。进而,周根据元春省亲从出行(约为现晚八点)到达荣国府,经历游幸、行礼、开宴、做诗、看戏、叙旧等应酬,到丑正三刻(现凌晨三点)再请驾回銮这段日程所用的时间,判断贾府所在地应位于“宫”西北不远处的地方;再据元春、惜春、宝钗、黛玉等众姊妹题咏新园的“应制”诗来看,“衔山抱水建来精”、“秀水明山抱复回,风流文采胜蓬莱”、“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等诗句,都表明大观园是一个四周山水环抱,秀美程度可与蓬莱相媲美的园林。查考恭王府和周围城建设施的历史变迁,在皇宫内苑之外,什刹海和恭王府组成的景致最符合这一条件。周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国内外许多红学爱好者的认同。

文学界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红楼梦》留给我们的巨大的想象空间和审美意境——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宝玉、黛玉,一千个大观园。时至今日,谁又能说得清楚,曹雪芹梦中的红楼,它究竟在哪里?

紫禁城之谜

紫禁城,名字中就透着一种雍容大气、壁垒森严的非凡气度,听来必是一个与黎民百姓相去甚远的地方。这个堪称城中之城的地方就是明清时期皇家王朝的统治中心,是中央政府的决策重地。它创建于明永乐四年至十八年,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四周被 10 米高的宫墙和 52 米宽的护城河所环绕,里面曾经居住过 24 位皇帝。

这个昔日被御林军严防紧守的皇家宫殿,于 1925 年正式被辟为故宫博物馆,自此普通的百姓才得以一睹“大内”风采,不断发掘和追寻着其中的奥秘。

那么,紫禁城的名称是源何而来呢?

中国自古就非常崇尚天文,在他们的意识中天皇大帝是上天的主宰,在堪称中华文化第一本成书的《易经》中,视“天”为最重要、最神圣的神,古代的皇帝就自命“真龙天子”;皇帝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自然也以天上的星座来规划和命名。

按照易学中所讲的星宿排布方式,天空的东方以青龙为代表、西方以白虎为代表、南方以朱雀为代表、北方以玄武为代表,四个神各执一方,位居中央的是北极星,又称紫微垣。传说中,天皇大帝理应在天空的中央,他居住在地处中心地带的紫微垣之“紫微宫”中。与天皇相对应,视为“天子”的皇帝居住的都城也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皇宫亦从汉代开始因“紫微宫”得名“紫宫”;又由于皇家要地是凡人不得自由出入的禁地,所以又有“禁城”的提法。到了唐代,皇家建筑群开始将“紫宫”的“紫”与“禁地”的“禁”连用,“紫禁城”因而得名。

紫禁城金碧辉煌、殿阁沉沉,不仅总体建筑名称的确立有资可考,其中各个主要建筑名称也都颇有讲究。比如,按照易学的说法,“乾”有像天、像阳、像龙、像君之意,所以皇帝居住的宫殿称“乾清宫”,寓意皇天清明浩荡;而“坤”则像地、像阴、像妇,所以皇后居住的地方称“坤宁宫”,寓意大地平静安宁。

此外,为突出紫禁城中的福瑞吉祥,城中七十多座宫殿,个个红墙黄瓦、飞檐翘首、富丽堂皇。在颜色的运用上,以红色象征喜庆、吉祥,黄色为“五行”中黄土之色,有土才有食粮,所以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黄色就成为封建帝王的专用色,寓意中心和尊贵。

紫禁城中稀世珍藏不胜枚举,就是其中的大小房屋也多得以计数,据说有 9999 间,这里大到整体建筑格局、小到具体的一个

杏花村之谜

殿宇，甚至屋脊上形态各异的龙、凤、狮等动物造型的雕塑都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可以说是集中了易学、太极、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各路思想之精华，也或许正是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才使这座宏伟瑰丽的紫禁城在世界上神秘悠远、魅力非凡。

杏花村之谜

看到杏花村的名字，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杜牧那首《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中杏花村给人的感觉是花香酒美，那份暖融融的感觉，似乎能让人暂时忘却雨中清明的凄凉与哀婉。杏花村是否真有其地，如果有，它会在哪里，一直是困扰诸学者的一个未解之谜。

在中国大地上，以杏花村为名的地方不下 80 处，其中尤以江苏南京杏花村、山西汾阳杏花村、安徽贵池杏花村、以及山东、湖北等地的杏花村最为知名。

很多学者认为杜牧所写的杏花村位于南京，又称金陵杏花村。因为杜牧曾经多次去过南京，而且北宋年间的《太平寰宇记》中有“杏花村在县理西，相传杜牧沽酒处”的记载。《太平寰宇记》距离杜牧生活的年代只有百余年的时间，所以被认为是具备说服力的重要参考证据。1933 年，在陈文述所著《金陵历代名胜志》中也有“杜牧沽酒处……皆在金陵”的提法。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将杏花村的地点确认为“山西汾阳县城北 15 公里”处。这种观点最有力的证据是当地不仅杏花美丽，而且自北魏开始就有了酿酒的记录，所产的汾酒和竹叶青均为名震海内外的“甘泉佳酿”，这一点是其他几个杏花村无法比拟的。喜好饮酒的杜牧对此地应当留有相当深刻的印象。所以，《清明》诗很有可能是杜牧晚年在江南落魄之际，回想起

世界未解之谜之中国历史之谜

自己年轻时在汾阳躊躇满志、激情豪迈时引发的感伤 这首诗的广为流传,又使“杏花村”得名并名扬天下。

在《中国名胜大典》中同时列举了两种说法,一个是山西汾阳,另一个是安徽贵池县的杏花村。《中国名山大川辞典》、《中国名胜辞典》等也将杏花村定位在贵池。据说这里也有酒肆,曾盛产一种名为“杏村大曲”的酒,味道香醇可口,至今古井犹存。杜牧唐会昌四年(844)九月来此地任刺史,为官期间曾来此地饮酒。在清代《贵池县杏花村志》和《江南通志》中都收入了《清明》诗,后者还特别注明杜牧所写的杏花村就在贵池。

也有人认为,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并非确指。纪晓岚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持此观点,认为“牧童遥指杏花村”是“盖泛言风景之词,犹之杨柳岸、芦荻洲耳。必指一村以实之,则活句反为滞相矣”,意即杏花村只是一个如同杨柳岸、芦荻洲一样的泛指,如果一定要找出与它相对应的实际地点,就未免将一个用得很活的句子概念化、僵死化了。在明朝陈沂所撰的《金陵古今图考》中,记载南京西南隅为“杏花村”,但并未提及与杜牧诗有任何联系 明《正德江宁县志》记载南京杏花村时也只提到这里的人家多种杏树,花开时节成一佳景,得名杏花村,也未提及杜牧沽酒之事;《金陵待征录》说明杏花村是在明嘉、隆年间由“遁园”改名而得,还强调“与杜牧诗无涉”;《大清一统志》中关于安徽池州杏花村的记载也未提及杜牧和他的《清明》诗。依照纪晓岚的观点,之所以若干的杏花村都言称自己就是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实为“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即想方设法与古迹相牵扯,以达到粉饰地方、吸引游人的目的。不知纪大人所言是否也有几分道理。

岳阳楼之谜

岳阳楼,既与黄鹤楼、滕王阁、蓬莱阁并称我国四大名楼,又以

岳阳楼之谜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非凡气魄闻名江南。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更赋予这一几经兴衰的巍峨伟丽的名楼以亘古传颂的伟岸气概。这个历来为各代名人称颂传扬的著名景致，却也有一段无从查考的身世之谜，让无数的后人难以知晓它究竟何朝何代建于何等人士之手。

很多书上因为没有确凿的考证和历史依据，在注解“岳阳楼”这一条目时，特意回避了它的创建原因和年代，只笼统地介绍说是创建于“唐代”，例如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就将“岳阳楼”简单解释为“唐建，即今湖南岳阳市城西门楼。北宋庆历中滕子京重修，范仲淹作有《岳阳楼记》。”还有部分书记述岳阳楼的创建年代是周代，只是从唐代开始闻名。

在岳阳市文物管理所编印的《岳阳楼简介》中，说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期吴国大将鲁肃在洞庭湖训练水军时的阅兵台，后来中书令张说在此基础上建成了一座楼阁，初名南楼，后名岳阳楼。山东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中国名山大川辞典》中也将岳阳楼条目解释为“相传岳阳楼前身为三国吴将鲁肃操练水师的阅兵台。唐开元四年（716）中书令张说谪守岳州时始建楼，定名‘岳阳楼’。……宋庆历五年（1045），滕子京守巴陵时重修，范仲淹撰《岳阳楼记》，……岳阳楼随之名声大著”等。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胜大典》也给出了类似的解释，并明确指出“岳阳楼由阅兵楼改建成楼阁。宋代以后，屡毁屡修”等。

但是，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并未提及岳阳楼前身一事，只以描述的手法解释为，“湖南岳阳县城西门楼。正对洞庭湖。遥望君山。风景颇佳”并列举了另外两书中该条目的说明文字，一是《岳阳风土记》中的注解“岳阳楼，城西门楼也。唐中书令张说驻守此州。每与才士登楼赋诗。自尔名著”，另一个是《方輿胜览》的注解“宋滕宗谅作而新之。范希文为之记。苏子美书丹。邵竦篆额。时称四绝”。根据书中引证，进一

步查考《方輿胜览》这部南宋理宗时期的地理总志,可以看到书中也提出了相同的疑问,即“岳阳楼在郡治西南,西面洞庭湖,左顾君山,不知创始为谁?”由此看来,岳阳楼的创始人问题,在那时就已经是一个难解之谜了。

如果我们有机会亲莅这一享有盛誉的千古名楼,在欣赏其明廊环绕、楼亭衬映的峥嵘气象,慨叹三层三檐、雕花窗棂,不用一钉而卯榫契合的精湛工艺时;当我们情不自禁地吟诵“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遥望君山缭绕烟云,下瞰洞庭万顷碧波”等一代代名家的诗文时,可能会再度思量究竟是谁奠定了岳阳楼的基石,是谁用智慧和力量为后人营造出了一个气宇轩昂的绝代名楼?而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也无从考证,将作为一个历代相传的谜,引来大家无尽的探究、猜想、查考和一种淡淡的遗憾。

乐山大佛之谜

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据《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记载,乐山大佛是唐代海通和尚修建的。传说当年乐山前面的水道是一条重要的航道,来往的船只很多,但是,这条航道因为穿越山岭地带,使沿江形成了很多急流险滩,被人形容为“突怒哮吼,雷霆百里”,常常舟倾人覆,酿成了很多家破人亡的惨剧。当地的百姓都迫切希望水患能够得到治理。海通和尚下决心依山面水凿一座佛像,既以此来传扬佛法,又可以通过佛祖的力量和仁慈镇魔降妖,还给百姓安定富裕的生活。这尊佛像就是今天的乐山大佛。在《中国名胜大典》中将其形容为“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佛依山建,山因佛名,二者相互依存长达千年之久。

没到过乐山大佛脚下的人也许在竭尽所能设想它的高大,但不亲身游历也许永远也感受不到身临其境时的震撼和感叹。大佛头至山顶,脚踏江面,气魄宏伟,却雕刻精致,是从唐开元元年至贞

乐山大佛之谜

元十九年,花费了 90 年的时间建造而成的。乐山大佛的肩宽达 28 米,眼睛长 3.3 米,一个巨型的鼻子也竟然有 5.53 米长,一根手指更是长达 8.3 米。据说,在他 7 米长的耳朵里,可以并排站立两个人,而在他 14.7 米高,10 米宽的头上稳稳当当地放一张圆桌则是轻松得如履平地。虽然大佛身体的各个部位尺寸比较精确,但关于他的高度,至今还没有定论,像一个一直没有找到标准答案的谜,期待着文物界、测绘界、历史界的专家学者们定论。

查阅参考文献,我们会发现关于乐山大佛,既有类似于“千尺”、“百丈”等充满文人浪漫主义和夸张色彩的高度记载,也有看似比较精确的记录,例如宋代的《佛祖统纪》、《方輿胜览》,明清时期的《四川通志》、《乐山县志》等书中,都将乐山大佛的高度定义为“三百六十尺”,约为 110 米左右。1962 年,当地文化部门在对大佛清整维修的时候,采取吊绳的方法测量大佛的高度为 71 米;十余年后,西南水利电力勘察院设计队测量的结果为 62.1 米,而后,水电部利用近景测量的方法再次确认了 71 米这个数字。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名胜大典》、《中国名胜词典》、《中国名山大川辞典》等有关自然、地理类工具书的条目介绍上,也都明确注明乐山大佛的通高为 71 米。

但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的《中国地名辞典》中,却把高度定义为 58.7 米,和被普通媒介广泛认可的“71 米”相差甚远,却同样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拥有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勘察测量技术的今天,测量一个不会生长和收缩的巨型石佛像会得到如此多的测量结果,又为什么获得较多方面认可的有两个数据,而且相差十多米的距离?

据文物界的专家讲,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定义乐山大佛的“通高”。文物界在测量实物时,讲究将实物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整体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之差被称为其“通高”。在测量一般的佛像

时,通常将佛像本身和与之相连的莲花座视为一个整体,测量时自然是从莲花座底一直量到佛像头顶。但具体到乐山大佛来说,有的人认为大佛脚下有两层莲花座,一层是大佛的足踏,也称莲花足踏,再底下一层是一个更为巨大的莲花座,所以,乐山大佛的通高应当以最底层的莲花座为基点进行测量,这样测得的结果为 71 米。还有的人认为大佛脚下其实只有一层莲花座,所谓的底层更为巨大的莲花座,根本不存在。因为一方面,乐山大佛是在隋唐时期弥勒崇拜盛行的历史背景中建造而成的,而类似的弥勒佛像都只有一层莲花足踏,例如乐山附近的一些唐代造像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所谓的巨型底层莲花座实际上只是大佛莲花足踏下面的一层石基,只不过在边缘刻上了一些莲花图解的图案,这种花纹只能算是一种装饰,不能依此就确定石基为莲花底座。所以大佛的通高应当从莲花足踏算起,这样测量的结果为 58.7 米。

一个大佛有两个、甚至更多的高度测量结果,显然是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物界留给我们的一个测量之谜。希望让乐山大佛这个世界著名旅游胜地能够以其本来面目昭示于各地的旅游爱好者。

桃花源之谜

桃花源,那是深植于每个人心目中的—个山水如歌、恬静超然的世外田园,那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感到失意或承受压力的人、那些向往美好生活的人、那些平凡的或超然的人,都不自觉地按照《桃花源记》中描述的景象,勾画和憧憬着那样一个清新、闲适、自由、富足的理想社会。

人世间真有如此美妙的桃花源吗?它会不会只是陶渊明在仕途坎坷时寄托的美好希望呢?带着这个谜题,我们开始了考察。

在很多探讨相关问题的著作和论文中,都认为那个“芳草鲜

桃花源之谜

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人人怡然自乐的桃花源根本不存在实际的原型，它只是寄托着作者理想的一个虚幻世界。他们认为桃花源的诞生与作者陶渊明的经历息息相关。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胸怀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然而东晋末年，统治者昏庸无能，士族间割据混战，陶渊明虽身为官吏，但感慨官场丑恶，昏君得势，空有鸿鹄之志，亦难改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他弃官还乡，隐居田园，希望从此过起“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超然生活。在这段生活经历中，他一方面仍然难解壮志未酬的苦闷与悲愤，另一方面亲身实践和了解了农民的生活和思想愿望，知道辛勤劳作却依然苦不堪言的百姓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于是他将自己的一腔抱负和理想寄托于笔端，让一个渔人“忽逢”桃花林，看到了其中和平、安定、富饶、纯朴的幸福生活，这里人人以诚相待、处处丰腴安康，使桃花源内的生活景象与外界的争权夺势、饥寒交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让人惊羨又向往，但当渔人带领武陵太守再次去寻找时，却不复得路，故事是美好的，结局却充满了玄妙，作者创造了一幅乌托邦似的美妙画卷，却以这种神秘的结尾让读者意识到这种地方在人间其实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罢了。

然而也有很多论述认为桃花源并不仅仅是诗人的一种寄托，它在世间是有现实原型的。首先，经过考证发现《桃花源记》中那位偶然发现了桃花源的武陵人是真实的。在南朝《武陵记》中记载着：“晋太康中，武陵渔人黄道真，泛舟溯流而入桃花源。道真既出，白太守刘歊。与俱往，则已迷路。”《武陵记》属于地方志，是当地人记载当地事，具备可信性，由此证实当年在武陵确实有一个名黄道真的渔人不意之中发现了桃花源。那么，桃花源应当就在武陵附近了，武陵郡在今天的常德市，而常德市位于湖南省沅江下游近河口段，下辖桃源等六个县。这种提法在很多工具书如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山大川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名

世界未解之谜之中国历史之谜

胜词典》等中都得到了印证，书中都注明桃花源在湖南省桃源县城西南 15 公里的水溪附近。经济科学出版社的《中国名胜大典》也将桃花源一条目标注为“常德市桃源县西南 15 公里的沅江附近”。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桃花源应当在江西庐山西南部的康王谷，距离陶渊明故居不远。这里的风光山色与《桃花源记》中的描写非常相像，同样是花如繁星，溪流潺潺，而且依据古书记载，秦灭楚时，康王（即楚王）曾经躲入谷中避难，秦军追至，却忽遇大风大雨，使康王得以躲过一劫，从此康王深居谷中不再出来。由于陶渊明曾经在庐山脚下隐居，对康王的这段轶事非常熟悉，所以有人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假借了当地的景物和康王事件的某些情节写就了《桃花源记》。

关于桃花源的具体地点问题，还有很多不同的提法，如依据古地名演变或景致特征等推断桃花源在今连云港地区或江西九江武夷山附近等等。究竟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是描写了一个桃花源，还是虚构了一个桃花源，我们还不得而知，只有在欣赏这位伟大田园诗人简洁俊逸的文字和勾画的幸福图景中品味那种无尽的审美感受，再从文章的字里行间，从古代的史书记载中去寻求答案。

黄鹤楼之谜

黄鹤楼与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它以仙阁琼楼、雄伟精制而著称。濒临滚滚长江，雄居蛇山之巅；登楼远眺，但见彩云纷飞，白帆摇曳，日月轮回，潮涌起落，是历代骚人墨客登临游憩，感景抒怀的必到之所。时至今日，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旅游胜地。崔颢那首飘逸的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一直被举为黄鹤楼诗文之首。据说，诗仙李白游至此处，见到粉墙上崔颢题的《黄鹤

黄鹤楼之谜

楼》，也只有自叹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搁笔而去。

这个千古名楼，旷世美景，虽以各种神话传说、名家诗赋而扬名海内外，但黄鹤楼缘何得名，今天仍然是一个无从定论的谜。

按照《报恩录》中“辛氏酒楼”这个传说中的说法，楼名是为纪念仙人驾鹤给此地带来了财富而命名的。据说当时一个辛姓人士，看到黄鹤矶上观景人甚多，遂选择此地卖酒为生。一个衣衫褴褛的道士每经此地必讨酒菜来吃，却从未支付过一文钱。辛氏不嫌不弃，好酒好菜以礼相待，如此一年有余，道士将别来谢，从桌上随手捡起一块橘皮（也有说是瓜皮），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单足挺立、赤顶明眸、昂首待命的鹤，每有客来，鹤必翩翩起舞，悠然长鸣，辛氏也因此宾客盈门，生意兴隆。十年后，道士故地重游，看到一派富裕景象，心满意足，遂吹铁笛一曲，召回壁上的鹤，驾之远去了。辛氏为纪念道士，修建此楼，楼也因仙人驾鹤得名黄鹤楼。《环宇记》中关于黄鹤楼的记载则是“昔费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传说当年费祎在黄鹤山修仙得道，乘鹤而去，后人希望再见到他，就建楼以图招鹤，因名黄鹤楼。《南齐书》上记录的是“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得名黄鹤楼。……这些神话中讲述的命名缘由，虽然极富故事性和感染力，但包含了太多的演绎色彩，不足为其得名的真正依据。

很多学者从黄鹤楼的地理位置考证，其故址在今湖北省武汉市蛇山的黄鹤矶上。蛇山，据查是因山体蜿蜒曲折似蛇，而名蛇山，自明代开始在文献中正式以“蛇山”命名，古时称“黄鹤山”，山上的矶头称黄鹤矶。再结合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城西临大江，西南因矶名楼，为黄鹤楼。”以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名辞典》中的注释，“古‘鹄’‘鹤’通用，黄鹤山即黄鹤山”。从三部典籍中的注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黄鹤楼得名于其建筑的地点——在黄鹤山的黄鹤矶上——是因地名而得楼名。

也有人根据《礼部诗话》的记载,指出崔颢题写《黄鹤楼》诗的时候,曾经自注“黄鹤乃人名也”。由此推想楼名是得自于人名。

种种说法虽都引经据典,但严格考证起来,却又都缺乏更为确凿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黄鹤楼的命名之谜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碣石之谜

凭海临风,亲身接触和感悟大海的波澜壮阔时,也许我们会随口吟诵出当年魏武帝曹操那首气势恢弘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其实不仅是曹操,当年的秦皇、汉武也曾临碣石、观沧海,并赋诗抒怀,刻石纪念。然而,这个几代皇帝大驾亲临的圣址究竟位居何处,自古以来却未得一是。

碣石,在《说文》中注释为“碣,特立之石也”;《尔雅·释名》解释为“碣石者,碣然而立在海旁也”。显然,碣石是指那些海边突兀而起的巨石或巨石群。历来关于碣石的具体地点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今河北省昌黎县碣石山,也有人认为是在北戴河境内的莲蓬山,还有人认为是在河北省乐亭县西南,且现在已经“石沉大海”,沦落于海平面以下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各执己见,争论不决,使之成为一大历史悬案。

1984年,辽宁省的考古工作者向考古和历史学界发布了一条重要信息,指出在距离秦皇岛山海关 10 余里的绥中县秦汉建筑遗址,应为当时举行观海等重大活动的地方。这为考察碣石的确切地点带来了一线曙光。

从地势地貌上看,在绥中至秦皇岛长达 40 公里的海滨区间内,海岸线平直,海滩不是砂泥质而是石质,海中耸立着许多孤崖、海蚀柱等由礁石组成的碣石带景观,确实有着“虎视何雄哉”的宏

抚仙湖水下建筑之谜

伟气魄。从史书所标注的地理位置上查考,在《史记·秦本纪》、《汉书·武帝本纪》等书中都记载了秦始皇和汉武帝巡行东方、登临碣石的事迹。东汉文颖对碣石的注释为“在辽西,……属临渝。此石著海旁”,在《水经注》、《山海经》、《新唐书·地理志》中也都同执一词。可见碣石的方位在辽西渤海湾的北岸也是正确的。

在辽宁省考古工作者于山海关外渤海岸边发现秦汉建筑遗址后所发表的《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中,认为这几处大型宫殿遗址很可能就是秦始皇东巡的行宫和汉武帝东临碣石的望海台。有人因此推断距离宫殿不远处海面的巨石“姜女坟”,就是秦皇、汉武和魏武帝等登临的碣石;也有人认为位于“姜女坟”以北 40 公里远北戴河海滨的鹰角岩才是真正的碣石,鹰角岩俗称鸽子窝,足有十五六米高,登临其上,确可望沧海无际;还有人认为在北戴河海滨至金山嘴半岛海蚀崖下的一块名为“南天门”的门状巨石是曹操登临的碣石。

针对这种种关于哪一块具体的碣石才是帝王们所描写的碣石的争论,有学者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海边碣石众多,很难确定究竟帝王登临观海的是哪一块或不是哪一块巨石,不同朝代的帝王完全有可能喜好或登临不同的碣石。所以,自辽宁绥中姜女坟遗址到河北北戴河金山嘴遗址这一段长达 40 公里的海滨可以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区域,其间的姜女坟、鹰角岩、南天门,甚至其他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碣石,都有可能是帝王们当年登临的碣石。

抚仙湖水下建筑之谜

抚仙湖位于云南澄江、江川和华宁三县之间,距省会昆明约 60 公里。因湖中耸立着两块仙人抚肩巡游状的石头而得名,又称大池、罗伽湖和澄江海。湖面海拔 1,875 米,面积 212 平方公里,在云南省境内名列第三。湖水最深处 157 米,是国内仅次于长白山

世界未解之谜之中国历史之谜

天池的第二深水湖。白天，抚仙湖受高原风的影响，波涛汹涌，到夜晚和早晨，却又异常地深沉、娴静、柔美和秀丽。

2000 年底，云南省一个名叫耿卫的业余潜水爱好者在抚仙湖水底发现了大面积的“具有人工痕迹的水下堆积物”。这一发现引起了有关专家的极大兴趣，他们根据耿卫提供的实物、照片和水下录像推测，这里有可能就是唐朝天宝年间突然消失而今仍然找不到任何遗址的俞元古县城。

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注明俞元县是西汉所置，地点在云南省澄江县附近，现在的澄江和江川，两县汉时都属俞元县所辖。

地理位置的吻合，使抚仙湖水下的发现吸引了更多专家和媒体的关注。

从耿卫提供的证据来看，经过几十次单独或有记者在场的潜水，他说这块水下建筑群的面积大概有七八百平方米，他在湖底陆续发现了石板状的石块、石条，足有五六层高的宽大石阶、青石、形状比较规则的方形石柱、红砂石以及三角形的石体，这些石块堆砌成一道道墙体和大面积的石砌平面，犹如一个断裂下沉的广场，被厚厚的淤泥所覆盖。有些石板上还凿有圆孔，圆孔中有类似“石钉”的东西。据耿卫讲，1998 年他还曾经在湖底发现了一道 9 米高、数十米长的石墙。他在水下捡到的惟一一块陶片，经专家证实为东汉所制。北大教授、城市环境学专家于希贤先生说：“可以肯定，抚仙湖里的石块堆砌群，是人类古文明遗址。这一发现，使抚仙湖古城之谜从传说进入取证阶段。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

记者亲往湖面察看发现，天晴风静时，水下建筑群纵横的墙基显影清晰可辨，凭肉眼可以看到水下两道“石埂”平行排开，约有数百米长，有的石埂还有规则地交叉排列，仿佛地面上纵横交错的街道。一位多年在抚仙湖从事深水探测的科技工作者介绍说，数年前他曾经通过现代仪器发现湖底有大面积规则的方格图形。他

抚仙湖水下建筑之谜

说,经过数千年的淤泥堆积,还能看见这些方格,说明它们应该是距地面较高的人工堆积物。

从当地群众处得知,这里早就有“水中有个澄江城”的传说。按照祖辈传下来的说法,这些“石埂”就是“一座城”或是“城墙”与街道。他们说,“澄江”的“澄”就是“沉没”的“沉”,原意就是一座古城“沉没”在抚仙湖里。

2001年5月,国家文物局终于正式批准对这处水下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中央电视台还特别针对这一中国首次发现的水下古建筑遗址进行了首次的水下直播,电视台和各宣传媒体的广泛报道,使抚仙湖再度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中国水下考古队利用声纳探测技术首先绘制出抚仙湖的水下三维地形图,确定出考古工作的具体实施方位。然后,利用专门用于考古的深潜器和小型水下机器人,辅助考古队员们开始了这次神秘的探测之旅。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水下作业,发现了令人振奋的陶釜、有人工加工痕迹的巨型石块,以及一堵长30米,高约1.5米的石墙。

可以说,这次水下考古初步揭开了困扰历史和考古学界的三大历史谜团,即神秘的抚仙湖水下遗址究竟是消失的古城,还是坍塌的水坝一类建筑?它创建于什么年代?又是如何沉入湖底的?

考古队利用水下探测仪已经初步证实抚仙湖底古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200米,是总规模达到2.2平方公里的大型水下古建筑遗址,从如此宏大的规模上推断,这处水下遗址当不是码头或水坝一类小型建筑,考古专家认为“不排除它是一座城市的可能性”,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古代的城市或较大的村落。

另据从砌在石墙缝隙中的贝壳来判断,古建筑的年代至少应是东汉中南期以前的建筑。考古专家认为,这处古遗址应当是由于地震造成山体大面积滑坡或由于地层陷落而沉入湖底的,因为根据近些年的测量,抚仙湖确有逐渐下沉的现象和趋势。

针对这次抚仙湖底的水下探测工作,有关专家一致认为像抚

仙湖这样大面积的水下古建筑遗址,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但是,现在对这处宏大的水下古遗址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目前只能凭借已经发现的实证做出推测,要想真正揭开罩在抚仙湖水下遗址上的神秘面纱,还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探索和研究,本着谨慎务实的态度去进行,决不能像传奇故事那样仅仅凭借主观臆测去妄加推断。

我们相信,凭借考古专家的不懈努力和先进的探测技术,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判定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它所独具的考古和历史文化价值也即将随着一层层神秘面纱的逐渐揭开而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岱顶无字碑之谜

岱顶无字碑,为汉武帝在公元前 110 年巡游、封禅后,在泰山之巅所立。从形状上看,呈直四棱柱形 碑体在宏伟磅礴的泰山辅衬下宛如一棵高大壮硕的擎天巨柱,直插云霄,让后世的人们不免流连忘返,意欲解读出汉武帝当年所要传达的旨意和宏愿。然而碑体四周青石溜光,未镌一字,它引来多少代人屡屡试解其谜,却又始终难断其故。

有人依据秦始皇封禅后刻碑立传为自己歌功颂德之举,推想汉武帝树立碑石却又一字不刻,应当是认为自己功德无量,难以言述之意。但此说不足以服人。秦始皇封禅,是在完成天下一统的宏伟霸业之后进行的,统一六国,君临天下,确有功高盖世之感,选在当时被认为是五岳之首的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并先后在邹驿山、泰山、芝罘山、琅琊、会稽、碣石等六处刻石立碑,撰文书写自己的功德,完全可以理解。汉武帝则不同,他虽治国有方,但属继承父业,从功绩上讲,尚未达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高度,他虽不断扩充自己的版图,屡战屡胜,但这些胜利大都是在对付匈奴进攻

岱顶无字碑之谜

的战事中取得的。在国泰民安的情况下，他统帅十八万大军，巡幸边防，封禅泰山，目的主要是扬显军威，要先从心理上消灭敌人进攻的野心。况且，与秦始皇专制粗暴的性情、焚书坑儒的政策相比，汉武帝文雅知礼、独尊儒术，打通举世皆知的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由此可以推想，汉武帝筑无字碑当不会是为了宣扬自己无以言喻的功德，他定有更深邃的意义要表达。

也有人以武则天的“无字碑”来揣测，认为岱顶无字碑同样是“功过留待后人评说”之意。姑且不论武则天“无字碑”所要表达的意愿究竟如何，单从汉武帝的角度来审视，立碑之时，他正值年富力强，建功立业之际，以这样一种胸怀高远志向的心情登临泰山之巅，俯瞰周际青峦叠翠、壮美山河，他心中升腾的、渴望表述的当只有身为真命天子，要奉天行事，征伐四夷，富国强民，再建功勋的决心，而非悔过赎罪的愧疚。

另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观点，即文韬武略兼具一身的汉武帝，竖立无字碑，实际是要留给后人一个谜面，而谜底恰是“四方无迹”，既显示了他的才学深邃，又表达了他心中治国、统一的最高境界。汉武帝对诗词歌赋、儒学典籍有很高的造诣，身边的文人骚客也颇多，他非常喜爱设置谜面让大家来猜，大文学家东方朔就因为常常能够正确解读汉武帝的谜语，而大受赏识。其实不仅汉武帝喜爱谜语，在当时，谜语作为一种独特、含蓄，又可寓情理于情趣之中的交流形式，在皇宫、民间风靡一时。所以，有人结合这一特定的情况，认为岱顶无字碑，四方的形状，又未着一字，恰是汉武帝巧设的一个谜面，直译为“四方无记（记载）”，“记”谐音为“迹”，故真正的用意在一代君王“四方无迹”、天下一统的宏大治国理想。

夜郎古国之谜

夜郎古国的历史我们不甚清楚,但是“夜郎自大”的成语却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这个典故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相传汉朝时,在我国西南方的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分布着一些比较落后的小国,由于没有道路与外界相通,他们如同井底之蛙,消息非常闭塞。汉武帝时期曾派使者前往这片地区,到达滇国时,滇王好奇地问:“滇和汉哪个大?”问得汉使者啼笑皆非。到了夜郎,夜郎国王同样关切地问:“汉的疆域和夜郎相比,谁更大?”其实,无论是滇还是夜郎,其地理范围都只相当于汉王朝统领下的一个普通州郡,而他们却由于缺乏对对方的了解而提出了一个以己之短比人之长的可笑问题。后来人们就用“夜郎自大”来比喻妄自尊大,而用“夜郎”来形容那些妄自尊大的人。

从史书记载和文物挖掘的现状来看,中国古代史上夜郎是确有其地的。但它是一个具体的国家还是一个民族主体、它的国都在哪里、疆域有多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还存有争议。究其原因,主要是各类史书对夜郎这样地域较小又相对落后的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记载不够详尽,而且有的古籍记载本身就存在歧义和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遗误,加上古代通假字的运用,使本来就比较贫乏的史证材料更为扑朔迷离、真伪难辨。各路专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但夜郎问题却始终是史学研究中一个未有定论的千古之谜。

根据熊宗仁《贵州研究夜郎五十年述评》一文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研究夜郎问题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和进展。

一些学者提出,所谓的古夜郎国,并不一定指现在意义上完整、统一的国家,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很可能是指夜郎族长统领

长城之谜

的一些权益相对独立、地域又适当分散的民族群体,而“夜郎”只是这一共同体的总称。持此观点的学者主张古夜郎存在于公元前 650 年至公元前 27 年左右。在地域分布上,战国时期夜郎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贵州西部和西北部、云南东部和东北部、四川南部和广西西北部,包括今四川东山、彭山等地;至西汉时期,夜郎包括 5 个犍为郡属县,8 个牂牁郡属县和 1 个益州郡属县。也有人提出夜郎疆域最大时曾经包括了今天的贵州全省,而且北至四川南部,南抵广西田林、南丹,东至湖南新晃,西达云南的曲靖和陆良。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夜郎是以夜郎邑为中心的一个国家。其兴亡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279 年至前 27 年间。地域分布问题也难以统一,一说夜郎仅为古牂牁,或包括与之毗连且族属相同的其他大约数十个部落;另一说是汉牂牁的全境,即今北起遵义,南至云南文山州、红河州,西达云南罗平等地,东抵贵州黄平一带的广大地区。

夜郎的衰败,是在汉成帝河平二年,夜郎王率周围 22 个邑大举反叛汉王朝时,被汉所击败。到唐朝时,又设置了多个名为夜郎的郡县,在客观上使古夜郎的踪迹变得更加难以追寻。看来,要想真正解开这个历史谜团,还需要贵州及其周围省市的有关专家学者从历史、考古、民俗、民族、语言等多种学科入手进行综合的考察和论证。我们期待着终有一天覆盖在夜郎古国上的尘埃能被一层层地拭去,让所有关注和探求夜郎之谜的人们看到它所蕴含的独特历史风韵。

长城之谜

长城,对于中华民族、对于炎黄子孙,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一个古代的城墙,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与黄河、长江融为一

体,成为民族尊严和智慧的象征 那种雄伟的魂魄早已深深注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成为所有中国人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无形旗帜!一段段的城墙、一座座的烽火台,纵横万里、跌宕起伏,或仍坚实、或已荒疏,都实实在在地记录着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历的坎坷与辉煌!

当我们登临长城,眺望美好河山,感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恢弘壮美的万里长城究竟是不是秦始皇的“功劳”。

很多人都认为长城是秦始皇修建的,他们在肯定长城防御敌人入侵功用的同时,也痛斥秦始皇不顾人民的利益,以致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像孟姜女那样的传说,让善良的人们在千年之后回想起来仍然心有戚戚。其实,长城早在秦始皇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查考古代资料,会发现早在四千六百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时期,人们就会修筑周长 1000 到 2000 米、高 8 米以上的城池,这为几千年之后春秋战国时期长城的修筑奠定了建筑基础。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连绵,黄河、长江流域出现了秦、楚、燕、韩、赵、魏、齐七个较具实力和规模的诸侯国,他们在征战中已经开始使用骑兵,而骑兵的攻城能力和速度大大提高,所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防御他国进攻,各诸侯国纷纷在自己的边境修筑长长的防护墙,这就是早期的长城。据《左传》记载,当年楚国就是凭借长城(当时称方城)做城防,加上有汉水做护城河,才避免了当时已然称霸的齐桓公的强行攻打,可见这高高的城墙在防御骑兵的攻打上是很有威力的。而且,秦、赵、燕三国经常受到与之毗邻的匈奴的威胁,匈奴生活落后,就以战争和掠夺作为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经常挑起事端。这三个国家于是在北方修筑了长城。所以,在秦始皇以前,秦昭王长城、赵长城和燕长城就已经存在了。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派将军蒙恬发兵 30 万取河套,采取“可缮者治之”的政策,一方面修补

长城之谜

和治理那些仍然可以发挥功用的旧长城,把秦、赵、燕三国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以更有效地防范匈奴,另一方面又扩建了新长城,使当时的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万里长城初具规模。

后来,两汉为了防范匈奴,北魏、东魏时为了抵抗柔然,北齐、北周、隋朝为抵抗突厥,明代为抵抗蒙古、鞑靼、瓦剌、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入侵,都修建了不同规模的长城。特别是明朝,边患不断,他们沿袭了古代修建长城抵抗侵略的办法,从洪武初年修筑居庸关和山海关开始,到嘉靖年间已经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全长 7300 余里的雄伟长城。明长城较之秦长城工程更为艰巨,气势更为恢弘。今天我们旅游所见到的长城,绝大部分都是明代修建的,八达岭长城就是一例,它依傍山势,在建筑材料上又多采用瓦、石,较之沙土夯筑更为费工费时。在八达岭长城发现的一块明朝石碑上,记载了当年几千名戍边官兵和许许多多的民夫才修筑了一段七十多丈长的工程,可见今日的长城曾经凝结着古代劳动人民多少的血泪甚至生命。当我们有幸再次登临长城或目睹那些几乎已成为废墟的古城墙遗址时,相信会有一种深重的历史责任感穿透岁月之墙,让我们永远铭记人民的苦难,肩负起国家的尊严,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今日的中国自信、自强,生生不息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长城这条华夏巨龙,气势磅礴地奔腾在我们祖国的群山之巅。当我们明晓了一些关于长城的历史,会发现这几乎就是一部抗御强敌的历史,它的功过是非至今仍是毁誉参半,一方面有效地防范了匈奴等民族的侵扰和掠夺,保卫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另一方面,深重的徭役之苦又让无辜的百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甚至出现了“道路死者以沟量”的记载。所以,我们在无限珍惜、爱护和崇尚长城这样一个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同样充满真诚地呼唤和平,但愿今后我们所修筑的不再是以防范为目的的城墙,而是

象征沟通与理解,和平与发展的桥梁。

泰山封禅之谜

泰山,险关深壑、危崖峭壁,间伴以飞瀑流水、庙宇松涛,伟岸的自然景色与丰富的人文景观浑然统一,碑石、楹联、庭榭、长桥,无一不是研究我国古代宗教、艺术、民俗和文化的瑰宝。这些珍品的留存,主要受到古代帝王封禅活动的影响——除武则天在中岳嵩山封禅之外,历代有资格封禅的皇帝都亲临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在客观上为泰山带来了宝贵的历史文化积淀,使泰山享有“五岳之首”的千年美誉。

封禅,实为古代帝王举行的一种极具政治和宗教色彩的国家大典。按照《史记正义》中的解释:“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班固的《白虎通·封禅》中也记载:“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可见,封禅是统治者祭奠天地、礼拜山神的仪式。但这种仪式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资格或机会来举办的。首先,封禅仪式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举行,那些没有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诸侯国之君主是没有资格的;其次,要发现祥瑞;再次,要功德显赫;最后,要国泰民安,也只有皇帝才有财力、精力和足够的时间率领大队人马离开首都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泰山在自然条件上既非最高,又非最美,地理条件上又不位于五岳之中,为什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大多选择泰山为封禅圣地呢?因为中国自古崇拜山神,认为山神能够兴云做雨,而泰山一带在古代比较发达,是宗教圣山,又位居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为万物之始。根据《后汉书》中“中国人死者,云魂归岱山”的记载,当

泰山封禅之谜

时人们认为死后,魂魄也都会集中于泰山;所以泰山被尊为“岱宗”,是五岳之首,而盛世皇帝能来泰山封禅也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旷世盛典。

泰山封禅开始的年代问题,现在还是一个千古流传的历史之谜。有学者认为泰山封禅自上古皇帝就已开始。在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曾引述管仲向齐桓公列举的封禅帝王,包括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颡顼等,并说应有七十二家,而他只记住了十二家。《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中也认为“殷墟卜辞即有祭山神的记载”。他们认为,当时的人们由崇尚日神、天神,渐渐转为山神,统治者一旦获得王权地位,就要举行封禅仪式,感谢天赐福祇,张扬自己具备的通天神性,亦向下属及民众证实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同时进一步祈求神灵的保佑。只不过那时封禅尚未形成国家大典,规模远不及秦皇汉武等后代。

另有学者认为泰山封禅始于秦汉。他们认为伏羲、神农等都是传说中半真实、半虚构的人物,而且“泰山”的原始义并非某山之特指,本为今山东境内泰沂山系的所有大山,所以认为管子所述若干原始社会先帝于泰山封禅一事根本不足为证。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树明在《泰山缘起》一文中又引证诸家观点,确定管子所述诸位先帝封禅的“泰山”实应为今平邑、蒙阴、费县交界处的蒙山。直至春秋晚期、战国、秦汉以来记述的泰山,才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泰山。他们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 219 年的封禅礼,自泰山山南登顶,礼毕由北路而下,禅于梁甫,这才是泰山的首次封禅大典。可以说,秦始皇封禅的具体经过在司马迁的《史记·本纪》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泰山上至今仍有“泰山刻石”等实物为证。

究竟泰山封禅起于何时,现在还难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封禅这种登封泰山,“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的旷代盛典,记述了

时代的更迭,显示了国家繁荣富强的雍容之貌,促进了与邻国的友好往来,更对泰山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和人文影响。

姑苏台之谜

姑苏,实为苏州的别名。相传这个名字和夏朝一位精通天文地理的谋臣胥有关,他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获得吴这块封地,自此当地便有了姑胥之称,而吴语中“胥”、“苏”读音相近,“苏”字相比之下又更为通俗易懂,所以“姑苏”渐渐取代了“姑胥”。也有人说,“姑苏”名字的传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昔日这里壮阔豪华的姑苏台,李白就曾经在《苏台览古》等诗中留下:“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稍稍来吴都,徘徊上姑苏。……目极心更远,悲歌但长吁”的感慨,慨叹昔日奢侈繁华、歌舞升平的姑苏台,历经千年的历史沧桑,到唐朝已经只剩下一座荒凉的山脊了。

后代的人们不禁抚今追昔,努力探寻这已经不复存在的姑苏台当年的荣辱兴衰。

查考中国古建筑文化的历史,可以看到早在商王朝,勤劳智慧的人们就已经拥有相当深厚的高脚楼建筑功底,他们所建的鹿台高达千余尺,据说登临其上仿佛凌云驾雾,可以纵览天下,连凤鹤的鸣啼都可直通霄汉。到了周代,各诸侯国更是竞相造仿,互相攀比,楚灵王构筑了章华台,吴王则不惜劳民伤财建造了镶金戴玉、气势恢弘的姑苏台。

《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中引用《越绝书》的记载:“阖闾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结合《索隐》的注释:“姑苏,台名,在吴县西三十里。”可见,姑苏台位于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内)以西三十里处,是吴王阖闾经过三年征集材料,再耗费五年的时间修筑而成的。《吴地记》中也有据可查:“姑苏台在吴县西南三

十五里，阖闾造，经营九年始成，其台高三百丈，望见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所载内容与前述基本一致。

但是，也有史书对姑苏台建造的时间和人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姑苏台实为阖闾之子夫差所造，或者是阖闾初建，而后夫差又予以扩建。在《述异记》中认为姑苏台“周旋诘曲，横亘五里”，为吴王夫差花费三年的时间建造而成，其间不惜人财物力，精雕细刻、大兴土木。台上建有春宵宫，可容上千宫妓起舞欢歌；又修造千石酒钟，作为天池，池中造有青龙舟，舟上盛陈妓乐，夫差整日与西施游弋其中，过着奢靡享乐的生活。在《艺文类聚》一书中则主张姑苏台是吴王阖闾十一年在距离吴国三十五里的姑苏山上建造的，台因山而得名，建台的目的是“春夏游焉”，而后，其子夫差将其进一步扩建，使其高 300 丈，宽 84 丈，更为高大壮美。

姑苏台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吴国的兴衰。它兴建于吴国强盛之时，据说姑苏台所用木材为越王勾践所献。当年吴越之间战事频繁，越王勾践采纳范蠡之计向吴王夫差进献绝代佳人西施和营造宫殿所需的高大木材，其中有两根足有 20 围粗、400 尺高。勾践的所作所为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沉浸在亭台、美人与好酒之中，日日寻欢作乐，还杀死了进谏忠言的良臣伍子胥。他一意孤行、执迷不悟，一面耗尽民力，广修殿宇，另一面又北上攻齐，谋图向中原地区扩大势力范围。越王勾践乘机率师屯海，断绝吴路，同时经由江淮攻袭吴国，夫差大败，自杀身死，姑苏台也被放火焚烧，据说熊熊烈焰燃烧了整整三十多天。

从此，一个曾经张扬显赫的皇家豪台化为了灰烬，一代霸主吴王永远地成为了历史，而关于姑苏台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地展开了。

长江之谜

长江在中国,以与黄河共同孕育了五千年华夏文明而被世代称颂。李白、杜甫等诗仙、诗圣,毛泽东等一代伟人面对长江两岸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感受长江千里浩荡、滚滚东流的宏伟气魄,无不即景写意,或感物抒怀,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今天,当我们埋首于长江的历史与渊源,会发现关于长江的很多研究和考证都来自古文献中“江”和“九江”的记载,这三者是否可以追本溯源、相提并论,至今仍是一个待解之谜,有待于我们继续去探索。

首先,古汉语中“江”即指“长江”的说法在文献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中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一说,“江”即“长江”,除非在“江”前定以其他的名词,否则就单指长江。这在《辞海》、王力著的《古代汉语》等权威性工具书和教科书中都有明确的定义和解释,也成为大多数人阅读古文时习惯的理解方式;另一说,“江”非专指“长江”,以《史记·殷本纪》、《史记·封禅书》等为论据,指明汉水、淮河等都会记之为“江”,故“专指‘长江’”之说不能成立。两种说法,各执一词,至今难解,如若统一,将为历史、地理等诸多研究领域带来意义深远的学术价值。

其次,古文献中就“九江”意为“长江”引发了更大的争论。虽然认同“九江”之称源自长江有九大支流,但今天的长江众流荟萃,“九江”得名于哪九大支流也是迷雾重重,难得定论。有人认为是长江上游的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九大支流,亦有人认为是源于中游的九条支流,例如在《中华全史演义》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中,称大禹视黄河和长江为北方和南方的最大水患,安治黄河后,至扬州平定九江之水,且“九江即沅、渐、辰、无、叙、酉、湘、资、澧诸流汇

九鼎之谜

合而成”，后又疏导“沱”、“潜”等支流，使荆州水患得以平息，由此确可推断这里的“九江”即指长江，且是得名于湖南、湖北和江西省境内的九大支流；但《寰宇记》中又以“浙江、扬子江、楚江、向江、荆江、汉江、南江、吴江、松江”为九江；《山海经》中则释九江为洞庭水系；《晋太康地记》中，刘歆认为赣江挟诸水入鄱阳湖，形成九水同注彭蠡之势，故称九江。总之，诸家论点，各有论据，无法一统。

谜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对于长江的重视和热爱。探索长江之谜，目的和意义也许远在长江之外。如果长江的谜可以解开，这个拥有万里流程和 14 万平方公里水域的长江的魅力，将不仅仅局限在其雄奇险美的旅游价值和水上运输的经济价值，对世界、对亚洲、对中国的人文、地理和历史研究都将产生深远而广泛的意义和影响。

九鼎之谜

九鼎，作为我国文明时代入口处的一块里程碑，已经遗失了 2000 多年。它们能否突然破土而出呢？这是人们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国古代青铜工艺高度发达，传下了许多稀世之宝。然而就历史价值而言，却没有一件比得上夏朝的九鼎。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就是因为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

根据《左传》宣公三年（前 606 年）的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师州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去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以避凶就吉。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九鼎一出世，就蒙上了一层神

秘色彩。其实,透过神话因素,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夏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周成王正式定鼎于郊鄩(今河南洛阳境内),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而由楚国首先发难。公元前 606 年,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之戎,路经洛邑,特意摆开阵势,显示武力。周定王连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咄咄逼人,劈头就问九鼎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冷冷地说:“在德不在鼎!”接着又不紧不慢地回顾了九鼎转手的历史,进而指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

到了战国后期,周王室已是奄奄一息。据《战国策·东周策》所载,周显王时期,秦国兴兵临周,企图夺取九鼎。周求救于齐,迫使秦国退兵。但强秦岂肯善罢甘休,后来秦昭王终于灭掉了东周。至于九鼎的下落,由于史籍记载不一,因而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首先,《史记》中的说法就不统一。周秦两本纪都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 255 年),在周赧王死后,终于“取九鼎入秦”。据此,九鼎当失于秦亡之后。但《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那么九鼎早在东周末年便已遗失,与秦无关。后来,《汉书·郊祀志》也是兼收两说,但又说“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前 327 年),……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以后秦始皇出巡路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时,派了上千人下泗水打捞,结果如同竹篮打水,未能如愿。这说明九鼎并未入秦,至少没有全部入秦。

对于《史记》中的矛盾,唐人张守节曾设法弥补,他说:“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史记·秦本纪》正义)这样一来,《史记》自相乖谬之处就不复存在了。但张

传国玺之谜

说没有提供资料来源,而且将秦昭王取九鼎时间较《史记》本文提前 41 年。至于说一鼎飞入泗水,更是荒诞不经。

到了清朝,全祖望、沈钦韩等学者对上述传统说法公开表示怀疑,并作了新的探索。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除引用全、沈二家之说外,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周人为防止大国觊觎,加上经济困难,采取了毁鼎铸钱的下策,对外则诡称丢失,不知去向。

二、史载秦灭周取鼎,为时人揣度之辞,并非事实。

三、秦人谬传九鼎沉入泗水,秦始皇也受到愚弄。

这些说法足以发人深思,但未必即为至论。

九鼎既然被周人视为天命之所在,也就只能与社稷共存亡,岂有因大国觊觎而自行销毁之理?况且九鼎铸于夏初,器形不会太大,楚庄王就曾以鄙夷的口吻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可见九鼎之“重”,只存在于传统的神秘观念之中,而不是实物本身的价值。东周统治者能为少量之铜而毁鼎铸钱、甘心自隳天命吗?

纵观古籍中有关记载,对九鼎遗失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说法不一,但并无已被销毁的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考古工作的进展。九鼎如失于东周灭亡之前,那么埋没于关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失于秦末,那么埋没于关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要是项羽破秦后载归彭城,那倒极有可能“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但与《汉书》记载的年代又相距甚远。如能将这些问题考辨清楚,对于寻找九鼎的下落,也许不无裨益。

九鼎被作为王权象征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它作为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却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我们相信九鼎一旦重见天日,必然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传国玺之谜

玺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宝印。在无数宝玺中，秦制“传国玺”被称为天下共传的“至宝”。几千年来有关它的种种传说无不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甚至在两千多年后的 1924 年 11 月，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警察总监鹿钟麟等还在追索这块“历朝相传的金镶玉玺”。

传说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见凤凰栖落青石上。古人曾有“凤凰不落无宝地”之说，他将此璞献给楚厉王，经玉工辨识认为是石块。卞和以欺君罪被刖左足。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宝，仍以前罪断去右足。至楚文王时，卞和抱玉痛哭于荆山下，文王命人剖璞，果得宝玉，经良工雕琢成璧，人称“和氏璧”。

400 年后，楚相国昭阳，灭赵败魏，威王将和氏璧赏赐昭阳。一日，昭阳率百余宾客浏览赤山，席中应众人之请，出璧传视。其时山下深潭有丈余长大鱼及无数小鱼跃出水面，众人争睹奇迹，以至散席，和氏璧不翼而飞。当时未发迹的纵横家张仪，正在昭阳门下，众疑“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但和氏璧终无下落。“盗窃犯”是谁？至今尚未“破案”。

50 余年后，赵国太监缪贤偶以 500 金购得和氏璧，赵惠文王闻讯，将璧占为己有。秦昭襄王获悉和氏璧在赵，假以 15 城换璧。赵王无奈，遂派蔺相如怀璧使秦。蔺不辱使命，设计“完璧归赵”。61 年后，秦灭赵，和氏璧落入秦国。秦嬴政统一中国，“称始皇帝”，皇帝宝玺自然要选用天下绝无仅有的宝贝。于是始皇命宰相李斯磨和氏璧作皇帝玺，并想代代相传，因此称为“传国玺”。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乘龙舟行至洞庭湘山，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忙抛传国玺于湖中，祀神镇浪。8 年后，使者过华阴平舒道，有

传国玺之谜

人持璧曰：“为吾遗涪池君”，传国玺，复归来。其事真假难辨，成为千古疑团。

刘邦率兵入咸阳，秦王“子婴上始皇玺”。刘邦称帝“服之，代代相受”，号曰“汉传国玺”。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小皇帝刘婴仅两岁，玺由王莽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莽命弟王舜进长乐宫索玺。后见舜怒斥：“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乘便利时，夺取国玺，不复顾恩义，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汉书·元后传》）随即将玺“投之地”。传国玺被摔缺一角，经黄金镶补，但终难天衣无缝，天下至宝，从此留下瑕疵。光武中兴，“莽败，李松持玺诣宛上更始”，后归刘秀。东汉末期，十常侍作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玺，返宫后传国玺杳无下落。

不久，“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从城南甄官井捞出宫女的尸体，在项下锦囊中金锁关闭的朱红小匣内取出玉玺。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补，下有篆文：“受命于天，并既寿永昌。”此文传为李斯所书。孙坚获传国玺，心生异念，但不久阵亡岷山。袁术乘孙坚妻吴氏扶柩归里，“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袁术死后，其妻扶棺奔庐江，广陵太守徐璆，依袁术先例抢传国玺献曹操。三国鼎峙，玺属魏。三国归晋，玺传晋。

西晋末年，五胡十六国更迭频繁。传国玺像是被猎犬追逐的猎物，被不停地争来夺去。每一次的交替易手，就伴随着一场血腥的残杀。晋怀帝永嘉五年，“玺落前赵刘聪”之手。东晋咸和四年，石勒灭前赵，玺属后赵。冉闵杀后赵石鉴，夺得传国玺。公元352年，慕容俊克冉魏邺城，宣称闵妻已献传国玺，封其为“奉玺君”，改年号为“元玺”，建大燕国（即前燕）。其实当时传国玺已被濮阳太守戴施偷献于晋穆帝，慕容俊只是导演了一场自欺欺人的骗局，妄

世界未解之谜之中国历史之谜

想以所谓“天命”来维持其统治而已。传国玺归东晋后，经刘宋、齐、梁、陈、隋，最后落入唐高祖李渊之手。从此，玺改称为“宝”。

传国玺从发现和氏璧始，传至唐末，计 1620 余年，像这样被历朝传递 1000 多年的历史文物，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令人可惜的是，传国玺于五代时突然失踪。宋太祖“陈桥兵变”受禅后周，仅获后周两方宝印，未获传国玺。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因此，在宋、元、明、清，均有真真假假的“传国玺”不断问世，屡经发现。如 宋绍圣三年，咸阳段义于河南乡掘地修舍，获一方“色绿如兰，温润而泽”、“背螭纽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十三名官员“考证”，奏称哲宗为“真秦制传国玺”。

明弘治十三年，鄂县毛志学在泥河滨得传国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明孝宗皇帝。但孝宗疑其伪“却而不用”。

明末，相传由元末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竟被金太宗于“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太宗由此“乃定立国之计”，改国号“金”为“清”。

清初，故宫交泰殿藏御玺 39 方，其中一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被人称为传国玺。公元 1746 年，乾隆皇帝从中钦定 25 方宝玺时，将此方宝玺剔除在外。由此可见，这是一块伪造的赝品。

真正的传国玺到底在哪里？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许随着历史的发展，终有一天人们能解开传国玺失踪的千古疑案！

大禹葬于会稽山吗

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相传是夏禹朝会天下诸侯计功行赏于

大禹葬于会稽山吗

此而得名。会稽,据说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而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却说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是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这个千古历史悬案,自二十年代史学界以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为首所展开的聚讼论争以来,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

清代学者梁玉绳认为,大禹巡狩并葬会稽之事,不足依据。当时建国多在西北,不宜独偏江南,若果巡狩所至,总会东南诸侯,并不应远来于越(见《史记志疑》卷二)。顾颉刚先生即指出:“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载《古史辨》第一册)。蒋炳钊、辛士成等先生认为司马迁之说大可值得怀疑。蒋先生指出把越说成是夏代的后裔,从考古资料到文献记载都难以找到可靠的证据,越族不是夏族的后裔是很清楚的。他系统地批判了流传已久的“越为禹后”说的错误(见《“越为禹后”说质疑》,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梁钊韬先生则主张在夏禹的时候,东夷越族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成员,共同建立了夏国,因而东夷越族在传说中,流传他们是夏的后裔,其后文字记载便把越王勾践的祖先认为是源出于禹之后,是合理的。可能在夏之时,会稽在山东泰山附近,为东夷越族人所崇敬,其后苏、鲁地区与华夏民族融合,不再被称为越人,后浙江越人因怀念其先祖,会稽一名又出现在浙江。故这个传说颇有来历,并非随便臆造。(见《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载《百越民族史论集》1982年版)

刘宜均、赵鸣同志对林华东同志在《再论越族的鸟图腾》(《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一文注中认为夏禹是不可能到达浙江之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夏禹会诸侯于会稽山,及大禹死于会稽

之事,史书中均有记载,尤以《越绝书》记述最详。依《越绝书》所载,大禹曾两次到过绍兴会稽,第一次是为了治水,并在此计功行赏,第二次是称帝以后巡狩江南时,病死于会稽,被葬在会稽山下。司马迁的说法是可信的(见《禹葬会稽考》,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对此,林华东同志撰文就大禹与绍兴会稽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剖析论证,答复了刘宜均、赵鸣同志。林文认为先秦古籍记载中的会稽并无确指就在今日的绍兴,逮至西汉,司马迁才提出会稽就在绍兴的观点,东汉以后,这个说法便被解释得更加具体,后代方志又大加附会、渲染,派生出种种传说来。绍兴会稽大禹陵、禹庙、禹穴,果真是夏禹圣迹吗?林文认为欲解此谜,当从考古学入手,再印证以典籍,方能揭示当年原貌。如果大禹时代的宁绍地区已纳入夏之范围,那么,它在考古学上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面貌,应与夏文化基本一致。目前,夏文化遗存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而浙北、宁绍地区相当于夏商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是以上海市马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即“马桥类型”,两者分布范围不同,文化面貌更是差别很大,绍兴并非夏土是很清楚的。大禹决不可能远离故地在此治水,或朝会诸侯,并葬于此。徐旭生先生也曾指出,当时“钱塘江以南的山岳丘陵地带,也不至于有洪水的泛滥”(《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其实,王充早就对此提出异议,他在《论衡·书虚篇》中说:“舜至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指出“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会计于此山,虚也。巡狩本不致会稽,安得会计于此山?”王充是汉代浙江上虞人,对于会稽遗闻古事,当有了解和调查,并不以司马迁之说为然。林华东进一步根据《管子·封禅》、《墨子·节葬下》和《史记》所载“禹封泰山,禅会稽”,以及《淮南子·汜论训》高诱注“会稽”是:“在泰山下,封于泰山,禅于会稽是也”和杨向奎、梁钊韬等的研究成果,认为早期的会稽应在山东泰山附近,绍兴会稽是由山东的会稽乔迁而来,这是同某支夏后

曹操的陵墓之谜

裔南徙入浙有关。《吴越春秋》曾载范蠡筑越城成功后,怪山自生,说是从山东琅琊一夕自来,此文反映出越之先祖由山东南徙之若干史影;《越绝书》载越王勾践灭吴后迁都琅琊,也不无重返桑梓之嫌。当时,夏人抵浙后,逐渐与当地土著融合在一起,并慢慢占居统治地位,后因怀念其先祖,故会稽一名及其与大禹的传说亦便出现在浙江了。这种例子不在少数,而司马迁因相距年代久远,不明其中底细,误把乔迁的绍兴会稽当作山东泰山附近的会稽,致使后人欲识其真面目,诚非易事。(见《绍兴会稽与禹无涉——兼论於越源流》,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

陈桥驿先生的《“越为禹后”说溯源》(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3期)文中即主张大禹巡狩会稽和死葬会稽的故事,是越王勾践强大以后,为了军事上、外交上和内政上的需要,有意编造出来,并加以散布,属托古之辞。少数民族为了政治上的原因而编造一种传说以自称汉族后裔的事,在以后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不足为奇。

曹操的陵墓之谜

曹操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建安二十五年正月(220年),他病逝于洛阳,终年66岁。同年二月,魏文帝曹丕遵照曹操生前遗嘱,将其遗体运回邕(今河北临漳一带)地安葬。

关于曹操陵墓的确切地点,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难解之谜。据《魏书·武帝纪·终令》记载:“初平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由此可知,曹操在他生前就已筹建陵墓,其位置当在西门

豹祠以西,周围有诸侯公卿的陪葬墓。东边西门豹祠,是邺地百姓为纪念战国时投巫入河、除暴安良的西门豹而建造的。在临漳一带,西门豹祠有多处。不仅如此,就连安阳、磁州境内,亦有西门豹祠。因此,要考证曹操陵墓,必先找到曹魏时的邺都三台村一带西门豹祠的确切之处。后世仅依据晋朝陆机《吊魏武帝文·遗令》中“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一语,多认为曹操墓就在今临漳县西面的丰乐镇西门豹祠一带。但丰乐镇西门豹祠建于天保五年(554年),有没有比它更早的呢?“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与“葬于邺之西岗上”,虽同用一个“西”字,但实际地点则大相径庭!如果将《终令》与《遗令》细细对照分析,就可看出后者有多处纰缪。为此,历史上曾有学者认为,引自陆机《吊魏武帝文》中的曹操遗令,可能有诈。(见梁章钜《三国志旁证》)

又,据《舆图备考》、《方舆纪要》、杨奂《山陵杂记》所载,曹操死后,恐后人发掘其陵墓,乃设 72 疑冢,使人真伪难辨,疑冢从临漳县三台村以西八里的讲武城起始,直至磁州而止,一座座如小山布列。历史上曾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到实地对疑冢作过考证,结果都一无所获。宋朝范成大《七十二冢》云:

疑冢在讲武城外,森然弥望,北人比常增封之。

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

闻说群胡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明朝俞应符《七十二疑冢》及清朝陈大玠《疑冢记》均认为,72 冢其中必定有一座葬有曹操的尸体。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1984年8月,笔者专程到临漳县古邺地,对疑冢作了实地踏勘。据临漳文物管理所的同志介绍,晚清年间,因闹饥荒,民盗发疑冢,冢内皆有尸骨,一为齐王陵,一为齐献武帝第十一子高阳王湜墓。一碑额题曰“公主为齐王四妹”。民国初,经人盗掘的疑冢内多有墓志,均系北魏、北齐时代王公要人墓。其中有魏故使持节

刘备的陵墓在何处

侍中、太保特进都督、雍州刺史安丰王妃冯氏墓，魏兰陵郡开国吴郡王墓，齐太祖献武皇帝第八子高清，齐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云州刺史景公等墓。史家认为，⁷² 疑冢可能是曹操生前所设，以惑后人，而北朝王公命妇则是“坐享其成”了。然而，曹操的真墓也始终莫得其所，使诗人、学者纷纷堕其云雾，发出“奸雄生前欺人，死后亦欺人”的慨叹。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曹操陵墓不是建造在地面上，而是建在漳河河底。其论据为，魏文帝《止临淄侯植求祭先王诏》中，有“欲祭先王于河上，览省上下，悲伤感切”之句。清代沈松《全健笔录》引《坚瓠续集》，佐证此说。其文云：“顺治初，漳河水涸。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旁有一隙，窥之黻然，疑其中多鱼，乃由隙入。数十步得一石门，心怪之，出招诸捕鱼者入。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倚或卧，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内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众人因跪而斩之，磔裂其尸。诸美人盖生而殉葬者，地气凝结，故如生人，既而漏泄其气，故遽成灰，独操以水银殓，其肌肤尚未朽腐也。”

此事近乎传奇，故不足信。又，笔者在临漳期间，曾听濮阳文管会同志介绍，1983年9月，当地社员在漳河大桥河床挖沙时，挖到过银元宝及银锹。近承临漳文物管理所的同志函示，漳河桥下出土的元宝、银锹，是明代皇家在此翻船遗落的，与曹魏墓葬无关。再说，曹操生前多次明言，不主张厚葬，曹丕、曹植的诗文中也都有“主薄葬”之说。

总之，集诸家言论观之，千百年来，人们对曹操陵墓的考证仅能因袭旧说，作大面积概论，谁也无法指出其具体的地点。

刘备的陵墓在何处

三国创始人，基业最大的是曹操，寿命最长的是孙权，可是他们的最终归宿处 漳河畔西门豹祠的曹操墓地，随之日月春秋逝去而已不可寻 孙权南京蒋陵在明初犹在，但自朱元璋毁鸡鸣寺建孝陵，它被留下来看陵门，此后虽然号称梅花山的孙陵冈尚存，但当年蒋陵的宏伟规模，亦仅是紫金山下一土丘了。

和魏、吴两个创业者相比，基业最小，称帝也短的蜀汉昭烈帝刘备，死后所葬的惠陵，已经历长达 1700 多年，风风雨雨，夕阳渔鼓，至今仍依傍着武侯祠巍然屹立。比起曹操、孙权的最后归宿，那是幸运得多了，就是从纵向比，也比他前后那两个曾割据四川称王立国的公孙述和李雄死无葬身之地要好些，总算有一块方寸的埋身之处，有诗为证：“君不见公孙跃马归乌有，悍骨知他何处朽。又不见李雄建多珠玉，麒麟古冢无踪迹。谁似君王百代思，鬼神呵护无尽时。”（明刘道开，见《古今图书集成》第五百九十六卷成都府部）

从现有材料，未见有惠陵被发掘、盗挖的文字记录。清褚人螭《坚瓠集》说：“嘉靖中，盗发蜀先主墓，数盗穴墓而入。见两人张灯对棋，侍卫十余。盗惊拜谢，一人顾谓曰：‘尔欲饮乎？’乃各饮以一杯，兼乞与玉带数条，命速出。盗出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也。视其穴已如旧矣。”此说借盗墓者进入惠陵受到惩罚的事，比喻刘备墓不可盗挖，也说明了刘备墓从未被盗挖。

可是中国历史几千年，帝皇几百个，很少没有皇帝陵墓被盗挖的，那么刘备惠陵为什么没有被盗挖？因此，两宋时候就有人怀疑，惠陵不是刘备真墓，它只是纪念刘备的衣冠冢。刘备的真墓只能是在他病死的白帝城（四川奉节）处。此说几百年来多有流传。

刘备的陵墓在何处

据说,二十世纪 60 年代郭沫若路过奉节城时,也说过刘备真墓不在成都,而是在奉节。

1985 年,陈剑提出刘备尸体葬在奉节说。他有三条理由:第一,奉节四月份后天气炎热,尸体最易腐烂发臭,要将它送到千里之遥的成都,实在不易;第二,据宋元以来典籍和地方志记载,甘皇后葬于奉节。而据《三国志》,甘皇后是与刘备合葬的,但她却没有葬在惠陵,可见刘备也是葬在奉节的;第三,刘备墓在奉节,在历史上多有传说,近年奉节城里多处出现人工隧道口,很像墓道,而且其走向均指向原府署(现县人民政府大院)。(《天府新论》1985 年第 3 期)

陈剑还说,近年,文物探测队曾使用超声波开展物探,发现在大院所在地底深处,埋藏有两个建筑结构,分别为 18 米到 15 米长,高 5 米。有专家认为它很可能就是刘备和甘夫人的真正墓葬。

但谭良嘯、吕一飞不同意此说,他们针对陈剑说作了批驳,认为刘备葬于惠陵,史志言之确凿。我国早发明尸体防腐术,至于甘皇后葬处,《三国志·先主甘皇后传》有详记,“后卒,葬于南郡(湖北江陵),章武二年,追谥皇思夫人,迁葬于蜀,未至而先主殂陨。丞相亮上言:‘……会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甘皇后)神枢以到,又梓宫在道,园陵将成,安厝有期。……故昭烈皇后(甘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臣请太尉告宗庙,布露天下,具礼仪别奏。制曰可。’”按刘备是公元 223 年(蜀汉章武三年)4 月,死于白帝城永安宫的。翌月,他的梓宫自永安宫护运到成都,八月安葬于惠陵,此处称“梓宫在道,园陵将成”,是指刘备之枢正在由永安运往成都的途中,成都的惠陵正在加速修建中。这份奏章是在白帝城(或正在途中)的丞相诸葛亮给成都的后主刘禅的,可见刘备和甘皇后确是合葬于惠陵的。谭良嘯等认为,“刘备虽死于奉节白帝城,但确系运回成都安葬。此事陈寿的《三国志》记载甚明,陈寿生长在蜀地,曾在蜀

国为官，岂能将国君的墓地错记？”（《巴蜀之谜》）

四川社科院学者沈伯俊也持“刘备惠陵系真墓”说，他提出“最简单的理由有二：（一）史书明言刘备还葬成都；（二）所谓天热尸体难运之说，亦站不住脚。秦始皇比刘备早死 400 多年，仍不顾路遥，还葬咸阳，到刘备时，防腐技术大有发展，何不可运尸回成都？”而“所谓奉节地下发掘古墓，实不可信”。

《三国志》记载应属可信，陈寿写《蜀志》且还引用了大批蜀汉档案材料，但他毕竟不是与刘备、诸葛亮所处同时代的人；而有关帝王陵墓因防百年后盗挖之灾，从来就是虚虚实实、假假真真，即使当时人员也未必能梳理清楚，所谓刘备的真墓假墓，那都是本本或传之于口碑之说。所谓奉节说，其所以能够不胫而走，扑朔迷离，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这里有人们对于古墓葬的新奇，更有对于刘备这个三国风云人物、一代枭雄的理念，而奉节确实和刘备有别致的地域姻缘，人杰地灵，由此推测和附会，以帝王传统的神秘行为而滋生自己的神秘感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有关人士已提出这个疑案，要解开它，看来仍得要作一番实地勘察才是哩！

寒山寺古钟今何在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首七绝是唐代诗人张继吟咏苏州寒山寺的绝唱。而寒山寺也由于张继的吟咏成为名扬千古的游览圣地，就是在日本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见诗名之盛。特别是使张继写出声情并茂诗句的那口钟，使中外游客无不为之向往。日本游客每年在岁末之夜都要专程到寒山寺聆听“夜半钟声”，并以此为荣。有趣的是，因

寒山寺古钟今何在

为张继诗中提到了“夜半钟声”，竟引起了一场持续到清代的笔墨官司。

宋代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一书中指责张继“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因为“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但他的指责却受到后人的普遍反对。南宋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盖公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唐诗纪事》曰：此地有夜半钟，谓之无常钟。继志其异耳，欧阳以为语病，非也。”《学林》、《诗眼》、《遁斋闲览》等书也都证明苏州寺庙有夜半敲钟的习惯。《苕溪渔隐丛话》、《野客丛书》等还引了不少唐代诗人如白居易、温庭筠、王建等人咏苏州夜半钟的诗句。直到清代，《渔洋诗话》、《全唐诗话续编》等书还在批评欧阳修的主观臆断。其实，历代诗人墨客到寒山寺游览后留下的诗句中，仍然可以发现寒山寺一直是夜半敲钟的，像宋人陆游“客枕依然半夜钟”、明人唐寅“客船夜半钟声渡”、清人王士禛“疏钟夜火寒山寺”等。由此看来，欧阳修的批评指责实在是想当然的主观臆断。

由于这场笔墨官司的渲染，寒山寺真成了“寺以诗显，钟以诗名”的游览胜地了。然而，使张继诗兴大发和使历代游人慕名而来的这口古钟如今何在呢？为什么现在寒山寺只有一口清代所铸的钟和一口日本钟呢？说来有趣，历经沧桑的寒山寺已经数易其钟了。寒山寺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初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502 - 519年）。这口钟也是当时所铸。到唐代，据《清一统志》载：“相传寒山、拾得尝至此”，才改名为寒山寺。至元朝末年寒山寺毁于战祸，以后虽经多次修建，却屡遭火灾，日趋败落。那口有名的古钟也不知去向。寺庙里是不可无钟的，所以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本寂禅师又主持建楼铸钟。唐伯虎曾写了一篇《姑苏寒山寺化钟疏》，记载了化缘募钟的始末。他的好友文征明还手书张继《枫桥夜泊》刻碑立于寺内。但没有多久，据《寒山寺志》记载：“钟遇倭变销为炮”，

文征明的手书诗碑也毁于火。直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巡抚陈夔龙才重修寺庙,并又铸了一口大钟。著名文人俞樾在《重修寒山寺记》中说:“堂之西尚有隙地,乃构重屋,是曰钟楼,铸铜为钟悬其上,以存古迹。”这口钟今天仍然悬于寺内西侧的八角钟楼上。俞樾还补书了张继的诗,这块碑刻也陈列在寒山寺的碑廊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口清钟铸成的同时,日本各界人士募捐集款,由小林诚义等一批日本优秀工匠精心制作,铸成一对青铜奶头姐妹钟,一口悬于日本馆山寺,一口送到苏州寒山寺悬于大雄宝殿内,同时还移来一批樱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侯爵还亲自撰写了铭文和铭诗刻于钟上。其铭诗云:“姑苏非异域,有路传钟声。勿说盛衰迹,法灯灭又明。”反映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及寒山寺的友情。寒山寺建成至今已历1400余年,古钟佚、明钟毁,现在只有清钟与日钟互为辉映、声韵长存了。

那口珍贵的古钟究竟哪里去了呢?这个谜已经有人揭示过了。康有为在庚辰年(1880年)2月25日到苏州寒山寺游览,看到古钟早佚,明钟又毁,大为感慨,写下了一首七绝:“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枫。勿使丰干又饶舌,他人再到不空空。”在题款中又云:“唐人钟已为日人取去。”康有为博学多览,所云必有所据,可惜未点明出处。无独有偶,日本人也认为古钟流入日本。伊藤博文在赠钟铭文中说:“姑苏寒山寺,历劫年久,唐时钟声,空于张继诗中传耳。尝闻寺钟转入我邦,今失所在,于山田寒山搜索甚力,而遂不能得焉。”他究竟据何“所闻”,于今也无从查考,真是令人十分惋惜。或许有一天,谜底终被揭示,古钟重见天日,不但与张继之诗珠联璧合,也可为中日友谊的一段佳话。

岳飞墓之谜

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是个阴暗的岁末,抗金民族英雄岳飞,以及岳云、张宪等,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杀害于狱中。国都临安的老百姓无不涕泣,“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七)。今天游人来到杭州栖霞岭的岳飞墓前,凭吊这位十二世纪的爱国将领,也不免百感交集,向这位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深深鞠躬。但是,这个墓里是否真有岳飞的遗骨,却始终是历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民间传说中,杭州众安桥下十七号被认为是岳飞葬处。此地是南宋临安城中比较繁华的地方,紧靠御街。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杭州府司狱吴廷康,正式确定此地为岳飞葬地。且筹集大量银两,营建岳飞墓、岳飞庙,又刊印了《岳忠武王初瘞志》,在当时影响颇大。

一些文字资料则载,岳飞葬于杭州九曲丛祠旁的北山之漏,即今杭州昭庆寺以北一带。当时“飞死于狱中,梟其首”(《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七)，“狱卒隗顺负其尸出，逾城，至九曲丛祠中。故至今九曲王显庙尚灵。顺葬之北山之湄”(《朝野遗纪》)。据说隗顺死时“谓其子曰：‘异时朝廷求而不获，必悬官赏，汝告言曰：棺上一铅箠，有棘寺(大理寺)勒字，吾埋殡之符也。’后果购其瘞……其子殆上台，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尚可更敛礼服也。”其他如明万历十年刊本《汤阴精忠庙志》、嘉靖时刻的《西湖游览志》、清康熙时编的《钱塘县志》等，均采用此说。从当时情况看，大理寺在钱塘门内，而“钱塘门沿城而北，旧有九曲城”(《西湖游览志》)，王显庙则在钱塘门外九曲城下，宋绍兴时建(据《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

狱卒隗顺背负岳飞尸体逾城,就近出钱塘门来王显庙当属可能。

至于今天所见的栖霞岭岳飞墓,是否是假坟,也难以说清。我们知道,岳飞遇害后人们一直要求为他平反昭雪,但宋高宗始终置之不理。到了宋孝宗即位,为了给太上皇保留体面,假称“仰承”高宗“圣意”,给岳飞恢复官爵与名誉,此时距岳飞遇害已 21 年了。《金陀续编》卷十四载有淳熙六年(1179 年)岳飞之子岳霖等《赐谥谢表》,其中讲到朝廷昭雪岳飞冤案,说“葬以孤仪,起枯骨于九泉之下”。中国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南宋绍兴十年,朝廷曾特授岳飞为少保,故岳霖称“葬以孤仪”。其上曰“起枯骨于九泉之下”。若记载无误,当指将岳飞之遗骨改葬于栖霞岭(当时称“西湖覆泰山剑门岭”)无疑。